



刘少奇选集

(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刘少奇选集

上 卷



刘湘

目 录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 (一九二六年五月)	1—3
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4—5
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6—9
一 工会代表会	6
二 工会基本组织	7
论口号的转变(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10—13
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一九三二年一月 十八日).....	14—18
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	19—22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23—33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一九三六年四月).....	34—40
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41—45
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46—54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一九三七年五月).....	55—71
彻底的转变	55
党和群众的关系	59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	61
党的转变	64

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一九三七年五月).....	72—79
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九三七年 十月十六日).....	80—89
一 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	80
二 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胜利的可能	82
三 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	85
四 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与抗日政府的组织	88
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一九三七年 十月)	90—93
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电(一九三七年 十月二十日).....	90
给贺龙、关向应及华北各地党组织电(一九三七年 十月二十二日).....	92
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七年 十一月十五日)	94—96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三九年七月)	97—167
一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	97
二 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103
三 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	108
四 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	112
五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	121
六 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129
七 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	136
八 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	148

九 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	153
坚决粉碎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一年五月)	168—169
论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170—177
论党内斗争(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178—217
一 引言	178
二 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与党内斗争中的偏向	181
三 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之表现	190
四 关于党内的无原则斗争	200
五 怎样进行党内斗争	209
答宋亮同志(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	218—222
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	223—232
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233—241
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	242—244
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三月)	245—287
抗战准备时期与抗战初期华北工作的经验	245
抗战初期与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经验	266
对华中工作的意见(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	288—289
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九四三年七月)	290—301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302—306
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四月)	307—313
论党(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	314—370
一 引言	314

二 关于党章的总纲	321
第一,关于我党的性质问题	322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332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	337
第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342
五 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358
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371—372
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一九四五年 十一月—十二月)	373—376
一 十一月二十日的电报	373
二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电报	374
三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电报	375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377—383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	384—395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396—407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十四日)	408—418
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	419—425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九四九年六月)	426—431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一九四九年九月 二十一日)	432—435
注 释	436—464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 与职工运动方针*

(一九二六年五月)

(一)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之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1]中,更有长足之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各地惨杀案均因镇压罢工而起,惨杀结果以工人死伤为最多。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二)一年来,职工运动均被军阀压迫与摧残,尤其在“五卅”运动时,奉直军阀^[2]摧残工人阶级更为惨酷。由这些事实,更可以明了国内军阀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和走狗。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即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可以证明必须打倒军阀,方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

*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至十三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是大会秘书长,受大会主席团委托,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报告分五部分:一、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意义及其前后的中国职工运动概况;二、“五卅”运动;三、反奉战争;四、全国职工运动之现状及其趋势;五、结论与进行方针。收入本书的是第五部分,原载这次大会会刊第十一期。

胜利。

(三)中国资产阶级^[3]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而且当无产阶级起来参加革命时,或要求生活改良时,资产阶级就马上反动起来了。“五卅”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已够我们领教了。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候,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强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

(四)中国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过去一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证明小资产阶级是有力量的,能革命的,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工人阶级并应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

(五)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各处的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方法,在农民的一切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援助之。工人阶级确定自己奋斗的方式时,必须顾及农民的利益。

(六)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之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现在各处工人群众都有统一工会组织之呼声,比如香港、广东工会之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二十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

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

(七)工会为工人群众之经济组织,所以必须公开。现在中国的工会尚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社会的承认,中国工人阶级为要发展中国的职工运动,必须积极地公开地开展争工会条例的运动,即使不能争得工会条例之颁布,亦可引导中国工人群众走到政治争斗的路上。中国职工运动,必因此种争工会自由的运动而发展。

(八)过去一年的职工运动,固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争斗,但其中处处都可看到工人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争斗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

(九)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一年的伟大奋斗中,已经惊动了全世界,世界工人阶级均起而注意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联合因此更加密切。如在“五卅”罢工中,各国工会来文电援助者、示威捐款援助者、派代表来华联络者,已不知若干起。今后中国工人阶级应在各种行动及组织中,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更亲密之联合,促进世界革命。

(十)中国职工运动迅速发展,工贼亦同时猖獗。各处工贼破坏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们应设法对付工贼之破坏,工会中应有自卫的组织。

廖仲恺^[4]先生与工农政策^{*}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才可成功,但中国工农阶级,是社会各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中之主要力量。担负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国国民党^[5],一定不要忽视这个主要力量。有单独扶助工农运动发展的工农政策,中国国民革命才可成功。

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其所以尚未成功的缘故,就是没有得到占国民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积极参加。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才有积极的工农政策,订下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纲,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引导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国民革命的势力,才一天一天发展,一天一天巩固。

廖先生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对于工农阶级不可与其他各阶级一样看待。依照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工农政策,积极帮助工农组织之发展,并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曾著极大的成效——统一了广东,稳固了国民革命的基础。因为要得到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为革命拚命,必定要使这个革命与工农群众发生切身利害关系。工农群众不是可以骗得来革

* 这是在廖仲恺遇难一周年时写的悼念文章,原载省港罢工委员会办的《工人之路》第四一二期。

命的。一定要真确地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继续不断地增加工农群众的利益,真确地谋得工农的解放,这样,自然可以得到工农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参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远。廖先生是首先执行工农政策的一个人,极力扶助工农运动的奋进,虽然经过很多的困难,受了很多的诬蔑,仍然行之不止。廖先生确实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及工农群众所占之位置。廖先生之所以伟大,廖先生之所以为国民党的模范党员,实即以此!

廖先生为执行工农政策,与中国工农群众发生了切身的利害关系。认为廖先生的存在有损自己利益的反动派,乃不得不买凶刺杀廖先生。可是全国的工农群众丧失了廖先生,就是丧失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廖先生遇害的今天,全国工农群众安得不纪念廖先生,努力继续廖先生未竟的事业,谋得自身的解放!呜呼!廖先生之死以此!廖先生之不死亦以此!

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 工会代表会

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变成专制。

所谓民主集权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即凡事须经过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一决定以后,即必须实行。各会员在一事未议决以前,均可自由地发表意见,若一经会议议决以后,则无论什么人均须服从。这样,一方面可以容纳群众的意见,一方面又可一致地与敌人作斗争。

有了上面的理由,所以每一个工会要有一个代表会。有了代表会,才可把工会的权力集中起来,同时又是民主的集中,不是少数人的专制。所以,工会的代表会是集中工会一切权力

^{*} 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为了指导蓬勃发展的职工运动,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刘少奇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由当时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行。收入本书的是《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的序言。

的机关,一切权力归于代表会。这样,于工人的团结、工会的前途,均有莫大之效益。

一个工会,如果没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这个工会就不能接近群众,就不是工人的工会,就变成了少数领袖的工会。工人与工会一有隔膜,工会的团结就不坚固了,敌人乘隙进攻,从事破坏,制造谣言,煽惑群众,工会前途因而危险。所以,代表会是任何工会不可缺少的组织。没有代表会,工会就危险;有了代表会,工会就坚固。

工会全体会员大会,应该是比代表会更高的权力机关。但事实上会员大会不能常开,且以人数众多,难于讨论各种问题,故在组织上反不及代表会之重要。

现在武汉的工会,没有代表会的很多,望各工会赶快按照规定,把代表会组织起来。已有代表会的工会,望切实整理,使代表会真正能够行使职权,按期开会。各工会代表会的组成,就可使各工会的团结巩固,各工友、各工会的办事人不可不切实注意。

二 工会基本组织

工会这个群众的奋斗机关,在革命中所负的责任,极为长久重大。因此,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

工会的群众很多,若无支部等基本组织,而仅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的招牌,那会员愈多,愈加散漫。这样的工会,

是不能奋斗的,执行委员会是无法统率群众的。比如军队,若只有一个司令部,底下没有营连排等下级组织,则这个军队就没有法子进行战争。所以,一个工会若没有支部、小组等基本组织,或有支部、小组而不起作用,则这个工会的组织就不健全,行动的时候就必感受很大的困难。我们要懂得,支部、小组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建筑在支部、小组之上,支部、小组若不坚固,工会的基础就不坚固,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工会有了支部及小组之后,工会的行动就非常敏捷便利。一旦有紧急的事情发生,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后,即刻通知各支部及组长与会员,在一二小时内,全体会员均可动作,而在形式上不费什么手续。若无支部及小组,如要使全体会员动作,则非开大会、发传单或出布告不可。如此,非费一二日之时间不能使会员全体知道,但若费去一二日之时间,时机已过,虽行动亦无效果了。这于工会是何等大的损失啊!

此外,工会有支部及小组,可使工会的行动秘密起来,不致为敌人所破坏。工会对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也可便利施行。各方面的消息亦极灵通。工会易明了工人的真实情形,工会的工作情况可常向各支部报告,使工人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不致发生什么误会和隔膜,于群众的团结亦有极大的效益。工会若无支部等组织,则工会的行动无法秘密,工人训练与教育亦难施行,消息既不灵通,情形又多隔阂,如此而想工会有力量,团结得坚固,实为不可能。所以基本组织在工会中真有极大之功效。凡各工会及工友不可不努力进行组织。

工会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均是工会必要的组织,缺一不可。现在,武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已经通通有了,但还有很多工会没有代表会及支部。同时工会的经济问题也极为重要。我们为武汉的工会在加过工资之后,更进一步地团结和巩固起来,并消除内部的危险,特费了几夜的工夫,很简要地写成《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及《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交总工会宣传部印行,以备各工会及工友采纳施行。望我工友过细观看,如有错误之处,仍希指正。

论口号的转变^{*}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在群众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它包括争斗中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众的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因此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争斗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如果争斗的形势已经改变,口号不及时地随之而改变,群众即没有一致的目标,将使争斗不能继续前进,无力而至于溃散。不仅全国革命争斗的口号是如此,即在一个工厂或乡村中小争斗的口号亦是如此。

我们每每因不能明确观察当时争斗的形势转变并据以转变我们的口号,所以发生了许多错误。大之如资产阶级叛变后代表我们许多错误政策的口号,小之如工厂及农村中许多或左或右的错误口号,都是因我们没有依争斗的形势来恰如其时地转变口号,发动争斗,以致脱离群众或使争斗紊乱、无力而溃散。

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

* 本文原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一期。

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在群众中是无力的,不起作用的,根本不能号召群众的。

我们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应该采取许多真实的材料,切实到群众中去了解各部分群众的生活与情绪。绝不可单凭某一部分群众一时特殊的表示及几个领袖一时激愤或悲观的报告,就认定全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是如此,而规定或转变我们的口号。过去我们的许多错误,大半是因为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和估量不能深切和正确的缘故。

口号有不同的性质。有宣传的口号,鼓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最后就变成指令。凡代表一个比较长时期的争斗任务的口号,总是要经过从宣传到鼓动到行动的步骤。例如“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⁶⁾”、“打倒帝国主义”等,又如某些工厂中的“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八小时工作”等。这些口号从普遍的宣传解释,使群众了解接受,到造成实行这些口号的坚定而忠实的执行者和群众基础,其性质还是宣传的性质。当实现这些口号的时机已经成熟,应争取广大的群众到这些口号之下并组织他们预备去实现这些口号,造成实现这些口号的群众力量时,这些口号就变成鼓动的性质。在群众力量的准备已经充分,可以推动群众运用实力直接行动去实现这些口号时,这些口号就变成了行动的口号。最后调集群众,分配任务,配置各种力量,坚决彻底地去执行这些口号,这些口号就变成当时的实际指令了。

一个重要的口号,总是要经过这些转变,经过在实际斗争中对于群众的宣传与训练,才能变成行动的口号,使群众自愿地为实现这个口号来争斗。过去我们分不清口号的性质,将宣

传鼓动的口号与行动的口号及指令混淆,如是就发生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去争斗、去暴动、去执行这些口号的现象;或者群众已经接受这些口号,已经直接用自己的行动上执行这些口号,而我们却不将这些口号变成行动的口号及指令去领导群众,致使群众的争斗紊乱而至溃散。

在每个工厂、作坊及乡村群众小的争斗中,口号的应用也是如此。我们要懂得当时革命的总的战术与策略,要明确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与心理,要充分搜求群众普遍的及特殊的痛苦之所在,而按期规定这个工厂、作坊及乡村的要求大纲或行动大纲,就是将群众的痛苦与要求变成简明的口号,作经常普遍的宣传鼓动,使群众渐渐在这些口号之下团结起来,活跃起来。

我们要找机会来发动群众的争斗,来实现这些口号之某一部分或全部。我们要用极敏锐的眼和耳去搜求工厂及乡村中发生的临时问题,如打人骂人、开除人处罚人以及减少工资、延长工时、欠饷、勒索、逼债等,拿来讨论分析,根据行动大纲规定对每个临时问题的简明口号,到群众中宣传鼓动。固然不是每个临时问题都能发动群众争斗,但每个问题上都有我们的宣传鼓动为好。在群众最气愤、利害关系最大最普遍的问题上,会爆发群众的争斗,我们就要善于领导这种争斗,正确地运用及转变我们的口号,使争斗一直发展下去,使群众的争斗情绪发挥尽致。

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可过早,过早了,群众不能接受或产生惊疑,甚至将群众吓退。不可过迟,过迟了,群众的气势会低落,或群众自动干起来使行动不能一致而

至紊乱。有时,甚至只有十分钟是转变旧口号及提出新口号的最好时机。

行动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有些行动口号适用的时间愈短就愈有效力。口号太多了,太长了,叫得不顺口,意思不明显,不切合群众的要求和心理,叫得太久而至于厌烦,引不起注意,都不适合作为群众行动的口号。

各种小争斗中的口号之规定及转换,应努力使之一步一步地与当时总的口号——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相接近。

在群众退却的行动中,及时地转变我们的口号尤其必要,尤须特别慎重规定。它的目的是使群众不致气馁,不致溃散,保存群众的组织,指示群众的出路,激发下一次继续争斗的情绪和决心。

在争斗结束时,应该有争斗后的口号,提示在争斗后的中心任务,引导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完成这些中心任务,并激发继续争斗的情绪,准备下一次更广大深入的争斗,同时记取过去争斗的经验。

在群众的各种小争斗中,应该特别注意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提高群众对于我们各种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的认识,指示群众争斗的最终目的,争取群众到我们各种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之下来。这就是说,宣传的口号应该与行动的口号及群众目前的要求分开,但不是群众的争斗中放弃我们各种主要政治经济口号的宣传。恰恰相反,在群众的争斗中,应该加紧宣传我们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去争取群众。

批评“退出黄色工会^[7]”的策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

因为大东书局的工人退出出版业工会^[8],引起我们中间一个争论。就是赤色工会^[9]是否应该训令自己在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及其所领导的群众(他们在黄色工会中还是占少数),从黄色工会中退出来?

在我们所有的决议案上,都没有规定过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不知道同志们为什么现在提出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来。有同志说,现在的客观形势比几个月前大不相同了。似乎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在几个月前是不正确的,到现在就变为正确的了。可惜这位同志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目前客观形势的变动,使我们对黄色工会的策略必须转变,必须提出退出黄色工会的口号。

在我们的决议案^[10]上都是这样规定的:赤色工会应使自己的会员打入(或加入)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不应加入),在里面建立革命反对派,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当着黄色工会之下的群众大多数到了反对派的领导之下,就可从黄色工会中分裂出来。决议案的意思是很明

* 本文是为反对白区工人运动中一种左倾错误策略而写的,原载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二十八期,署名仲麓。

白的：(一)觉悟的工人应加入黄色工会；(二)只要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能够到里面去接近群众、争取群众，就应该加入，不管这个黄色工会是一个工厂的或几个工厂的，或是黄色工会的总工会；(三)在革命反对派领导了黄色工会大多数群众的时候，就可以分裂出来；(四)承认觉悟的工人和革命反对派在黄色工会里面去争取和接近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比在黄色工会外面要好些、容易些；(五)革命反对派还只在一个工厂、店铺的工人中占有大多数，但在整个黄色工会的会员中还是少数的时候，不应该分裂出来，更不应该消极地退出来。

现在正是我们加紧执行上列决议案的时候。群众已经到处起来反对黄色工会，国民党^[5]的各派正从黄色工会里面和外面利用群众的不满来争夺黄色工会的机关。赤色工会和革命反对派应该和群众在一道，扩大自己独立的宣传鼓动，团结群众，领导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各派，揭破各派的欺骗，进而驱逐各派的黄色领袖，从新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国民党各派断绝关系，消灭黄色工会^[11]。目前我们的策略并不是需要转变，而只是要加紧执行。在目前的变动中，有些蒋派^[12]的黄色工会，过去是有群众的，将来会变成没有群众或被消灭；同时又有些新的改组派^[13]的黄色工会起来。但我们的策略在原则上并不需要变更。那些已经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就不要加入或留在里面；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还是应该加入或留在里面的。

在目前，如果有人主张与黄色工会中国国民党任何一派联络去“打倒”另外一派，这结果就不过是把蒋介石的人换上汪精卫^[14]的人，或将来又换一批国民党其他派别的人，但工会

总还是国民党工会。这完全是投降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如果有人主张革命反对派要退出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脱离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让这部分群众去受黄色工会领导的欺骗和愚弄,结果也就是维持了黄色工会的存在。

有同志认为:在包括许多工厂企业的黄色工会(如出版业工会,报馆工会,铅印工会等)中,革命反对派虽然在整个黄色工会之中还是少数,但在一个工厂占了大多数,就应领导这个工厂的工人退出黄色工会,成立这一个工厂的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对立。同时号召其他工厂的工人也退出黄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对立,成立各自的独立工会。他们想用这种“退出”的策略来消灭黄色工会。这种策略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一)这个工厂的工人退出黄色工会,就会取消或削弱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二)这个工厂的工人更难接近还留在黄色工会下面的其他工厂的工人,就是与其他工厂的工人更脱离;(三)一个工厂的工人或者几百人、几十人、十几人,他们组织一个很小的独立工会与几千人的黄色工会对立,于工人不是有利的(国际五次大会^[15]决议上说:任何情形之下都要建立独立工会是有害的主张);(四)由一个统一的工会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小工会(一个厂一个工会),实际上是一种分裂政策,这种分裂对于工人阶级不是有利的(虽然在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情形下,我们是不怕分裂的)。

有同志说:这个工厂的工人退出黄色工会之后,可以不再受黄色工会的欺骗,更易于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还易于争取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并且还可

以加紧做其他工厂的反对派的工作。相反,如果这个工厂的工人不退出,那就一切都难以进行,并且到明天黄色工会领袖来个欺骗,这个工厂的群众就有对黄色工会领袖发生幻想的危险,所以非在今天立即退出黄色工会不可。这是什么话!这难道不是完全否认了我们的决议吗?我们号召觉悟的工人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反对派,难道不是因为到黄色工会里面去更容易接近群众,更容易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更容易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更容易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更容易消灭黄色工会吗?如果说,觉悟的工人站在黄色工会外面进行这些工作,比在黄色工会里面更容易些,那加入黄色工会建立革命反对派的决议就是发疯。如果这位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那不独革命反对派应退出黄色工会,连加入黄色工会的策略就根本是错的。

有些自称觉悟的工人,他们惧怕明天黄色工会领袖来一个欺骗而成为黄色工会领袖的俘虏,他们连黄色工会的名字也不愿听,他们一天也不能忍耐,自己马上要从黄色工会的“泥坑”中退出来,以便保留自己的“清白”,做个“模范”,好叫那大部分还留在黄色工会的“落后”的工人们看了,照自己的样做。如果有人不赞成他们这样做,他们就说“你们打击了我们反黄色工会的情绪”。这是标本式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好听的言词下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我们应该向这些人说:你们好是好,可是你们不是布尔什维克^[16],布尔什维克是能够跑到黄色工会的“泥坑”中,进行长期的耐性的艰苦工作,把那大部分陷在黄色工会“泥坑”中的“落后”工人们拯救出来。有同志对

这种说法不能忍耐,他说:等到什么时候那大部分工人才觉悟过来呵,这是等待主义啊。同志,这不是等待主义,这只是叫那些觉悟的工人暂时留在黄色工会里面,加倍努力地进行反黄色工会和争取群众的工作。为进行这种工作,就不能因为厌恶黄色工会这个“泥坑”而裹足不前,因为在这里还有大部分的群众呢。

黄色的总工会是否应该加入呢?我们只问:在这个总工会里面是不是有群众?我们是不是到里面去能够接近他们下面的群众,做自己的宣传?如果是的,那我们就应该加入。在我们的决议案上,并没有规定只准加入黄色工会在企业中的下层组织。

有同志说:脱离黄色工会的组织后,赤色工会还可以派代表参加黄色工会的会议,提出自己的主张。我不知道怎样可以参加!

有同志以为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活动,就要革命反对派退出黄色工会,来建立独立的赤色工会。实际这不是使我们的活动走向公开,而恰恰是走向秘密。

至于大东书局的工人退出工会,主要是资本家利用工头号召工人退出工会,好向资本家去要求复工。我们当然不赞成资本家这种破坏罢工的策略。

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

苏维埃^[6]革命,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霸占的土地转给了农民。虽然革命在今天的阶段上还没有剥夺一切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但是我们已实行工人监督。苏维埃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已经大规模地组织了苏维埃的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农民们和苏维埃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们,他们在以前是为地主资本家工作,现在是头一次为着自己工农劳苦大众而工作。

目前,在苏维埃革命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工人阶级一切福利的基础,是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是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扩大和在全中国取得胜利。“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这就要求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们,为着战争,为着苏维埃的胜利,为着工人阶级全体长久的利益,而自觉地努力地工作。因为苏维埃企业与合作社企业的发展、巩固与生产力的提高,是直接关系于战争的胜利,关系于工农劳苦群众生活的改善,而且这是准备着将

* 一九三二年冬,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本文是为革命根据地的工人写的,原载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五十四期。

来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经济基础。

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们！你们该记着，你们现在再不是为地主资本家而劳动了，而是为工人阶级自己、为人类的最后解放而劳动着。这种劳动的性质的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你们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

在国民党⁽⁵⁾、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下，工厂、矿山及一切生产交通工具，是拿在资本家、地主或国民党政府的手里。资本家、地主为着他们少数寄生虫穷奢极欲的生活，强迫工人饿着肚子牛马似地为他们劳动，生产利润。在这种情形下，工人为着吃饱饭，为着工作与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反对工厂主，反对剥削者寄生虫，不惜采用罢工、怠工及各种带破坏性质的手段，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是，在苏维埃政权下，苏维埃的工厂企业与合作社企业，是工农大众所共有的财产。它不是为着剥削工人、生产利润去供养一部分寄生虫，而是为着供给战争，为着供给工农大众的需要，为着创造人类最大的幸福而生产。因此，国家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应该爱护自己的——民众的工厂企业，把自己所有的技能与天才贡献出来，为着发展和巩固苏维埃企业与合作社企业而斗争，而努力生产。

我们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大多数能够了解这一点。他们用了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他们感觉到现在是为着自己而工作了，很大地发挥了他们的劳动热忱，创造了劳动的新形式——生产竞赛、生产突击队、义务劳动，及为苏维埃与合作社工作而自动减低工资等。他们了解这不是为着哪个生产利润，

而是为着战争,为着工人、农民自己,应该如此地去劳动。但是,在国有企业、合作社及其他为苏维埃、红军工作的工人中,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了解这一点,他们还是用旧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用旧的观念来看待民众的工厂与财产。他们对待苏维埃的、合作社的工厂与财产,和对待资本家的工厂与财产一样:少做些工,做得坏些,偷点把子懒,拿些公家的东西自己用,随便损坏公家的东西,为着不满工厂个别负责人不当的处置而实行怠工,不守厂规。这样的人,在我们工厂中还是不少的。这些人还是用旧的习惯的观点来对待苏维埃的工厂与财产。甚至还有反革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他们的走狗,在工厂中进行各种破坏——故意损坏机器、工具,大批浪费材料,生产大批坏货,煽动工人罢工、怠工等。

“为自己的劳动取代强制的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¹⁷⁾。几千年以来的旧习惯,要在艰苦的长期的教育与斗争中才能消除。因此,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同旧的习惯作斗争。

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应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即使是细小的问题)上,来实现这种教育与进行这种斗争,把工人组织到自觉的生产竞赛的队伍中来。应该拿住一个工人无故迟到十分钟的问题,一个工人拿公家的木炭去烧私菜的问题,某几个工人偷懒不能完成生产数量的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坏现象,在工人大会上,在墙报与报纸上公开指出来,批评他们,教育群众。

在国有企业中,必须与破坏劳动纪律、违犯厂规、偷窃公共财物、浪费材料及怠工偷懒的现象进行坚持的不调和的斗争。把那些最坏的分子的名字,写到黑板上去,甚至把他们赶出工厂,放到监狱里去。因为他们有意破坏神圣的公共财产,他们是民众的敌人。

把那些真正的突击队员——劳动的英雄们,列在红板上!极大地在群众中奖励他们。因为他们是革命战争中生产战线上的先锋与模范。

打击最坏的分子,奖励模范的好的工人,是为着教育广大的群众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使得工人群众了解民众的公共的工厂与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解工人阶级全体的长远的最大的利益在哪里,了解共产主义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对广大的群众进行教育,才能更顺利地组织与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为自己为苏维埃为革命战争而努力工作。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立三路线^[18]在各种基本的重要问题上被克服过来了。但立三路线之中的一个问题,至今还残留在党内,还没有被完全克服过来,那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因为这个错误长期残留在党内的缘故,因为在党内揭发与反对这种错误之斗争异常不够的缘故,更因为这种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千百次重复表演的缘故,所以它给党、给革命的损害也最大。如果从今天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来看,那末,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成了党的主要危险。

今天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对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

* 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到天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为了贯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肃清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写了许多文章。本文原载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五期,题为《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文中“立三路线的残余”主要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过去若干年来所给予党的损害之具体事实,差不多每一个党龄较长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和参加过群众斗争的同志,都可以说出很多来。如果简单地说,那就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当我们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积蓄了一些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当我们在反日或某种口号与纲领之下,创立了公开的比较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时,它不把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弄到这种组织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16]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还有根本就不到群众中去,仅仅坐在房子内空叫的关门主义。至于在党内斗争中对于这些事实采取什么态度呢?那就是: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塌台的、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跑了的同志有奖,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做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艰苦工作中谨慎将事的、把组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同志,倒少有不给他们戴“和平发展”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撤销工作的处分。这就造成党内许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巩固和发展。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六大”的决议^[19]说:“准备武装起义”;最近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0]说:“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在大城市中所做的,恰是与这些决议相反。当我们的工作仅仅在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做好了,就要指挥这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去和敌人决斗,要这些工厂学校单独举行政治的罢工、示威游行,给予超过他们当时力量所能胜任的斗争任务。党内许多同志跑到这些工厂学校去,在报纸上宣布这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等,结果就没有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我们开始有了一点基础和力量,就这样被消耗和浪费掉,这就自然不能积蓄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所以每到一个重大事变(如“九一八”^[21]、“一二八”^[22])来临,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时,我党常因自己在群众中缺少基础和力量而无从执行当时所提出的任务感觉痛苦。我们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不知道只有将那些已有的工作、组织和力量保存与巩固起来,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去扩大与加强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我们同志常常是急性的、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总是盲目、莽撞。结果不能不使得我们的工作环境与条件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红军中,要保存与爱惜我们的力量,要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作战,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击敌人较弱的一点,以取得胜利,那末,我们在白区城市中指导群众斗争,却完全是违反这种战略战术原则的。对已有的力量,尤其是对群众中的领袖与干部,不设法保存与爱

惜,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只要是纪念节就同敌人作战,不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而盲目地进行斗争。结果,我们在红军的斗争中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而在白区中心城市的斗争中则与此相反。

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为什么在形势与条件不好的时候,眼看着要受到敌人严重的打击还不停止这些事呢?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不承认形势与条件也可能对示威有不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礼拜日”,不管天晴落雨总是要作“礼拜”的。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我们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而是常常要群众去背诵我们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口号,或是提出今天群众还不了解、还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强

迫群众斗争。甚至不经过群众的同意,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同党一样的、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允许的宣言、传单和文件。对于任何一次群众斗争,不管条件怎样,都要机械地“坚持到底”,即坚持到任何力量都耗费尽了才止。在形势极不利于战斗继续延长的情况下,他们还认为“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斗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提议是机会主义。这样,就使得群众斗争不能发动;或者在斗争发动后,群众离开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或者放弃了某些胜利的条件、机会,使斗争受到打击,直到最后的失败。他们领导群众的方式与领导党组织的方式一样,使群众团体的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结果在侦探严密监视下,就没有法子不使群众团体的组织也缩小到和党的组织一样。

当着群众或者某些派别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反对现政府时,只要他们的口号纲领不完全和我党一样,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不积极去参与与援助这些斗争、帮助他们达到目的,并努力使斗争扩大,以实现更大的要求。我们的同志常常是站在旁观的地位,忙于去批评这些斗争、口号和纲领如何不彻底,如何成为反革命的欺骗群众的东西,咒骂这些斗争的领导者,甚至号召群众脱离这些斗争,去反对他们的领袖。结果,把这些群众和同盟者完全关在门外。群众或某些人要起来抵制日货,我们同志忙于批评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不去参加、赞助这些人抵制日货,使之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群众与某些人提出口号要枪毙王正廷^[23],我们同志忙于批评这是反革命欺骗群众的口号;某某人拿出钱来援助反日罢工工人,我们同志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某某派提出工农商

学兵大联合抗日,我们同志硬要把“商”字去掉;“九一八”日本武装占领了满洲,我们同志却强调地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这样,怎能使我党和同志走到广大群众中去!

当着我们在某种部分的纲领和口号之下,团结了比较多的群众和各种派别的人在我们周围,建立了真正的群众组织时,我们同志是一个纲领之后再加上一个纲领,一次冒险斗争之后再加上一次冒险斗争,使这些组织中的群众和同盟者完全离开,直到剩下我们同志几个人。上海工联^[24]、反帝同盟^[25]、民众抗日会^[26]、左联^[27]、社驳^[28]以至许多工会,开始时都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志总是不会把这些组织的群众基础更加扩大,而只会把它缩小到完全没有群众。在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总不能容许其他派别有一个人和我们共事,而必须是“清一色”。我们夺取了黄色工会^[7]的群众和领导机关,总是忙于把它“转变”成赤色工会^[9],以至弄到塌台。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似乎是不许党外再有群众组织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而我们同志常常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和黄色工会。我们同志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

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地进行。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地进行。但我们同志所做的恰与此相反,许多可以公开的工作,要拿到秘密机关来做,许多可以公开发表的主张、论文,要拿到秘密刊物上来发表,或是发行秘密的传单、宣言等。我们同志忽视与放弃公开工作的可能,而把秘密机关无限制地扩大起来,秘密的刊物、文件特别多,特别长,一般文件“机械化”、“八股化”,这样就使群众工作极端缩小,而使秘密机关到处膨胀,结果是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但我们所做的是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混淆错杂起来,这样就破坏了秘密工作,妨害了公开工作。我们同志甚至在秘密的刊物上宣布某些群众行动、某些群众团体、某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在某些地方开了某些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某些事项,便利了敌人来监视我们。在某些地方或工厂,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活动还可以避开敌人的耳目,但我们同志在这些地方却完全无必要地散发党的秘密传单,写出党的口号,使敌人能从这些地方来找我们。对公开的群众团体,不是设法让它更公开些,范围更广泛些,而是要使任何公开的范围都逐渐缩小,直到完全不能公开,甚至要把工人中一切灰色的公开的附属组织^[29]都转变成

为赤色工会,说是什么“赤色工会的中心作用”。结果就是取消一切公开工作,使一切附属组织都秘密起来。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轻视经济斗争,对经济斗争的重要性的意义估计不足,不了解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要机械地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而我们硬是一成不变地提出这么多纲领、这么多口号,少了一条也不行,结果是拒绝了这些同盟者。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也在党内组织问题上严重地表现出来。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进党内来。党内斗争许多是过分的、机械的。对于那些思想上、理论上没有准备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的错误,关门主义者硬要依照直线的理论,说这是“系统的机会主义”,替他造出系统来。下层同志的自动性、创造性、自我批评被抑制着,在党内造成了害怕犯错误,害怕犯右倾,害怕说话,不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些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哪里?负责者是谁呢?自然我们不能怪那些下层的同志,而是领导机关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不采取同志式的、诚恳的态度爱惜同志和教育干部,往往是过分地打击同志与干部,把打击下层组织、打击干部的错误斗争方式,认为是“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取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推动下级和干部的工作。我们

没有在党内造成同志不怕犯错误、不怕批评、欢迎批评和放手工作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发展下层同志自动性与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以上这些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使某些部分的群众和同情者对党产生某些疑惧，使许多企业中的很好的同志和群众离开我们，不愿见我们的面，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的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与屠杀。而在另外一方面，就为取消派、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资料，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和奸细对党进行破坏。过去我们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天津、北京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这种错误的损害也最大。在这些中心城市，我们现在的基础也最弱。原因在哪里？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关门主义的根源是：因为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层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统一战线。左的关门主义在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根源。

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还常常对目前形势作一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时竟可以估计这

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6]。所以他们敢于冒险，认为不必要做长期艰苦工作，不必要聚积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就可以和敌人决斗。对于一个工厂的罢工，他们可以从世界革命如何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分析起，要这个工厂和敌人立即进行决斗，似乎世界革命在当天就可以与这个工厂的罢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敌人，不必根据这个工厂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估计这次示威如何“成功”，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死亡，如何成为什么什么的信号，以及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但对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干部以及在组织上的许多损失，他们是看不见，也是不愿意看见的。似乎这不算什么，不要紧，明天革命胜利，这些损失马上就可以弥补起来。对于形势的这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常常成为冒险主义的基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没有想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30]失败后到现在有九年了，为什么上海、汉口、天津这些地方还没有变成苏维埃区域？倘若他们早想到这一点，以九年的艰苦工作来聚积革命所需要的力量，那末，他们也许不会那样浪费革命的力量，而认识到积蓄力量和保存干部的必要了。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在党内滋长起来，到立三路线时代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四中全会以后虽有改正^[31]，但基本上没有转变过来，而这些错误的恶劣影响直到现在党内还是残留着。过去我们揭发与反对这

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斗争是不够的,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给予党的损害有这样严重。在以前,我们没有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应有的打击,更说不上致命的打击。有些同志把工作和组织弄塌台,但是我们没有拿这些事实来研究,开展斗争,给这些同志以应有的必要的处罚,以教育同志。因此,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就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留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教育我们同志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地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³²⁾组织起来。虽然我们一些同志和干部在这里可能犯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我们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党,有无数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干部与同志,只要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完全不应该害怕这些错误以至裹足不前,我们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

(一九三六年四月)

一、中心城市与大的产业中心,是反革命的支撑点,是反革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反革命在这些地方对于革命的防护最为严密,同时,我党在这些地方的工作基础与组织基础,是十分薄弱的。所以,我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目前还不是革命与反革命决定斗争胜负的时候,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应当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

二、为着要积蓄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作,只有这些组织和作能够大体保存和巩固起来的时候,才能从这些已有的基础上去扩大和发展我们的作和组织。因此,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更加改善我党的秘密工作。要使我们逐渐建立起来的作和组织,不致有无谓的损失,并且能够防御敌人的袭击,然后我们才能积蓄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

^{*} 本文是为了总结一九二七年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经验,提出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而写的一份工作提纲。

三、当我们仅在某几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并能实际指挥这些工厂的工人大多数时，那末，我们在这些工厂的工作任务应该是：（一）把组织更加巩固起来，培养与训练大批的工人干部和领袖；（二）派干部到其他工厂去，开辟工作和建立组织；（三）分派积极的工人到农村中去参加游击队、义勇军等；（四）参加一般的公开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把我们在这些工厂中的堡垒保存与巩固起来，以便在此基础上开展我们的工作，避免单独地和敌人作战，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为着争取群众，创立和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领导这些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即使是最小的胜利）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而止”地暂时停止战斗。在原则上我们当然反对国民党^[5]的强迫仲裁，但是，为着争取群众斗争的胜利，对于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完全拒绝。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去取得工人某些具体要求之实现，并使我们更能公开地指导群众斗争。

五、国民党政府的工厂法、工会法^[33]，用了一切的条文来反对工人阶级与束缚工人群众的斗争。但是，这些法律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用以欺骗工人阶级的，因此，它就不得不规定一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如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与罢工，规定了比现在较少的十小时工作时间，星

期日纪念日休息,对于工人疾病年老死亡的抚恤救济等)。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上那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所规定的利益,并就此揭破国民党的欺骗,这样才实际有益于我们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如果我们对于工厂法、工会法仅持“绝对反对”的态度,只在工人群众中去叫喊“反对工厂法,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34]”这样绝对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要在革命胜利后才能实现),那是等于一事不做,那是完全空洞的反列宁主义的关门主义(几年来反对工厂法、工会法的经验是如此)。

国民党政府的工会法、工厂法中某些条文对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好处,我们要求马上实现。但这样的规定太少了,我们要求增加。那些压迫、束缚工人阶级的条文,我们反对!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所应该采取的态度。苏维埃的劳动法,在白区城市中目前还不能实行,仅仅是宣传的文件。

六、不独是工厂法、工会法我们应该利用,就是国民党在工人中进行的其他许多运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35]、纪念节的运动,以至儿童节运动、植树运动、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36]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利用这些运动,一方面使国民党与资本家更难反对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使我们更能取得公开的地位来领导工人的斗争,更易于使工人的要求和斗争得到胜利。唐山工人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户、设澡堂、发新衣等得到胜利,就是很好的经验。因

为他们不是采取关门主义的简单的“绝对反对”新生活运动的策略。

七、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⁷⁾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就是现在还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就是仅仅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公开的招牌和地位,去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也是必须的。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在我们采取这样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⁹⁾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

在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如果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如立案等),我们能够在这些工人中公开地成立新的工会,那末,这种公开组织工会之可能的机会,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虽然做这件事是极不愉快的,要受国民党各种严格的束缚(如呈请立案,国民党派指导员来,干涉工会的选举,圈定名单等),但即使是在这种严格束缚的条件下,只要我们还能够借此公开去组织工人群众,我们是必须去利用这种机会的。我们不应害怕或者拒绝去做这种不愉快的事。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在各厂各业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去公开组织工会。如果这样做,国民党也不允许我们成立工

会,那我们就有事实宣布国民党工会法是骗人的。我们反对合法主义,但是又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去组织工人。有些工作能够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去做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不去利用?

对这种公开组织工人群众与公开组织工会的策略,过去有人指责说“这是第三种工会”,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种指责是错误的。黄色工会的领导位置,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我们都要用力去争取,为什么我们在某种条件下能够组织一个为我们领导的工会,而不去组织呢?只有十足的关门主义,才放弃这种可能不去利用。如果我们要在赤色工会的全部纲领被承认的条件之下,才去组织工会,那只有在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那末,革命胜利之前,我们就只好甘心满足于那种狭小的秘密工会的组织。

八、在黄色工会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形成与巩固革命者的阵地。黄色工会每一个选举的位置,黄色工会的全部领导机关(上级和下级的),我们都要努力争取到手里来。如果在黄色工会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全部的胜利,群众与领导机关都转到了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亦不应该立即将这个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因为这在国民党统治下是不能存在的),仍应保持表面上的黄色工会的原状(如开会仍通知国民党,允许他们派人来参加,工人的要求亦可通知国民党,要他们实现工人的要求等等),应尽力巩固我们已得的阵地,实现工人更多的利益,培养大批的干部。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成为赤色工会。

九、在反对资本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我们要在一切工人中努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呼吁全国各军队的军官士兵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苏区^[6]的内战,并联合一致去抗日,组织全国一致的抗日反卖国贼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2]。要在各城市中设法联合一切工人的团体与各厂工人,建立工人的抗日救国会,动员工人到农村中去领导与组织农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参加抗日反卖国贼的战争,特别要动员工人利用各人的亲戚朋友关系向国民党的军队去进行活动,去组织和影响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抗日战争,拒绝蒋介石等进攻红军的命令。尽可能派工人到军队中去服务,去宣传抗日,反对内战。

在罢工委员会、反日会等组织中,过去我们排挤和打击那些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各派工人的领袖,是不对的。我们应在一定的纲领之下,诚意地和他们合作,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与抗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立场上去领导群众斗争。对于他们的错误,应采取善意的态度去批评。只有对于工人中的汉奸分子,我们才应该坚决驱逐。

十、要特别注意保存我们在群众中企业中的干部和领袖。党在工厂中的支部,不应该使全部同志都去公开领导斗争及进行公开活动。一个同志和一个同情者,在公开领导一次至两次斗争之后,第三次斗争必须换人来领导,不能再要这个同志

来领导了。让这个同志仅以同情斗争的态度一般地参加斗争，就在群众中把这个领袖保存起来。这样我们可以在群众中保存许多领袖，同时，也可以培养出许多新的领袖来。

十一、我们的许多同志长期在狭隘的秘密条件下工作惯了，现在要他们到广大群众中去，公开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要在复杂的环境下对付狡猾的国民党、黄色工会领袖及各种派别，那自然可能发生许多错误，甚至有些人受他们的影响、欺骗、愚弄、威吓以至收买，而发生动摇、投降以至叛变。但我们绝不应该害怕发生这些问题，而重复把我们自己关在秘密的房子中。只有让我们的同志到广大群众中去，到十分复杂的环境与斗争中去，才能锻炼出真正能干的布尔什维克⁽¹⁶⁾的群众领袖。

十二、我们要加紧教育同志不论在如何复杂变化的环境下，不论使用何种灵活的策略去与反动派斗争，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纲领。任何时候，我们在主观上是不放弃这些纲领的。虽然这些纲领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只要一有机会与可能，我们就一分钟也不忘记要部分地实现这些纲领，尽可能使工人群众的要求，接近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与各派的工人合作，不是我们放弃自己的纲领，去接受其他党派的纲领；相反，是努力宣传我们的纲领，去影响同盟者。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我们行动的自由。对于同盟者的动摇、叛变与投降，要使用批评的武器。要不断地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工作，在群众中不断加强我们的组织和影响。同时，党的政治纪律性与警觉性应更加提高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右倾的错误。

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义,我党的组织和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

但我着重地指出,空谈主义不存在于支部中,不存在于那些正在公开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与汉奸斗争的同志中,而严重地存在于我党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我所指的,是这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的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谈的领导方式。因此,我特别要求各省、县、市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提高自己的警觉,特别虚心地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在这里,我们不能容许用“空谈主义”去责骂支部与担负群众工作的同志。

我看过同志们写的一些带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工作报告、政治报告等,这些东西是特别长、重复、乏味,而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指示与文件的公式化、刻板化,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改正过来。或者是为着要“具体”,而把一切细小的事情毫无组织与中心地堆积起来;或者是为着“不脱离总的形

* 本文原载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八期,署名 K V。

势”而泛论全世界、全中国各方面的形势,玩弄许多政治名词,傲慢地咒骂一切。我常用极大的忍耐看完一篇东西,但我还不能了解这篇东西到底是说的什么问题。如果用这些东西去指导工作与教育同志,那是只能得到极坏的结果的。

在京东与保属的干部^[37]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些干部不相信他们那样的工作情形可以把事情做好。然而我们的领导同志除开翻来复去地骂这些同志是“机会主义”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机会主义”骂过了,已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要发生。

我们说要反对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然而在许多地方这又成为佛经中的“阿弥陀佛”,把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诚心念它千遍之后,自己还没有懂得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在他那里是否也有这种东西。

常常一件活生生的事情,一个活泼泼的问题,一到这些空谈家的手里和嘴里,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象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

同志们!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你们应该特别虚心学习,把你们还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

我提议对下面除非有完全的必要,应少采取指示与命令

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绝对的东西应该少一些,多留一些回旋的余地。少去责骂下面,多去帮助下面。尤其随便宣布下面或某些同志为机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如果下面对于某些问题不了解或了解有错误,你们的任务是指正与帮助下面了解。如果下面对某些问题未注意或注意不够,你们的任务是提起他们的注意。在这里,板起教师的面孔责骂是用不着的,没有好处的。

目前我们的总任务,是准备大规模的抗日反汉奸的战争,而实现这个总任务的总策略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详细分析了目前世界与中国的形势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我们每一个同志就应该把这些详细地研究清楚。但当我们研究清楚之后,如果形势没有重大的新的变动,我们就不要在一切文件上,在各种说话中,千遍重复地来分析世界与中国的形势(现在是天天在一切事情上都分析形势,但又很少有同志真正来研究一次形势),也不要拿着“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在口头上当作“圣经”来念,而是要我们各地的同志根据各地方、各工厂、各学校、各农村、各兵营的具体特殊环境,进行当时当地的准备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工作。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

有些农村的农民还不了解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还斤斤于自己日常的经济要求。如果我们的同志忽视这个特殊情形,

到这个农村去号召农民来举行反日游行与组织救国会，那就会成为空谈。但在平津学生中这个号召就不是空谈了。实际工作总是根据各地方的特殊情形来决定的。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但我们反对农村“特殊论”，因为“特殊论”认为农村根本不能有反日运动。如果农民对于日常经济要求有兴趣，我们就领导经济斗争，同时我们向农民解释目前的民族危机，经过农民的经济斗争，是可以引导农民走上民族斗争的。经济斗争与民族斗争不会是矛盾的。

我们的同志还要严重地注意工作从哪里下手？从何处开始？这也是根据各工厂、学校或农村的特殊条件与同志的能力来决定的。这里可以从办报纸开始，那里可以从组织研究会下手，这里是发动经济斗争，那里甚至只能从找人谈话、介绍书报开始。然而只要我们能确实地走了第一步，我们就可能去走第二步，切实地抓住了第一个环子，就可以过渡到另一个环子。

各地方的领导干部还要特别注意那些中心支部、中心的群众团体和有力量、有信仰、有发展前途的个别同志，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和训练，爱护与提拔他们，这样才能依靠这些支部、这些团体、这些同志使工作开展起来。

我还要求我们的同志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去把目前的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详细研究清楚，这也是使我们的工作进入实际的第一步。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我常奇怪，为什么新的决议与策

略到北方来丝毫没有引起同志的争论与怀疑,但这不能证明在同志中就没有问题。实际上我看到满纸拥护新策略并用新策略去骂别人的文章,却对于新策略没有任何真切的了解。很明白,这些同志是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我们不反对而且欢迎同志们对于党的文件和决议在某种程度上的争论,及提出疑问,要求解释等。对于实际工作的争论更是容许的。只要不把这种争论又变成空谈,对于党的工作是有益处的。

为着要使我们的工作开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不反对空谈。然而我们又不要用空谈来反对空谈,用空谈的八股文章来反对空谈。而是要我们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要我们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

领导权问题是民族 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资产阶级现在来参加民族统一战线,是好的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危险。这个危险是由资产阶级获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产生,最坏的结果可以使统一战线破裂,革命失败,无产阶级受到牺牲。无疑的,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每一个动摇和叛变,都要引起统一战线内部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程度,要看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对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影响,与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和策略而决定。为着减少这种危险,并使这种危险不至于危害革命,无产阶级从与资产阶级开始合作的第二天起,就应该注意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中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加强自己的影响。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危险不是惧怕,不是逃避,而是要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克服

* 为了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刘少奇撰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全文分上、中、下三篇。收入本书的是下篇。上、中两篇主要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策略转变和战略任务的关系,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本文原载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第六十七期,署名K V。

这种危险。所以,无产阶级不是因有这种危险而拒绝民族统一战线,而是要积极地参加到统一战线中,在长期的工作中去克服与战胜这种危险,中心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问题。

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

在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将在一些什么问题最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呢?总的问题当然是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而在革命领导权上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就常常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不正确,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对革命转变问题不了解,对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不了解。因此,就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放弃与忽视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的独立,放弃与停止对于阶级斗争的领导,放弃对同盟者的批评,放弃对于工农群众的独立组织与教育工作,放弃对于军队的争取和领导等。很明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是要葬送民族统一战线与民族革命的。所以我们在提出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就特别要注意到这些问题,防止右倾机会主义。

* * *

所谓革命领导权,就是谁成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袖,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因为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革命性估计不正确,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就说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目前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所以革命的领导者“当

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只能帮助资产阶级革命,待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再来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如是,他们就不参加统一战线的革命政府,认为这个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现在是援助它,将来还要打倒它。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已使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30]失败了,在以后还要危害革命的。

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目前民族革命的高潮中,虽然还有暂时的革命作用,但因为这些阶层的特别软弱及其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各方面(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习惯上)的密切联系和无产阶级力量对于它的威胁,它的这种革命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要求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且反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完成,而要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来完成。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就等于葬送革命。

有人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足,就怀疑或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领袖。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强大的。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国家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力量上都要强大得多。而无产阶级为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就必须首先肃清封建势力与驱逐帝国主义。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以出路,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而中国资产阶级就不能

给他们以出路。因此,无产阶级就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他们的革命领袖。无产阶级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应以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的资格,率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去。所以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

* * *

为着要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断加强,才更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坚。为要组织与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要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加强与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6],建立强有力的工会,加强与扩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工作。这些,就成为十分必要的工作。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如果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有任何的忽视,都要成为严重的右倾危险。所以,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认为可以降低入党条件,可以放松党的纪律,可以在党内容许自由主义、投机分子和各种不正确倾向的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思想可以危害党的独立和一致,可以使我党受到资产阶级的侵蚀和破坏。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认为可以放松工人运动和劳苦群众中的组织工作,可以模糊或者隐瞒党的政治主张与政治面目,都是错误的。因为这要损害无产阶级的独立。

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若是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能独立或取

消自己的独立,那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保持与加强自己的独立呢?(一)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二)对于每一个重大事变和重要问题,都要根据自己的观点给以分析,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和办法,并根据自己的主张行动;(三)要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评论各党各派的主张,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与其他各党各派的观点和主张在群众面前分别得清清楚楚,让群众来选择;(四)要建立无产阶级群众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力量,要加强巩固我党的组织和一致。无产阶级必须如此坚决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用自己正确的革命主张去影响别人,推动别人跟随自己的主张行动,而不至于去接受别人的影响,在别人的主张下动摇自己,甚至作别人的尾巴。

当着同盟者起来向敌人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给同盟者以援助是必要的。但无产阶级不只是援助同盟者,必须自己也起来向敌人斗争,而且要站到斗争的最前线,要批评同盟者在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向同盟者及群众提出自己在斗争中的独立主张。最近,有些救国团体在援助绥东事件^[38]中,没有提出对绥东事件的整个主张,没有批评晋绥当局^[39]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和冀察、南京当局^[40]的错误,没有组织义勇军去参战,而仅仅只是募捐援助,应该说是重大缺点。

* * *

在统一战线中,同盟者的错误、动摇和叛变所引来的危险,常常难以事先被人察觉。所以,无产阶级不得不提高自己的警觉性,不得不对于同盟者任何一个小的动摇都给以最高

的留心。对于同盟者的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同盟者的每一个动摇和错误都可能给统一战线内部带来危机,都是离开无产阶级的开始。无产阶级如果不给这种动摇和错误以批评、揭发和指正,那就不能提高群众的警觉性,不能停止同盟者的动摇,不能巩固统一战线,而无产阶级也无法在群众面前阐明自己的观点,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并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虽然这种批评尽可以采取和平诚恳的态度,然而在思想上观念上的明确性,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不应该不使用批评的武器。在细小的不重要的个别的问题上,不应该和同盟者引起过多的不必要的纠纷;但在主要的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就必须毫不放松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些批评要公开进行,要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有人觉得对同盟者的批评,会引起同盟者不快的情绪,促使同盟者离开无产阶级,因而惧怕使用批评的武器,企图在统一战线中与同盟者和平相处,抹煞自己与同盟者在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无疑的,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与危险的。

有人认为,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应该停止或减弱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他们认为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是不能联系的矛盾,这也是一种极危险的右倾思想。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消灭社会各阶级间原来的矛盾和冲突。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这些矛盾是依然存在的,所以阶级斗争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工农群众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相反,还会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

工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力量,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参加和积极拥护,统一战线是不能有力树立起来的,革

命是不能胜利的。但当工农在重重的压迫与剥削的情形下,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形下,他们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斗争的热情,就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就不能充分发扬他们伟大的创造力。只有当他们的生活地位已经改善了的时候,他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减轻了的时候,才能使他们的热情、积极性和对于革命的忠诚发展到最高限度。所以,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必须为改良工人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斗争。如果工农群众的这些要求获得满足,就可以发扬数百万工农群众在民族革命战场上无限英勇的牺牲精神,就能造成世界上任何帝国主义不能战胜的力量,相反的这种力量要战胜世界上任何帝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要不断地吸引这些伟大的力量来加强自己。因此就不独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拥护工农为改良生活待遇与获取土地等要求的各种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愈是迅速有效而正确地进行,就愈能加强统一战线的力量。相反,如果去阻止与压制这种斗争,就要削弱统一战线的力量,就要失去广大工农群众对统一战线的拥护与热情,统一战线就有被敌人战败的危险。所以,这个问题也是统一战线运动中最基本的重大问题之一。

自然,工农阶级斗争的发展,是会损害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给他们以威胁的,因此,资产阶级和地主就反对这种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怕吓坏资产阶级与地主,主张停止这种斗争,然而,无产阶级是不能这样做的。中国的封建势力本来就是汉奸的社会基础,是在反帝革命中所必须清除的势力,为着满足对日战争与工农的需求,而牺牲封建地主的利益^[41]是应该的。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固然要受到一些损

失,但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收回海关,抵制帝国主义的货物,提高工农购买力等,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内市场扩大,又可以增进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开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前途。所以资本家在这种斗争中并不是绝对的损失,部分资本家还有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

* * *

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绝不停止与忽略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也需要这种斗争来充实自己。但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不故意加紧反对资本家的方式,如不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特别是影响抗日军事的罢工、总工及冲突,用政府颁布法律命令等方式来满足工人的要求,从各方面采取办法来实现工人的要求等。但当资本家顽固地拒绝工人要求的时候,非用罢工不能实现工人的要求的时候,工人就绝不应该避免采取罢工等手段。此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要特别注意到,一方面不要在阶级斗争中损害他们的利益,在为了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必须损害他们的一部分利益的时候,就应该在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增进他们的利益,如减低捐税等。

统一战线的进行,不限制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自由,这种统一战线才是革命的。上层统一战线是为着更顺利地去组织下层的群众。如果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运动中,自愿取消或限制下层群众的斗争和组织的发展,那对于革命、对于无产阶级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 * *

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之下,将集中

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 ,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战胜封建势力与汉奸 ,战胜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叛变 ,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 ,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尚理想。

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一九三七年五月)

彻底的转变

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在今后是要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

为什么要转变呢？

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决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反动了十年的国民党^[5]及追随它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转向抗日，两个政权的对立取消，国内和平基本上实现，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极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来。这些变动，已经改变了并且今后还要继续改变我们全般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所提出的任务、口号和政策。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42]中指出：目前阶段，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在目前阶段，“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口号已经过去了。在今后我们主要的口号，应该是巩固

^{*} 这是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全文共十一部分，收入本书的是其中的四部分。

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且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任务的中心一环,我们需要在全国进行一个广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实际地建立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全然依靠于我们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

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地实行转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43]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31]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为了肃清这一传统于每一具体工作中,就需要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的创造,需要党的组织工作的全般转变。

所以,目前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是有两重性质的:(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前一种转变,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后一种转变,是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而上学转到辩证法。因此,目

前的转变,是党与群众工作全般的、彻底的转变。这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斯大林同志说:“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44]。全党同志必须进行极艰苦的工作与学习,来完成这一个伟大的转变!

应该指出,这一个转变从前年十二月决议^[20]发表以后,在党内就开始了。现在要问:我们在这上面已经做了什么?转变达到了何种程度?

一般说来,党的政治口号与政治宣传在各地大体上已经转变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党的政治影响已经空前扩大了,党取得了极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然而组织工作的转变,则极不令人满意。在平津及华北其他几个城市固然已经开始从一切具体工作中去进行转变,并且已经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华北党扩大了,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也一直是发展的,为今后工作开创了比较好的基础与条件。但在其他地方,或者还只是部分地开始转变,或者还完全没有转变,过去的一套,还是系统地无数次地被采用着重复着。因此使得这些地方党与群众工作至今没有什么进展,使已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的群众,或者又弄到解体塌台,或者变成极狭小的秘密组织。

党与群众工作为什么至今没有全般的决定性的转变?

它的原因是:(一)我们和许多同志在过去没有了解这个转变是两重性的,是一个极深刻极艰苦的转变。过去我们只在党内提出,形势变更了,策略也需要变更,这是一个比较易为的任务;而没有提出转变十年来所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

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此,就没有使党内觉得有进行一个彻底与全般转变的必要,没有使许多同志感觉他们过去在党与群众工作中所熟悉的那一套,是错误的,是需要改变的,他们在工作中还是自信地重复那一套。(二)我们没有系统地具体地揭发与批评过去的恶劣传统,否定过去的错误原则,并且提出新的正确原则去代替。因此,使得过去的错误原则还指导着我们同志的日常工作。此外,中央与各地党部的关系不密切,也是转变迟缓的次要原因。

许多同志认为我们目前的转变只是策略的转变,他们就只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为满足,认为只要把过去的口号取消了,换上新的口号,他们就已经彻底转变了。再多一点转变,他们都认为是不需要的。因此他们口头上尽管千百遍地叫着统一战线,而实际工作上还是千百次地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如是,使我们提出的需要在每一个实际工作中具体执行的新策略,经过他们就变成了完全的形式主义的空谈。

因此,为了要彻底转变今后的党与群众工作,我们除了在同同志中解释目前环境的变动与新的策略任务外,还必须着重地揭发与批评过去历史传统中的错误,必须在党内提出彻底转变全般工作的问题。从总的任务起,一直到每一个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止,都或多或少地需要转变。这或者是由于要适应目前新的环境与任务,或者是由于过去本来就错了。

党和群众的关系

为了争取与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我们必须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正确组织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学习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必须分别清楚领导党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根本不同,党内工作方法和群众工作方法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清楚的实际的了解,那我们就不要去幻想组织和领导千百万群众。

党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建立呢?

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要使群众认定我们党、我们的同志是他们的领袖,并自愿地跟随我们去进行决死的斗争,就需要我们经过一个长期艰苦和正确地争取群众的工作过程。

我们不是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

我们要求群众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我们要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意见。

当着我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时,我们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在主张上则保留我们的意见。当我们是多数时,方能要求反对我们的少数服从我们的意见。

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

我们是以群众中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提出主张和办法,使群众自愿地接受,自动地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

这些,就是党员和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然而,我们有许多同志却对此不甚了解或不愿意了解。有这样一些同志,他只要求群众服从他,而他可以不服从群众,不尊重群众;他自以为群众领袖是可以自称的,是可以由党的决议任命的;他甚至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一切,取消群众团体的独立性,破坏群众团体的民主原则。这种错误,大大地妨害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党的周围。

另一种错误,是作群众的尾巴。当着群众拒绝我们的正确意见时,我们就悲观失望,表示没有办法,不去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解释我们的主张,启发群众的觉悟,反而接受群众的错误思想,作群众的尾巴。

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是我们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国民党侮辱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权利,命令和压迫群众。而我们则同国民党相反,群众就自然愿意亲近我们,抛弃国民党人,而举我们的同志为领袖。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应当怎样联系呢？

这实际上就是秘密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我们在各地的同志，首先应当估计各地在各个时期的环境，依照这些估计，来判断何种组织、何种工作、何种方式在当时当地可以合法地进行，何者只能半公开地进行，何者只能秘密地进行。我们还应当调查各地有哪些已经成立的合法团体，甚至反动团体和带政治性质的同群众有联系的机关（如乡民会议等）。对于这些团体和机关，是可以派人加入到里面进行工作的。只有作了这种估计和调查，我们才能正确地确定当地到底有哪些可能公开的机会给我们利用，并使公开的工作和秘密的工作配合起来。过去我们完全不作这种估计，结果弄出极大极多的错误。

一般估计，我们今后的工作环境可能变动。如果和平实现，国共合作成立，那末我们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将有更大公开进行的可能，虽然在全国各地程度上并不会一致。有些地方，合法运动或将成为我们主要的工作；另外一些地方，或者只能半公开工作，或者公开活动的可能较少，秘密工作还是主要的工作。至于在日寇及汉奸亲日派统治的区域，党的组织当然还是处在绝对秘密的环境中。我们估计到这些可能的变动，要准备在更大范围内去进行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改组我们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相互关系。然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还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取消

这个问题甚至没有降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只要环境允许,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地采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去进行工作。秘密的党的工作没有全部公开进行的可能,只能部分地公开进行。我们应当利用这种部分公开的可能去工作,哪怕是一点半点的公开机会都是宝贵的。能够公开办一个补习学校,组织一个灰色团体^[29],出版一个灰色杂志,我们都必须去利用。但是有人说:这种部分公开我们不要,必须全部公开我们才来。为什么呢?说是我们的党纲不能部分地公开提出。他们过去就这样地取消了一切公开工作。

由于环境的变动,我们的公开工作可以随之扩大或者缩小,但是不要超过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因为超过这样的限度,就要使我们原来公开的组织和公开进行的工作,转入半公开或者秘密的状态。一般来说,所谓公开工作,就是能够合法地进行的工作。利用合法并不是合法主义。我们过去在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中,认为所有一切合法地进行的工作都是所谓“合法主义”。当环境不允许时,还要把公开的灰色团体、黄色工会^[7]等都转变为赤色工会^[9],使秘密的团体和人员去冒险公开,那是极端错误的。

一般来说,群众工作应当是公开进行的(虽然有时只能半公开进行),而党内工作则应当秘密地来进行(如有可能也应当部分地公开地进行)。但是我们在党内工作的方法,绝不能拿到群众中去使用。我们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和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

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能兼负党的秘密机关的工

作,应当同秘密机关断绝关系,只同特别指定的同志发生关系。党的秘密文件不能拿到群众机关中去。不要使敌人从公开工作的同志那里找到任何党的组织关系。

在党的文件刊物上,不要登载公开群众团体的情况,不要使敌人从党的机关中找到任何同群众团体的关系。

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就是在组织上混淆起来,方法上又完全重复。把应当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秘密机关来做,把应当秘密进行的工作,又去冒险公开(如秘密机关的负责人兼任群众团体的职务等)。这样,使得应当公开的不能公开,应当秘密的不能秘密。结果就是党和群众工作都遭到破坏。

我们过去忽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没有在党内着重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极大的错误。列宁说:“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激烈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配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组织(如保险基金会等),那末他们就决不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⁴⁵⁾中国党的历史证明列宁的话是对的。过去我们在白区的组织并没有能够保持,更谈不到巩固和发展。

在目前,我们一方面应当动员群众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允许救国会的公开,允许各种非法团体的登记,允许言论、集会、罢工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利用各

种灰色的团体去组织群众，加入各种已有的合法团体去进行工作。我们的同志在各种灰色的合法团体中应当忠实地为群众直接的要求而斗争，以争取群众，争取领导地位。但不要把那些团体转变为所谓“赤色团体”，表面上还应当保持它的灰色和合法。

在日寇及汉奸统治的区域，采用救国会等名义去组织群众是不适当的。在这些地方，应当以组织公开灰色团体及利用原有的合法团体为团结群众的主要方式。

党的转变

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党的布尔什维克^[16]化及其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才是唯一的保障。

(一)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

在国共合作成立后，固然给党以比较顺利的发展和工作的条件，但同时资产阶级对于党内影响的可能，也大大增长了，从内部来破坏党的可能，也增长了。为了保持党的独立、纯洁与一致，应当：(1)提高新党员入党的条件，新党员要经过候补期的考查(工人可不经)；(2)加紧对于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3)加强党的纪律，扩大党内的民主；(4)慎重地选择党的干部；(5)加紧对右倾尾巴主义倾向的注意。上面提到的入党条件，在秘密环境下的党，可以放宽一点。

有些地方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应该依靠一些基本的党

员与干部去进行,这些党员与干部是绝对忠实于党的,是可信托的,绝不应该随便调动他们。

(二)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应清楚地分开。党内一切工作与组织状况,比以前更应秘密些,不应该使同志互相知道,尤其是公开工作的同志。

党的机关应当很小,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组织与官衔。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尤其与公开工作同志的关系,应当很技术地建立起来。这是秘密工作中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事。这种很小的秘密领导机关,即使在公开环境下,都必须保存。如环境有更大公开的可能,只是群众组织与公开活动的同志去公开即可。

我们对于党的秘密工作,要有远见,要坚持,要忍耐,不能有丝毫的急躁病和疏忽。因为环境是变动的,今天觉得不要紧的事,但到明天也许就很重要了。今天是要服从明天的。我们许多同志在过去就是没有远见,不能忍耐,害着不能容许的急躁病,过于疏忽。他们在今天甚至不估计到明天的情形,甚至不估计当时的环境去布置与进行工作,如公开征收党员、举行革命竞赛、进行突击运动、随便调动干部与改组党的组织等。我们以后不要随便再以“怕死”、“动摇”等话去批评同志,助长同志的冒险情绪。秘密机关中那种忙乱的状态,也是不能继续的。

在秘密环境下,我们的组织如发生问题,即应暂时停止工作,风声紧张时,人员即应暂时离开(如可能离开的话)。如果没有相当保障,一切工作都不要冒昧去进行。工作没有做好不要紧,要紧的是机关无论如何不能破坏。我们应该特

别小心，应该建立巩固的秘密领导机关，虽经各种风浪也不致动摇。

对于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同志，应该坚决执行纪律。

只要我们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得适当，秘密机关的工作井井有条，不疏忽，不乱来，那我们就能够对付奸细。现在奸细还会混入我党，我们除开特别小心考查外，主要的要使公开的与秘密的工作配合适宜，使奸细不能更大地损害我们。

(三)在可能条件下，应该扩大党的民主。如领导机关多与同志通信，多征求同志对自己领导的意见，多取讨论的态度去实现指导等。我们不只是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地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党内的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还严重地存在着。这表现在不从政治上原则上去彻底解决一切问题，而采用组织手段与纪律去解决一切问题（有些人甚至离开纪律，就不解决任何问题），表现在领导方式上的过分机械与绝对。这是一种极不民主的习惯。一切问题要从政治上原则上去解决。只有在政治上原则上解决以后，组织手段与纪律的采用才是对的。纪律在

党内是必要的,应加强——但要在最后的时候去采用。

加强纪律,是提高同志服从多数、服从组织的精神,而不是要指导机关经常用纪律去制裁同志。相反,指导机关制裁同志愈多,就表示那里党内的纪律愈坏。

党有纪律,不表现在不许同志向党内发表不同意领导机关的主张,而表现在同志虽有不同的主张,还能在行动上服从多数与执行领导机关的决定。

我们党正因为有这种铁的纪律,才能使奸细很难破坏我们。惩办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帮助奸细的。

党的集体领导,只有在民主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广泛地吸收了全体同志的经验与好的意见,才算是真正的集体领导。

党的民主集中制与个人负责制是必须同时采用的。重要问题应该民主决定,但工作的执行则应个人负责。工作机关应该有工作秩序与工作纪律。机关的首长应该督促与检查工作。

真正的民主精神,与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道德是不能分离的。自私自利,是与大公无私相反的。自高自大,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这种人,他要居人头上,而不肯居人下;他要求支配别人的特权,他自己不受别人支配;他可以随便批评打击辱骂别人,别人不能批评他;他要别人服从他的“决议”,他自己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决议;他认为别人破坏集中原则是犯纪律,他不承认他自己破坏民主原则也是犯纪律;他只图自己个人的发展,甚至为发展自己而去妨害别人的发展。这是旧社会的思想在党内的残余,这是与民主

精神相反的。

扩大党内民主,首先就要我们的干部有民主修养,在行动上做模范,然后才能在同志中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训练。过去党内的同志与干部怕说话,怕犯错误,不敢负责。这是在不民主的情况下造成的现象。过去我们主要的不是用说服与教育去推动同志工作,而是用斗争打击同志去推动下级工作。这不是民主的办法。这使同志因为怕斗争而不敢说不敢做。斗争只是对于那些坚持错误、不学习、不自觉改正的人,才是需要的,而且还是为了教育。

(四)过去在思想斗争中随便去打击同志,加同志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因同志发表不同的意见而随便撤销工作,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使许多同志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发表出来,这就掩盖了同志中在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也就不能克服这种分歧;这样只能造成党内表面上的一致,妨害了政治上、原则上、思想上真正的一致;这样并不能减少同志与领导机关对立的现象,反而使这种对立加深加多。同志们就不会去帮助领导机关的领导,他们会挑领导的岔子。这样,无原则的斗争又有了基础。

表面看来没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并不是好的现象。

我们不要在思想斗争中随便打击同志,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抹煞同志中原则上、政治上的分歧。相反,正是要使同志能够充分发表他的意见,以便真正消除这种分歧。大多数的分歧意见,用说服、用讨论是能消除的。

以后如因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意见而开除同志,应特别慎重,除非是他在组织上违犯纪律而不能纠正。

(五)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训练出大批的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是党的中心工作。各地方要特别注意选择干部来受训练。

毛泽东同志在结论^[46]中提出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干部的标准: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而且没有自私自利个人英雄主义等毛病。我们每一个干部应当按照这样的标准来修养。

我们要把现有的干部以及新干部提高到这样的标准,这需要党与干部自己艰苦努力,而不是用这种标准来考试我们现有的干部,把不够标准的黜职。很明白,我们现有的干部有各种的缺点,政治上的、能力上的、思想上的、意识上的缺点都有,甚至还带有旧社会各种乌七八糟的残余尾巴,然而现在就是要将这样的干部改造成成为具有足够高度水准的干部,不能毁坏他们。这虽然是极艰苦的工作,但是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还要改造全人类。

我们要经常考查干部,要恰当分配各种干部的工作,给他们以能够胜任的任务,并在工作上帮助他们。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领导机关犯了不少错误,应该纠正。

提拔新干部在目前是重要的。但新干部要经过一定阶段来提拔,不能照过去一样随便提得很高,这样反而使他无法工作。

在华北已有新旧干部不融洽不合作的事情发生。这应给以注意。新旧干部各有不同的长处与缺点,应该互相学习,互

相尊重,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集体领导改善。

(六)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还是应该建立党团^[47]。但党团应很技术地工作。各级党团应绝对服从各级党部的领导,服从上级党团的领导。党部领导党团时应该谨慎周到,应该和党团同志讨论一切,但不要在一切小问题上都去机械地决定。要活泼地领导党团,不是不给党团以具体领导。

(七)我们同志那种忙乱无章的作风,应该改变。应该抓住各时期中心的工作,分别各时期各种工作的轻重缓急,有秩序地去工作。我们的同志都有热烈的革命精神,但一定要加上真正的务实精神,才能切实推动工作与革命。我们同志对于一件工作想清之后,就应有抓紧这一件工作干到底的精神。只有革命精神与务实精神的结合,才能肃清空谈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八)我们的宣传工作应该彻底转变,虽然最近我们在宣传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过去我们一些同志常分不清楚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的区别,对内教育与对外宣传的区别,党的口号与群众口号的区别,党的宣传与群众呼声的区别。常用“武装拥护苏联”、“武装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等口号去动员群众行动;常在罢工要求上加上“驱逐日寇出中国”;常把党内问题的文章登在对外刊物上,在对外刊物上宣布某些团体与行动为党所领导。这种事过去我们做过许多。同时,宣传的形式化、刻板、琐碎、夸大、不注意事实、不注意对象,文件的八股化,是一贯的传统。这些东西必须彻底肃清。

今后,党的理论与理论宣传更加重要了,这应该利用

各种公开的可能,组织研究会、出版机关等来系统地进行。

(九)最后,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表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我们的某些干部中它的毒很深。它只注意事物的表面与形式,而不注意事物活泼的内容;它只记得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而不能将这些条文活泼地运用到具体环境中去;它使我们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使我们在群众斗争中盲动;它使我们在罢工工人的要求上加上“拥护苏维埃红军”,使我们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上海提出“实行苏维埃劳动法^[34]”;它使我们不分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使我们的文件刊物公式化;它使我们在口里千百遍地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18],在实际工作中又千百遍地违反国际路线,执行立三路线;它使我们机械地处理问题,一切工作公式化、刻板化,使我们许多同志毫无生气,不去思索问题、考虑问题。由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很大的。

我们的同志必须坚决抛弃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什维主义^[18]来代替。怎样来改正我们过去的一切错误?同志们都应该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前进,才能使党与群众工作彻底转变。学习!学习!再学习!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我们是能克服过去的一切错误,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的。

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 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一九三七年五月)

同志们：

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报告^[42]是同意的,我只说以下两个问题。

—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目前挽救中国、解放中国唯一正确的政策。两年来,全党执行这一政策,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国内和平基本上实现了,国内政治已经相当地向我们所指示的方向转变,向民主与抗战的方面转变。党的政治影响在全国群众中迅速增长着,而且党在组织上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这证明,我党至今还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民国成立以来的二十六个年头,中国是经常有内战的,没有国内和平的。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是民国历史上一件

* 这是在延安举行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最重大的事情,是中国的—个极大的进步。这个进步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实现了。我们不应该小视这—个事件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用—切力量—步巩固国内和平。

和平为什么能够实现?基本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企图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同时由于:(—)资产阶级的转向抗日;(二)英美法等国改变了分裂中国的政策;(三)人民大众要求和平与反对内战的强有力的运动;(四)最重要的,还是我党与红军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以及红军力量的强大。很明白,我党如果不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去领导群众运动,如果在西安事变^[48]中采取错误的政策,那末,国内和平至今是不能实现的。

和平在今天虽然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总还在想法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和平仍有被破坏的可能。所以有人提到怎样巩固国内和平问题时,我们的回答是实现民主、排除亲日派和对日抗战。没有民主与对日抗战,国内和平是不能巩固的,是不能长期保持的。

国内和平的实现,民主政治的实行,将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统一。我们当然赞成中国的统一,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要的条件之一。但是统一中国的途径与方法,我们与蒋介石之间是不同的。蒋介石原来是企图用武力讨伐和阴谋的政治手腕,排除与消灭—切异己势力,建立自己的独裁,来统一中国。而我们则主张联合与实行统一的民主制度,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统一。照蒋介石原来的办法,中国是不能统一的,甚至和平也不能保持。只有我们的办法才是目前统一中国的—途徑。

南京中央政府如果不能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不允许人民参与政治,而要求各地方实力派将政权、军队、地盘、财政交给蒋介石支配,这显然是困难的。蒋介石如用强力和阴谋来这样做,不是采用光明正大的民主的方法去统一,那就是和平的破坏和中国的分裂,就会将某些军阀推到日本怀里,封建割据势力就会在这一点上来反蒋与割据。

蒋介石本来要消灭红军,消灭各派,建立独裁,统一中国。但因为日本的进攻,以及各方面的客观情形,使蒋介石不能继续这样做了。蒋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降日,二是抗日。现状不能维持。蒋现在是走向第二条路,虽然是违反他原来意志的。蒋介石武力消灭红军和各派的政策,暂时放弃了。但蒋介石还是继续采用阴谋、挑拨、收买、威胁等方式,即改良主义的方式来削弱与瓦解红军和各派。

我们应该要求南京政府实行民主,同时要求各地方势力实行民主。要在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条件下,联合各地方势力推动南京政府实行民主。我们不能放弃对各地方势力的工作。在目前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成各地方势力的反蒋要求,因为这是帮助日本的;同时,我们也不赞成蒋介石在非民主的原则下排除、瓦解各地方势力的要求,因为这也是帮助日本的。我们要批评各派的反蒋,同时还要批评蒋介石分裂、瓦解、消灭东北军西北军^[49]及各派的阴谋,因为这都是于和平团结有害的。

我们有些同志将就各派反蒋的要求,是错的。但对蒋介石非民主的倾向及排除异己的阴谋不采取各种形式的批评,也是不对的。

依照蒋介石原来的意志,不论在任何情形下,是不会不企图削弱、消灭我们的。仅仅根据这一点来看,国内和平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国内和平的保障,并不在这里,而在下列的客观事实:(一)日本的进攻不会停止;(二)红军力量的强大,及其在任何情形下不松懈自己的战斗情绪和对于蒋介石这个老奸巨滑的同盟者之谨慎的应付;(三)全国人民、军队强烈地同情红军和我党,并强有力地反对内战;(四)各帝国主义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本、亲日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上述客观情势下,国内和平是有相当保障的。如果再加上我们在各方面正确的政策与有效的工作,民主的实行,和平就可巩固。如果我们不看客观情形,只看蒋介石个人原有消灭我们的意志,那我们就会悲观;如果我们不估计到蒋介石还采用改良主义来孤立与破坏我们,那我们就会松懈自己的戒备,这两种倾向都是危险的。

红军与苏区⁽⁶⁾的戒备,比过去不独不应松懈,而且应加强。因为反革命从内部外部阴谋破坏红军与苏区的可能性更加扩大了。

党中央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作了某种限度内的退让,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这样,大大便利了我们在白区群众中的工作。在西安军事上所作的退让,是向日本、亲日派以及反共顽固分子政治上的严重进攻。因为我党在西安事变中执行了正确的政策,推动中国向前进了一大步。

有同志提出怎样在全国争取民主的问题,这自然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必须详细地讨论。争取民主的根本问题是立宪与国民大会的问题。然而除此以外,我们必须进行各种个

别的立法运动,如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立法等。每一个关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具体要求,我们都必须加以注意。而苏区则应是实行民主的模范。

有同志说,民主要求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这不对。民主要求,特别是各种具体的民主要求,农民要土地,工人要改良生活,都是能动员广大群众的。在目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主、抗日,我们应使群众了解民主的重要性及民主与抗日二者之间的联系。

二

目前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内容和条件是怎样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前途和努力的方向。

如果历史事件可以比较的话,那末,现在的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同一九二七年前后的国共合作相比,不同的地方如下:

(一)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有一九二七年前合作的经验以及十年内战的经验。

(二)一九二七年前民族危机不如现在严重,联合战线主要是反对北洋军阀^[50],而现在则将是直接对外作战了。

(三)一九二七年前世界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反对中国革命,而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已不一致了。英美法相当赞助中国抗日。国际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斗争的胜负,已经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

(四)一九二七年前是党内合作的形式^[51],而现在是党外合作了。

(五)国民党^[5]今天已经有了全国的政权,但内部是更不一致的。国民党十年来的反动在全国群众中种下了极恶劣的影响。

(六)共产党有了大革命^[30]的经验,有了很高的政治水平,有了苏区和红军,有了十年苏维埃运动^[52]在全国群众中的影响,虽然党的重要干部有很多牺牲。

(七)苏联的强大,世界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上列七项,就是今后国共合作客观和主观的条件,领导权就是要在这些条件下来争取。这些条件总合起来看,对于我党,对于无产阶级并没有变得不利,虽然国民党已有全国的政权和庞大的军队,并有英美等国的援助等优越条件。

现在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结果和前途怎样?这就要看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是谁。是资产阶级,那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那对日战争必然彻底胜利,并将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合作阶段中的中心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具有极优越的条件来获取最后的胜利。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及整个第三营垒的人,也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领导权,领导中国走第三条(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是不可能的,结果是要走到殖民地的。要战胜他们,要有正确的政策,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对一切忽视这个问题的倾向,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懈怠,必须给以坚决的批评。

共产党如何来争取领导权呢？毛主席已正确地提出了四项原则^[53]。具体地说，我们就要分析国共合作的具体条件，并善于运用这些条件，克服自己的弱点，发扬自己的优点，利用对方的弱点，并避开与削弱对方的优点。

我们的方针是孤立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也企图孤立我们。斗争是复杂的，而且是残酷的，只是暂时不拿起武器而已。

我们清楚估计了上述七项条件，我们就知道应该如何努力。除毛主席提出的四项原则以外，我认为下列具体问题也应提出：

第一，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是有经验的，因此，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工作必须十分艺术。我们应该完全抛弃虚浮、夸大、空谈的作风，不要故意去刺激资产阶级的警觉性。要进行切实的工作，不要企图用吹牛皮来吓退敌人。

第二，统一战线免不了“纵横捭阖”。要对付国民党各方面的阴谋，我们的许多同志是没有经验的。应该善于灵活接近各方面而保持自己的纯洁，不是将自己放在保险箱里保持纯洁，而是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纯洁。

第三，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红军要成为干部学校，要采用个别退伍的方法为全国白区准备军事干部，并使苏区“全国皆兵”。大革命的经验，要立即从新研究与整理好，来教育我们同志。

第四，在党内与群众中加强国际形势教育。策略的决定要

更多地估计到国际形势,因为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问题决定的因素比一九二七年增加了。要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第五,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停止以后,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的斗争已经提到了主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在政策上、原则上、理论上加强对于国民党及各派的批评,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以上是几项具体工作。毛主席提出的四项原则,是更基本的。此外,如壮大红军与发挥特区的模范作用,共产党的发展与巩固,广大地组织群众,影响国民党的军队,都是很重要的。每个同志坚定正确地照这样去工作,结果一定是我们的胜利,民主共和国就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否则,革命的再一次失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抗日游击战争中的 若干基本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一 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 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

在芦沟桥事变^[54]以前,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主要是非武装的斗争方式(如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当时敏感的学生与知识界常是站在反日斗争的前线。在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已经提高到武装斗争的阶段了。这是一个对日抗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站在抗日前线的是抗日的军队和那些武装起来的人民。

一般说来,武装斗争有下列三种主要的方式:(一)正规战争;(二)游击战争;(三)武装暴动。今天,在全中国来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是正规战争。在华北,也主要还是正规战争。

但不幸的是,在今天抗日的正规战争中还存在着许多缺

* 本文原题为《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当时由解放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公开发行,署名陶尚行。全文共六节,收入本书的是一至四节。

点。领导战争的政党与军政当局^[55]还坚持着许多错误的方针,不能全部执行正确的政策,使得今天的抗日正规战争在华北遭到相当严重的失败,许多主要城市、大部分土地与交通要道沦于敌人之手,被敌人利用来向中国内地进攻。这是十分痛心的事。然而,正规战争中这许多错误与缺点,还不是一天或一个月所能全部纠正的。同时八路军^[56]又还不是华北正规战争中的主力,真正的人民武装也还没有广大地组织起来。因此,华北的正规战争继续遭受一些严重的失败,仍是可能的。

华北抗日的正规战争如果继续遭受一些挫败,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虽然在全中国来说,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还是正规战争。

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一切愿意在华北继续进行抗日斗争的人们,都不应该放弃或逃避游击战争。如果真能在华北动员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那末,这一件事实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下列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

(一)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

(二)在华北长期坚持抗日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三)围困日本侵入内地的军队而最后消灭之,部分地收复失地。

(四)给华北人民以斗争的出路,给汉奸以打击,暴露投降

者的可耻面貌和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错误,给某些可能的对日妥协企图以极大的牵制。游击战争将告诉全世界:华北人民为保卫华北的每一寸土地而血战到底。

(五)在游击战争继续扩大与胜利的过程中,将转变到以正规战争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最后驱逐日军出华北。

有许多人对华北发展广大游击战争的政治军事意义,是估计不足的,对游击战争的前途是怀疑的。他们以为,数十万久经训练的、超过日军数倍的正规军,都不能支持华北的战局,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日军连续击破,难道在这数十万大军失败后,由人民组织起来的新的零散的游击队,能长期与更多的日军作战,并取得胜利吗?这些人的思想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华北正规战争的失败,是不能由这数十万军队与人民来负责的。不是由于数十万军队与华北人民的力量不能战胜日寇,而是由于没有发挥这数十万军队与华北人民的伟大力量,并错误地使用了军队与人民的力量。这是应由政府当局负责的。这种错误与缺点在今后的人民游击战争中,必能迅速地纠正与克服,也必须迅速地纠正与克服。所以,今后华北的游击战争,是有胜利前途的。

二 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胜利的可能

如果华北的交通要道和主要城市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那末,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将在何种条件之下与敌人斗争

呢？

敌人方面的情况是：

第一，敌人能在主要的城市、军事要地集结优势兵力，利用铁路、公路及工业中心，容易得到补充并能迅速地调动兵力；

第二，敌人有优良的武器装备；

第三，敌军到处受到华北人民的反抗；

第四，敌军不能没有后方作战，在断绝后方接济的情况下，敌军即不能生存；

第五，华北的地区广大，敌军不能在广大的乡村到处配置兵力，运输联络线很长，到处有被游击队截击的危险；

第六，敌军大多数士兵是被迫到中国来作战的。

以上是敌军在华北作战的优点和弱点。

我们的军队、游击队有哪些弱点和优点呢？

第一，我们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处在敌人后方和侧翼作战，外面的补充和接济很困难；

第二，我们的器械与军事技术低劣；

第三，我们能够到处得到人民的帮助，风土习惯、地形都很熟悉；

第四，有广大山地以及敌军不能经常驻扎的广大乡村，作为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

第五，我们的官兵是自愿地同敌人作战；

第六，在华北，有具备游击运动战特长的八路军为中心力量。

此外，过去华北的政府当局及豪绅资本家一贯地压迫剥

削人民,人民生活状况的困苦没有改善;这次许多抗日正规军的纪律不好,又在人民中种下新的恶劣影响;人民长期没有民主权利,没有组织;中国政府在历史上对西北蒙回等少数民族一贯采取错误政策,以及华北有些地区的会门^[57]土匪很多等,这些也是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应该重视的条件,应该作为确定游击队战略战术与基本政策的出发点。在游击战争广大地开展以后,在正确的政策执行以后,这些条件即将逐渐地改变,而对于我们有利。

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是在上述基本条件之下和敌人作战的。我们的战略战术与各种政策,都必须根据这些条件来确定。

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有许多专著论述,我这里不说了。我只说:如果在华北能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能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与正确的政策,那末敌人愈深入中国内地,他的后方联络就愈困难,绵延数千里的铁路、公路交通,到处都有游击队去破坏和截断。这就逼使敌人用极大的兵力来保护交通联络线,我们就可以围困深入内地的敌人,便于主力部队去消灭这部分敌人,收复被敌人占驻的一些地区。游击队能够对付超过自己数倍的优势敌人,并能打胜仗。东北义勇军^[58]的经验和八路军过去的全部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华北数十万正规军不能战胜的敌人,但数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的,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有着光明前途的。

但是游击队要战胜敌人,除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外,还必须:(一)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隐蔽自己的行动,了解敌情,并从人民中取得给养与补充,否则游击队不独不能胜

利,而且不能存在;(二)在各方面都要有正确的政策,代表人民的利益与意志,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三)有很好的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并实现官长与士兵的平等,保证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条件,虽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也是不能最后胜利的。因此,我们为华北游击战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除开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游击战争而外,还必须建立能够在各方面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并且改造那些不能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里建立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游击战争的抗日政权。

三 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

如果华北沦陷于日寇手中,决心反抗日寇的不会只是共产党,其他一切有民族意识和抗日决心的党派、军队与人民,都会拿起枪来,参加游击战争,和日寇作战,华北游击战争就能广大地开展起来,这自然是很好的。但这也说明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将是很复杂的、极不一致的,各种游击队会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政策与立场。对于这种情形,我们主张各种不同的抗日部队联合起来,配合作战,并执行一定的共同的政策。

估计将来抗日游击队约有下列数类:(一)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二)原在华北抗战的各派军队之一部;(三)以前在地主指导下的民团^[59];(四)人民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五)土匪会门中抗日的队伍;(六)从伪蒙军^[60]中反正

过来的队伍；(七)蒙民回民组织起来的抗日部队；(八)以至将来还会有从日军中哗变过来的士兵及俘虏兵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在抗日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主张与政策上是极不一致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日寇，我们提议：

(一)所有在华北抗日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32]，建立联军总司令部，受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二)联军总司令部以及各军区的联军司令部设经常的军事会议，由各种抗日部队的代表组成。军事会议决定战略战术方针和作战计划并选举联军司令官等。

(三)为了便于作战，各种零散部队应互相集中合并起来，成立正规的抗日军队。只要一有可能，共产党即为集中、合并与团结各种零散的部队成为正规军而努力。但必须以自愿为原则，反对强制的兼并购或改编。

(四)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不独需要自己的胜利与发展，而且需要一切友军的胜利与发展。共产党愿意公开自己一切成功与胜利的经验，以完全诚恳坦白的态度，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帮助各种抗日部队的改造，使一切抗日武装都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部队。但共产党对各友军的错误与缺点，也将不隐讳地进行批评。

在抗日战争中迫切需要到处组织武装部队，也迫切需要各种武装部队的联合、集中、合并与改造。因此，共产党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及某些地方当局禁止人民自由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方针，主张让人民武装起来，发给人民枪支，帮助人民武装，不要怕抗日的武装部队太多太复杂。同时，共产党既反对各种

抗日武装部队的分立主义,也反对强制的联合,主张民主的联合与集中。

我们认为,许多参加抗日的部队是需要彻底改造的。否则这些部队就不能胜利与发展,甚至不能在华北存在。这种改造是:

第一,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在政治上巩固部队,加强纪律,并提高对日作战的勇气与牺牲精神。

第二,必须改善对士兵的待遇,禁止打骂虐待士兵,废除肉刑,实现长官与士兵平等。因为游击战争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士兵已不是为了找饭吃、赚几元钱,而是为了抗日救国来当兵。他们是光荣的。因此,士兵就不能再受打骂与虐待,让别人把他们不当作人看待。一个抗日部队如果继续保留过去军阀主义的一切恶习,这个部队逃亡的必然很多,没有人愿意到这个部队当兵,这个部队也不能高度发扬士兵的英勇精神与敌人作战。这样的部队终究是不能胜利甚至不能生存的。

第三,必须实行部队的经济公开,并由士兵举人管理监督经济。这样,士兵才能在给养困难的条件下不生怨恨,才能剔除坏人的中饱。

第四,必须淘汰对抗战动摇与不坚定的分子,才能使这个部队长期坚持抗日,并取得胜利。

共产党主张有上述缺点的部队要进行改造,并愿尽一切可能帮助友军的改造。共产党同样虚心吸取友军的特长和好的经验,来改造自己的部队。

四 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 建立与抗日政府的组织

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在华北,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

在这些区域中,有的还存在着原来的政府,这些政府或者继续抗日,或者准备投降转变为汉奸政府;有的原政府人员逃走,汉奸们准备建立维持会^[61]等。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

首先应该召集这些区域中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武装部队、原来政府的代表和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举行会议,选举临时政府委员会。在该区域政府领导下,各县、区、乡、村的政府,同样召集会议,实行改造。这个临时政府除开执行政府一切职务外,还要筹备正式政府的建立,起草政府的组织纲领、选举法,并办理各级政府的选举。待民选的该区政府代表大会召集后,正式政府产生,临时政府的职务即行終了,将政权移交于人民选举的正式政府。这是改造政府所应经过的手续。

这种政府实行何种制度呢?实行民主制度。实行普遍、秘

密投票的选举,开始时或者还应采取复选制^[62],凡男女公民年满十八岁无精神病者均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各级政府采取委员制,由委员会任命各部部长,表决时以多数赞成成为通过。

这种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与命令。但它同时是地方自治的政府,它有权颁布地方性的法律和命令在自己区域内实行。

这种政府应该是地方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现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5]一党专政的政府),一切在抗日战争中坚决奋斗并取得民众信任的政党、团体、军队和个人,均应有代表参加政府。同时,这些政党、团体、军队和个人又应有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共同纲领,作为政府施政的准绳。

这种政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并争取胜利。因此,它施政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一)普遍地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改善人民的生活;(四)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

这种政府如果能够最好地完成上述任务,就能取得群众最高的信仰,发动群众以最高的积极性去参加战争中的一切工作。群众就能组织自己训练自己,并愿意将自己的一切交给政府去与日寇作战。这样,就能将这个区域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游击队的给养与补充可以取之于这些地方,后方可以设在这些地方,可以引诱敌人到这些地方来加以消灭。群众会以最高的热情从各方面来帮助政府与游击队。这样,就能使游击队长期坚持与优势的敌人作战并取得胜利。

建立我党领导下的 抗日民主政权^{*} (一九三七年十月)

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给聂荣臻^[63]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

一、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

(一)立即普遍进行区乡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民选;

(二)由当地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代表组织临时县政府委员会,好的县长可为主席;

(三)立即筹备边区^[64]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主席即以宋劭文^[65]担任;

(四)立即准备公开军区司令部。

二、立即颁布临时边区政府的组织法,规定:

(一)各级政府负责人的产生办法;

(二)实行委员制与民主集中制;

(三)各级政府组织法,边区及县区政府分为下列各部或

* 这是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的两份电报。

科：财政经济部、军事部或人民武装部、农政部（管理农民土地问题）、劳动部、内务部（下设民警局，相当于保卫局，不设锄奸部，取消原来的民团^[59]警察）、教育部、交通部（管军事运输）、法院（改组原来的法院，增设一高等法院及若干地方法院，法官由政府委员会推定）、监察部；

（四）区政府可不设监察科及法院，只设专管委员；

（五）取消薪饷制，规定各级政府公务员人数及其生活费的办法。

三、各地临时政府成立后，我党应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66]与基本政策，向委员会提议：颁布各种法令，主要的是劳动法、农民土地法；废除过去的捐税令，规定统一的累进税^[67]则，发布肃清汉奸令等。

四、军区司令部即准备公开，并召集各抗日武装代表成立军区军事会议。

五、设立边区工会、农会、民先队^[68]部及妇女抗日会等筹备处。另设军事政治学校一二所，大批招收青年工农学生训练干部。

六、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一面筹备成立，一面向蒋、阎^[69]提出，力求取得其同意后，向全国公开，以便推广到其他边区。在未得承认前，边区可先行办理，唯暂不向全国公开。

此电并致各边区省委，晋西北及绥远^[70]亦可采取此种原则，依当地实况，逐步进行。

给贺龙^[71]、关向应^[72]及

华北各地党组织电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在冀察晋绥已被敌人占领地区,如繁峙、代县、崞县、宁武、神池及雁北各县,原来的县政府被摧毁或人员逃跑投降,但广大的乡村并无日军或汉奸武装驻扎。在这些地方,我们的地方工作方针应如下:

(一)直接用共产党及八路军^[56]政治部名义,去动员群众。如在当地有友军友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即联合他们,并在战委会^[73]名义下共同去动员。

(二)建立当地的抗日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并使各种零散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受当地政权领导。

(三)建立或改造当地的政府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首先由当地各种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及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成立临时县政府的委员会(名义暂不统一),亦同样成立各区村乡临时政府的委员会。这种县区政府仍应隶属在省政府之下(如山西)。临时政府的任务是:(1)大量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斗争;(2)下令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行减租(战地免租)减息、免税、增加工资等,改善人民生活;(3)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群众运动的豪绅等;(4)颁布县区乡政府民主制的组织法、选举法,筹备选举,产生正式政府。

(四)建立工会、农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首先成立县工会、农会等筹备委员会。其任务是:(1)起草章程;

(2)提出当地工农群众各种要求的纲领,并组织群众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3)训练工会、农会工作干部;(4)派人到各区各村,成立区村工、农会;(5)动员群众去参加自卫队游击队及政府各方面的工作。

二、在未被敌人占领地区,当地政府还能照旧维持其统治,我们的地方工作方针是:

(一)共产党与八路军政治部应该独立自主地去动员与领导群众运动,但当地共产党员尽可能用左派面目出现,如当地有友军及政治团体如牺盟会^[74]等,更应联合和推动他们去做,并可用战委会名义去做。

(二)推动当地政府进步,要求政府武装人民及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坏官坏人,在发动群众运动基础上逐步改选政权。

(三)中心一环是广大发动当地群众,要同时采用抗日救国的政治口号与改善生活的经济口号去动员与组织群众,并建立人民自卫队。

(四)首先在县一级成立工会、农会等筹备会,其任务同上。广泛地动员群众起来要求增加工资,少交租谷百分之二十五;取消向穷人摊派,增加对富人摊派;优待军人家属及进行其他一切改善生活的斗争。要使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联系,让穷人吃饱饭,好去救国。

三、在已失及未失地区,都要大大发展地方党,吸收在抗日斗争中积极的工农与经过锻炼的知识分子入党。要在各县首先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建立全县各乡村党的支部。

独立自主地领导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目前,正处在片面的军事抗战^[75]已很难支持,而全面全民族抗战还没有到来的危险严重的过渡期中。华北的正规战争大体结束,今后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将是八路军^[56]为主的游击战争。正因为这样,统治阶级就更加动摇,汉奸活动更加猖獗。一部分统治阶级、军政领袖倾向对日妥协、求和,以保存他们的财产权位,国际上调解“中日冲突”的活动^[76],更增加了他们对和平的幻想;黄河以北的一些军政领袖,则企图逃跑到黄河以南去躲避战争。而另一部分统治阶级、军政领袖,则倾向于开放民众运动、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在民众援助下继续坚持与扩大抗战。

二、华北已经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因为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落在我党身上。目前在华北,旧的政治机构已被日寇破坏,而日寇与汉奸的政权还没有在广大的乡村与大多数小的城市建立起来,在这些地方,我党公开直接动员

* 这是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的决定。

与武装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有了。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推动国民党^[5]、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改造。

三、如果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不能继续坚持与扩大,我们就要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地和日寇作战。然而比东北义勇军^[58]的困难要少多了。华北游击战争有重新转变为正规战争、驱逐日寇出华北的胜利前途,这取决于八路军若干倍的扩大,武装民众和争取与改造友军的成功。因此,我党在华北一方面要动员人民坚决反对妥协求和的倾向,反对退却逃跑,反对国际上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和平方案;同时要集中全力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争取友军。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

四、我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发动民众运动。除开深入与扩大我党的政治宣传外,必须坚决广泛地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使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抗日武装斗争联系起来。要加强反对右的危险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因为惧怕同盟者不高兴,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与减弱领导群众的斗争,放弃领导群众改善经济生活的斗争,惧怕用八路军与党的名义公开去动员群众,模糊我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同时,必须反对左倾错误,这种错误表现在不顾统一战线的原则,提出过高的口号,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不必要地去刺激同盟者等。目前,我们不要去依赖同盟者的帮助,而应独立

自主地去领导群众与游击战争,但我们应尽可能取得同盟者更多的帮助。我们不要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领导群众的斗争,但我们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要尽可能不故意刺激与吓退同盟者。目前是要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进一步地发展我党的独立自主,而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

五、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各根据地成立边区^[64]政府、军区司令部,改造与建立各县、区、乡政府。要尽可能联合各党各派来建立这种政府与部队,并取得南京中央政府的承认。同时,还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族解放先锋队^[68]及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整个系统的组织,使之成为群众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

六、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成为政权、武装与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即公开。要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增加领导机关的人员,扩大党内的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要反对党内准备在日寇到来时只潜伏在日寇统治下进行秘密工作的倾向,这只有在日寇统治暂时稳定的城市中才有必要。在广大的乡村中,我党要公开出来进行游击战争。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九三九年七月)

同志们：

我要讲的，是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现在来讲讲这个问题，对于党的建设和巩固，不是没有益处的。

一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呢？

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和自然界进行斗争，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人们的物质生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进行生产的时候，都要建立一定的生产关系。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人们的本身，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都是在社会的人们和自然界的长年斗争中不断地改造和进步的。在古代，人们的生活样式、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和现代人们的都不同，而在将来，

^{*} 这是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演讲。一九四三年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一九六二年经作者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人们的生活样式、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又会和现代人们的不同。

人类本身,人类社会,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就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都在一定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生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在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思想意识的阶级之间,进行着不断的阶级斗争。这样,人们不但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说:“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⁷⁷⁾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自觉地去经受长期的社会革命斗争,并且在这种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自己。

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

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

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78]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

我们说,共产党员要在同反革命^[79]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这就是说,要在这种斗争中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和能力。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一个比较幼稚的革命者,由于他:(一)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他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包括成见、旧习惯、旧传统)的残余;(二)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因此,他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要改变这种情形,他除开要学习历史上的革命经验(前人的实践)而外,还必须亲自参加到当时的革命的实践中去,在革命的实践中,在同各种反革命^[80]进行斗争中,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加紧学习和修养。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逐渐深刻地体验和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和自己,才能发现自己原来不正确的思想、习惯、成见,加以改正,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培养革命的品质,改善革命的方法等。

所以,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吧,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去参加某种群众的革命斗

争,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去参加革命实践,这种革命斗争对于这些党员所起的影响,可能完全不是一样的。有的党员进步得很快,甚至原来较落后的赶在前面去了;有的党员进步得很慢;有的党员甚至在斗争中动摇起来,革命的实践对于他没有起前进的影响,他在革命的实践中落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又比如,我们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这对于他们是一次严重的锻炼,其中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然而长征对于个别党员的影响却是相反的,他们经过长征之后,对这样的艰苦奋斗害怕起来了,有的甚至企图退却和逃跑,后来他们果然在外界的引诱下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许多党员同在一起长征,而影响和结果却是这样的不相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种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来,是社会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我们的党员由于原来的社会出身不同,所受的社会影响不同,因而就有不同的品质。他们对待革命实践各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和认识,所以,在革命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就在你们学校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形。你们在学校中受着同样的教育和训练,然而由于你们各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因而你们就可能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因此,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

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

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1]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

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82]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毛泽东同志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83]

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

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或者说得更近些,在近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得到了某些成就,爬上了当权的位置以后,就腐化堕落下去。这是由历代革命者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由过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结果总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由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代替。所以,历代的革命者,在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就失去他们的革命性,反转头来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然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无论如何决不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一切阶级的革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而不剥削别人的无产阶级,它能够使革命进行到底,从人类社会中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清除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它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经过这样的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来和一切腐化、堕落的现

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地从党内和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分子(不管这种分子是作了多大的“官”),而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特点,无产阶级革命党的这一特点,是历代革命和历代革命党所没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

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上面讲的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的缘故。下面我再讲共产党员修养的标准。

二 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按照党章的规定,只要承认党纲、党章,交纳党费,并且在

党的一个组织内担负一定工作的人,就可成为党员。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能成为共产党的党员。但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只是做一个起码的够格的党员,而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力求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

恩格斯在论到马克思的时候说: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84]又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85]

斯大林在论到我们应该学习列宁的榜样的时候,曾经说:

“要记住,要爱戴,要学习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袖伊里奇。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反对、去战胜国内外的敌人。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建设新生活、新风俗和新文化。在工作中决不要拒绝做小事情,因为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积成的,——这是伊里奇的重要遗训之一。”^[86]

斯大林又说:“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担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象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在

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 ;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 ,毫不惊慌失措 ,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 ,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 ;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 ,也能够象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 ;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 ;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⁸⁷⁾

这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 ,斯大林对列宁的简要描述。我们每个共产党员 ,就是要这样去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和品质 ,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有人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天才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 ,是学习不到的 ,要把自己的思想和品质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品质那样的高度 ,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看成是天生的神秘的人物。这种说法和看法对不对呢 ?我想是不对的。

我们普通的同志 ,今天诚然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高的天才 ,那样渊博的科学知识 ,我们大多数的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不能达到他们那样高深和渊博。但是 ,我们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 ,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 ,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并且始终不脱离当前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 ,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 ,那末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作风 ,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 ,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 ,这是完全可能的。

《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88〕}，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当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否则，是学习不好的，是学习不到的。事实上，在我们的队伍中，对于这种学习，是有几种不同的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态度的。

有一种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他们虽然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但是，不能把这些书籍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他们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然而他们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

这一种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是不不少的。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诚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

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真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真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蠹贼。这种人在党内,终归要被党员群众所反对、揭穿和抛弃,是无疑问的。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内就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

另一种人就完全和前一种人相反。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他们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他们仰望这些创始人的伟大人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而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去检查自己处事、处人、处己是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他们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都是为着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民族的和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成功,而没有其他。

只有这种人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才

能使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真正刻苦修养，忠实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的人，他所特别注意的，是要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问题。除此以外，他绝不计较自己在党内地位和声誉的高低，绝不以马克思、列宁自居，绝不要求人家或幻想人家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利。然而，正因为 he 这样做，正因为他在革命斗争中始终是正直忠诚，英勇坚定，并且表现了卓越的能力，他就能够受到党员群众自觉的尊重和拥护。

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作为我们的模范来学习，要做他们一个最忠实的最好的学生，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在伟大群众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善于总结经验，进行各方面的锻炼和修养，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是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的。

三 共产党员的修养和 群众的革命实践

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

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大家都无例外地需要进行上述各方面的修养。但是,由于我们党员的政治觉悟、斗争经验、工作岗位、文化程度、社会活动的条件,都各不相同,所以,各个同志需要特别注意修养或者着重注意修养的方面,也就会各有差别。

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89],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90],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但是,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这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

实践。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地倾听同志们和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仔细地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检验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否正确,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而加以纠正,去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总之,我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坚持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旧社会在教育和学习中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在旧社会中,有许多人在受教育和学习的时候,认为他们所学的是并不需要照着去做的,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照着去做的,他们尽管满篇满口的仁义道德,然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国民党^[5]反动派尽管熟读“三民主义”^[91],背诵孙中山的“总理遗嘱”^[92],然而实际上却横征暴敛,贪污杀戮,压迫民众,反对“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甚至去和民族的敌人妥协,投降敌人。有一个老秀才

亲自对我说：孔子说的话只有两句他能做到，那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93〕}，其余的他都做不到，而且从来也没有准备去做。既然如此，他们还要去办教育，还要去学习那些所谓“圣贤之道”干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用这些“圣贤之道”去压迫被剥削者，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这就是旧社会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对于他们所“崇拜”的圣贤的态度。当然，我们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旧社会的这种遗毒，难道就完全不会影响我们吗？会有影响的。在你们同学中，固然没有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了去升官发财，去压迫被剥削者。然而在你们中难道就没有这样想的人了吗？就是说：他们的思想、言论、行动和生活不一定要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他们所学到的原则也不打算全部加以运用。在你们中又难道就没有这样想的人了吗？就是说：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高深一些的理论，是为了将来好提高自己的地位，夸耀于人，使自己成为有名的人物。我不能担保，在你们中完全没有这种想法的人。这种想法是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一根本原则的。我们一定要学习理论，但是学习到的就必须做到，而且是为了用才去学习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才去学习的。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

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⁹⁴⁾我们的同志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方法,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四 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 修养是统一的

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

在一些共产党员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想法:就是认为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无产阶级立场虽然不很坚定,思想意识虽然不很纯洁(即还残留着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可以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们认为,只

靠书本学习,只靠书本知识,就可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的,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的。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和掌握它。没有坚定纯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是不能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的。如果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者,不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他不想革命,或者不想坚持革命到底,而想半途而废,那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对他也是没有用处的,或者是用处不大的。

我们常看到某些由工人出身的最好的党员,虽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备比较少,若要考试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公式,他不一定比别人记得多。但是,在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只要能用他懂得的话解释给他听,他的兴趣,他所了解的程度,常比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还要高得多。比如《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一段,对于某些党员来说,是不容易了解的。但是对于这些由工人出身的党员就不同。因为工人在生产中,在同资本家斗争中,深切了解资本家如何计算工资、工时,如何剥削工人取得利润,如何压迫工人等。因此,他也常常比某些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能够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我们说,许多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并不是说,他们由于出身关系就是天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说,一切具有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一切没有任何个人成见

和其他不干净的东西的同志,只要虚心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切实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他们在观察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一定会比其他同志更敏捷而正确。他们在斗争中,也能够更好地洞察真理,能够更勇敢地拥护真理,而没有任何顾虑。

我们也常看到许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由于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之间的关系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得到不同的结果。一般地说,这些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员,在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立场不很坚定和明确,思想意识也不很正确和纯洁,还有或多或少的、各种各色的、旧社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残余。显然,这些东西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直接相冲突的。但是,由于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在这种冲突中也就有了不同的结果。有的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时候,把这种理论学习同他的思想意识的修养正确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去抵制和克服自己思想意识上的旧东西,这样,他就端正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纯洁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处理实际问题。这样的党员是很多的。另外有的人则走了相反的道路,他身上的旧东西积累得很多,有许多固习、成见和个人的物欲私念,而又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在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批判他思想意识中的这些旧东西,相反,他企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达到他个人目的的武器,甚至用他原来的成见去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因而他就不能够正确理解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原则，不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在他处理革命斗争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会因为他有旧社会的习惯和成见，有个人主义的打算，而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徬徨动摇，不能无障碍地洞察事物，不能勇敢地拥护真理，不自觉地以至自觉地掩蔽和歪曲真理。这种人根本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也就不能敏捷地、正确地、实事求是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有时在党组织或别的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正确地解决了实际问题以后，他甚至采取拒绝的态度。这种情形，也并不是怎样少见而奇怪的事情，而是可以常常见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要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革命斗争的武器，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有比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就必须有崇高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同时，我们也应该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

在一些共产党员中，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认为只要自己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完全行了，学习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都没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只靠家庭出身好，本人成份好，用

不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有的同志,虽然一般地承认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工作 and 斗争中,却从来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这些想法,显然都是不对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

革命坚决、斗争勇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品质,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谁是直接的同盟军、谁是间接的同盟军、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的问题;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军,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倒主要的敌人的问题;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战略和策略的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要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在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

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拿我们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来说,在“七七”事变^[54]以前,有一些同志由于不了解当时中国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降低为次要的矛盾,曾经反对党的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我们党联合一切爱国的阶级、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一致抗日的政策,特别反对我们党联合国民党一致抗日的政策。这些同志在反对党的正确政策的时候,自以为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上,但是,在实际上,他们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完全陷入一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立场。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这种错误主张去做,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就不但不能团结和领导全国一切抗日爱国的阶级、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相反地,会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使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孤立起来,不利于抗日救国的斗争。在“七七”事变以后,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有一些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为国民党参加了抗日,就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采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的投降主义的政策,而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政策;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分地信任国民党,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而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因而不敢放手发展自己,放手发展人民的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主张这样做的同志虽然把自己标榜为无产

阶级的真正代表,但是他们这种政策的实质是要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要使无产阶级丧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上面所说的这种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辨别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显著例证。

无产阶级不能只是自己解放自己,它必须争取一切劳动人民的解放,争取自己民族的解放,争取人类的解放,才能实现自己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必须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最后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必须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严格区别开来。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同广大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和一切同盟者同自己一道前进;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阶级的利益,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要代表占本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并且要了解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又必须同迁就主义、投降主义严格区别开来。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分清界限,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分清界限,甚至要同劳动群众有所区别;要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各种影响;要在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要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一方面,在

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95]

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时候,曾经说:“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现实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96]又说:“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当是工联会的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横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97]我们共产党人要实现列宁在这两段话里提出的要求,当然必须不间断地参加革命实践,去增加感性知识,积累实际经验。但是,必须指出,光有感性知识和实际经验,还是不够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98]因此,在参加革命实

践的同时,必须十分用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理论。只要我们密切联系革命实践,去学习它,运用它,掌握它,我们就能够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我们就能够有确定行动方针的能力,能够对革命运动的前途具有信心。

正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具有这样伟大的作用,所以列宁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⁹⁹⁾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

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极大重要性。他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¹⁰⁰⁾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提出过,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当前运动的实际情况,研究本国和世界的历史,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行动,并且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较低的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引起我们全党的注意。

五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

现在来继续讲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

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一回什么事呢?我认为这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上述斗争是一种思想上的矛盾的斗争,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斗争的结局,对于我们党员来说,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以至肃清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克服以至肃清其他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般利益和目的的思想克服以至肃清个人主义的思想。如果结局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后者压倒前者,那末他就会落后,以至失去共产党员的资格。这对于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

我们共产党人,在党内党外的各种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的思想,经常地总结和吸取革命实践的经验,检讨自己的思想是否完全适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完全适合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利益。在这样的学习、反省和自我检讨中,去肃清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残余以至某些不适合于共产主义利益的最微弱的萌芽。

你们大家知道,人的言论行动,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而人的思想意识又常常和他的世界观分不开的。我们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只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方法论。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上,特别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哲学著作上已经讲得很多,你们也学习过,今天我就不讲了。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讲一讲我们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党员到底要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事业。

我们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经过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手,去改造自己的国家,从而一步一步地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和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个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那末,这样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说,是能够实现的,是必然实现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已经作了无可怀疑的科学的说明。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也给了我们以事

实上的证明。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更快地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但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前面还站着强大的敌人,必须彻底地、最后地在各方面战胜这些强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没有这种斗争,就没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自然,这种斗争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什么“偶然的”社会现象,是某些共产党人所制造出来的事件。而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是不能避免的阶级斗争。共产党的产生,共产党人的参加、组织和指导这种斗争,也是社会发展中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帝国主义,法西斯蒂,资本家和地主,总之,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剥削和压迫到不能生存的境地,使得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非联合起来反抗这种剥削和压迫,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因此,这种斗争乃是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

道德。

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去推动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是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因为在世界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中,蕴藏着极伟大的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发动、团结和组织起来,是能够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因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是正在产生着和正在发展着的新事物,而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就目前的情势来说,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苏联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许多国家中已经组织了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战斗的共产党,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迅速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力量,也正在不断的斗争中迅速地发动和团结起来。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全世界组织成为雄伟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共产主义事业要继续发展,继续前进,以至获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还必须了解:国际反动势力和剥削阶级的力量,今天还比我们强大,它们在许多方面暂时还占着优势,我们要战胜它,还需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艰难的斗争过程。

在数千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由于剥削阶级统治人类的结果,剥削阶级给自己造成了各方面极大的权力,霸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们的长期统治,在人类社会造成了长

期存在着的各种落后、愚昧、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等现象，给被剥削阶级的群众和社会中的人们带来了极坏的影响。这是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它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所必然造成的结果。因为没有被剥削阶级群众和殖民地民族的落后、散漫和分裂，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就不能维持。因此，我们为了要获得胜利，就不但要和剥削阶级进行严重的斗争，而且要和剥削阶级在群众中长期造成的影响，要和群众中的落后意识、落后现象进行斗争，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团结广大的群众去战胜剥削阶级。这就是我们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过程中的困难之所在。同志们！假若象某种人所设想的那样，群众都是觉悟的、团结的，在群众中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影响和落后的现象，那末革命还有什么困难呢？

这种剥削阶级的影响，不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被剥削阶级把剥削阶级从统治地位上推翻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也是仍然存在的。你们可以想一想，要最后地战胜剥削阶级及其在人民中的影响，要解放和改造全人类，要改造千百万的小商品生产者，要最终地消灭阶级，要把数千年来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受了各种旧习惯、旧传统影响的人类逐渐地改造过来，提高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聪明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的人类，这中间要经过多少曲折的过程，多么艰难的工作和斗争呵！

列宁说：

“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

相处 ;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 ,重新教育他们 ,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 ,浸染无产阶级 ,腐蚀无产阶级 ,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 ,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 ,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 ,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 ;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 ,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101]

列宁又说 :

“资产阶级的反抗 ,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 ,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 ,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 ,小生产的力量。因为 ,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 ,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 ,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102] ,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 ,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 ,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103]

由此看来 ,无产阶级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 ,也还有极困难的任務需要解决。无产阶级革命 ,和过去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是不同的。比如资产阶级的革命 ,通常是以获取政权来完成的。

而对于无产阶级,则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获得胜利,还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极大的工作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在取得政权以后。

共产主义事业,真如我们所说的是“百年大业”,是决不能“一蹴而就”的。它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需要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才能逐渐地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例如在我们中国,现在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它的敌人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买办势力。必须战胜这些敌人,才能够完成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长时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才能逐渐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

实现共产主义,既然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很自然的责任。

正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这样伟大而艰难的事业,所以至今还有些追求社会进步的人怀疑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实现还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人类在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领导下,是能够发展和改造成为高度纯洁的共产主义的人类,不相信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系列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们或者没有估计到这种困难,或者在实际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悲观失望起来,甚至有的共产党员因此而从共产主义队伍中动摇出去。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最伟大的气魄和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

产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我们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实现过程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又清楚地了解这种困难是一定能够在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发动中完全克服的,绝不困难所吓倒。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依靠,完全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中一段大工程,同时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完满地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工程。我们共产党员这种伟大的胸怀和气魄,是人类过去历史上任何阶级的英雄豪杰所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可以自豪的。

我记得西欧有一个资产阶级的传记作家^[104]去到了苏联,曾经和斯大林同志谈过历史人物的比拟问题。斯大林同志当时说:列宁好比是大海,而彼得大帝^[105]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这就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和地主阶级、新兴商人阶级事业中的领袖,在历史地位上的比较。从这个比较中我们可以了解:为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成功而奋斗的领袖,是这样的伟大;为剥削阶级事业而奋斗的领袖,是那样的渺小。

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就不是一个好共产党员,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或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也不是好共产党员,而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

产党员。这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标准。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而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是丑恶的。正因为它丑恶,所以绝大多数的人们才要求改造它,不能不改造它。我们改造世界,不能离开现实,不能不顾现实,更不能逃避现实,也不能向丑恶的现实投降。我们正视现实,认识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向丑恶的现实斗争,改造现实,逐步地达到我们的理想。所以,共产党员应该从眼前所处的环境,眼前所接触的人们,眼前所能进行的工作,来开始和开辟我们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工作。在这里,我们应该批评某些青年同志所常犯的一种毛病,就是他们总想逃避现实或者不顾现实的那种毛病。他们有高尚的理想,这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常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这种工作不好,那种工作也不好。他们总想找到一个能够合于他们“理想”的地方和工作,以便他们顺利地去“改造世界”。然而,这种地方和这种工作是没有的。这只是他们的空想。

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别的。

六 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 服从党的利益

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共产党员必须清楚地确定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开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必然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一切劳动人民,解放一切民族,即解放全人类,那末,无产阶级就不能完全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同一切劳动人民解放的利益,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利益,同全人类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分不开的。因此,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发展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党员个人的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也就是服从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利益。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06]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行动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党员的思想行动中,都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在个人

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

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党员个人的目的只能是和党的利益相一致的。如果我们的党员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加强自己的工作能力,建立各种革命的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等,作为自己的目的,把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目的,那末,共产党员这种个人目的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党正需要许多这样的党员和干部。但是除此以外,党员就不应该有个人地位、个人名誉、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其他个人打算等等个人的独立目的,否则,就会使自己离开党的利益,以致走到在党内进行投机。

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如果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那末:

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有明确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所以他能够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他能够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另一方面，他对待人类的蠹贼，能够坚决地进行斗争，能够为保卫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而和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07〕}。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08〕}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109〕}。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第三，他也可能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办法。他能够运用这种理论和办法，去敏捷地观察问题，认识和改造现实。由于他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他没有任何个人的顾虑和私欲，因而不致蒙蔽和歪曲他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真理的理解。他实事求是，在革命实践中检验一切理论和是非。他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够“慎独”^{〔110〕},不做任何坏事。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时他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他没有私人的目的和企图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问题上善于自处,没有必要卑躬屈节地去要求人家帮助。他也能够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爱护自己,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但是,在为了党和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的时候,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

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

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所谓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这是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道德”。这种“道德”观，从来都是唯心论的。把道德观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基础上，公开地宣称我们的道德是为着保障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战斗利益，这只有共产党人能够做到。

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党的利益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现。绝不能把共产党看作是图谋党员私利的、行会主义的小团体。凡是这样看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员。

党员有个人利益，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在某种时候可能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甚至对立，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在任何形式的掩盖和借口之下，企图牺牲党的利益去坚持个人利益。我们的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全心全意为党的利益和党的发展而奋斗，并且应该把党的、阶级的成功和胜利，看作自己的成功和胜利。党员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努力增加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但是，只能在争取党的

事业的发展、成功和胜利中,来提高这种能力,增加这种本领,不能够离开党的事业的发展而去争取什么个人的独立发展。事实也证明,党员只有全心全意地争取党的事业的发展、成功和胜利,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本领,否则,党员要进步、要提高,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党员个人的利益必须而且能够和党的利益完全取得一致。

我们的党员,不是什么普通的人,而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自觉的代表者。因此,他的个人利益完全不应该在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突现出来。党的干部和党的领导人,更应该是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的具体代表者,他们的个人利益,更应该完全溶化在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中,只有无产阶级最能代表民族解放的利益,因此,我们的党员也应该是整个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

在我们党内,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还要求党员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党内,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抹煞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消灭党员的个性。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要根据他的个性和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因此,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同时,党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还要帮助党员根据党的利益的要求,去发展他的个性和特长,给他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党在可能条件下顾全和保护党员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如给他以教育学习的机会,解决他的疾病和

家庭问题，以至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因为保障党员必要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教育条件，使他们安心地热情地工作，是完成党的任务所必需的。这是党的负责人在处理党员问题的时候所必须注意的。

总而言之，一方面，党员个人应该完全服从党的利益，克己奉公。不应该有同党的利益相违背的个人目的、私人打算。不应该什么都只顾自己，到处向党提出一大堆私人要求，责备党没有抬举和奖励他。而应该在一切情况下，努力学习，努力前进，勇敢奋斗，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断加深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以便对党对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在解决党员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党员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教育情况，使党员能够更好地为党工作，使党员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不断地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特别是对于那些真正克己奉公的同志们，要给以更多的注意。只有这样，只有这两方面的注意和努力配合起来，才能对党有更大的利益。

七 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

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拿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了解，以及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那末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有许多党员和干部是合于这些标准的，他们能够作为党员的模范；另一方

面,也有一些党员和干部还不合于这些标准,还存在着各种各色的或多或少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我在这里不妨大要地指出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以便引起我们的同志注意。

党内同志中有哪些在基本上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呢?

第一,加入我们党的人,不只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各不相同,而且是带着各种各色的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当然,很多的党员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目的来加入共产党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党员,却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和目的来加入党的。比如,过去我们有些农民出身的同志,以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在入党时是懂得的。今天也有不少的人,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来加入党的。还有些人是仰慕共产党的声望,或者只模糊地认识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来的。另外,还有些人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的。甚至还有个别的人为了要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这些同志,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和艰苦,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是很自然的。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要发生一些动摇和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他们带了各种各色的思想意识到党内来,因此,对于他们的教育,他们自己的修养和锻炼,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某些人要来依靠共产党,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总算还是不错的。他们找共产党并没有找错。除开敌探、汉奸、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以外,我们对于这些人是欢迎的。只要他们承认和遵守党纲、党章,愿意在党的一定组织内担负一定的工作,并且缴纳党费,他们是可以加入共产党的。至于对共产主义,对党纲、党章的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可以在他们进了党之后再学习,并且根据他们所学习的再在革命斗争中锻炼修养,这样,他们就完全可能使自己变为很好的共产党员。本来,许多人在加入党以前就深刻理解共产主义和党纲、党章,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提出承认党纲、党章作为入党条件,而没有提出精通党纲、党章作为入党条件,也就是这个原因。很多人在入党以前虽然还不精通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在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目前的革命运动中,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战士。只要他们入党后努力地学习,就可能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此外,在我们党章上还规定党员有退出共产党的自由(加入党是没有自由的)。任何党员如果对于共产主义不能深信,不能过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或其他原因,有向党声明出党的自由,党是允许党员自由出党的。只要他退出党以后不泄露党的秘密,不做破坏党的活动,党是不作任何追究的。至于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奸细,我们当然要清除他们出党。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党的纯洁。

第二,在某些党员中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

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就是:某些人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的时候,常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他对于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个人的利益;或者假公营私,借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借口原则问题、借口党的利益,用这些大帽子去打击报复他私人所怀恨的同志。讲到待遇、享受和其他个人生活问题,他总企图要超过别人,和待遇最高的人比较;“孜孜以求之”,并且以此夸耀于人。但是,讲到工作,他就要和不如他的人比较。有吃苦的事,他设法避开。在危难的时候,他企图逃走。勤务员要多,房子要住好的,风头他要出,党的荣誉他要享受。一切好的事情他都企图霸占,但是,一切“倒霉”的事情,总想是没有他。这种人的脑筋,浸透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他相信这样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世界上不会有真正大公无私的人,如果有,那也是蠢才和傻瓜”。他甚至用这一大套剥削阶级的话,来为他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辩护。在我们党内是有这种人的。

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常常表现在党内的无原则纠纷、派别斗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中;表现在对于党的纪律的不尊重和随意破坏的行动中。无原则斗争,大部分是从私人利益出发。进行派别斗争的人,闹宗派主义的人,常把个人的或少数人的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他们常常自觉地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中破坏党的组织和纪律,无原则地或是故意地打击某些人,又无原则地结识某些人,互不得罪,互相隐瞒,互相吹嘘,等等。

至于党内存在的本位主义,主要是由于一些同志只看到部分的利益,只看到本部门本地区的工作,而没有看到全局和

全党的利益,没有看到别部门别地区的工作。这在政治上思想上说来,是一种和行会主义相似的东西。犯本位主义错误的同志,固然不一定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不过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常常犯本位主义的错误。

第三,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等,在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有这种思想的人,他首先计较个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低。他好出风头,欢喜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有个人野心,“逞能干”,好居功,好表现自己,好包办,没有民主作风。他有浓厚的虚荣心,不愿埋头苦干,不愿做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就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企图压倒别人,不能平等地谦逊和气地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时”,不能“倒霉”,他受不起委屈。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装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在他这种目的不能达到的时候,在他受到委屈的时候,他就可能有动摇的危险。在党的历史上由于这样的原因而动摇出党的人是不少的。在这种人的思想中残存着剥削阶级的意识,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没有共产主义的伟大胸怀。

共产党员是不能有任何的自满和骄傲的。就算某些同志很能干,做好了某些工作,获得了大的成绩(如我们军队的指挥员率领几万几千人的军队打了胜仗,我们各地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在工作中创造了较大的局面等),这或许是“伟大”

的成绩,很可以“自骄”一下。然而,如果拿这点成绩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比较起来,又到底有多大呢?这对于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呢?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把工作做得对,做得好,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他应该防止自满和骄傲,力求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个人地位,又有什么得失值得计较的呢?个人地位总莫高过于皇帝了,然而拿这来和共产主义事业家比较,到底又有多大呢?还不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只是大海中之一滴罢了。这又有什么可以值得计较和夸耀的呢?

不错,在我们党内,在共产主义事业中,需要无数的共产主义的英雄,需要很多有威信的群众领袖。目前我们有威望的革命的领袖和英雄还真是太少了,还需要在各方面培养和锻炼很多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领袖和英雄。这对于我们的事业,确是一件很重要的完全不可忽视的事情。谁要轻视这一点,谁就不懂得怎样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为着适应共产主义事业前进的需要,我们必须大大提高党员在革命事业中的前进心,大大发扬他们的朝气。应该说,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的。比如,某些党员的学习不努力,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兴趣不高,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绝不是反对党员的前进心。为了人民,力求前进,这是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和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拥护真理,并且最有效地为真理而斗争,它有无限

的发展前途和进步性 ;而后者即使对于个人来说 ,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 ,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 ,常为个人利益而自觉地抹煞、掩蔽和歪曲真理。

我们的同志还必须了解 :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真正的领袖和英雄 ,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和英雄 ,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做领袖的人 ,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我们党员群众不会拥护那种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有个人野心和虚荣心的人 ,来做我们的领袖。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只有毫无个人目的、完全忠实于党的党员 ,他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和品质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有相当的工作才能 ,能够正确地指导党的工作 ,努力学习 ,不断前进 ,只有这样的党员 ,才能取得党的信任 ,才能取得党员群众的信仰和拥护 ,而成为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和英雄。

我们的同志还应该了解 :任何党员 ,任何领袖和英雄 ,他在共产主义事业中 ,只能做一部分工作 ,尽一部分责任。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件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创作的事业 ,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即使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 ,也只能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做好一部分工作。他们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千百万人共同努力 ,继续努力。我们 ,普通的党员 ,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也是做一部分工作 ,尽一部分责任。我们的这一部分 ,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一部分 ,当然是小得多。然而 ,我们总有一部分。大小虽然不同 ,但都是整个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所以 ,我们只要做好了一部分工作 ,

就算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当然要尽可能使自己做的工作多一点,然而,如果不能多,就少一点,也是有益的,也是一样光荣的。无论如何,最低限度不能妨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必须大小不一地尽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多少不一地做好自己担负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党员所应有的正确态度。那些不愿意做技术工作的同志,以为在技术工作中埋没了他,使他“不能”(其实也能,如斯达汉诺夫⁽¹¹¹⁾就是技术工人中出来的)扬名一时,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因此,使他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前进心。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技术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这些同志的工作,和其他同志的工作一样,都是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尽了一部分责任。共产党员对于工作的态度,应该是党需要做什么工作,就去做什么工作,不管这个工作是自己愿意做的或者是不愿意做的,都应该愉快地努力地做好。

自然,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分配党员的工作,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到党员的个性和特长,发扬他的长处,并鼓励他前进的热忱。但是,党员不能拿个人的兴趣作为理由,来拒绝接受党分配给他的工作。

第四,少数同志有浓厚的剥削阶级的意识。他们常常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的问题,完全没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伟大而忠诚的互助精神和团结精神。

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总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他嫉妒强过他的人。别人走在他前面,他总想把别人拉下来。他不甘心居于人下,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看见别的同志遇到困难,遇到挫折,

他幸灾乐祸，暗中窃喜，完全没有同志的同情心。他甚至对同志有害人之心，“落井下石”，利用同志的弱点和困难去打击和损害同志。他在党内，也利用党的组织上工作上的各种弱点，在党内“钻空子”，扩大这些弱点，以取得他个人的某些好处。他在党内好播弄是非，好在同志的背后说人家的坏话，进行一些阴谋诡计来挑拨同志间的关系。他好参加党内一切无原则斗争，对各种无原则的纠纷感到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他就更要在党内制造和扩大这些纠纷。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不明白，这完全是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的反映。

一切剥削者要发展自己都必须损害别人。资本家要发展自己的财产，或者要在经济恐慌时不致破产，他就必须挤倒很多较小的资本家，就必须使无数的工人饥饿。地主主要发展自己，他就必须剥削农民，必须使许多人失去土地。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要发展自己，它们必须损害其他国家，使奥地利、捷克、阿比西尼亚⁽¹¹²⁾等亡国，使中国受侵略。剥削者总是以损害别人、使别人破产作为发展自己的必要条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所以剥削者相互之间不能有真正坚固的团结，不能有真正的互助，不能有真正的人类的同情心，而必然玩弄阴谋诡计，进行暗害活动，使别人倒台破产。然而他们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在大众面前假装“圣人”，装作“公道的主持者”。这是一切没落的剥削者的特点。这些东西对于剥削者来说，也许是他们的“高尚”道德的标准，但是对于

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来说,就是大逆不道。

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完全相反。无产阶级不剥削别人,而受别人剥削。无产阶级内部没有基本利害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之间也没有基本利害的矛盾。无产阶级要发展自己,求得自己的解放,不但不需要损害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发展,而且必须和其他劳动人民大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一切劳动人民,解放全人类。一个工人或一部分工人的单独解放,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必须把人类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一步一步地争取全人类的共同的解放,半途而废,中途妥协,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的这种客观地位,决定了觉悟的工人们的思想意识,同剥削者的思想意识完全相反。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自己,他们一方面要用无情的手段对付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绝不使用这种手段去对待劳动阶级的兄弟和同志。他们把对付敌人的态度和手段,同对待自己同志和朋友的态度和方法,截然分开。他们对于自己阶级中的兄弟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具有伟大而忠诚的友爱、热情和同情心,具有伟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团结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他们根本反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权,认为自己不应该有任何特权的思想,他们认为在人民内部居于特权地位,对于自己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侮辱。他们要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就必须同时发展别人,提高整个劳动阶级的地位。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不甘心落后,而有极高的前进心,但是他们同时又尊敬、爱护和帮助在这些

方面强过他们的人,而努力向他们学习,绝无嫉妒之心。他们极关心自己阶级和世界全体劳动人民的痛苦和困难的境遇,关心每一个地方的劳动者的解放斗争及其胜利和失败,认为不论哪一个地方的劳动者的胜利和失败,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和失败,而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们认为对于任何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错误的,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犯罪的。他们爱护自己的同志和兄弟,对于自己同志和兄弟的弱点和错误,进行坦白诚恳的批评(这正是真正的爱护的表示),绝不在原则上敷衍、迁就,更不去助长别人的错误(迁就以至助长别人的错误,不是真正爱护同志的表示)。他们用一切方法帮助同志去克服和改正这些弱点和错误,绝不采取那种利用和扩大同志的弱点和错误的方法,使犯错误的同志“倒霉”,以至使这些同志的错误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对于自己的同志和兄弟能够“以德报怨”,帮助同志改过,毫无报复之心。他们能够对自己严格,对同志宽大。他们有坚定的严格的原则立场,光明、正直而严肃的态度,不在原则上作任何让步,不容许别人对党的利益有任何损害,也不容许别人对自己的无礼侮辱,尤其鄙视别人对自己无原则的奉承、阿谀和谄媚。他们反对一切无原则斗争,同时不使自己被牵扯到无原则的斗争中去,不被那些不负责任的、非正式的、在自己背后的批评所牵动和刺激,而丧失自己原则的立场、冷静的思考和镇定的态度。无产阶级的这种思想意识,是我们每一个党员所应该学习和发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就是这种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最集中的、模范的具体代表者。这些是现今社会中人类的正气。共产党就是代表

人类正气的。我们要发扬和提高这种无产阶级的正气,克服一切的邪气。

第五,在我们党内某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小气”,计较小事,不识大体等毛病。他们没有共产主义的伟大气魄和远大眼光,看不到大的方面,而对于他们鼻子下面的小事物却是津津有味。他们对于党内和革命中的大问题、大事变,不大感觉兴趣,而常常计较那一针一线、一言一语的小事,为了这些小事,他们可以郑重其事地和别人争论不休,伤感备至。这些人也容易被别人的小恩小惠所笼络。他们具有农村社会中小生产者那种狭隘性的特点。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党内生活中常常表现不清楚不确定的态度,对于他,可以这样也是,那样也是。这些人中实际上有两种,一种人是认识问题,另一种人是品质问题。后者总是喜欢投机取巧,双方讨好,到处逢迎。“看人看势说话”,“顺风转舵”,毫无原则,就是这种人的特点。有时候,他简直象寓言中的蝙蝠一样^[113],看哪一方面行时,他就投到那一方面去。这种“非驴非马”、“两面三刀”的人,在我们队伍中并不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人具有旧商人的特性。此外,还有个别的人受不起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引诱,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金钱美色,他们就动摇起来,以致因此犯罪,直至叛变党和革命。

最后,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动摇性,流氓无产者和某些破产农民的破坏性等,也常常反映到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识中来,对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是代表伟大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共产

主义的思想意识的。但是,也应该指出,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或多或少地反映着社会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以至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思想意识,有的时候在党内潜伏着,只在一些个别的日常的小问题上暴露出来,有的时候就发展起来,系统地暴露在党内各种原则问题上、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和党内斗争问题上。党的组织的个别部分、个别环节,也可能被这些错误的思想所统治、所腐蚀,在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如在陈独秀^[114]、张国焘^[115]等人当权的时候,甚至暂时地支配了党的重要领导环节。但是,在经常的时候,它又被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压服着。这样,就表现为党内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对于某些党员个人来说,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潜伏着,被克服着,但是在另外的时候,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又可能发展起来,以至支配着他的行动。这样,也就表现为党员个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矛盾和斗争。我们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要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八 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

共产党是代表着现今人类社会中最光明的最先进的方面,是人类最高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寄托和发育之所。世界上最觉悟、最进步、最健全、最有道德和最富正义感的人士,集中在共产党中,而坚持不屈地和一切黑暗势力搏斗着,

为人类社会的光明和最后解放奋斗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在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它有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同时继承着中华民族历代进步思想家、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它代表中国社会中最进步最光明的方面,在它的组织内集中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它和中国社会中的黑暗势力作过了长期的斗争,经过了艰苦的锻炼,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这一切,是我们共产党人足以自豪的。有一切的根据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和最后的成功。然而,在我们的组织中还不是尽善尽美的,还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在我们的队伍中还不是没有不健全的人以至坏人的,这些不健全的人和坏人,也还是会干出一些乌七八糟的坏事来的。这就是说,在我们光明的党内,也还有某些不好的东西,还有黑暗的一方面。这就是我在前面所列举的那些东西。

家里既已招来了丑女婿,或者娶来了丑媳妇,总不好完全不让他们见客。对于这些不好的事情,即使我们想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把它们掩藏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经常和我们党接触联系,同情我们的人要来我们这里参观,仰慕我们的人们和青年男女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或加入我们党。这些人来到我们这里,除开看到了我们一切进步的、光明的、美丽的东西和“家人”之外,还会碰到我们的丑女婿或丑媳妇,在稠人广众之中,说了些丑话,演了些丑态,做了些丑事,如是就引起了一些客人和新党员的疑问。他们这样问:共产党不是最公平的吗?共产党人不是最优秀的男女吗?为什么在共产党内还有这种丑人坏事呢?这难道不奇怪吗?有一

些青年同志,当他们未入党以前,他们对现社会有极大的不满,觉得一切都不是出路,只有共产党最光明。他们想着,入党以后一切都会满意、都会有办法的。但是当他们入党以后,或者到了革命根据地以后,由于看到党内还存在着某些错误缺点,而且实际生活并不能使他们一切都满意(因为他们所满意的事,有不少是不合于党和革命的利益的),因而使他们觉得实际的情况和原来的想法并不完全相合,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觉得奇怪。他们问:“为什么共产党内也有这些事呢?”有些人在没有来延安、进抗大^[116]以前,以为延安和抗大是合乎他们想象的那样好,在到了延安、进了抗大以后,也不能处处都使他们满意,于是他们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延安和抗大也有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事呢?”某些人因为对于这些问题不能解答,以至悲观失望起来。

对于这些问题,除开引起我们的警惕,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严重注意——要好好地对待和带领我们的新党员及一切倾向我们的人,不能给他们以坏的影响外,还要向我们的党内党外的同志们解释清楚。

为什么在我们光明的党的组织内还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呢?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一般说来,我们的党员是中国的优秀儿女,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他们都是来自中国旧社会的各部分,而今天中国存在着剥削阶级和他们的影响——自私自利、阴谋诡计、官僚主义等各种恶浊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最好的党员不容易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但是也还有某些党员不免要带来一些或者反映一些旧社会中的恶浊东

西,这有什么奇怪呢?正如一个人从污泥中爬出来,他的身上带有污泥,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完全不奇怪,是一定有的。共产党的队伍中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恶浊东西,倒是奇怪的,倒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可以说:只要社会中还有这些恶浊东西,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剥削阶级的影响,那末,在共产党内也就难免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恶浊的东西。正是因为社会上和党内还存在这些恶浊的东西,共产党就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党员就有改造自己的必要,就有修养和锻炼的必要。我们除开进行社会斗争,反对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势力和东西以外,还必须进行党内斗争,反对党内某些动摇的不坚定的分子把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东西反映到党内来。这就是我们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根据。我们要在党内党外各种斗争中,去改造社会,去逐渐清除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东西,同时去改造我们的党和党员,解决党内的矛盾,使我们的党和党员更加健康和更加坚强。

斯大林说: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绝的,是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

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本家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别、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和‘极左’派别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117]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各种错误缺点和恶浊东西的根源。这就是党内还存在着各种矛盾的根源。

九 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 ,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

由于剥削阶级的影响 ,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由于工人阶级本身有不同的阶层 ,由于我们党员社会出身的不同 ,所以在我们党内就产生各个党员间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别 ,在观点、习惯、情绪上的某些差别 ,产生党员间在世界观和道德观方面的某些差别 ,而且也产生党员间对于事物、对于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之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

在我们党内 ,有一部分人 ,是能够从事物的发展的、联系的状态去看事物的 ;另外一部分人 ,却习惯于从事物的静止的、孤立的状态去看事物。前一部分人能够全面地客观地认识事物 ,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作为我们行动的正确向导。后一部分人中有些人只看见或夸大事物的这一方面 ,另外有些人就只看见或夸大事物的那一方面 ,就是说 ,他们都不是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和联系的规律 ,全面地客观地去看问题 ,而是片面地主观地去看问题。所以他们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不能提出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方向。

因为各种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 ,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 ,就引起党内的斗争。特别在革命的转变关头 ,在每一次革命斗争加剧和困难增多的情况下 ,在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下 ,这种分歧和争论也就必然更加激烈起来。

所以问题的中心 ,不在于党内有无不同的思想意识 ,有无

意见上的分歧,这是一定有的。问题的中心,是在于如何解决党内的矛盾,如何解决这种分歧,如何克服党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很明白,只有经过党内斗争,才能解决这种矛盾,解决这种分歧和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正如恩格斯所说:“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118〕}

对于我们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有几种不同的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和几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人,他们没有看见或者不愿意看见党内某些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而盲目地以为我们党内没有什么不好的现象,因此,也就松懈他们的警觉性,放松他们对于某些缺点、错误和一切不好东西的斗争。第二种人,就只看见或差不多只看见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而看不见党的正确和光明,因此,就悲观失望,丧失信心,或者在看见这些东西之后,大惊小怪,使自己慌乱起来。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片面的。我们的看法,和前两种看法都不同。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党是中国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各种大小不一的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同时,我们还清楚了解这些东西的来源,清楚了解如何纠正和逐渐肃清它们的方法,不断加强自己的锻炼,努力做好工作,进行必要的斗争,推动我们的党和革命前进。

由于各种人的立场不同和看法不同,对于我们党内这些不好的东西,也就有几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的态度,第二种是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和思想方法不正确的党员的态度,第三种是坚持马克思列

宁主义原则的党员的态度。

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高兴我们党内有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他们幸灾乐祸,乘隙而入,并想一切方法利用和扩大我们的某些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来达到破坏我们党的目的。有时甚至采取反对某种错误、拥护党的路线的形式,把错误弄到另一个极端去。

第二种人也有以下几种不同情况:

(一)就是有些党员同情和接受党内某些错误的思想,学习党内某些人的坏样子,以满足他私人的某些企图和欲望。他认为党内某些缺点、错误的存在对于他是有利的,因此,他也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助长某些缺点、错误的发展而加以利用。这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品质极不好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

(二)就是有些党员放任党内某些缺点、错误和各种坏的现象不管,而任其自流地发展。他们得过且过,而不愿和这些东西进行斗争。或者惧怕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认为这是对党有害无益的;或者对这些现象麻木不仁,不愿意看见这些现象;或者在对这些现象进行斗争的时候,采取敷衍了事、调和折衷的态度。这是对党责任心薄弱的党员,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

(三)就是有些党员对党内这些缺点、错误,对党内某些思想不很正确的人,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他们随便地宣告和犯错误的同志绝交,企图一下子就把这些同志从党内肃清,驱逐他们出党。但是如果一下不能肃清,或者还碰了钉子的时候,就表示没有办法,悲观失望,感伤起来;或者就“洁身自好”,不管了,甚至自己远远地离开了党。这种绝对的态度,还

表现在有些人对于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机械的了解。抱这种绝对态度的人,他们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开展党内斗争,而且斗争得愈多愈凶就愈好。他们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对什么小缺点也要加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他们不按照客观需要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来适当地具体地进行党内斗争,而是机械地、主观地、横暴地、不顾一切地来“斗争”。这是不了解党内矛盾的根源的党员、缺少办法对付党内分歧的党员和机械地了解党内斗争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这种对党内斗争的绝对态度,在一个时期内曾经被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把党内的机械的过火的斗争,发展到故意在党内搜索“斗争对象”,故意制造党内斗争,并且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争的手段来惩罚同志,企图依靠这种所谓斗争和组织手段来推动工作。

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无产阶级的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上述各种错误的态度相反,我们主张:

(一)首先认识和辨别党内各种现象、各种思想意识、各种意见和主张,哪些是正确的,对党和革命的利益是有益的,而哪些又是不正确的,对党和革命的利益是有害的,或者争论的两方面都是不对的,对的应该是另一种意见和主张。经过冷静的辨识和思考之后,决定自己明确的态度,站在正确的方面。不盲从,不随波逐流。

(二)学习、提倡并发扬党内一切好的模范和正气,积极赞助一切正确的主张和意见,不学一切坏样子,不受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的影响。

(三)不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畏惧必要的党内斗争。对党

内各种原则错误的思想和主张,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便不断克服这些错误现象,绝不放任这些错误现象的发展,不使它损害党和革命的利益。

(四)不抱机械的绝对的态度。把原则上的不调和和明确性,同斗争方法上的灵活性和耐心的说服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在长期斗争中去教育、批评、锻炼和改造那些犯了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具体地、适当地去进行党内各个时期各种原则问题上所必要的思想斗争,而不是主观地、机械地、捕风捉影地在党内乱斗一阵,也不是有“斗争”的嗜好。

(五)在党内斗争中团结党,提高党的纪律和威信。对于党内某些已经不可救药的分子,给以组织上的制裁,直至驱逐出党。把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看作是自己最高的责任。

这就是党内一切好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我们的敌人要利用我们的每一个缺点和错误来破坏我们的党,是不奇怪的。我们除了要经常提高警觉性之外,应该在党内每一次缺点和错误发生的时候,尽可能减少给敌人利用的机会,这是每一个爱护我们党的同志所应有的职责。如果我们的党员在党内斗争中不顾到这一点,如果他只图一时的痛快,甚至不拒绝坏分子的援助,而和坏分子结合,或者还假借党外的某种力量和援助来达到他在党内的某种目的,那末,他就在政治上、党的纪律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们的党员,在党内应该反映正确的思想,学习好的模范,而对于不正确的思想和坏的样子,就不应该学习,而应该

反对。但是,党内的实际情况是,某些同志除了反映正确的思想、学习好的模范而外,也还反映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学一些坏的样子。对于某些同志来说,似乎是学坏容易而学好难,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这些同志在党内有某种错误发生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助长和扩大这些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常常站在错误的一方面,或者不分别正确和错误,只看哪一方面行时,就站在那一方面。对于这些同志,如果不给以严格的批评和锻炼,他们是很难进步的。

至于那些对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抱自由主义、官僚主义态度的同志,当然也是错误的。我想,这对于你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应该是很明白的。因为在你们学过的“党的建设”里面就讲到党内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的必要,对于这个问题解释得很清楚、很深刻,你们可以去研究,我在这里用不着多讲。现在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在我们党内抱这种自由主义态度的同志的确还是不少。真正负责地、正式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去揭发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一切坏的现象,从而加以改正和清除,常常是做得不够,特别是由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够,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大大加以发扬。然而,在党内,对于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对于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不负责的、非正式的批评,以及背地里的议论和闲话,却是不少。这是党内自由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这表示某些同志在政治上的发展、革命斗争中的勇气还不够,也反映党内民主的正确发扬还不够。某些同志不敢破除情面,不敢得罪别人,怕引起别人的抱怨和对于自己的反批评,而宁愿放任各种缺点、错误在党内存在,采取“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敷衍了事的态度,然而却又在背地里去议论人家,这对于党是无益有害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和议论,可以引起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和不团结的现象,而党的缺点和错误却不会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和非组织的议论而得到改正。我们提倡党内负责的、正式的、对党有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内既有各种缺点和错误存在,既有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存在,而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在某种时期发展成为党内某种倾向,引起党内某些原则上的分歧,妨碍党的行动的一致。因此,如果不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经常地揭发和纠正各种缺点和错误,不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不进行党内斗争来克服党内的分歧,而在党内斗争中采取折衷的态度和“中间”路线,或者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那末,就不能正确地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

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还表现在另外一种现象上。这就是当着党内某种争论已经发生的时候,许多同志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整天整月地进行空洞的争辩,或者任意地放纵起来,在这种争辩中使党内的团结松懈,使党的纪律削弱,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把我们战斗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机关变为争辩的俱乐部。这种现象,过去在我们党的某些组织中是不只一次地发生过的。这同我们所主张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毫无相同之点。我们之所以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为的损害党的威信,败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的提高党的威信,巩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领导。

所以,对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采取自由主义和

官僚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来反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克服党内的分歧。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巩固、发展和前进。

在党内斗争中抱绝对态度的同志,也是不对的。

这种态度,是自由主义态度的反面。因为他们不了解党内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绝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党内的许多同志在各种不同的时候,都可能多少不一地反映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而在工作中会犯一些错误,这是任何一个同志都不能完全避免的。如果说,所有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同志,所有犯了错误而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都一律不要,都一概不能容纳,都绝对地拒绝他们,或者把他们都从党内驱逐出去,那末,我们党内也就没有什么教育同志和巩固组织的任务了。如果我们党采取了这样极端的政策,那末,这种抱绝对态度的同志自己,最后也就不能不从党内被驱逐出去。抱这种绝对态度的同志,特别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中一项极大的艰苦的工作,是要把人类改造成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民,是要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和教育,把带有各种弱点的人类改造成为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就应该懂得,教育和改造已经加入党的多少带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党员,是我们党内一项重要的经常的任务。

自然,教育和改造这些党员,要作长期的、耐心的努力,是很艰苦的工作。但是,如果这样的艰苦工作都不愿做,都畏难,那还说得上什么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类呢?改造世界和改造人

类这样的空前艰巨的工作，我们都下决心做，都不畏难，那末，现今世界上还有什么艰苦工作可以使我们畏难的呢？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共产党员，是大无畏的，是不怕一切艰难和困苦的，是了解世界事物发展的曲折进程的。那些抱绝对态度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性和曲折性，所以，他们畏难，想走直路，想一下子就肃清一切不愉快的东西，一下子就跳到他们理想的世界去。他们这样想这样做，是一定要碰壁的。在他们碰得头破血流以后，又往往悲观失望，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丧失信心。他们就是这样从左的极端走到右的极端，把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本质在人们的面前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尽管抱着这种态度去对待党内的缺点和错误，对党、对同志、对自己都很不利，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党内还是有不少同志在不同程度上抱着这种错误的绝对态度。

党内斗争之所以必要，并不是由于我们主观地嗜好斗争，欢喜争辩，而是由于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和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党内原则上的分歧。在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为维护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斗争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的斗争，矛盾才能克服。”^{〔119〕}任何妥协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说，当着问题的争论已经发展成为原则上的争论，非用斗争来解决不可的时候，我们应该毫不躲避地进行党内斗争，来解决这些争论。而不是说，我们在一切日常事务问题上，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都要小题大作、板着面孔来进行党内斗争，都要绝不妥协。“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思想的人作各种妥

协。”^{〔120〕}

当着党内产生机会主义思想,存在原则分歧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进行斗争,来克服机会主义思想和各种原则错误。但是,这绝不是说,在党内不存在原则分歧、没有产生机会主义的时候,硬要把同志间在某些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扩大成为“原则分歧”。

毛泽东同志说:“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121〕}

对于党内某些犯了原则错误或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当着他说不听说服,不顾党的批评,而坚持错误,刚愎自用,顽固不化,抵抗党的方针,或者采取两面派态度的时候,给以严格批评,以至给以组织上的处分,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并不坚持错误,经过平心静气的讨论、说服和批评之后,愿意改正错误,放弃他们原来的观点,或者正在冷静地考虑他们的错误,并且和其他同志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的时候,就应该对他们的每个微小进步表示欢迎,不应该一律给以处分。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并不是面孔板得愈凶就愈好,也不是处分同志愈多就愈好,而应该以真正能够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纠正错误、教育党和巩固党为最高目的。

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他们的错误是很明显的。按照这些似乎疯癫的人看来,任何党内和平,即使是在原则路线上完全一致的党内和平,也是要不得的。他们在党内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时候也硬要去“搜索”斗争对象,

把某些同志当作“机会主义者”，作为党内斗争中射击的“草人”。他们认为，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依靠这种错误的斗争，依靠这种射击“草人”的火力，才能得到灵验如神的开展。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平地起风波”，故意制造党内斗争，才算是“布尔什维克^[16]”。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真正要郑重其事地进行党内斗争，而是对党开玩笑，把极严肃性质的党内斗争当作儿戏来进行。主张这样做的人，并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药的人，或者是以“布尔什维克”名义来投机的人。

以上所说的，就是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的问题。我们在反对党内党外各种黑暗东西的斗争中来改造世界和人类，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党和我们自己。党内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在党外的阶级斗争中——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来锻炼、发展和巩固自己，同时，党又在党内斗争中达到自己的巩固和统一，而更有计划地、正确地、有力地去领导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所以，对于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企图抹煞党内原则的分歧，掩盖党内矛盾，躲避党内斗争，敷衍了事，是根本不对的，是对敌人有利的，是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是和我们在斗争中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基本观点不相容的。同样，脱离党外的阶级斗争，脱离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使党内斗争变为空洞的清谈，也是不对的。因为离开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去锻炼、发展和巩固党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把事情弄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而对一切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采取敌

我不分的态度,或者抱着绝对的态度,都机械地过火地去进行党内斗争,主观地去制造党内斗争,也是根本不对的,是和党的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对于党内犯错误的忠实的同志,不应该和他们决绝,而应该抱着爱护和同情的态度,去说服、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如果他们不是坚持错误,不可救药,就不要打击他们,驱逐他们。

虽然在我们的党内还存在着某些缺点和错误,还有某些个别的部分的坏现象,但是我们完全相信,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伟大的群众革命斗争中,是能够而且一定要肃清这一切坏东西的。中国共产党以往十余年来斗争的历史和伟大进步,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都使我们对于这一点深信无疑。

党内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同志不但应该有党外斗争的锻炼和修养,而且应该有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锻炼和修养。但是,在我们党内的不少同志中,对于党内两条战线斗争还没有真正深刻的体会,还缺乏应有的锻炼和修养。这不但表现在党内有些同志常常进行许多无原则的斗争中,而且表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甚至斗争历史较长的某些同志,常常在党内经不起批评,受不得委屈。这些同志在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论斗争是如何的残酷,如何的艰难困苦,受到反革命如何严重的打击,他们都是绝不动摇、毫不抱怨、从不伤心的。但是,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却丝毫也经不起批评、打击,受不了委屈、冤枉,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也受不起。或者是多心多疑,以为别人的某些话是有意隐射他的,为了这些话,他可以抱怨、伤心到极点。这种

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

我们应该说,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为他们坚决地和反革命斗争,他们把自己的党当作温情满怀的母亲。当他们在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之后,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中来,是应该受到各种鼓励、安慰和抚爱,而不应该受到任何打击和委屈的。他们的这种希望,也是应该有的。然而,有一点他们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不足,这就是我们党内还有各种缺点、错误,还有党内斗争,每一个同志也必须经过这种斗争。在我们党内对各种缺点错误要进行批评,要进行斗争,这并不是党的无情,而是党在革命斗争中不能避免的现象。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各种正确的批评是必要的,对自己对同志、对党都是有益的。同时,有些同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受到某些不正确的批评和打击,甚至受到某些委屈和冤枉,这也是难免的。这些同志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一遇到这些情况,就觉得奇怪,就出乎意外地难过和伤心。

在这里,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同志要注意和其他的同志团结,要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对待同志,不要随便地用言语去伤害其他的同志,不要挖苦刻薄,尤其不要在别人的背后不负责任地去批评同志。对一切同志的错误,应该站在帮助和爱护同志的立场,诚恳地当面地进行劝告和批评。这是我们,尤其是比较负责的同志应该注意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同志应该经常有党内斗争的准备,应该虚心接受一切正确的批评,同时也应该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不

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除开同志间组织上正式的相互批评以外,只要自己的思想正确,行为正大,对于别人不负责任的误会和批评,必要时可以申明和解释一下,如果解释不了,只好让别人去说。中国有两句谚语:“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世界上完全不被别人误会的人是没有的,而误会迟早都是可以弄清楚的。我们应该受得起误会,在任何时候都不牵入无原则的斗争,同时也应该经常警惕,检点自己的思想行动。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注意自己不用言语去伤害别的同志,但是,当别人用言语来伤害自己的时候,也应该受得起。

党内无原则的纠纷,我们是在根本上反对的。因为它“无原则”,对党有害无益。因为它“无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多大的“是、非、善、恶”可分。所以,我们对于那些无原则的斗争,不要去评判谁是谁非,去计较谁好谁歹,这是弄不清楚的。我们只有在根本上反对这种斗争,要求进行这种斗争的同志,无条件地停止这种斗争,回到原则问题上来。这是我们对无原则纠纷和无原则斗争所应该采取的方针。但是,党内如果发生某些无原则纠纷,在某些原则斗争中如果夹杂着许多无原则纠纷的时候,又怎样办呢?或者这些无原则的纠纷特别要来光顾我,把我牵扯在内,又怎样办呢?那末,我们还只有着重原则问题,而不要去着重无原则问题。我们应该根据上述的方针,严正对待这些无原则纠纷,始终站稳自己的原则立场,不被牵扯到无原则纠纷中去。不要人家来一个“不对”,我也还他一个“不对”。我应该始终站在“对”的方面,去反对人家的“不对”。这件事对于我们某些同志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

们的同志必须特别注意锻炼和修养。

现在,我把上面所说的一些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这就要求:

(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

(二)根据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根据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去检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同志。

(三)经常采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于影响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

(四)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对于同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动,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除此以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但是,对其他同志的要求,除开原则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以外,就不要过分严格,不要在“小节”上去“吹毛求疵”。

党员的思想意识的修养,照我讲来,基本上就是这样。

坚决粉碎顽固派的进攻^{*}

(一九四一年五月)

(一)目前苏北党的总任务是:迅速从思想上、组织上、武装上准备自己,以现在苏北的新四军^[122]部队为基干,抵抗敌寇、汉奸及顽固反动势力对于我党我军的围攻,彻底战胜顽固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根据地,以便最有效力地长期坚持苏北敌后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苏北地方党与新四军部队,要用一切努力来坚决地不动摇地准备与执行这一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即是你们最大限度地推动全国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

(二)部队党与地方党要一致为猛烈扩大苏北新四军而斗争。在三个月内(在今年九月一日以前)要扩大新四军至一万人枪,并加以巩固。在目前顽固派尚未武装围攻我军时,应到处动员民众加入我军,并在可能地区组织新四军的游击队(必须以党员为领导,不可利用流氓兵痞)。秘密的地方党则要克服反动派的阻碍,转送党员和群众到部队中去。在武装冲突发

^{*}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加紧进行反共磨擦活动。为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打退顽固派对我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作了多次指示。这是一份给苏北党组织的电报。

生后,则应更加放手地扩大我军,武装人民,最广泛地动员民众同我军一起坚决战胜顽固派与反共派的进攻,直至民主政权的建立。

(三)要加紧在一切反共武装中的秘密工作,采取坚决地瓦解和破坏反共武装的方针。当着反共武装同我军作战或镇压民众时,即应很技术地举行反正,驱逐那些反共头子。但对一切可能同情我们的与中立的部队,则展开广泛的统战工作,以便争取与中立他们,而不在他们部队中建立秘密的党组织。

(四)要发展地方党的组织,要最大限度地组织民众,要准备大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要努力筹措与保证部队的给养。在反动统治下的地方党要特别注意秘密工作,把一切暴露的及不十分暴露的党员都送到军队中工作。

(五)要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势力。除汉奸及反共顽固派分子外,一切中间派分子的利益必须尊重。严格防止党内打土豪、打地主观念的恢复及打汉奸的扩大化,以免侵犯中间派的利益,引起中间派的恐惧。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孤立反共顽固派,要特别注意新的部队的纪律。

(六)你们两个特委^[123]之外应成立区党委,以便统一领导。为统一军队与地方党的工作领导,可由军队负责同志和地方党组织军政委员会。

论抗日民主政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件痛苦的事情,就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最近几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全中国,打进中国的内部来。所以,解放中国人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今天,首先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这就叫做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

中国人民第二件痛苦的事情,就是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半封建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及思想习惯上的束缚等)。所以,解放中国人民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要推翻封建势力的压迫。这就叫做争取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

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这就是中国革命目前所要做的相互联结的两件大事。按其性质来说,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或第一阶段。只有走过这第一步或第一阶段,才能走到第二步或第二阶段——取消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目前的民主革命,已经不是西欧资产阶级那样的旧

* 本文原载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办的刊物《江淮》创刊号,署名胡服。

民主主义革命,而是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124]的革命。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进行的,中国革命已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丧失其民主革命的彻底性,中国无产阶级又以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势力指导了中国革命,并且以后还要继续加强其指导作用;第三,中国在革命中及革命后,要建立也不能不建立革命各阶级的联合的民主专政,不是建立也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要实行也不可不行彻底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第四,这个民主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或第一阶段,它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第二步或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西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不同之点。

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都是中国人民的压迫者,又都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对象,所以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反对中国进步与人民革命的事业中,就常常结合起来(虽然革命政党的政策应尽可能使它们不结合或结合得不坚固,因为这种结合对于革命是不利的,它使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特别强大)。中国的封建余孽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来反对中国的人民,这是近百年来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所证明了的。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3],一方面由于它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它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是矛盾的,所以,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软弱,它本身是剥削者,它就容易和革命的敌人妥协,并特别惧怕工农革命力量之壮大,所以,在另外的历史时期,它又与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结合,来反对革命。

在革命中及革命后建立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是不包括反革命者在内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业已反革命的封建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是不能参加革命政权的,他们是革命政权的专政对象。参加革命政权的,只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的分子。因此,这种各阶级联合政权的内容,即参加政权的各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变动的。但不论如何变动,它总还是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而不能是一个阶级单独的专政,既不能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组织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就必须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度(如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乡民大会等)。革命的各阶级通过一定的民主的形式,去参加革命的政权。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目前,在条件业已成熟的各个地区,就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否则不能战胜国内国外的敌人,取得中国的独立与革命的胜利。

目前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的基本任务与性质,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30]是一样的。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主要表现为反对北洋军阀^[50]的北伐战争^[125],而今天的大革命则主要表现为反对异族敌人的抗日战争。所以,今天参加革命(即参加抗战)的社会基础特别广泛。国共两党在内战十年之后,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最初包括了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及

封建阶级中的某些个别分子与个别集团。这个统一战线的阶级内容,是已经有、往后还会有某些变动的,但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它总还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一部分资产阶级已经叛变(如汪精卫^[14])或将会叛变(如隐藏在抗日阵线内的投降派),但其他部分的资产阶级是能抗战到底的。抗战三年来,这种统一战线虽然基本上结成了,然而至今还没有总的完成的形式,而且也是不平等的。这使得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有些难于捉摸,不够广泛与不够巩固。这种总的完成的形式,就党派来说,应该是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委员会;就政权来说,应该是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即抗日民主政权。不幸的是,这种形式除个别地区外,总的还是没有的。

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它只有在平等原则上,采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组织成功。这也是领导中国抗战与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好的最有力的形式。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不实行民主政治,抗日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抗战三年了,本来早就应该在全国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以领导抗战,那样,抗战决不只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结果和成绩,可能获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胜利与成绩,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战中的这许多困难与人民的痛苦。然而,没有这样做,这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只顾其“一党专政”的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危亡造成的。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56]、新四军^[122],对于以上这一点了

解得很清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我们不会不尽忠于自己的职责。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有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⁹¹⁾的民主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也就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最有力地打击敌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我们在敌后所要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这种政权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它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区别,不只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又与工农专政相区别,不只是保护工农利益。它的方针与任务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及镇压汉奸反动派。当着各阶层人民内部发生利害冲突与斗争的时候,它就去调解这种冲突与斗争,注意使工农的要求能够满足,同时又照顾到抗日的地主与资本家的利益。它要调节抗日各阶层人民相互间的利益,但是对于汉奸,对于反对民主的反动势力,就实行不客气的专政。

根据抗日民主政权的这种性质,政府的组织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各级民主政府的委员制、代表会议制,实行普遍的选举,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在政府人员中,共产党员应只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二,这就是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¹²⁶⁾。这些非共产党人员,不问他们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党何派,

只要他们抗日并愿与共产党合作就可以参加。当然,投降分子、顽固的反共分子是不能参加这个政权的。

这个政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没有勾结敌寇和汉奸的行为,没有破坏与反对抗日军队的行动,没有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不论他是属于何党何派,属于哪一阶级、阶层,政府一律保护。一切党派只要抗日、不反对民主,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这种政权,今天还只在部分的敌后地区建立。在全国,由于国民党不愿意结束“一党专政”,不愿意“还政于民”,这种政权仍然还是不能建立,仍然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因此,这种部分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只是地方政府。它应该属于中央政府,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依照敌后情形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同时它也可以在地方自治的原则下,颁布该地区的单行法令。

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还没有为中央政府正式承认,因此有人说:这种政府是不合法的。很明白,这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问:什么叫合法和不合法?

在目前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全国人民最高的法律原则。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都应该是为着保护民族的利益,保障抗日的胜利。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127],就是目前法律的基础。那末,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民族利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就是最合法的。而不实行的,是不合法的。违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

纲领及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是违法的。大多数人民承认的,选举的,就是合法的。相反,大多数人民不承认的,反对的,自己把持霸占的,就是非法的。抗日民主政权由人民选举,是合法的。其他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就是非法的。如果中央政府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就应该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府,并以它作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予承认,只能证明中央政府人员的违法,违反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这个法律基础。中央政府不“还政于民”,不改组为抗日民主政府,也是不合法的。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违法的事情是很多的。在各国的最高法院中,就有审判这类案件的,在中国还没有过这种审判。但这不是中国就没有这种事情,是有许多这种事情,只是没有人敢于过问罢了。所以,在敌后建立的这种抗日民主政府,在实质上是最合法的。

由于国民党⁽⁵⁾中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民主,所以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暂时恐还难于实现。但是,在中国一部分地区,则已实行民主化。这种民主化的地区,应该是新的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地方基础。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因此,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它实行的结果之好或坏,将给全国以好的或坏的重大的影响。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

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处，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而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那末，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所以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共同管理政府。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担负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这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论党内斗争^{*}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

一 引 言

同志们：

最近我们在党内提出了加强党员党性锻炼的问题。听说中央已通过了加强党性锻炼的决定，不久我们就可以收到。为了加强我们党员的党性锻炼，我们就要在党内开展一些具体的思想斗争，来反对各种违反党性的不良现象。但是我们怎样来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就算正确，又怎样开展就算不正确呢？这便是现在我所要讲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一个领导广大群众战斗的党。党为了要实现自己所负担的历史任务，便要和各种时期的革命的敌人斗争，便要和各种不同的革命的阶层与阶级联合。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没有一刻钟不是处在严重的战斗环境中。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之中。这些其他各种阶级，便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或在

^{*} 这是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原载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六月经作者修订，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

同无产阶级的联合中,经过党与无产阶级内部不稳定的成分,侵入到党与无产阶级的内部来,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来源,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也就是党内斗争的来源。

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我们的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党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也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斗争。这两种斗争是有区别的,但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党不进行这后一种斗争,不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那末,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发展,就要使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可能腐蚀我们的党或党的某些部分,就可能使我们的党或党的某些部分起质的变化,变为非无产阶级的组织。比如,欧洲的社会民主党^[128],就是因为这样而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所腐化,就是因为这样而变成了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主要的社会支柱。所以这种党内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那些企图避免党内斗争的想法,那些不愿批评别人错误以便换得别人也不批评自己错误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这种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

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所以没有思想原则分歧的党内斗争,同志间没有原则分歧的相互倾轧,就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无内容的斗争。这种无原则无内容的斗争,在党内是完全不必要的,对党是有害无益的,每一个党员都是应该切实避免的。

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为了这个目的,党内斗争还必须在两方面来进行,必须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因为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从两方面来影响党的,是从右面或者从左面来进攻党的,是在党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因此,我们的党内斗争,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只进行单方面的斗争,如果我们疏忽对任何一方面的警戒与斗争,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可以、而且一定从我们疏忽的一方面来进攻党,那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不能巩固党。所以党是在不断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同志说:

“只有通过为维护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斗争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的斗争,矛盾才能克服。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思想的人作各种妥协。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关,则任何妥协、任何‘中间’路线都无济于事。在原

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129]

又说: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克服党内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我们党的队伍的历史。”^[130]

这就是党内斗争的必要性。

关于党内斗争的这种必要性,关于党内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之如何要不得,在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说得很多,同志们可以去看,我在这里不多说。我现在所要说的,是怎样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大家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我不想全盘地来说明这个问题,而只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就我个人所观察到的,来提出我的意见。至于这些意见是否完全正确,还请同志们大家来讨论。

二 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与 党内斗争中的偏向

同志们!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无产阶级做好了什么工作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为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理论上准备了完整的体系。不仅如此,他们还还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独立的组

织,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建立了第一国际^[131]。第二国际^[132]成立初期曾受到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教育了并且指导了工人阶级怎样组织起来,怎样进行斗争。

在第二国际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是进行了广大的组织工作,广泛地开展了组织工人阶级的运动,在组织上是获得很大的成功。不过当时是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人阶级的组织也是在这种和平时期建立起来的,党与工会之间的区别还不很明确。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在考茨基辈领导之下,对党内机会主义采取不可允许的调和路线,以致机会主义腐蚀了第二国际各国党。这种党与工会,一到帝国主义时代,一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显出它不能担负无产阶级在新时期中所应该担负的革命的任务,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不能不走到破产与没落。

列宁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不同,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建立坚强的、战斗的政党,建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完全统一的,并和无产阶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政党,依靠这样的党,才能胜利地去进行极端严重的革命斗争。因此,列宁除在各方面恢复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而外,还特别创立了一个完备的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学说。关于我们党的建设的学说体系,基本上是列宁创立的。这个党的建设的学说,是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完全不可分离的。

列宁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时期的条件是怎样的呢？

在当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大战的迫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迫近；而在另一方面，拥有广大组织的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还不愿意也不敢去准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攻。因此，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组织上也是散漫的，有派别分歧的，不能进行稍为严重的战斗，因此也就完全不能适应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如劳资合作的理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可以经过议会斗争掌握政权、不必经过革命，因而不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等等），而且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也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及俄国的孟什维克^[133]，主张党的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政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组织的水平，主张党内不要严密的组织与严格的纪律，主张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容许党内的派别（具有不同思想和组织系统的派别）存在等，对于第二国际各国党来说，党的统一与纪律，党内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不需要的。这便是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组织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具体表现。

在当时，还有俄国的经济主义派^[134]，欧洲（如法国）的工团主义派^[135]等，他们主张工人阶级不要有政党的组织，拒绝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或把工人阶级的政党附属在职工会之下，主张“工会独立”，否认党对于工会的领导作用……。

在当时，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任务摆在面前，要

求有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去领导广大群众,执行这种任务;另一方面,拥有数百万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又是那样的松散,那样的不能战斗,而且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支持着这种组织上的落后与散漫。这便是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16]党的时期之具体的重要条件。

列宁在上述这种条件下,为了建设一个能够胜任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统一与巩固的政党,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尤其不能不反对他们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最初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就是在组织问题——入党条件问题上的分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的建设的学说,是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是在反对经济主义派、工团主义派不要工人政党的理论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所以在列宁的党的建设的学说中,就充满了反对各种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反对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的理论,反对把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组织水平的理论,反对党内的无原则的和平,反对党内的派别组织与派别活动等。列宁并在反对这些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确定了:党是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勇敢、最进步的分子组织起来的最先进的部队,最有组织的部队,最有纪律的部队,而且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有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以至政府、军队等等的组织,然而党是无产阶级这一切组织中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能够指导其他一切的组织。因此,列宁就把党和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明

确地区别开来了。列宁并且确定了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有统一的铁的纪律。这些党的组织原则,是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学说之主要内容。

列宁主要是在反对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来建设党,而主要不是在反对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来建设党的。在十月革命以前,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还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机会主义,所以在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中,充满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反对不要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反对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反对不要党内的思想斗争及害怕自我批评,反对党内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反对工会独立主义等。这是由于列宁建设党的时期之具体条件产生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具体条件,那就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时候的条件完全不同。

第一,中国党的建设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

第二,中国党从开始到现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

第三,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容许工人阶级和平的议会斗争,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

第四,在中国党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成份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并有若干游民成份,这是中国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

社会基础。

由于前面四个条件,就使我们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始在主观上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则和道路进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组织原则,在我们多数的党员中就能背诵出来。而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传统与习惯,在我们党内是没有的。因此,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还没有的。认为不要自我批评和党内斗争,不要严格的组织与纪律,不要工人政党及工会独立等等主张,在党内是不能公开发表的。虽则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还有不够的地方,但那还是由于理论水平的低下,不能看出原则上的分歧,或者是被党内个别负责人采用非常办法压制自我批评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党内有什么系统的反对党内斗争的理论。

但是,我们中国党建立时期的这些特殊条件与特殊情况,是发生两方面的影响的:一方面是好的,使我们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严格遵循着列宁的原则,这个党一开始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这是推动我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使我党进步很快。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个极端,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

许多同志是机械地错误地了解列宁的原则,把列宁的原

则绝对化。他们认为：党在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党内的民主；党内斗争的必要，就否定了党内和平；党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领导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就否定了工会及其他工人的与劳苦群众的组织之独立性；统一的铁的纪律，就消灭了党员个人的个性及党员的自动性与创造性……。

许多同志是死记着列宁的原则，认为党内斗争是必要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是要不得的。但他们是机械地死板地运用这些原则，他们以为在党内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是斗争得愈凶愈好，党内斗争的方式，党内批评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志间在党内的对立，愈尖锐就愈好。不然，就会犯自由主义、调和主义的错误。为了要证明自己没有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并证明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就离开时间空间的具体条件，在党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如是，这些人也就成为党内斗争中没有正确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嗜好斗争的“斗殴家”，为斗争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丑事，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是“十足的布尔什维克”，而只能证明他们对于布尔什维克的侮辱，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

许多同志不了解：党内斗争是原则的斗争，是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则而实行斗争，为确立这一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来进行斗争，为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此目标的斗争方式而斗争。他们不懂得：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只要不涉及原则上的分歧，是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

有别种意见的人作必要妥协的。他们不懂得和不了解：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确立斗争目标的问题上，在选择达此目标的斗争方式的问题上，是应该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而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就不应该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实行不调和的斗争，而应该作必要的妥协。这些正是列宁、斯大林的党所固有的作风，但是没有被我们许多同志学到。他们在这些应作必要妥协的问题上，也实行不妥协的斗争，于是他们就没有不对抗的问题，没有不对抗的时候，没有不对抗的人。一切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他们都要实行对抗，强使其绝对的相同，他们是一切都不妥协，绝对不妥协。他们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对抗，对抗着一切，这就是他们的绝对主义。

许多同志不了解：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属于原则的问题，什么是党的战略计划和策略路线，并抓住这些原则问题，这些关于战略计划和策略路线问题上的分歧来进行斗争。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经验还是格外的低下，他们还抓不到这些关系重大的问题，并且为这些问题来进行争论。然而他们又死死记得在党内是要斗争的，不斗争是不对的。他们虽抓不到这些重大问题，不能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可是他们还是要斗争的。于是他们就只能抓住个别的现象，个别的问题，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来实行无原则的斗争与争论了，并因此而造成同志间的不团结，互相对立，及组织上的分歧。这种党内斗争中的恶劣现象，在我们党内是存在的。

上述这些，是中国党内斗争中的一种偏向，是在中国党内特别严重的（在外国党内虽然也有）一种偏向。这就是党内斗

争进行得过火、进行得毫无限制,走到另一个极端——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否定党内民主,否定原则上一致的党内和平,否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相对的独立性,否定党员的个性及其自动性、创造性等)。这是由于中国党的特殊环境与特殊条件产生的。

在这里,还要说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原则斗争没有被中国党的许多同志所注意这一种事实。十月革命后,俄国党内产生了左派共产主义的一派^[136],他们反对布列斯特和约^[137],在以后又有关于工会问题的论争^[138]。十月革命以前,在布尔什维克内部虽也有过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召回派^[139]—派人,但不久即被克服,不象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左派共产主义那样严重。俄国这一左派不久也被列宁克服了。但在西欧各国又产生了“左”派共产主义,他们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反对参加国会,反对合法斗争,反对和社会民主党左翼进行必要的联合。在这种情形下,列宁就在一九二二年四月间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以纠正这种倾向。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从前不相信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的,现在有了活的事实,给了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左倾机会主义,以为革命可以不经过任何迂回道路,一个早晨就可以胜利。这种情绪,中国党内也发生过,在某些时期内并且占了统治的地位。犯这种错误的人们完全不注意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反对迂回,反对等待,提倡少数先锋队可以不顾广大群众还没有跟得上来的事实,就实行冒险的进攻,反而骂其他的人为“右倾机会主义”。一切

组织上右倾或左倾的机会主义，都是从政治上的右倾或左倾而来的。中国党内既在某些时期犯过政治上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于是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这种错误。而特别是在内战时期犯过冒险的左倾错误，于是在组织上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就产生了。

在中国党内斗争问题上，如果可以这样来分的话，那末就存在着以下三种错误倾向：第一是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第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党的组织问题上及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第三是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

以上三种偏向，在本质上说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和斗争、党内的过火斗争与自由主义都不是马列主义，都是反马列主义的表现形态，上述三种倾向是仅就其形式来分的。

这就是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和党内斗争中的偏向。

三 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之表现

同志们 在上述三种党内斗争的偏向中，第一种自由主义的偏向，我今天不准备多讲。虽然我并不认为目前党内自由主义的偏向不严重，目前反对自由主义不重要，我也还不能相信同志们对于自由主义这一种倾向及其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的表现，是已经彻底弄清楚了的，我想许多同志是还没有彻底弄清楚的。但我今天不准备讲它，下次有机会时再讲。我只提出党内自由主义倾向在最近有些发展，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党内

斗争中一种主要的倾向,党内思想斗争是开展得不够的。因此,就使得党内许多错误的倾向和不良的现象,不能及时得到有力的纠正,党的纪律也逐渐地松懈起来,这是很不好的。这是由于最近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及新党员加入到党内来,他们是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到党内来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还没有受到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的锻炼;同时,过去犯过左倾错误及党内过火斗争错误的许多同志,在今天他们又反转过来犯右倾错误,犯自由主义错误。长期统一战线的环境,资产阶级影响党内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则用一切方法发展与拥护党内的自由主义。因此,就使得党内自由主义的倾向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在加强党性锻炼的斗争中必须严格反对的一种倾向。比如有些同志看见别人犯错误不说,怕人报复;好朋友犯错误不说,相互隐瞒;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随便批评、发牢骚、小广播等……这些现象,在党内是相当普遍存在的。还有特别严重的一种现象,最近也在党内产生,就是有一种人,生怕别人向党内上级报告他们的缺点与错误,怕人告状。一方面,他们不能禁止自己不犯已经知道的错误,他们明知故犯;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禁止别的党员向党向上级报告及在会议上批评他们。他们做了一些错误的正当的事情,犯了错误,但他们不肯将错误揭露,以便改正他们的错误及缺点。他们讳疾忌医,他们不知道只有将错误揭露才能改正错误的真理,他们要隐蔽错误,把错误当作比什么宝贝还要珍贵地隐藏起来,于是他们就不只是想办法使别人的眼睛不敢正视他们的错误,他们还要想办法禁止别人的嘴巴不敢向党向上级报告他们的错误,取消别人以完

全正当的组织方式在党内说话与批评的权利。他们恐吓其他的同志说：“你敢于向上面报告，那我就对你不起的，我要揍你的！揍你这个喜欢向上面拍马屁溜勾子的东西！”痛恨那些向上面报告及讲过他们错误的同志，而永记在心，并要想办法报复。这种现象是完全失了党员气味的恶劣表现。他们要隔离党的领导机关与党员群众的联系，以便他们能够在党内为非作恶。这种现象是应严格禁止的。

任何党员看见其他党员犯错误或其他一切不利于党的事情，必须向党向上级报告，不报告是不对的，报告是完全对的。禁止别人向党向上级报告自己的缺点错误，是完全非法的，党内是绝不能容许的。当然党的领导机关在得到这种报告后，应调查清楚事实，审慎处理，而不能单凭一面之辞，轻率随便地处理。

目前党内的思想斗争应该适当地开展，这是我们已经决定了的。在某些党的环节，犯自由主义错误特别严重的地方，应该根据事实，开展反对自由主义的具体斗争，克服这种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几年前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举出了党内十一种自由主义的现象，至今仍保持其效力，你们应细心研究，并遵从这篇文章来纠正与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同时，在党的建设的课程上，也会要详细讲到自由主义的。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我现在着重讲第二第三种偏向，因为这两种偏向是从来没有人在党内系统讲过的。

党内机械的过火的斗争，表现在一些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以下的一些事实上：

第一，在地方党及部队党内，经常举行所谓“斗争会”，甚

至在政府机关及群众团体等非党组织中也经常举行这种“斗争会”。这种“斗争会”是预先布置好了的,主要的不是为了检讨工作,而是要打击某某人,不是首先“对事”而是首先“对人”斗争,主要的不是向某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原则进行斗争,而是向某人斗争。所谓“斗争张三或李四”,目的就是要打击某某犯了错误的同志。“斗争会”的实质,是一种同志的审判会,主要的不是从思想上去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从组织上去解决问题,去镇压某些敢于坚持自己不同意见(这种意见不一定是真正不对的)的同志,或调皮捣蛋的同志。而且在每一次“斗争会”对被斗争的人,大多数必有组织结论。很明白的,这种斗争方式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首先,“斗争会”这个提法就不对,就不通。既有所谓“斗争的会”,那末是不是还有所谓完全“无斗争的会”呢?如果我们把某些“会”认为是专门进行斗争的会,又把另一些“会”认为是完全不进行斗争的会,那就是一种观念上的糊涂!在这里,证明许多同志是不懂得斗争的绝对性和普遍性的,是把斗争与教育机械地分开的。

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党与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所以党内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党内不可缺少的教育,而党内的教育也是一种党内斗争,一种比较温和的斗争。因此教育与斗争是不能分开看的,斗争即是一种教育,教育即是一种斗争,机械地分开是不对的。

其次,这种“斗争会”是党内宗派主义及对干部对同志实行错误的打击政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为了要打击被斗

争的同志,而不是为了要帮助、教育或挽救犯错误的同志。主要的是对人斗争,而思想上的分歧与对立反而被忽略了。因此这种“斗争会”常常不能真正加强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反而常常加深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分歧,加深党内不团结的现象、无原则的纠纷,及助长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

至于在非党的机关团体中举行这种“斗争会”,那更是不对的。

第二,党内机械的过火的斗争形式,还表现在:有些同志以为党内斗争是斗争得愈凶就愈好,问题提得愈严重愈好,搜集别人的错误愈多愈好,给别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评的语句愈尖刻愈好,批评与斗争的方式和态度愈严峻愈粗暴愈好——讲话的声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齿露出来愈长……就以为是愈好,就以为是“最革命不过”的了。他们在党内斗争与自我批评中不讲求适当,不讲求分寸,不讲求适可而止,毫无限制地斗下去。很明白,这也是完全不对的!

第三,有些同志还不了解: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与加强党内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是要从思想上、原则上去解决问题之后,才能在组织上、行动上解决问题。然而要在思想上、原则上求得一致与解决问题,要去克服别人不正确的原则,要去纠正别人不正确的原则,要去转变别人的思想,要去纠正别人久已相信的原则、观点和成见,就不是那样容易的事,就不是采用那样简单的办法,三言两语,或一场斗争会所能做到的,不是采用单纯的压迫手段与强迫办法所能做到的,而是需要经过艰苦

的说服教育工作与各种复杂的斗争,经过相当长期的教育与斗争及革命的实践,才能够得到的。有些同志不是这样来认识党内斗争的实质,而是把党内斗争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认为党内斗争只是一种组织上的形式上的对立,只是一种简单的打架或者骂人,只是一种吵嘴或者角力,而不是要从思想上、原则上去求得真正的一致与解决问题。或者认为党内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是可以利用这种简单机械庸俗的办法来解决的。很明白,这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这些同志不是从思想上、原则上去克服党内的分歧,去纠正某些不正确的倾向与现象,来保持或达到党内的统一,而是企图用一种简单的组织上的办法,用一种对党员的压迫手段、打击政策与惩办制度来达到或保持党内的统一,所以他们就采用各种错误的过火的党内斗争方式,所以他们就不是细心地、周到地从原则上思想上去说服同志,而是采用一种单纯的组织上的办法,行政上的办法,甚至敌对的方式去压服同志,吓住同志。他们随便对同志做组织结论,在组织上去处罚同志。他们残酷地处罚党内的同志,不论何种党员犯的错误大小,不管其承认及改正与否,一律给以同样的处罚。这就形成党内的惩办制度。他们常用开展斗争的办法,去开展工作,推动工作,故意去寻找“斗争对象”(党内的同志)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者来开展斗争,牺牲与打击这一个或这几个同志,“杀鸡给猴看”,以推动其他的干部党员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他们故意搜集斗争对象的缺点错误,形式地、片断地收集他不大妥当的言论行动,把这些缺点错误和不大妥当的言论行动又孤立起来看,当作就是这个同志的全部。把这个同志个别的缺

点错误夸大起来，替他构成为机会主义的系统，在党内同志中造成对这个同志极不好的印象，激起党内一切仇恨机会主义的心理，向着这个同志来斗争。于是“死老虎人人可打”，一些人的报复心理也发展起来，揭发他一切的错误缺点，任意提到原则的高度，甚至捏造一些事实，凭着主观的猜疑及完全不可靠的谣言，乱加给这个同志以各种罪状等等，非把这个同志弄得昏头昏脑不可。这样做了之后，他们还不允许这个被打击的同志起来做任何的辩护。如果他有辩护的话，那末又说他故意辩护错误，承认错误不彻底等等，再加以打击。不允许被打击的同志在服从组织的条件下保留意见，不允许向上级控诉，一定要被打击的同志当时认错。如果被打击的同志被迫都承认了的话，那末思想上、原则上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又是不大注意的。所以在党内也发生过这种事实：即某些同志在斗争中承认错误过多，为了免遭打击起见，不如一切都承认好些。错误虽承认了，实际上他自己也还是不懂得的。在这里也就证明这种斗争方法不能培养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顽强性。

第四，是将党内斗争方法与党外斗争方法不加区别地混淆起来。有些同志，将党内斗争的方法机械地搬到党外的非党的群众团体及机关中去使用，用党内斗争方法，去向非党干部和群众斗争；另外有些同志，用对敌人对异己分子斗争的方法，来向党内的同志斗争，用对付敌人与异己分子的办法，来对付党内的同志。一切挑拨离间、阴谋诡计都使用出来。把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办法也运用到党内斗争中来。如有些同志在锄奸工作中所犯的过左错误，大半就是没

有将党内斗争与对敌斗争严格区别开来的结果，是把党内思想斗争与锄奸工作混淆起来的结果。党内也往往有敌人的奸细暗藏着，对于这种暗藏的敌人，必须根据事实进行斗争，把他们揭露出来和驱逐出党；但这与共产党员犯错误需要进行教育性的斗争完全是两件事，必须把二者区别清楚。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斗争的方法和斗争的形式必须区别开来。

还有些同志(其实这已经不能称为同志)则公然依靠与假借党外的力量来进行党内斗争，向党要挟和恐吓。如有些人，依仗他们一部分的工作成绩，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依仗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或某一部分的统一战线关系等，而向党向上级机关进行斗争，要挟上级机关及党接受他们的要求与意见，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或者利用党外的、甚至资产阶级的、敌人的报纸杂志及各种会议来批评党，向党的上级机关及向某些同志和干部进行斗争。很明显的，这与另外一些人依仗党的势力，去强迫、命令、压迫党外的群众，去向党外人士进行敲诈勒索，是一样严重的错误。这些人是站在党外来向党斗争，因此他们虽尚挂着共产党员的名，却已经完全离开党的立场，成为党的敌对者。

第五，我们党内的许多问题都是在会议上解决，或经过会议解决，这是好的。但各个组织中，有许多会议是没有经过准备和预先调查研究的工作的，常常在会议上发生许多不同的意见与争论，而一切会议又必由最负责的参加者来做结论，一切会议的结论又等于决议，在这里也常发生许多毛病。我看见有些会议上的争论，最后逼到指导员或支部书记或其他负责

同志来做结论。但这个负责同志自己是完全无把握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弄清的,然而事情是逼来了,非做结论不可,否则不能做负责同志。这个负责同志只得来做结论,有的则表现非常狼狈,汗流浃背,粗率地把结论做下来,而这个结论也即等于决议,事情就照这个结论决定下来,这当然是要发生许多错误的。有些同志,当着他们对问题还没有把握决定的时候,他们不肯说明自己还没有把握,要求有一个考虑与研究的时间,或向上级请示的时间,而要顾全面子,保持地位,硬说自己是已有把握的,随便决定下来,结果常常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也应该纠正。

我们一切同志对一切的问题,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党内的问题,不是依靠蛮横所能解决的。一切会议应该有结论,但不能决定的事情,或尚有疑问、尚未弄清的问题,就不应随便决定。决定的事情一定要是自己相信的,如果自己还无把握相信的事情,可以保留下来再加以研究或请示。会议的结论,不一定要参加会议最负责同志来做,谁报告,在讨论之后,即由谁做结论。但这个同志的结论不一定等于决议,会议的决定可以和这个同志的结论不一样。

以上这些,就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的一些重要表现。

我在以上所说的,当然是一些最坏的典型,不能说我们过去的和现在的党内斗争普遍都是如此的。但这种党内斗争的方式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曾经在一个时期是占着统治地位的,成为主要的党内斗争方式。

这种不正确不恰当的党内斗争,曾经在党内造成了什么

结果呢？是曾经在党内造成了以下一些恶果的：

第一，助长了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

第二，另一方面，又助长了党内极端民主的倾向及自由主义的发展。许多党员平时不敢说话，不敢批评，表现党内一种形式上的和平与统一。但是一到矛盾无法继续隐蔽下去的时候，一到情况严重与错误暴露出来以后，即又乱批评乱斗争一场，形成党内的对立和组织上的分裂，很难收拾。这也就是党内家长制的反面表现。

第三，影响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生活不能正确的建立，党内民主生活不经常、不正规或极端的缺乏。

第四，阻碍党员同志们积极性、自动性及创造性的发扬，削弱党员对党对工作的负责精神，影响同志们不敢积极负责，不敢放手工作，放手创造，不细心去考虑研究问题与情况，养成他们照办公事、人云亦云的作风。

第五，助长党内宗派主义的发展，无原则派别斗争的发展，造成党内害怕批评与斗争的心理，养成某些同志“独善其身”的保守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第六，给托派^[140]奸细反革命分子以破坏党的更多机会，给反革命进攻我党以更多的口实。托派奸细分子特别利用党内的矛盾，不正确的党内斗争，来进行破坏党的活动，来争取那些受打击的对党不满的分子。而反革命则利用党内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来进行宣传煽动，影响党外的同情者及党内不稳定的成分来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党内的团结与统一。

上述这些恶果,在党内是曾经造成过的,并且还有一部分遗留到现在尚未把它们消除。

这种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方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经造成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给党的损失很大。现在在我党高级领导机关中虽是已经纠正过来了,在全党现在也不是一种统治的斗争方式,但在某些中下级组织中,在某些个别组织中,这种斗争方式则至今还未完全纠正,还相当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继续着。因此,这些组织中的生活仍然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严格指出这种偏向,以便在我们的一切组织中彻底肃清它。以便我们的同志不再重复这种错误,以便正确地切实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推动我们的党前进。

四 关于党内的无原则斗争

同志们!我现在来讲党内斗争中另一种偏向——党内无原则的斗争。这种现象在中国党内是特别普遍与严重存在的。在外国党内虽然也有一种所谓“闲谈运动”,但我想还没有中国党内这样严重吧。所以我们对这种现象,必须使同志们认识清楚,并采取必要的办法来对付,否则对党内的团结和工作上的妨碍是太大了。

什么是党内的无原则纠纷与无原则斗争呢?

我认为党内的以下几种纠纷和斗争是属于无原则的,即是离开我们党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之共同立场和原则的。

第一,有些同志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整个党的利益上来提出问题,来和其他同志进行斗争,而是站在个人利益或派别

利益的立场上提出问题,来和党内其他同志进行斗争。就是说,他们在进行党内斗争中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因此,他们对于问题的观点、处理方针和办法,也是不正确的。一切事情的处理,只要对他们个人或少数人有利,他们就赞成、就主张,如果对他们个人或少数人不利,他们就反对、就不赞成。至于是否对党对革命有利,他们是不管的,或摆在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因此,这种人主张什么或反对什么,都是没有原则的,离开党与革命的原则的。或者说,他们的原则不是党的原则与革命的原则,只是他们个人利益的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个人利益为原则的话,那末,各个人的利益和原则必然矛盾,必然相互斗争。

比如在你们中间就有人为了伙子的问题、马匹的问题、吃饭穿衣及生病打针的问题、没有提升自己职位的问题等,曾经发生一些争论和斗争,就是属于这种个人的无原则的问题。同志们不是从原则上提出伙子、马匹、吃饭、穿衣及打针应该怎样支配才对党对大家有利,要党及学校采取;而是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不给我伙子、马匹?为什么不给我打针?为什么不提升我的职位?为什么不给我好的饭吃?好的衣穿?一切以“我”个人为中心,从“我”个人的立场出发,在党内造成纠纷,进行斗争。那末只要给他个人满足了,即使支配得再不合理一点,他也可以不管的。这就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

又比如同志们反对浪费吧,有些同志是站在党的利益和党的立场上来反对浪费的,因此他们提出各种违反节约原则的浪费现象来加以批评,并提出节约的意见要党采取。这是很对的。但另外有些同志就不是站在党的利益和站在党的立场

上来反对浪费,因此他们就这样提出问题:某人浪费了多少,某人某人又吃了什么,穿了什么,用了什么……,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吃,这样穿,这样用呢?难道我的资格不老吗?对党无功吗?因此他在反对浪费的口号之下,起来斗争了。原因就是别人浪费了,而他自己还没有浪费到。这也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

比如在皖东,曾经规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有少量的薪水,于是就有一些同志要求到政府机关去工作,目的就是想自己也要得到这一点薪水。不允许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在反对政府机关人员有薪水的口号之下起来斗争了。他们并不是在原则上提出应如何规定政府机关人员的生活,来加以商讨。这也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

第二,有些同志不是为了把党的事情弄好,甚至是为了把党的事情弄坏,或其他目的,来在党内闹纠纷,进行斗争。目的是不正确的。这也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比如有些同志为了个人出风头,为了个人地位及个人面子,甚至为了报复别人以泄恨,在党内闹纠纷,和其他同志斗争,以捣乱其他同志的工作和计划,破坏党内的秩序与团结,而不顾及当时的情况与条件等,就是属于这种无原则斗争的。

第三,有些同志不是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要党采纳,或要党放弃,而只是凭自己的感情与喜怒来提出问题和进行斗争,为了一时的痛快,为了发脾气抒感慨而骂人和泄愤,这也是一种无原则斗争。另外有些同志由于他们的经验与理论水平低,不能从原则上提出问题来争论,而只是在一些个别的零碎的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不涉及原则的当前政策问题上,来和其

他的同志作绝不妥协的争论,但并未涉及到一般的原则问题,因此这也是一种不应坚持的无原则斗争。比如,有些同志对于某一次的战斗,某一次的行动,某一个斗争形式,某一个组织方式等发生相互对立的意见,而不涉及到一般的战术原则与战略计划及一般的行动方针与一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各持己见,不停止地争论下去。他们的问题提得不正确,因此常不能有正确的结论,或是无论怎样都可以的,因此就常成为一种无结论的清谈。

第四,是不择手段,不依照正当的组织手续来进行党内斗争。在党内无原则地拉拢或打击同志,在同志间进行挑拨离间、阴谋诡计及陷害同志等;或者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对党不负责任地乱批评乱广播及造谣、撒谎、诬蔑同志等。

以上这些,都是无原则斗争。此外,还有一些同志,在原则斗争中夹杂无原则斗争的若干成分,或者在原则斗争的大旗掩护下进行着无原则的斗争。另有些同志特别着重地注意某人与某人争吵,某人与某人的关系不正常等,而不注意他们争论的实质。

党内这一切的无原则斗争,都是不好的,对党有害无益的。

同志们又问,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什么是当前政策问题?以及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不应坚持己见,而应与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作必要妥协?

同志们!这些问题确是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什么是原则呢?

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讲,所谓原则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法则。特殊的事物有特殊的发展法则。相同的事物有大体上相同的发展法则。我们所谓原则问题也就是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法则作为我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问题。如果我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一般法则有错,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错,那我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就必然要发生错误。如果我们认识某一类问题的发展法则有错,那末我们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方法也必然要发生错误。所以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能马虎的。如果在原则上发生错误,那就不只是会发生个别的错误,而会发生系统的、一贯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上的错误。

什么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当前政策问题及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呢?

这大半是一些个别的问题,是一些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发动组织群众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大家都同意,而发动与组织群众又须集中由群众团体来领导,部队也应该协助与参加群众工作,这些都是原则问题,我们大家都同意,即我们在原则上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有的同志主张将部队的民运队及民运部暂时取消,将这些工作人员派到群众团体中去工作,另有同志则主张部队的民运队,不应取消。有些同志主张群众团体应分为四部办事,另有同志主张分五部办事,这些就都是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都不是原则问题。

又比如,我们敌后抗战,今天的一般战术原则是分散的游击战争。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没有分歧的话,那末,我们就没有战术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但如果有一次由于各种情

况的逼迫或者由于对他们特别有利的情况发生,我们某个指挥员打了一次胜利的或失败的运动战,那末,这也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个别的实际问题。只要这个指挥员没有在敌后打运动战的原则的观点,那末即使这一次二次战斗是错误的,也只是个别的错误,或者是由于特殊情况的发生,这个指挥员打得并不错,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些个别的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坚持己见,争个不休。

又比如,在今天我军装备条件下,原则上是不应强攻敌人的坚固工事与中心城市的。如果对于这一个原则我们没有分歧的话,那末某一个工事,某一个城市,因为有特殊的条件,或有特殊的必要,我们去打下来了。这也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个别实际问题。但如果因为打下了这一个工事,这一个城市,就说一切敌人工事与敌占城市今天我们都可以去打,这就成为原则问题了。在内战时期,曾有同志主张打大城市,指挥红军向某些大城市进攻,这就是涉及原则问题的实际问题。因为他们去打这些大城市是在原则上主张红军应该向大城市进攻。在这种涉及原则问题的实际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在原则上妥协,而仍应在原则上主张不打大城市。

一切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常有几个解决的办法。由这里到那里,常有几条可走的路。这些办法,这些道路,对我们当时情况又各有利弊,有的办法或道路对我们是最有利的,但包含有危险性,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不如采取次好的办法或道路。所以在这些具体的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发生有不同的意见,只要不涉及到原则上成为问题,我们就要善于妥协,善于让步,善于接受与同意别人的意见;“善与人同”,然

后事情才能畅快地办理,问题才能爽快地决定;而不应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要别人放弃意见,总是要别人来将就自己,总是要别人照自己的意见办理,这样反而要拖延问题的解决,妨害工作的进行,增加党内纠纷与清谈的倾向,妨害同志间的相互团结。这就是为什么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应与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作必要妥协的缘故。

由此可知,什么是不涉及原则问题的当前政策问题、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呢?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们的斗争目标及达到此目标的斗争方式的问题,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们的战略及策略的问题,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们的一般立场与具体立场的问题。上面举过的各种例子,就都是这样的问题。

总之,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总原则,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一切要服从这个总原则。一切违反这个总原则的主张、意见和行动都是要反对的。各种原则之中,又有大原则与小原则之分,我们的规矩,是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小原则服从大原则。在一切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是不能调和妥协的,必须彻底争论清楚,求得一致。然而在一切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就不应死不妥协,就不应过分着重地斗争与争论,否则也要妨碍工作与妨害团结的。

我曾经听见一个同志说,在党内斗争中只要我的政治主张是“对的”,在组织上即使错误一点是不要紧的,是次要问题。因此,他认为在党内斗争中,可以采取各种不合组织纪律的手段向反对者斗争。这种说法,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他把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对立起来看,他不知道捣乱党内的秩序与组织,就是犯了一个最严重的原则的错误;

特别在今天妨害和破坏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就是最大地帮助了敌人,最大地损害了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就是犯了比其他原则错误更加严重的错误。在这里,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都要善于比较、善于区别各种原则问题在当时对党的利害的轻重关系,根据小原则服从大原则、部分服从整体的法则,来决定在什么原则问题上应暂时让步不坚持,在什么原则问题上则坚持不让步。为了保持党内团结和统一,有时对于某些关系不大重要、不大紧急的原则问题,我们也是应该和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暂时妥协的,暂时不提出这些问题,不在这些问题上坚持争论,而着重在当时关系重大的紧急问题上,这当然不是原则上的调和与中间路线,而是实际行动上的妥协及服从多数决定。

以上就是关于党内的无原则斗争问题。

党内无原则斗争以及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它们的根源是什么呢?这是由以下一些根源中产生出来的:

第一,是党内同志的理论水平一般还很低,许多方面的经验还不够,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地形成,党在各地方的领袖与中心则至今还很少实际地形成。

第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多,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疯狂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报复性,经常影响到党内斗争。

第三,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同志间客观地相互商讨问题的作风未形成,粗糙地主观地判断与处理问题的作风仍然严重存在着。

第四,投机分子混入到党内来,以及某种投机心理在党内

一部分同志中的存在。他们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故意要左一些，以为左要比右好点，或者为了打击别人，以便抬高自己。

第五，托派奸细反革命分子混入到党内来，利用党内斗争来破坏党。内奸托派常常在党的旗帜掩盖之下故意打击某些同志，在打击之后，又要另一个内奸托派分子去吸收这些被打击的同志作内奸加入托派。

以上这些，就是党内斗争中上述各种偏向产生的根源。

我们的党从最初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很好的。在党内斗争中有许多是做得对的，恰当的。因此我们的党在许多次的党内斗争中都有成绩，都使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有些提高。不可否认的，这些批评与党内斗争是推动我们党进步的原动力。如果没有它是不行的。然而我们同样地不可否认，在我们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是存在着上述各种典型的偏向和错误，在党内斗争中有许多是进行得不正确的。因此，就使我们在过去党内斗争中费去了很大的代价。我们今天就应该注意，如何地来惩前毖后，如何使过去所费去的很大代价不致虚费，如何从研究过去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中来求得党的大的进步。

以更少的代价和痛苦换得党内斗争更大的成绩和党的更大的进步，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研究中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中所应确定的今后党内斗争的方针。但这就需要我们彻底纠正过去党内斗争中各种偏向和错误，需要我们切实地适当地去进行党内斗争。

五 怎样进行党内斗争

同志们 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要怎样正确地适当地来进行党内斗争呢 ?

关于这个问题 ,联共党及各国党均有很多经验 ,中国党也有很多经验。列宁、斯大林有很多指示 ,党中央也有很多指示。关于这些 ,同志们应该细心地研究 ,将来在党的建设课程中还要讲的 ,所以今天不来讲那些 ,我只就中国党内斗争的经验提出以下一些意见 ,作为同志们的参考。

第一 ,同志们首先要了解 :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 ,绝不可以草率从事 ,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 ;必须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 ,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 ,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 ;必须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 ,把问题弄清楚 ,实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同时还必须是有组织地、有领导地、有准备地去进行。

同志们应该知道 :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才能纠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场 ;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 ,然后才能矫正别人的不正派。所谓“必先正己 ,然后才能正人”。

只有自己首先不动摇 ,然后才能帮助动摇的人 ,克服人家的动摇。

只有自己正确的原则、正确的理论 ,然后才能克服人家不正确的原则和不正确的理论。

只有自己对于原则问题具有明确性 ,才能改正人家的不

明确。只有自己了解问题的实际材料更多,更有系统地研究了问题,然后才能给其他的同志并给党以更多的帮助。

如果有的同志不是这样,如果自己首先就不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没有把握到正确的原则,没有按照原则去观察客观情况和系统地研究问题,甚至只要有个别的缺点与在某些地方的不够明确,那在党内斗争中就不能克服人家不正确的东西。如果还要鲁莽地去斗争,那就可能走到不正确的路上去。

只有客观的铁的事实,只有在实践中已证明了的经验,只有真理,才能够战胜一切。

我们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不是为了要削弱党的组织与团结,削弱党的纪律与党的威信,妨害党的工作的进行;相反的,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与团结,提高党的纪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的进行。因此党内斗争不能任其自流的发展,形成极端民主的现象。在党内既不能容许家长制的存在,也不能容许极端民主现象的产生。这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两个极端的表现。

党内斗争,是要用对党对革命最高的负责态度来进行的。

第二,同志们要了解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对立。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及做组织结论。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在十分必

要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手段。党的一切组织,在适当限度内,都有权力对任何坚持错误的党员做组织上的结论,党的纪律的执行和组织手段的采用,在一定的情况之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手段不可轻易采用,不可滥用。单是在组织上处罚同志多,并不能提高党的纪律。党的纪律,党的统一,主要的也不是靠处罚同志来维持(如果要这样才能维持,那就是党的一种危机了)。而主要的是依靠党在思想上、原则上的真正一致,依靠大多数党员的自觉性来维持的。我们只要在思想上、原则上最后弄明白了,如有必要,组织结论是最容易做出来的。我们不要一分钟可以决定开除某些同志的党籍,或宣布自己脱党。

同志中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坚持、对立与争论,和同志们对于党的组织上的服从,对于多数与上级的服从,是不可分离的;否则就没有党的统一与行动上的一致。同志们决不可以因为在原则上坚持己见,就在组织上同党对立,就不服从多数或上级,就去自由行动。这是违反党的基本纪律的。

原则上思想上的对立,和组织上方式上尽可能的不对立,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许多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一方面没有思想上和原则上明确的对立与分歧,但另一方面,在组织上和斗争方式上又对抗得一塌糊涂,斗争得一塌糊涂,争得面红耳赤,骂得狗血淋头,斗得两方面不见面,仇恨种下很深,然而在他们之间竟找不出原则上、思想上的明确分歧来。

第三,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一切过

分的批评,夸大人家的错误,滥给别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对的。党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有适当限度,应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指出与批评别人的错误要抓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问题,给以系统的明确的解释,才能解决问题。而不要枝枝节节地搜集人家许多错误的现象,及似是而非的事实,简单给以暴露了事。这会使人感觉你故意找他的错误,攻击和打击他。

当你们估计或批评某个同志时,你们不应仅仅指出他的缺点错误,并当做他的全部,你们还应指出他的成绩、功劳、长处和他的正确主张。即使他的主张只有一点或一部分是正确的,你们也必须替他指出,不可抹煞。这样才能给这个同志以全盘的估计与批评,才能帮助他进步,使他服气。

适当的批评,适当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反对“过”与“不及”,这就是我们在党内斗争中所应采取的方法。

第四,在党内外一般地停止斗争会的举行。应从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来指出各种缺点错误。应该首先“对事”,然后“对人”。应该首先把事实弄清楚,把问题弄明白,把错误与缺点的性质、严重程度、产生的原因弄清楚,然后再指出对这些缺点错误的负责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谁负责,而不要首先去追究错误的负责人。只要犯错误的同志不是有意的,并且真正在了解错误,改正错误,那我们就应该欢迎,就不应再事斤斤计较。在党内斗争中,对干部和同志的打击政策,攻击别人与打击别人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这和剥削阶级对劳动者的鞭子政策、压迫政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的政策是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检讨。

对于某些特别调皮捣蛋、经常违反决定、违反纪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同志,对于他们,原则问题还说不通、也说不通的时候,那末,个别地举行一些同志审判会,也并不是不可以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把它普遍化就是不对的。

第五,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在给同志做鉴定和组织结论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如果他不服,在经过辩论之后,应向上级申诉(一切在处罚后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愿上诉,党的组织亦应代他上诉)。任何党的组织,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处罚后向上级申诉。党员的上诉权不能剥夺。一切的上诉状,任何党的组织不能扣压,关于思想原则问题,党员并可越级直接向高级党委或中央上诉。当然,上诉的同志应该在下面充分说明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分歧的意见何在,弄清楚之后,才去上诉,不能在下面不说,到上面又乱说,蒙混上级,企图取巧。一切案件上诉之后,决定权即在上级,上级党委可取消、或减轻、或加重下级党委对同志的处罚。

在思想原则问题上,经过争论之后,如果还未在党内最后取得一致,是可以通过多数决定的。在多数决定之后,少数同志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在组织上行动上绝对服从多数的条件之下,是有权利保留自己意见的。

一定数量的下级党委或同志要求上级党委及领导机关召集适当的会议检查工作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上级党委应该召集会议来检查。

第六,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有明确的界限,也有适当的联系。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将党外

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争与恐吓。一切党员要严重地注意和警惕，不要使暗藏的托派奸细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来进行破坏党的活动，一切党员在党内斗争中，不要被这些分子所利用。这只有严格地遵守纪律及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才能做到。

在党内，只能允许合法的斗争，只能允许思想斗争，一切违犯党章党纪的斗争方式，都是不能允许的。

第七，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这须规定以下的一些办法：

（一）一切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及各个党的组织，如有意见，只能向相当的党的组织提出及批评，不允许在群众中乱说。

（二）一切党员对其他党员及党的负责人如有意见，只能当面批评，或在一定的组织中批评，不允许乱谈。

（三）一切党员或下级党委对上级党委如有意见，只能向上级党委提出，或要求召集会议检查，或向上级的党委控告，不允许乱说，或向下级传达。

（四）一切党员如果发现其他党员有不正当的行为及危害党的利益的行为时，必须向相当的党的组织报告，不得隐瞒或互相包庇。

（五）一切党员应提倡正气，提倡正派，反对邪气，反对一切不正派的言论与行为。给那些喜说闲话，喜欢广播，喜打听人家的秘密，喜造谣言的党员以严重的斥责。党的领导机关应该随时通令：禁止党员相互谈论某些一定的问题。

(六)各级领导机关应随时找那些喜欢说人闲话、喜闹无原则纠纷的同志来谈话,给以纠正及警告或其他处分。

(七)各级党委应尊重每个党员提出的意见,应经常召集会议,讨论问题,检讨工作,给党员以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于无原则纠纷,应该一般地禁止,不应去判断是非,因为是无原则纠纷,所以是无是非可以判断的。

当着我们去解决同志间无原则纠纷的时候,决不要单从纠纷的本身去解决,而应该去检讨与总结那里的工作,从原则上正面提出那里今后的任务、工作方针、路线和计划等。在总结工作,提出任务、方针、路线和计划中,批评到某些同志的不正确意见,然后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如果同志们还有不同的意见,那就变为原则的争论,把同志间的无原则争论引导到原则问题的争论上来,如果同志们在原则上没有不同的意见了,就要求同志们在共同决定的任务和方针之下,团结起来,一致为完成这种任务与计划而斗争。至于其他一切的无原则问题,要求同志们抛弃。总之,应该从总结过去的工作、解决当前的任务、推动当前的工作中去解决无原则的纠纷,否则,无原则纠纷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我们决不要用审判官的态度去解决无原则的纠纷,这是无法判断、无法解决的。如果你判断不当,双方都是会不满意的,纠纷会继续存在的。

至于某人对某人信任不够,某人对某人尚有若干怀疑等等,这些问题一般不应提出来讨论,因为讨论是无益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在工作中、斗争中、实践中,才能解决,才能证明某人是可信任的,某人是无可怀疑的。

如果有同志在原则斗争中夹杂着若干无原则成分,那末

我们只着重和他讨论原则问题,无原则问题不应着重去讨论,否则就会湮没原则问题。

如果有同志在原则斗争的掩盖之下去进行无原则斗争,那我们一方面应指出他在原则上对的方面,不要“以人废言”;同时也应适当地指出他的立场和手段的不正确,以免将原则斗争引上无原则斗争。

总而言之,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否则不行。道理讲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道理,一切主张,对于党和无产阶级的战斗有利的,对整个党与无产阶级的战斗长远有利益的,都是对的;不利的,都是不对的。无道理可讲的斗争,讲不出道理的斗争,就是无原则的斗争。不讲道理或讲不清道理,都是不对的,都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道理讲清楚了,最后还不能得到一致的话,那末谁个是违犯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也就清楚了,对于坚持错误的同志,采取组织结论就有必要了,问题也就好解决了。为了要讲清楚道理,要能讲清楚道理,党内民主就是必要的,平心静气互相商讨的作风就是必要的。同志们虚心学习,提高理论水准,弄清楚情况,调查清楚事实,细心研究问题等,更是必要的。粗心大意,主观主义,人云亦云,脱离实际,不查清楚事实,是绝不能讲清楚道理的。既不讲道理,或讲不清楚道理,结果就只有依靠蛮横,依靠手

段,依靠组织上所赋予的权力,甚至依靠欺骗来解决问题,党内民主就更无必要了;因为党内民主,就是为了大家来把道理讲清楚之后,以便一致行动的。

我在这里所说的道理,当然不是那些空洞的似是而非的道理,而是那些实际的与被实践所证明了的真正道理。某些知识分子是好讲空道理和歪道理的。他们不要事实也可以讲一大篇,从地下可以讲到天上,这是一种空谈、党八股,对党对革命是只有害处毫无益处的。所以在提倡讲道理的作风中,又必须反对空谈和党八股,提倡那些从实际出发的又是为了实践的客观的唯物的道理。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唯物的。

一切要讲道理,不讲道理是不行的,道理讲错了也是不行的,空谈更是不行的。这当然有些为难,但只有如此,才能够得上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是明白道理的,是讲道理的,是真理的支持者,并且是好好地和别人讲道理的一种人,而不是蛮不讲理的无理性的斗争家。

同志们!这就是我所提出的怎样进行党内斗争的一些方法。

我们同志应该依照这些方法去进行党内斗争,去反对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去检查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干部的党性。使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进一步地巩固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答宋亮同志^{*}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

来信收到。你的意见是对的。

中国党内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114]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这种意见,与当时某些党员的另一种意见,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真正的学院式研究对抗着。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

党员在党校中学习,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

^{*} 这封复信原载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内部刊物《真理》第二期。宋亮即孙治方,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

理论上的深造与把握,而不是学校生活的锻炼(虽然这种锻炼联系到所学的理论,即从理论研究中来逐渐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意识,亦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独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并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马克思、列宁本人更是如此。过去有人指埋头读书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特别在学校中来强调,就更为有害。

学院派是欧洲学术界及马克思主义者中一个派别,是一个专门名词。这派人只有离开实践的理论研究,轻视实践,而不将理论与实践联系,结果,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而不能成为实践的指导。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及我们党员中,今天仍然是有这种人的。比如,有些党员,他们对切近的组织问题、实际问题等,常常采取一种非常不严肃的态度,不去注意与研究,而轻视它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是不包含马列主义原理的,他们也不会从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去学习到一点什么东西。因此,他们并不以研究《资本论》的严肃态度来研究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不知道(或忘记了)马列主义学说要成为解决这些问题(行动)的指南。实际的有生命的马列主义,恰恰就包含在这些问题中,包含在一切人们的社会的具体实践中,而不在书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

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

利的,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

中国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16]差,所以中国党历来的组织工作就是很好的,不论做什么事,如组织工人,组织农民,组织政府,组织军队,进行各种方式的战斗,只要在党内一动员,为党员所了解,历来就能做得很好,就能完成任务,就能组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工人农民和军队到革命的战场上去。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这些表现,是除联共党外,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党所不及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今,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

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上述错误的意见与之有关而成为其原因之一,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这

些原因就是：

(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不象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与斗争经验的总结(这种情形直到今天还是有的,如我们今天到处都感觉到实际工作中的干部缺乏,一切干部几乎都很难从工作中抽出作一种比较长期的理论学习等)。所以中国党一开始成立,就卷入伟大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各方面都应付不暇。这与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亦是有关系的,这亦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党秘密活动的十年^[141]中,情形就有不同。这时是有时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但中国党也没有抓住这样的时机来克服理论准备不够的弱点。这当然亦是一个错误。这也是由于对理论重要性认识不足及对当时革命形势过分估计而来的,虽然在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伟大成绩的,党亦曾给以某种重视。然而党没有自觉地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准,并把这当作当时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及从事文化运动的干部,都包含着很多弱点,没有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干部与全党的全部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就使当时的作品十分杂乱,不深刻与不实际;因此,亦不能大大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

(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

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直到现在,马恩列斯的著作,大部分还未译成中国文字,而中国党员能读马列原著的并不多,即使能读的人也很少去读完。因此,影响到中国党员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修养。这也是中国党理论准备不够的原因之一。

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

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

这就是我的答复。

克服困难 ,准备反攻 , 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

今天来说 ,对我们最要紧的 ,是如何克服困难 ,渡过今后两年。没有现在 ,就没有将来。我们的将来 ,只有从现在就加以准备 ,只有从现在发展下去。要把我们现在的工作 ,今后两年的工作 ,与将来的反攻斗争 ,战后新中国的斗争 ,密切联系起来。要在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的观点上 ,同时也在准备将来、准备反攻与战后新中国斗争的观点上 ,来进行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除开华中局扩大会所说到的一些以外 ,我现在特别就准备反攻与战后斗争的观点提出以下几点 :

第一 ,在反攻以前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斗争 ,坚持原有的根据地(这必须与开展敌占区及敌接敌区的游击战争密切联系起来) ,无须主动进行对敌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 ,我们的主力就无须大的发展 ,也不可能发展 ,而以加紧整训教育为主 ,提高其质量 ,以便将来在发展扩大时有必要的良好基础。

* 一九四一年五月 ,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一九四二年调党中央工作。本文是在回延安途中 ,根据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精神 ,写给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等的一封信的后半部分。

如果我们在反攻中需要大批的新兵补充主力,需要主力尽量扩大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组织与训练好大批的民兵自卫军及地方武装,并保存这些后备力量;在政治上作动员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将来能大批的动员(现在无须经常动员,以免引起人民的厌倦)。

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破敌人的严重扫荡,特别在华北、山东、上海、南京附近要准备在反攻时期出现比今天更加严重十倍的敌情。同时,要准备在反攻中较大的进攻的战斗,准备抵御可能发生的反共军进攻的战斗。

第二,如果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的政治动向,是决定战后新中国动向的基本力量的话,那末我们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就特别要注意吸引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在政治上倾向我们,并且能坚决地拥护我们,和我们一道共同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

第三,如果根据地内的人民负担过重,超过了人民所能负担的能力,足以破裂我们与根据地内人民的联系,足以引起根据地外的人民畏惧与拒绝我党我军的领导,足以引起人民对共产党领导战后新中国的怀疑的话,那末我们就要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把负担减轻到中央所指定的限度(全部负担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百分之三)以下,并须向人民作充分解释:这是战争期间的负担,在战后就要减少。如果人民负担的能力,不够养活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应实行严格的精兵简政,情愿少要些人员马匹,号召干部艰苦生活,实行严格的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各级财政机关对粮食的注意太不够,粮食浪费太大,其实关系人民生

活最大的是公粮问题 ,而不是税收问题 ,我们收入最大的是粮食 ,浪费粮食是最大的损害民力与破坏我们的政治影响) ,颁布严格的法令 ,来惩罚那些贪污浪费公款公粮及乱征民间伏马者。同时要培养民力 ,注意组织与改善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要显示我们区域与敌顽区域人民生活的本质上的区别。这件事不独要影响我们今天的斗争 ,而且要影响我们在战后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对这件事情的不注意 ,我们必将自食其恶果。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 ,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这在全党全军中必须进行深入解释和动员 ,为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光明前途与新中国的创造而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物质资财。对民力、对物质资财的不爱惜 ,无异于对党对革命不负责任 ,无异于犯罪。

有的部队做生意赚钱 ,流弊百出 ,应该停止、改正。但部队自己生产蔬菜、烟叶、麻、棉花及开厂做鞋子、织手巾等 ,是能够解决部队困难的。华中各部队机关要切实仿效。

第四 ,如果在根据地内很好地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 ,推行“三三制”^[126]等 ,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 ,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 ,足以影响与推动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的话 ,那末我们就要下决心 ,务必在今后把民主政治、“三三制”等切实推行 ,非达到可能的高度不可。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缺少民主的训练 ,对于民主政治的精神、实质及方法 ,党内党外多数的人都是不大懂的 ,因此 ,我们的民主没有充分见之于实际。政府机关中 ,以及部队与民众团体中 ,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作风还极端严重。不少的干部是站在民众之上 ,而不是站在民众之中 ;他们是以人民的上司自居 ,而不是以人民的

勤务员自任 ;他们是越权垄断包办一切 ,而没有尽到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 ;他们自以为是人民的统治者 ,而不是人民的公仆 ;他们不是听命于人民、以民意为依托(不要与尾巴主义相混淆)。这些现象 ,是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民主政治生活之很大的障碍。不肃清这些现象 ,在根据地内组织很好的民主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根据地内领导政权许多年 ,还不能建立一种象样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秩序 ,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在全国人民中、在战后再来谈民主政治 ,那就会引起人民对我们以至对民主政治的怀疑 ,以为只是在口头上叫的而不是在实际上实行的。而且这也绝不能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群众。

这些现象的发生 ,是由于我们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民主的教育和锻炼的缘故 ,是党风不正、宗派主义严重存在的缘故。只要我们有好的民主的教育和训练 ,整顿党风 ,有这种毛病的党员 ,大多数是能迅速改正的。因为他们愿意学习与进步 ,但必须经过认真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才能改正过来。

因此 ,我们必须在党内外及人民中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应该指定同志去研究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法国的、美国的、孙中山的) ,苏联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 ,研究各国的宪法 ,写出必要的文章、小册子及教材。我在华中局讲的《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142]等 ,也可拿到党员干部中去讲解和研究。要号召我们同志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 ,学习民主 ,在各阶层人民中去运用民主 ,并总结各地实行民主的经验来教育党员与群众。还须制订出一些关于民主的法律(如各级政府组织法 ,选举法 ,代表会议的规则 ,处理

各种案件的手续等),规定制裁那些违反民主、侵犯民权(人民民主权利)的官员的办法等。在党内,对于违反民主的党员,要进行批评、斗争或处罚。在人民中也应进行广泛的民主教育,解释各种法律等。各级宣传部教育科,应在关于民主的研究及宣传教育工作中进行必要的努力,多写文章、小册子,多到各种会议上去作报告。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工作同志,各级领导同志,更须加紧对民主的学习、修养和锻炼。总之,我们要下一个决心,使党员懂得运用民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真正地推行民主及“三三制”,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

庞友兰^[143]说,共产党的下层同志能照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话办事,一定得天下。那末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这样呢?是能够做到的。这对布尔什维克^[16]党来说,没有做不到的理由,我们一定要做到。做到了,我们就“一定得天下”;做不到,就不一定“得天下”。这件事对我们的关系是这样重要,是能否“得天下”的大事。就是地主阶级里面的人,也是这样来警告我们的,我们能不重视这件事吗?能让现在那些恶劣现象继续存在吗?能不努力研究与学习实行民主吗?为了要“得天下”,即为了革命的胜利、战后新中国的创造,全体党员应该在根据地内创立模范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新秩序。这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这能吸引全国人民来赞成我们、反对顽固派,巩固根据地内人民和我们的关系。

第五,如果根据地内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的提高,是我们坚持抗战与创造战后新中国所依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就要用一切努力来提高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

度。这在华中似乎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工作,已经相当普遍地改善了工农生活,并组织了几百万群众到农会工会之中,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工人、青年、妇女、儿童,则还大部分没有进行组织,自卫队的组织与训练,还须作极大的努力。某些地方的群众如果还没有组织与发动的话,都必须全部地使他们组织起来。当着群众已经发动,并已初步组织起来和达到了基本的经济要求之后,就应把对群众的教育工作提到第一位,就应为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而进行一切的努力,就应注意经济主义的狭隘思想在群众和干部中的发展。估计今年秋季减租是无须费大气力就能做到的。群众团体在秋季减租后,除经常注意保护群众的日常利益而外,要建立各种相当固定的组织与制度,以巩固群众的团结。在这时候,必须对群众进行广大而深入的教育工作,也有时间与可能来大规模地进行群众的教育工作。在许多地区,在今年秋季、冬季及明年,你们应指示各地方党及群众团体大规模地进行社会教育与国民教育,特别是对群众中积极分子的教育。目的是为了

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主要还不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但国民学校的教育及以后的社会教育,提高文化仍是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思想上巩固这些群众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不致因为某种变动与挫折而动摇群众对我们的信仰。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政府的教育部门、群众团体的干部及地方党,应有大的动员,应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应密切配合,并应加强青年团儿童团的工作。要注意青年、儿童的教育与学习。要准备好教材,拨出经费,由各群众团体直接领导,在乡村中创立许多民众夜校,并须多办国民小学与中学。群众团体的

干部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应自动去当夜校的教员,并应派遣必要的专门教员,派遣干部去加强政府教育部门的工作,同时大量吸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加以训练去办教育和当教员。必须使根据地内数百万基本群众及数十万儿童、青年都受到深入的教育。这是一个异常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党与政府必须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来进行。

现在我们不能用土地革命来吸引群众跟我们走,但我们必须在减租减息^[144]、增加工资及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去吸引群众紧随着我们。如果我们能在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吸引了数百万基本群众与青年儿童,使他们不论在什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跟随我们走,那我们就要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件工作,是有如此伟大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进行。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

有教育意义的群众会议,应多召集。各级负责同志以及各地最高的军政负责同志,都必须密切注视群众的情绪,必须设法经常去参加群众的会议,亲自去解答群众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亲自去与群众建立亲密的联系,互相认识,而不可将群众中的事情完全委托下层同志去处理。

各地党政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去检查各种学校(小学、中学、夜校等)的教育内容,考查教员,掌握教育方针与政策,并经常亲自去向学生讲话。你们要知道,即使是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5]的特务,如果他们对青年儿童进行了深入的“教育”,他们都能驱使成千上万的青年为其拚命,难道我们有真理并有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不能在深入的教育中团结数百万青年和我们一道为新中国奋斗吗?为了这个目的,大批

的共产党员应到教育机关去服务,应学习如何去教育群众与青年,应经常总结经验,应首先训练大批的教员,我们党政群众工作的干部也去兼任教员。

报纸杂志亦应改善,亦应提高其作用,亦应成为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亦应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

中央在“七七”^[54]五周年纪念的宣言中提出了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与顽固派企图造成少数人专政的中国是直接对抗的。应拿这篇宣言到各阶层人民中以各种方式去展开完全民主的讨论,去深入地宣传教育群众,去团结群众在我们的口号(民主的新中国)之下,去详细解答群众所提出的关于新中国的各种问题。有时甚至可用完全民主的方式在群众中进行投票测验。务必在今后两年间,在根据地数百万群众中,对于战后新中国,在思想上、在实际生活上准备好完全巩固的基础。

第六,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之中,如果中间势力、中间阶层的动向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的話,如果这些中间势力的动向成为决定战后新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話,那末,我们就应该以极大的注意和切实而广泛的工作去争取中间势力站到我们这一方面来,或在斗争中守善意的中立。而且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一定要中间势力在今天能对我们守中立或倾向我们,主要的是要使他们在战后为新中国的斗争中能赞助我们或善意中立。我们今天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主要是为战后斗争做准备的。目标应该放远些。

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及对顽固势力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过去已经说得很多了,故在这里不多说。不过我们仍

须经常提醒各级干部 ,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执行政策中注意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 ,修明政治 ,生聚教训 ,整军经武 ,严修武备(各种武器资材弹药的聚集) ,为了坚持两年斗争须要这样 ,特别为了准备反攻及战后的斗争更须要这样。敌人的扫荡在华北是很严重的 ,故在华北的工作方针更须多照顾到如何坚持两年斗争的问题 ,一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如何渡过今后两年的问题。在华中则情况似乎有些不同 ,敌人的扫荡似乎没有华北严重(过去如此 ,以后不知怎样)。我估计 ,如果我们在华北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扫荡与清乡 ,如果敌人在华北不能“剿灭”我们 ,那末 ,他们就不能照样来“清剿”华中我军了。在这一点上说 ,华北八路军^[56]英勇艰苦地坚持斗争 ,是极大地帮助了华中新四军^[122] ,是与华中新四军的命运完全相联的。正如华中新四军在反磨擦中的胜利 ,极大地帮助了山东河北的八路军一样。很明白 ,如果八路军在华北不能坚持 ,则华中新四军便将立即受到敌人最残酷的“清剿”。我估计敌人或许不能照在华北一样来“清剿”华中新四军 ,因此 ,在华中的工作方针 ,就有更多的可能照顾到准备反攻及准备战后的斗争。一切工作就有可能更多地放在准备将来斗争的目标上。这是我的一种想象 ,不知客观事实的发展是否能如我所想象的这样。

为了实现这一切 ,目前必须经过一个关键 ,就是经过我们的中下级干部。而中下级干部的状况 ,则不是令我们完全满意的。他们还很幼稚 ,没有成熟 ,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 ,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党的政策 ,作风也有很多不正的。这是我们目前一

个很大的弱点。因此,用心来逐渐解决这个问题,有极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一下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不解决,一切工作任务又难于完成。因此,除开办党校、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整顿三风^[145]等外,还必须设法派遣一些较强的干部去任县区工作。还必须在某一个工作任务提出以后,在干部中作充分的动员与教育,使干部理解之后,再去进行工作,并由高级负责人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通过总结工作来教育他们。对于某些专门的问题(如战略策略,战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等),负责同志应多作讲演,来提高我们的干部。应特别注意对直接领导部队的干部(团营连)及地方党政民工作的干部(县级区级)的教育与讲演。因为他们是直接实现党的政策与执行任务的人,是直接联系人民与士兵的人,如果他们不懂得政策,不了解任务,工作是无法做好的。而过去对他们的教育又太少,故许多问题是由他们发生的。因此,轮流召集他们来比较系统地谈清一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提高他们,就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过去我们许多报告都是对直属机关干部作的(这固然也要),以后应多向下层干部进行教育,才能解决问题。

关于减租减息^[144]的群众运动^{*}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是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

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可作为晋西北参考。晋西北和华中不同的是地大、人稀、经济落后,但某些原则是可以通用的。

党中央曾提出发展华中、巩固华中的任务。经过对敌伪的抗击和反磨擦的胜利,建立了我们的根据地,建立了政权,华中的发展基本上是完成了。接着的问题是巩固根据地,其中心一环,就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以提高其觉悟。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容易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参加各项建设,才可能真正发扬民主,把政权搞好,把财政经济工作搞好。这样,党才能巩固,统一战线也才会真正搞好。基本群众

* 这是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由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进攻,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各解放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依靠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战胜困难,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的重大决策之一,是领导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报告是在这种背景下作的。

的极广大发动,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关,不能跳过这一关。过好这一关,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础,否则,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拿统一战线来说,如果群众工作搞得不好,群众还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没有站起来,那末,抗日统一战线就会只是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广大基本群众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如果群众工作没有做好,应该加紧做,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以至十年八年,都非要把这一工作搞好不可。

因此,在党员中,干部中,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非常薄弱,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纠正,不解决,党性就成问题。

我们革命,不是为老婆,为吃饭,为出风头,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马克思、列宁常常讲,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加强和巩固与基本群众的联系。又讲到,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基本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联共党史》^[146]结束语第六条中说,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日本特务机关整天窥视着我们,时时想找我们脱离群众的弱点,来勒死我们。我们在太行山曾截获国民党^[5]特务机关的指示,说破坏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共产党对群众的强迫命令。共产党如果单靠枪杆,单靠同地主、士绅、商人搞统一战线,是没有前途的。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不可在行动中有任何违背。

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口头讲的是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一到

行动就忘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对群众利益不关心,妨害群众利益,以官僚主义对待群众,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受到严厉批评。还有的同志把群众工作的地位看得很低,这是非常不对的。把人分成等级,把各种工作也分成等级,把群众运动的工作看成很低的等级,这不是共产党应有的观点,而是封建社会的等级观点。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农会工作搞好了,青、妇团体也会搞好的,工会工作也同样。

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是这样的: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

中心区、村在开始发动群众时,由政府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召开士绅、地主座谈会,说明群众运动要来,讲清政策,减少顾虑;同时工作团挨家挨户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联络和发动更广泛的群众。在群众酝酿成熟的基础上,召集全村农民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问题,选举农会筹备会。应找出当时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问题下手(比如借粮),通过这些斗争的胜利,提高农民的热忱和信心。还应加紧教育和训练积极分子。然

后成立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成立农会时要悬榜,农民对于悬榜,非常重视;县长、军队首长也要去出席,并讲话鼓励,以示对农会的重视。影响一传开,非中心区的农民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这时候,中心区、村即可留下一部分干部做巩固工作,其他干部转移到非中心区。这时到非中心区,群众就会自己找来了。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发动千百万群众,形成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潮流。

群众运动一起,积极分子涌出,就要抓紧教育。要认真准备好一篇讲话:世界是什么人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创造的。饭哪里来的?房子哪里来的?一切都是工人农民创造的。但是未创造世界的,却占领着世界。这里要注意打破农民的迷信,说明人受两种压迫,一种是自然的压迫;一种是人的压迫,人剥削人,人吃人。世界没有地主资本家可以成为世界,没有劳动者就不行。应以外地农民起来斗争的经验以及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说明工人农民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一了解这个真理,会非常兴奋,就会主张:索性把这世界推翻吧,把那些地主老财都干掉吧。这时要特别向他们说明统一战线的重要,今天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和地主老财讲统一战线,共同打日本,这是为了全民族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农民工人的利益和前途。这种革命阶段的性质一定要给他们说清楚,并要说明根据地的重要等等。这篇讲话,一定要准备好,语言和举例应当是当地农民容易懂而又切身感到的。农民听懂了,觉悟会提高的。华中那些刚觉悟的农民,常常兴奋得睡都睡不着,跑来问这问那,提出许多问题。这

样，农民的革命思想树立起来了，农民说“换了一个脑袋了”。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教育农民，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这个教育搞好了，农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摇。

农民在提高了觉悟之后，心也发痒，嘴也发痒，会到处去讲，进行宣传，那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农民起来了，就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

进行减租减息，农民说要斗理、斗力、斗法。所谓斗理，就是进行说理斗争。地主是很狡猾的，他会用种种方法来恐吓农民，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宣传力量，造成“不减租减息没有道理”的舆论潮流。有了理，就会得到社会的同情，能大大增强农民的斗争信心和勇气。所谓斗力，就是较量力量的斗争，依靠有觉悟、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去斗垮地主破坏减租减息的一切阴谋诡计。减租减息时，可从开明的地主先减起，因为容易一开始就做好，促使地主内部的分化。对那些不减的，就和他斗争。可选择一个最顽固的大地主，只要把他斗下来了，其他地主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谓斗法，就是依据法律进行合法的斗争。发动农民到地主家里去谈，说明为了抗日而减租减息。农会并可开会，请地方长官和地主参加。在会上表扬开明地主的大义，对地主的普遍减租表示感谢，以消地主的积恨。遇敌人扫荡时，农民就去帮助地主空室清野，以示共同抗日，互相团结。抗日民主政府应用自己的法令来保障农民的利益，制止地主的破坏活动，同时又适当照顾地主的利益，使地主服从和拥护抗日政府的政策。

要有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一切工作才会做好。农民起来

了,为防止地主打黑枪,自动要求发枪,民兵也就起来了。他们关心政权了,政权也就巩固了。农民“换了脑袋”之后,加上一个决心,不怕死,参加共产党的多了,党的力量就壮大了。

在群众运动中,还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

过去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常常代替、干涉群众团体,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关系搞得很混淆,表现在政府代替群众团体,干涉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派群众团体干部做政府工作等。

如果是政府代替群众与地主作斗争,就会失掉政府立场,不能兼顾地主的利益;而群众未发动起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是八路军^[56]、共产党给他们的利益,减租成了“恩赐”。结果,把地主闹翻了,群众又不拥护。这样做的人本意要做好事,结果是做了坏事。应当了解,脱离群众,少数人与地主斗争,是不允许的。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147]。我们应该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党、政府、军队代替群众减租减息的方式应该禁止。

政府过多地集中群众团体的力量突击征粮、征税、扩兵等,就会使群众团体放弃了自己本身的任务和工作,使群众不能正确认识群众团体。比如好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说农会是八路军的、政府的农会,而不说是自己的。我们要组织农民自己的农会,工人自己的工会,不依靠劳动者以外的任何英雄豪杰。党、政、军派去农会工作的干部,应以农会名义进行各项活动。一切好事,于农民有利益的事,都应交群众团体去做,而群众团体要教育群众拥护政府、拥护八路军。群

众团体干部被派去做政府指定的工作时,应完全以政府名义,不用群众团体名义。如果群众团体代替政府征粮、征税、捕人、审案等,就成了两个政府,结果变成了无政府。至于群众团体代替党的现象,有时表现为不去搞经济任务,只去搞政治宣传。自然,不能把经济任务与政治任务完全分开,但它们是有所区别的。

因此,党、政、军、民关系要区别清楚,同时又应该相互很巧妙地结合。是巧妙的结合,而不是混合。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领导一元化,是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统一,不是绝对的,不是取消各种组织。从单细胞到高级动物是发展,越是高级动物,细胞的分工越细密。我们今天的各种组织分工要科学、明确,不能混淆。划分职权之后,然后统一。现在客观要求分工,主观却分不清,把结合变成了混合。

党不能直接领导群众团体,而应通过自己的党员去领导。政府与群众团体,应互相协助。

怕群众团体威信高是不对的。群众团体是党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桥梁,群众团体威信提高,也即是党的威信的提高。群众团体有极高的威信,号召群众拥护政府才有力量。农会如果威信扫地,就难以号召农民拥护政府。所以,群众团体在群众中的威信越高越好。这种威信高,是党的领导的结果。

第二,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

党和军队的领袖可以委派,而群众领袖是不能委派的。因此,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有威信的群众领袖。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巩固的群众运动。有领袖、有纪律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运动。群众领袖应是

成千成万的,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的群众领袖。党应培养、教育干部成为群众领袖,这是重要的事。应派干部下去经常做群众工作,长期培养,成为群众公认的领袖。在华中,派干部去作县长,先不派到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工作做好了,在群众中有了威信,由群众选他出来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至于外来的做群众工作的知识分子,只要与群众密切联系,熟知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也可以成为群众领袖。

第三,群众运动中如发生左倾过火的情形,必须正确地对待。

群众运动起来了,可能有掌握不住的情形发生,因为群众不动则已,既动起来,往往超过我们的主观愿望,有些过左、过火的现象。有的同志对这种现象,感到害怕。应该认识,群众运动起来发生过左是一回事,领导的过左又是一回事。应该把群众行动上的过左,和干部领导上的过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这是有原则差别的。领导上的过左,是左倾机会主义,是犯错误,是不允许的,应该禁止的。群众起来有些过左的现象,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应该害怕的。

因此,应加强我们主观领导能力,力求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防止右倾和左倾。群众运动本身有时左有时右,无论如何我们的方针要拿得稳,我们主观领导决不能左右摇摆。怕左而不发动群众,或以为左一点不要紧,而用左的领导思想发动群众,都是不对的,要切实避免。

我们不怕群众过左,而怕自己的干部过左。四项动员^[148]时,不是群众左,而是派下去的干部左。结果,把地主弄翻了,

群众未起来,把自己孤立了。

我们对群众运动,一定要在领导上控制得住。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思想上、领导上的控制,出于群众的自愿。比如大革命⁽³⁰⁾时,武汉码头工人自发地驱逐巡捕,占领了英租界,一二十万工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陈独秀⁽¹¹⁴⁾等当时害怕群众过左,要想停止群众的游行示威,并要全国总工会负责。全总负责同志说明停止是不可能的,当晚找了群众领袖,提出示威时绝不能动手,不要损坏东西,这在思想上控制住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示威,包围领事馆,搞了一天,没有发生一点事情。这是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没有秩序、没有纪律的群众运动,不算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一次的群众运动,对于收回英租界⁽¹⁴⁹⁾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正确的领导下,群众中个别的左是能够纠正的,群众自己是能够建立起纪律的。群众中的领袖,也可能搞得过火,但我们应该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教育,爱护他们的革命热情,绝不能向群众泼冷水。如果有的同志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不知道爱护,而是站在群众之上指责群众,这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就不纯。

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

“华中概况”及你们给各地指示均收到，完全同意。我经过华北时，看到华北对敌斗争有很多好的经验，特简略电告，望你们参考。

(一)敌人较大的扫荡战役，总是分若干路向中心区合击，然后反复扫荡，再向据点撤回。我们应付的办法是：当敌人合击与反复扫荡时，主力应切实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要去企图阻止或打击敌之一路，而应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主动地打击敌人空虚的据点及交通，或择地隐蔽，只留小部队在中心区游击周旋，待敌撤退时，主力再转回中心区。

(二)在反扫荡时，所有笨重不能带走的東西，都埋藏在山上或沉之水底，而这些埋藏东西的地方，是预先秘密准备好了的，有些还派小部队看守。所有群众的粮食、器具也都埋藏地下，全家老小只挑一担行李、粮食，上山“跑反”。群众“跑反”及耕牛隐蔽，也常是有组织的，有民兵掩护及放哨。

(三)在反扫荡时，地雷的作用很大，使敌人的行动受很大

^{*} 一九四二年三月至十二月，刘少奇从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苏北阜宁，经山东、冀鲁豫、太岳、晋西北等根据地回延安。这是从延安发给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张云逸等的电报。

约束,使许多村庄及窖藏得以保存。太岳区人民还普遍有一种石炮,即在坚硬的石头上打一个洞,装上土硝、信管,放在路旁村边,触动即自行爆炸,如石匠爆取石头者然,可以炸死数人。在冀中曾用地雷包围一些据点,缩小敌占区。望你们切实研究地雷、石炮、水雷的制造,或以手榴弹作地雷。但地雷炸死自己的事,也常发生,故须派民兵看守。

(四)训练好的民兵,在边沿区、敌占区及在反扫荡时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平时不要管饭的军队。对于他们的训练,实际的战斗锻炼及武器(地雷、手榴弹、快枪等)配备等,望令各地切实注意。各地民兵数量不一定要很多,每乡有二三十人即够,但质量要很好。华北有些边沿区的民兵,已逐渐成为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全区青壮年轮流脱离生产,当半年兵,如是在这个区,就经常保持一二百人的游击队。

(五)在敌情特别严重的游击区,游击部队的组织形式有以下三种:(甲)在八路军^[56]、游击队尚可公开活动的地方,游击队一般着军服,以连为单位活动,主要领导人是营以上干部。当地区长、区委书记,都经常在部队中,依靠这个部队坚持斗争。(乙)在八路军、游击队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游击队均着便衣,昼伏夜出,以二三十人为单位活动,他们也不一定要一个公开的番号。(丙)在完全的敌占区,就以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队活动,平时人枪完全隐蔽,队员都有“良民证”,必要时在夜间临时集合行动,至天明前则又分散隐蔽,白天放哨,如有敌人来搜查,则分散转移。华北许多主力部队的连长,都轮流经过特别训练,学习以连为单位活动的一切办法。

(六)华北争取了不少的日本俘虏。他们积极工作,对我们

帮助极大。日本俘虏帮助我们教操、教刺枪、教劈剑等,获得很大的成绩,特别对我们做敌军工作、争取俘虏工作帮助更大。日本俘虏开始转变是很困难的,必须使他们明白新四军^[122]、八路军是正义的军队,中国抗战也是为解放他们自己,他们才转变。但在转变后,大多是完全可靠的,能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亦不逃跑。要已转变的老俘虏去争取新俘虏,也是不困难的。望你们切实注意这个工作,并信赖他们。

(七)在游击区与敌占区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需要巧妙配合。一切非法的事都可以向敌人说是新四军做的,一切合法的事由人民来做。在敌占区帮助人民减轻与逃避对敌负担是中心问题。在华北没有提出对敌不负担的口号,只提出少负担、慢负担、拖负担的口号。当着敌人把负担派下来时,我们就和人民讨论,如何采用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办法,使人民的负担减少、拖延及逃避。这样就使各阶层的人民都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共同对付敌伪,打击敌伪,保护人民,我们在敌占区就能存在与发展。

(八)减轻根据地人民财力与人力的负担,华北也有许多办法。除开部队生产节约外,一切不必要的会议不开,不必要的运动、工作和自卫军形式上的站岗放哨均取消,只在敌情紧张时及敌据点附近才放有作用的隐蔽哨,一切部队的粮食军需均由部队派人搬运,不动员民伕及派牲口搬运,如此则节省极大的人力,使之用在生产上。

以上各项,参照华中实际情形加以运用。

六年华北华中工作 经验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三月)

抗战准备时期与抗战初期 华北工作的经验

一 抗战准备时期

一九三五年冬天,中央决定我到华北去工作。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到了天津。当时中央给我的任务,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此时党的“八一宣言”^[150]及“十二月决议”^[20]都发表了,但苏维埃区域^[6]、红军同全国其他地方还是完全隔绝的。

当时华北的情况是怎样呢?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本部进攻。一九三五年发生了“华北事变”^[151]、“何梅协定”成立,在日本要求下,中央军

^{*} 这是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刘少奇结合自己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一九四二年春的经历,总结党在华北、华中工作的经验,在党内作的一次报告。原题为《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全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收入本书的是第二、第三部分。略有删节。

从河北撤退,并成立了宋哲元^[152]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造成了华北的特殊化。华北处于危急之中,保卫华北、保卫中国的任务非常迫切。

第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反日大示威^[153]以后,学生反日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小城市,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来潮。但是,当时国民党^[5]与共产党仍然处于尖锐对抗的形势中,因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顿时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呼声。

第三,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赞成,但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中。国民党虽然继续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旧政策,继续进攻红军与捕杀共产党员,但亦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

总起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全国各阶层的人民,共产党提出了团结全民族挽救危亡的总方针,工人、农民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化,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赞成抗日的方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也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

当时我们党在华北的组织情况又是怎样呢?

从大革命^[30]失败以后,经过了九年的反动时期,现在又有了新的民族革命浪潮,我们的党在白区保存下来的还有什么呢?我们不能不悲痛地回答: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

如果说在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54]统治苏区和红

军党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在遵义会议^[155]以后已经基本上纠正过来了的话,那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白区党组织的时间是很长的。在苏区及红军的党组织还没有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时候,白区党的组织早就被这种路线统治了。在苏区及红军的党组织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白区党组织中的这种路线还没有被克服。虽然在“六大”^[156]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以及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白区党组织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纠正过^[31],但这种纠正是极不彻底的,特别是在思想体系及群众斗争策略、组织形式、斗争形式等方面,没有被彻底纠正过来。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的影响,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

在上述情况下,华北党的任务与工作方针是什么?我们是怎样根据情况来提出任务与决定方针的呢?

除开动员群众并动员各方面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当时全党的总口号)而斗争外,党在华北的任务,就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要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就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联合一切抗日势力,有效地准备自己与准备群众,就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根据当时已经开始了的(特别在学生、知识界中)革命运动的来

潮时期之具体情况,提出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必须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必须在青年、军队及一切群众中进行顽强的工作,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这样,才能团结华北一切抗日势力,进而推动全国的团结和准备抗日。这就是我们在当时的任务与工作方针。

当时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努力工作了。

我们在华北以至在全中国广泛地传布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以党中央委托北方局的名义发表了新的宣言^[157],并以陶尚行的名义发表了给《自由评论》(国家社会党机关报)的一封公开信,答复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讨论共产党新政策的文章^[158],在党内党外均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还出版了《华北烽火》等党的半公开刊物,又利用当时平津上海等地许多左倾刊物,发表了我们所写的许多文章。这样,就迅速将党的新政策广泛地传布开来,在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同情。为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我们还做了许多具体的联络工作,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同各实力派及社会名流、学者等接洽,一般都得到了不坏的回答。我们还通过某方面的关系和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某种非正式的接洽。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号召群众为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使抗日救国运动更深入更广泛了。我们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159],进行政治的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的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贼和投降分子。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并由华北这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

国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通过各界救国会、学生会、民先队⁽⁶⁸⁾等组织,出版了几十个公开半公开的刊物和许多小册子,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戏剧团、歌咏团、下乡工作队等。这些就是当时群众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

党的组织在当时一般还是秘密的。但群众的特别是学生、文化界的救国活动,把统治者的严格限制多少冲破了一些。许多救国团体是半公开的,一部分刊物是在官厅登记出版的,另一部分刊物书籍则没有登记亦可在许多地方公开发行。依照新的情况,党的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需要给以重新配合。我们大体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联系,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的群众中,因此在这些活动中党的秘密组织的破坏还不大,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城市及乡村中略有发展。还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汉口、河南等地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则发展到全国各个城市,以至在巴黎、东京等地都有他们的支部。

要准备抗日战争,没有军队的参加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争取华北的军队抗战,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通过各种关系同中、上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二)通过群众救国运动向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三)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把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刊物输送到军队中去。这些工作对于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的转向抗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西安事变^[48]的时候,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且在党员及左倾人士中进行了深入耐心的解释工作,说服了他们。

在进行上述这些工作之前及工作过程中,我们在党内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内的指导刊物《火线》^[160]在这一年多内出版了四五十期,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161]等文章,从原则上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又在一切具体工作与斗争中来彻底粉碎这种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三六年三月,北平的学生因郭清之死举行的“抬棺游行”(郭清是为爱国被捕死在狱中的学生),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与学校当局发生了严重的对抗。他们不听学校当局的劝告,不接受学校当局向官厅交涉抚恤及合法的追悼郭清的方式,而是秘密地、突然地推倒学校的墙壁,抬着郭清的棺材到马路上去游行,致被警察打得落花流水。这是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行动。我们批评了这次行动的错误,并且责令我们的党员进行许多善后工作,向学校当局进行了解释及道歉等,挽救了当时的危险形势。

当时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构,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

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在同党内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水平及工作积极性,因此,逐步地巩固了群众运动的来潮,使广大的群众团结在救国会、民先队的周围。北平的国民党教授及其他国民党员为了分裂北平学生运动的目的而成立北平学生会(新学联)时,只有极少数的分子参加。在肃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党内只有个别的分子不赞成,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

以上就是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在进行了这些工作之后,华北的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及统一战线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成功。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地方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了,平津两市党的组织与工作大大加强了,还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华中华南的若干党组织。差不多所有的大学及中学都加入了平津学生会。各方面人士对共产党的疑惧心理大大减少了,都愿意与党来往了,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和组织也有扩大和发展。党已深入在群众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空前未有过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运动来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华北党内克服了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正确执行党中央路线的结果。

这些成绩,为党与八路军^[56]在华北抗战创造了比较顺利的工作条件与发展条件。

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什么缺点呢？

这个时期我们工作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非常薄弱。除开在唐山及个别的铁路与工厂中有很小的组织外，在许多企业中没有什么组织，党的新政策在工人中的影响亦很小。当时学生群众的救国运动，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来，还没有较为广大的工人群众起来参加救国运动。这是由于：（一）当时的政府及工厂对工人群众的压迫与限制特别严重；（二）从很久以来，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就受到无数次的破坏（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还有一次相当大的破坏，企业中的党员及与党接近的工人共有五十多人被捕），使党与工人群众的组织联系几乎断绝，党内做职工运动的干部亦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党必须重新训练干部才能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三）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各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工人中的工作注意不够，没有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派遣必要的干部到工人中去刻苦工作。

当时，中央对过去白区工作中的左倾路线，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这使华北党组织克服左倾路线的斗争遇到了困难，并在党内发生了纠纷。当不少同志提出过去的领导路线是否错误的问题并要求答复的时候，我们的答复却不能不是含糊的。这就给了当时个别留恋左倾路线的负责人以间隙，使他们乘着这个间隙来反对正确的领导。不久以后，中央召集白区党代表会议（一九三七年五月和苏区党代表会议一起召集），我和华北的代表来到延安开会。就在这时候，反对者在党内，在代表中，暗中进行了许多活动，他们和延安的某些同志结合起来，影响白区党代表会议中不了解内情的一部分代表和他们

在一起,坚持拥护历史上白区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否定当时华北党的正确领导路线。因而使得这个白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工作中的困难不独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虽在不久以后抗战就爆发了,华北的工作条件、工作任务完全改变了,但是这个白区工作会议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到很久以后还没有最后消除。这也成为当时华北党的工作中一个严重的缺点。

这就是抗战准备时期党在华北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和经验。

二 抗战初期

芦沟桥事变^[54]发生以后,党中央估计到日寇要占领平津。平津危急。于是就提出了“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为保卫国土而流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号召群众与军队紧急行动。

平津失守后,华北及全国抗战的形势还没有确定。根据过去“一二八”^[22]抗战、冀东抗战^[162]及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的经验,国民党可能再来一个什么停战协定,还有妥协的可能。这时我们的方针,是采取一切办法推动全国抗战,反对丧权辱国的和平妥协。

因为平津被日寇占领,我们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党的领导机关撤退到太原,并且应该迅速坚决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应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

枪来打游击。但在撤退过程中,有个别负责同志反对撤退,利用撤退时某些人的慌乱现象,在党内外提出了“反对逃跑”的口号。他们命令党员及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人留在平津,因而部分地延迟了这种撤退的行动。虽然没有造成损失,但这些同志的意见与行动无疑是错误的。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撤退。如果在此时党不去组织撤退,那只能是帮助敌人。

日寇占领平津后,即大举向中国内地进攻,收复平津的可能性暂时丧失,全国抗战的形势也已经确定,国共宣布合作^[163],共产党已有半公开及公开的合法地位。这时候,我们决定了如下的方针:

第一,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

第二,在冀东(这里是在几年前就被日寇占领并划为特别区的地方),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冀东的同志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当八路军宋时轮^[164]支队进入冀东行动时,英勇地发动了冀东人民的大起义。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我们的同志在起义前作了很好的工作,那里的国民党组织及伪政权下差不多全部的保安队(七八个旅),县政府的武装,开滦矿山的工人,农民及许多地主资本家,都联合起来参加了起义。

这是真正地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并在起义后立即组织了联合的领导起义的政权与军事指挥机关。然而这一次起义在不久以后即遭遇到敌人很严重的进攻,受到严重的挫折。只是到后来又用了很多的办法,方把冀东游击战争组织起来。

第三,在华北其他地区(我军的后方),应动员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同时准备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此时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是战地动员委员会^[73](有一些地方是救国会)。这种动员委员会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

第四,在华北即将失守的城市、矿山、铁路、工业区,应动员工人、职员能迁移者,迅速迁移;不能迁移者,准备和组织在失守以后的对抗斗争。号召工人、职员在敌人到来时,组织工人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以上就是我们在太原失守以前的行动路线。

在抗战之初,我们就估计到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会大部退出华北,华北的旧政权及国民党党部也会退走,那时,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就会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

在估计了上述的可能情况之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方针: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八路军一到太原,北方局就向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及地方党的干部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与方

针。十一月十五日北方局的书面决定^[165]，再次确定了这一方针。但当时有少数同志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华北也许不至于全部沦陷，也许用顽强的正规战还可能阻止敌人前进。因此，他们就觉得没有在全华北准备游击战争的必要。说到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的任务时，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这将给国民党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发生大破裂，至于在华北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政权，那更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不能允许的行动。他们的方针是什么呢？是要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抵住敌人前进。他们认为敌人是抵得住的，抵不住以后的事情不要去想它。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侧后不大的地方去进行一些，辅助华北正面作战，它的意义与前途是不大的。很明白，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当时否决与批评了这些意见。

到太原危急的时候，整个华北沦陷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太原是当时华北最后一个还没有失守的大城市，太原失守后，在华北进行正规战争的条件一般地就失掉了，不能组织相当固定的战线，只能以游击战争的形式来坚持华北的抗战。这时，我们就在党内确定地指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全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地发展、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我们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决心把自己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

这时候中央也指示我们说，我党我军在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这样的指示，在当时华北情况下，是完全正确

完全需要的。

当时,群情慌急,不知所从。党内也有少数党员表示了这种情绪。我们禁止党员离开华北,并向群众作广泛耐心的解释,说明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走:一是继续同敌人打,二是逃走到别处去,三是投降敌人。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而要继续同敌人打,怎样打法?谁个打?是否能打胜?这些都是在一般群众及许多党员的思想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采取了许多实际办法,在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关于游击队的组织问题;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关于干部问题;关于游击队作战区域问题等。

我们特别告诉群众说:游击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而要由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来打。

在太原失守的前后,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八路军的胜利与良好的纪律,党与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党已一般地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可能。党与群众运动,华北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到处都有大发展之可能,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要求党派人去指导他们打游击。这时候,一方面是旧统治阶级的退却逃跑,张皇失措,和汉奸的粉墨登场;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愤激和他们的武装抗战的决心,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高涨。这时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缺乏。当时我们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采取了以下的一些办法:

第一,开办了许多一星期卒业的训练班,把这些人立即分

派到各地去进行工作。

第二,把上层领导机关的人员尽可能地分派下去,连技术人员也分派下去工作。

第三,动员了城市中的大批工人,大批党员,大批学生及同情抗日分子,下乡去组织游击队,回到自己家乡去组织游击队。如果他们把游击队组织起来无法指挥时,就交给八路军指挥。

第四,召集一些可能召集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告诉他们工作方法,检查他们的工作,交给他们任务,使我们各地方的工作人员能够迅速成熟起来,能够担负当前的任务。

第五,大量发展党员,并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各地方的党部,首先建立各县的县委或地委,然后再来发展党员建立支部。

因为我们从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上述各种问题,所以全党都有一定的信心、一定的计划去进行工作,去应付激烈变化着的环境。所以,我们当时的发展是很快的,许多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太原失守后不久就成立了。在客观形势的飞跃发展中,我们的工作也飞跃发展了,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后来,华北几乎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队大多数退走,并抛弃了很多武器资材。河北、察哈尔^[166]两省政府及差不多所有的县长、专员都逃走了,山东韩复榘^[167]的省政府和县政府人员及其军队也逃走了,山西的旧派也大多数逃走了,而山西进步的新派就大为活跃起来。华北人民正决心准备自己起来救

自己的时候,八路军部队和大批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华北敌后,到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密切地和人民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党员和八路军、积极的抗日分子,拾起国民党军队所抛弃的武器资材,到处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一时,在广大沦陷区中,我党的、其他党派的与无党派的游击队,共有数百个。而这些游击队大都与八路军有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加入了八路军。这样八路军在敌后就得到迅速的扩大,许多新的支队编制起来了。八路军就成为拥有十数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了。

在旧的行政官吏逃走或叛国之后,我们委任了许多新的县长、专员,并在各战略区经过民主方式成立了行政公署或边区^[64]政府,建立了新的抗日秩序。不久,许多地区的土匪被肃清,人心逐渐安定,人民自卫军、民众运动都大大发展起来。党的组织亦有十多倍的发展。单以华北范围来说,我们的党已成为领导抗战的最大的政党了。

敌人在占领太原以后的四五个月中,没有继续向山西南部进攻,这给了我们从容布置敌后工作的时间。这时候,我们决定在敌后采取可能的国家政权的斗争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与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军区、军分区),颁布各种地方法令,征集物资、粮食,镇压汉奸等。我们还决定了根据地中党的公开及采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不论党、政、军、民及其他组织,最初均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建立,首先成立领导机关,然后建立下层组织。在革命高涨时期,领导机关建立以后,很快就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充实下层。因为一切都在飞跃中,时间是很宝贵的,浪费时间就等于犯罪,一切都要迅速爽快地解

决。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局面是打不开的，或不能迅速打开。我们在“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下，采取了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斗争形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织形式。由抗日人民代表会议直接产生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军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救国会，扩大八路军，以及党的公开等。由于我们及时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新的口号去代替旧的口号，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去代替旧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并且在斗争过程中，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把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相互结合起来，因此，就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激烈变化着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发动了最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战场，并在战场上适当地布置开来。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关于策略的具体指导。

华北人民的革命运动，华北的党组织，在上述策略指导之下，大踏步地前进了。仅仅几个月，华北大部地区就完成了这样几个大转变：统治华北的腐败的旧政权，在敌人进攻下几乎是完全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敌人的傀儡政权——汉奸政权；随即又由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抗日游击运动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之下的大发展，在华北广大的乡村中，摧毁了敌人的傀儡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仅仅几个月，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抗战中失败了，退走了，代之而起的是数量更大的与八路军密切结合的人民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抗战中所给予敌人的打击，大大超过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所给予敌人

的打击。这种伟大坚强的游击战争，将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也将在敌人面前证明：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很明白，象这样复杂的巨大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指导，是不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

当时在策略的指导上，最复杂、最需要冷静地思索与处理的问题，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问题。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翻了筋斗。我们采用了这样两种斗争形式：第一种，就是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完全退走的地方，以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地区，建立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和部队，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91]，进行抗战，然后请求国民政府批准（但国民政府不批准也就算了）。这主要是在河北采取的形式，我们在上面已经研究过了。第二种，就是在山西采取的，即是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过新派及牺盟会^[74]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这种形式，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

关于山西新派发展的具体经验是什么呢？

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末，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山西的阎锡山^[168]在绥远事变^[169]后，看到敌人要侵占山西的严重性，决定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因为他要抗战，他就需要人民的帮助，就需要采用许多进步的办法与任用许多坚决抗日而有能力的人才。这就形成了他下面的一派势力，即山

西的新派。在太原失守后,旧派的许多人逃跑,有的投敌,于是他更重用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装(决死队^[170]),任命新派作专员、县长等。但到后来,因为新派愈加发展并形成成为独立的力量,他又畏惧新派的势力过大,就反过来压制与打击新派,提高旧派,并利用旧派来反对新派。到最后,就指挥旧派向新派武装进攻。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新派采取了坚决的方针,击溃了旧派的进攻。新派就更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了。

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忌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上述方针执行的结果,使新派取得了胜利,也使我们取得了胜利。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统一战线中左派的成功。

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因此,这个经验是

值得注意的。

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然而,即便如此,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有些地方,特别是那些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因为长期习惯于秘密工作,在形势突然转变、历史飞跃前进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方式一下转变不过来,不会运用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各种问题。他们仍然照过去一样,一点一滴地去进行工作,一个一个地去发展群众团体的会员和党员,只进行局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满足于几个党员与几十个会员的增加,满足于局部经济政治斗争的微小成绩。他们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提出任务,更不能解决在客观上完全成熟的那些任务。因此,他们就不能不远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这种毛病,很久以后才逐渐纠正。

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这时候不耐心等待,就要犯错误。但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不要再等待,要大胆前进,这时候再等待,也就要犯错误。我们过去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工作,也可以说是等待了十多年,等待什么?就是等待这样一个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今天,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都等到了,如果又轻轻把它放

过,不利用这种时机迅速前进,那就等于犯罪。

第二,有些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他们在特别有利的时候,不知道以我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的抗日势力与抗日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来领导敌后的抗战。他们不懂得国家政权在革命斗争中极其重大的意义,而等闲视之,弃若敝屣。在山东及其他一些地方,当着旧政权人员逃走,汉奸政权又被我们推翻很久以后,还不独立自主地建立新的抗日政权,不知道委任县长、专员,不知道经过民主方式产生当地最高的政府,不去迅速建立新的抗日秩序,让那种无政府状态延长下去。他们似乎觉得我党无权利站在抗战的领导地位,无权利站在统一战线及抗日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无权利建立当地抗日政府及委任县长、专员等,而且他们似乎还觉得全体抗日人民也无这种权利,唯一有这种权利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就等了又等,等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恢复那里的“一党专政”,然后他们再给以拥护。甚至当这些“一党专政”者转眼无情,不独不报答他们拥护的善意,而且要驱逐他们出境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这些同志的错误观点,使山东丧失了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并还将下面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也取消了。这些错误,给我们以后在那些地方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些错误,在华北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

第三,有一些同志犯了过左的错误。在筹措部队的给养时,没有严格遵守统一战线的政策,过分加重地主富人的负担。在收编游击队时,编得过多,没有保留必要的地方武装及

非党的外围武装,对编余干部的处理简单粗糙。在群众运动中,有些地方对于流氓分子的破坏性注意得不够,因而造成某些乱捕人、乱杀人、乱筹给养的现象,引起社会上的严重不安。党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犯了“拉伕”的错误,引进了一些坏人及落后分子。这些错误现象的纠正,在许多地方是很慢的,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有些地方在纠正这些过左错误的过程中,又不适当地打击了群众和下层干部,向他们泼了冷水,因而引起群众情绪的低落和下层干部的消极,反动分子乘机抬头反攻。

第四,当时北方局与八路军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政策、个别工作上还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最初我们对于地主,对于汉奸,在政策上有些过分的规定,虽在不久以后,我们自己就纠正了,但下面很久还没有完全纠正。其次,一九三八年春天,党内及军队内曾受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71]这一口号的影响,许多地方不敢放手发展。这个错误,我们不久以后也自己纠正了。再其次,这个时期北方局在晋西停留时间过久,没有迅速到敌后各根据地帮助解决问题,有许多原则问题没有在党的干部中,特别是军队的干部中解释清楚。八路军部队向河北平原及山东深入的时间,也稍为迟了一些。这些缺点,都多少影响到当时的工作。

这就是抗战初期,也就是我们在华北发展时期的工作经验。

抗战初期与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经验

一 抗战初期

抗战初期,华中党的工作是由长江局指导的。在长江局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前,中央派了博古^[172]同志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指导华中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六中全会^[173]决定成立中原局,并派我到中原局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党的工作。而长江以南及新四军^[122]军部的工作,还是由东南局负责指导。皖南事变^[174]后,才将东南局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因此,抗战初期华中工作的情形,我不清楚。以下的意见,只是我到华中以后,就下层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来加以检讨的,所以还不是全面的。这些意见是否完全正确,也是值得商讨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当时长江局的任务,不只是指导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还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华中的工作,只是长江局指导范围以内一部分的工作任务。我在下面所要说的,也只是华中范围以内的工作,而下涉及其他部分。

抗战以前,党在华中的组织基础怎样呢?

一般说来,党在华中的基础比华北更弱,除开南方各省及大别山有不大的游击队之外,只在上海、汉口、河南及徐州等地方有党的很小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大半是新建立的。但是,

由于民族革命的来潮和党的工作,党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各大小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都有党的各式各样的广大的同情者。

在抗战开始以后,武汉失守以前,是华中情况激烈变化着的时期。当时,华中情况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日寇向华中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汉口、杭州、九江、徐州、安庆等城市及华中广大地区,均有失陷的可能。

第二,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国共合作已宣布成立,我党已取得暂时的合法与半合法地位,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第三,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

第四,在敌人进攻下,前线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部分溃散,遗弃大批武器弹药,敌后地区的旧政府纷纷撤退,秩序混乱,土匪纷起,人民恐慌愤激。

在上述情况下,党的工作方针与任务应该是:一方面,迅速恢复与发展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帮助国民党军队抵抗敌人的进攻,推动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应将自己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准备与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上,放在敌后的乡村工作上,以便在国民党军队退却之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和势力,用游击战争坚持抗战。

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如何决定行动路线,我不知道。据说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只提出了:发展各地方党的组织,动员群众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阻止敌人进攻,求得统一战线进

一步发展等任务。而对于准备与组织敌人后方和前线的游击战争,敌后乡村中的工作及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任务,则根本没有提出来。据说当时曾有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受到领导机关的反对,说这些同志太重视游击战争了,说敌人是要用机械化师团才能打出去的。很明白,当时华中党的行动路线,与当时中央在抗战初期的行动路线是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

华中党在这一伟大抗战高潮时期内,是有成绩的,主要是:第一,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及某些乡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并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帮助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出版了《新华日报》⁽¹⁷⁵⁾及其他书报,向各方面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等;第二,成立了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不大地发展了新四军,在个别敌后地区组织了党所领导的几个小的游击队,但这些游击队都是用友军的番号。

除开这些成绩外,工作中还有重大缺点,这就是: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培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因此,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这就是当时华中党的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认为,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以下的错误观点造成的:

第一,是不了解芦沟桥事变以后民族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和主要斗争形式的新变动,不懂得根据这种新形势和新变动

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与布置自己的工作。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城市中非武装的群众斗争上。在新形势下仍然以非武装的、部分的群众政治经济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就必然使自己的工作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发生不了什么重大作用。没有注意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敌后去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没有想到自己如何有组织地独立自主地去参加抗战,而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结果国民党拒绝我们的帮助,并限制和禁止群众的反日运动时,我们自然就一无所有。

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在上海、南京、汉口、徐州及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退却时丢弃了数十万件武器及大量的军用品,而敌后又是空虚的,一时什么人也管不到。如果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此时是有决心的,动员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大批的干部、党员及非党抗日分子到敌后工作,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他们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的时候,组织党员与同情分子一起往大后方退,而不是到敌后的乡村拾起枪来独立自主地打日本。所以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大城市失守以后,附近没有我们的游击队,倒有国民党的及土匪的游击队(我们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游击队是武汉失守以后很久才去组织的)。这样,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放过了。

第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在最初一个时期对于抗战形

势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估计日本不至于打到武汉来，或者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阻止敌人前进，中国可以速胜，可以很快就驱逐敌人出境。因而他们认为没有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必要。因而他们对于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关系有不正确的了解，不了解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不了解我们在抗战中（至少是抗日初期与中期）只有在基本上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式去参加抗战才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就放弃了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

在举国一致的抗战中，说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看不见武装斗争，那是不对的。他们看到了战争，也懂得“战争解决一切、一切服从战争”的道理，但他们对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不具体了解敌人是一个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敌人战略进攻的阶段就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广大中国领土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驱逐敌人出境也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由于敌人是异民族，并且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无法完全控制敌后广大的占领区。又由于中国旧的统治者的腐败，在敌人严重进攻下不可避免地要逃亡崩溃。只有在这种估计下，并从这些具体条件出发，才可能确立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但当时在华中的负责同志并不这样估计，并不承认这些具体条件的存在，认为中国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就阻止敌人深入内地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就不能确立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的方针，而集中力量于如何从正面阻止敌人前进，如

何保住武汉，如何很快地把敌人打退，收复沦陷区；而不集中力量于准备与布置敌人向内地推进以后的工作、武汉失守以后的工作、沦陷区不能很快收复时的工作，从而就丧失了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

其实，在武汉危急时，我们在华中大部地区的中心任务应是独立自主地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其他一切工作（如民运、地方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都只能是配合游击战争的。游击战争是这些地区当时工作的唯一方向，其他的方向都只能是空谈。当时我们在华中并没有一个正规军队，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都还在国民党指挥下，武汉及其他地方的群众又没有自己起来直接保卫武汉的实力，而我们要在武汉附近及其他敌后准备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又是禁止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除开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以及与游击战争相关联的其他一切工作）外，还有什么实际工作可做呢？这时如果我们不搞游击战争，而要搞正规战争，搞保卫武汉的正规战争，那我们除开向国民党建议，督促与帮助国民党而外，是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的。但国民党不听我们的建议，拒绝我们的督促和帮助。我们的建议、督促和帮助，都只能是空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抗战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正规战，也只有正规战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与驱逐敌人出境。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当采取正规战的方式和敌人作战，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将来能够和敌人进行正规战的一切条件，这些都是无需说明的。但是，从当时我们共产党的具体条件出发，是不能采取正规战去参加抗战的，特别在华中更无这种可能。而游击战争在抗

战中占极重要的地位,我们又完全有可能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因此只有进行游击战才是正确的方针。然而,当时华中的领导机关对于这种又重要又可能的游击战争不去搞,轻视它,主观地缩小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而去强调正规战,把自己的工作方针和全部希望放在正规战上。结果就只有去依赖国民党,将就国民党,幻想在国民党允许之下,成立若干归我们领导的机械化师团去进行正规战,或者幻想国民党能够允许我们参加他们的军事、政治领导(即所谓共同领导)。这就要在统一战线政策上走到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造成上述缺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执行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他们不是在敌人大举进攻下采用一切办法造成一种形势去逼迫(同时也实行必要的有限度的让步)大资产阶级与我党合作抗日,而是采用单纯让步的办法和在行动上严格限制自己的办法,去企图求得大资产阶级诚心善意的合作。因此,他们就不敢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和允许之外去行事,不敢采取有组织的独立自主的方式去参加抗战,不敢在可能条件下组织一定独立的战线与战区去抗战,不敢组织自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不敢用共产党的名义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不敢收编那些愿意受我们编制与领导的抗日部队,甚至不敢拾起国民党军队所丢弃的枪枝,更不敢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去团结一切抗日阶层与抗日势力,建立在自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民主根据地与抗日民主政权。甚至在国民党采用各种办法来限制我们及向新四军部队实行无理磨擦和进攻时,也不敢采用坚决自卫

的斗争方针,而只是一味地让步。因此,就不能不丧失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就不能不助长大资产阶级敢于向我们进攻的嚣张气焰,就不能不脱离广大的中间阶层,而陷自己于严重孤立和危险的境地。

他们不知道,我党与大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带着阶级对抗的合作,是在一种特殊形势下的合作。大资产阶级最初就不是诚心诚意与我们合作,而是要在合作过程中来限制、削弱与瓦解我们。所以,在这种合作中,我们决不能只用让步的办法,必须进行适当的斗争,必须利用与设法造成一种客观形势去逼迫对方,才能使这种合作继续保持与巩固。为此,首先就必须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以外去发展进步势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必须超过大资产阶级允许范围,利用一切时机去敌后独立自主地建立我们的武装与根据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坚决进行抗战与实行三民主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情势,使大资产阶级不敢轻易反对我们,不敢破坏合作,并不得不继续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独不会促使国共合作破裂,相反,还是保证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果只采取让步的办法去求得大资产阶级的合作,结果不独不会使合作保持、继续与巩固,相反,还会引起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严重进攻,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这一点,不独有历史上的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华中当时与后来的事实也是完全证明了的。然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不懂得这条道理,所以走了错误的道路。

第四,不能不说到华中负责同志的组织纪律问题、党性问

题以及思想方法问题。当时党中央对华中工作是有很多正确指示的,华北敌后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广大发展的实践经验,他们是知道的。然而他们不执行中央的屡次指示,轻视在华北实践中已经证明了的经验,而强调华中的特殊性,在行动中坚持自己的与中央抵触的错误路线,才在工作中造成这样不美妙的结果。

抗战开始以后,党中央关于政治、军事及组织工作的方针是很明确的,有历次决议、决定与指示,并在徐州失守后特别对华中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以后对东南局及皖南新四军军部又有许多严峻而明确的指示。但是,这些都被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拒绝了,他们坚持着自己的错误方针,这不仅仅是方针上的错误,而且是组织纪律上的严重错误,表现了这些同志党性的不纯。他们强调华中一些个别的特点,说华中没有八路军,华中敌后大部分是湖沼地带、水网地带及平原,华中没有军事干部,华中的国民党与华北不同等,以此为借口,来拒绝中央的指示。很明白,他们夸大了华中的一些局部现象的特点,并根据这些局部现象来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思想方法上的错误。

此外,他们对于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不够,害怕到敌后去活动,对敌后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也是他们放弃敌后工作的原因之一。

很明白,如果他们的组织观念是强的,遵守纪律的精神是好的,党性是纯洁的,如果他们尊重与细心研究并执行中央的指示,停止执行自己的方针,那末他们也不会在自己的工作中造成这样不好的结果。

以上这些,我认为就是造成这时期内华中敌后工作特别薄弱以及其他缺点的重要原因。

二 发展时期

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然而在这时,发展华中最好的时机事实上已经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来得及补救。

我们到达华中以后,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当时估计,敌人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因此,当时我们一方面布置武汉附近及豫东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而没有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津浦路、淮南路以东的广大敌后地区。如果我们能早将中心移到津浦路附近,那我们就会多做很多事情。以后我又回延安开会,整整耽搁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虽然李先念⁽¹⁷⁶⁾已经初步发展了武汉附近的游击战争,彭雪枫⁽¹⁷⁷⁾、吴芝圃⁽¹⁷⁸⁾发展了豫东的游击战争,而津浦路、淮南路以东仍是没大注意开展游击战争,那里的同志仍在东南局原来路线的影响之下。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才改正了这个过分的估计,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敌后地区去。但这时,时机更晚了一些,条件更困难了些。

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和共产党合作,但是它企图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党。所以它对共产党主

要是采取麻痹政策与特务政策。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采取严格限制与打击共产党的政策,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¹⁷⁹⁾等。从这时候起,国共之间的磨擦,就在各地逐渐发生。又因日寇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而加紧其政治上的诱降活动,国际上又有远东慕尼黑⁽¹⁸⁰⁾的新阴谋,以及我党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一些恐惧。因此,就使得国内形势逆转,投降、倒退、分裂的危险空前严重起来。汪精卫⁽¹⁴⁾投降,亲日派活跃,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开始出现,华北敌后不断发生武装磨擦,华中国民党顽固派亦节节向我进攻,强令我江北部队南调,武装磨擦亦开始发生。此时,我党在华中及皖南薄弱的武装力量,有被亲日派反共派包围、孤立和击溃的危险。在国民党地区,我党和进步的群众组织,则受到压迫与摧残,已经开始了民众运动的退潮。因此,我们在华中的工作条件就更困难了。

这时,华中敌后地区的情况也和武汉失守时有了根本的不同。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这样国民党就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一些秩序,江北自发的人民武装游击队已全部被国民党收编(但在后来又大部投敌当伪军),而我们在敌后则很孤立。形势对

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办，我们的方针是什么呢？

我们根据中央指示，揭破日寇的诱降与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动员并联合一切抗日的党派、阶层和人民，反对汪精卫，反对亲日派、反共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奋斗。我们的行动方针是：（一）在国民党地区，根据运动的退潮情况，适当防御与退却，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隐蔽精干，已经公开及半公开的干部党员，采取某种可能的向国民党抗议的方式撤退。（二）在敌后地区，则准备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战，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不依靠国民党发饷和弹药），准备全国性的及地方性的突然事变，准备实行自卫，克服当前的危险，准备在可能的地区建立一些根据地，并相机挽救前一时期华中工作中的损失。

我们当时在党内、军内传达了党中央在抗战以后的正确路线和我们的行动方针，在党的干部会上报告了目前严重的形势，指出了我们面临着危险及华中党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全体干部的精神为之大振，深刻地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认识到对于反共顽固派的退让政策不是出路，从而高度团结在中央的路线的周围，并为新的任务努力工作。这就在精神上、组织上准备了自己，并准备了群众，为克服当前的困难，为应付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而坚决斗争到底。很明白，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没有这种准备，没有这种明确的方针与坚决斗争的意志，要克服当时的危险是不可能的，当然更说不上创造华中敌后的新局面了。

我们工作的发展获得了超出我们希望以外的成绩。这一

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正确方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反共顽固派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反共顽固派在一九三九年发动反共高潮^[181],向我华北八路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在我华北党坚决自卫方针指导下,八路军与广大人民坚决斗争,击败了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得不停止进攻。然而顽固派并没有死心。他们以为华中我军力量薄弱,过去又有退让政策,很好欺负,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82]可以有把握地消灭或驱逐我军,因而就毫无顾忌地向华中我军进攻。可是事态发展的结果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反共顽固派多次的武装进攻,使我们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团结一致与之拚命。在坚决的自卫斗争中,我们的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理直气壮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及大多数地方士绅都是同情我们的,有很多人参加了我们的自卫斗争,包括江苏八十四岁的老耆绅,过去做过两任省长的韩国钧^[183]先生,都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同情我们方面,指责反共顽固派。在反磨擦斗争中我们执行了正确的策略,严格遵守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使我军的士兵、广大的人民群众、士绅以至国民党军队的官兵都亲眼看到:我们是自卫的,是有理的,是迫不得已的;而反共顽固派是进攻我们的,是无理的,是企图置我们于死地的。到了条件成熟了的时候,我们即向进攻我之反共顽固派实行坚决的猛烈的反击。在反击之后,我们又进行充分的解释(对自己的士兵、对人民群众、对士绅、对俘虏、对友军、对反共顽固派都进行了解释),释放俘虏官兵,医治对方伤员,并请士绅到对方提出和平条件,说明我们是不愿意自相残杀而放过日寇的。这样我们就争取到了

广大的同情者和后备军,而反共顽固派则是孤立的,内部是极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华中的武装力量虽然很小,反共顽固派指挥下的武装虽有二十余万人枪,但在无数次的磨擦斗争中,反共派没有得到重要的胜利,而我们则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反共派的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样,我们在华中不独渡过了危险关头,而且打开了在敌后广大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局面。我们华中的力量,在一年多的反磨擦斗争中没有削弱,而且发展了。反共顽固派在敌后的二十余万武装,则在磨擦中引起了内部的瓦解——叛变投敌、逃跑,加上战斗中的伤亡,所剩无几。大敌当前,他们无理进攻自家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我们则“因祸得福”,感谢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我们在华中的武装部队很少,但在一定地区有局部的优势,可能独立自主地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三民主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抗战、保卫家乡、改善人民生活等。这样,群众拥护我们,而反共顽固派就嫉妒与痛恨我们,并找借口武装进攻我们。然而群众是明白的,许多群众说:“他们自己不实行三民主义,还要反对人家来实行,真是没有道理!”他们师出无名,其气不壮,在群众中孤立,内部不团结。在这种时候,我们停止了退让,实行了坚决的武装自卫和反击。这就是反共顽固派失败的基本原因,也是我们胜利的基本原因。我们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发展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是经过这样的具体道路: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与坚决的武装自卫斗争。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

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没有在大敌当前犯进攻“自家人”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在反共顽固派武装进攻面前,犯毫不抵抗、一味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说,我们不独是在对日武装斗争中,同时也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也在对顽的反磨擦武装斗争中,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执行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与组织方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彻底纠正了华中党在前一时期的错误路线,我们才渡过了难关,克服了危险,并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我们的胜利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皖南的负责同志与新四军军部,就犯了这后一方面的错误,他们在反共顽固派阴谋和无理进攻的面前没有警惕性,一味退让,重复大革命时期陈独秀^[114]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没有在中央的屡次指示之下改正自己的错误,一直坚持错误到底,最后又在军事行动上犯了错误。结果就在皖南事变中遭到惨重的失败。华北华中以及皖南实践的经验,这样明确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抗战以来,应该说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谁个违背了它,谁就不能胜利。

反共顽固派的失败,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在每次磨擦之后,我们都向他们提议和平,要求他们停止武装进攻,一切问题用商谈来解决,然而他们完全拒绝。我们在二次黄桥战斗^[184]之后,答应让出盐城、东台及其他地区的防地,放还俘虏的师、旅、团长三十余人,退还缴获的武器等条件,请韩国钧先生到韩德勤^[185]那里去谈判,要他们停止对我们继续进攻,然而他们还是拒绝了。弄得韩国钧先生也气愤地对我们说:“和

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顽固派除开抱怨他们自己以外，还能抱怨谁呢？

由于顽固派不顾大局，在华中进行了一年多激烈的武装磨擦，我们虽然基本上胜利了，但牺牲是重大的。尤其以皖南事变中的损失为最大。同时日伪也乘机利用这种磨擦来加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与掠夺，因而使敌后抗战更加困难。又由于许多反共武装的叛变投敌，伪军增加了，伪化区扩大了，敌人的扫荡也加多了。即使如此，华中敌后广大地区还是建立了进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阶层广大人民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建立了敌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武装人民，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的自由及人权、地权、财权等，这就大大提高了华中敌后人民的抗战力量。华中人民和新四军在一起，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有力地坚持着华中敌后的抗战，给敌伪以极大的打击。这就是在磨擦中所引起的华中敌后情况的基本变动。这种变动，将长期影响华中敌后形势的发展，并影响全国形势的发展。这是在磨擦中所产生的积极的结果。在反磨擦斗争中，我们不独克服了当时的危机，而且使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也基本上完成了。前一时期华中工作中丧失发展时机和敌后工作特别薄弱的缺点，我们也基本上克服了。

三年来，华中工作的主要成绩是什么呢？

由于中央的正确指导，北方局和八路军的援助，华中我党我军全体干部、党员和指战员的英勇奋斗，除开个别地区以

外,我们的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简单地讲,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胜利坚持了华中敌后抗战,严重打击了敌伪。除开皖南与豫皖苏边区外,击溃了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对我军的进攻,阻止了投降分裂的危险。

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各师作战的情形如下:共作战二千三百九十一一次,缴获枪枝二万六千一百八十二枝,轻重机关枪六百挺,各种炮四十一门,各种子弹七十八万三千零一十二发,各种炸弹四万二千五百一十八枚;毙伤敌伪官兵三万三千零七十三名,俘虏二万零七百八十二名。我之死伤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八名(皖南事变除外)。

在一九四一年以前,我军除第五师外,作战情形如下:共作战二千七百零三次,缴获长短枪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枝,轻重机关枪四百二十八挺,各种炮五十七门,各种子弹六十六万一千五百零五发,各种炸弹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七枚;俘虏及毙伤敌伪官兵共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九名。我伤亡官兵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三名。

从以上的数目字,可以看出我军作战取得很大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伪,坚持了敌后抗战。

第二,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发动与组织广大的人民到抗日战争中去。虽然政府断绝供给我军一切弹药,但由于这种根据地的建立,仍能保证我军的给养。

根据不完全不精确的统计,可以报告以下的一些近似的数目字:

我军所建立的敌后根据地,面积共约一十八万方里,如加我军经常游击活动的地区,则约有二十五万方里,其中大约有十万方里是比较巩固的地区。在根据地内的人口,根据一九四一年向我交纳各种税款及公粮者计算,约共有一千五百万人,约占敌后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在比较巩固地区的人口,则约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虽然还极不完备,错误还多,但是我们注意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实行“三三制”^[126]。我们在各地开了参议会^[186]及士绅座谈会等,将党的政策向各阶层人民作解释,消除了中上层人士的怀疑恐惧,他们中有一部分积极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这里至少可以证明:抗日根据地内,在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是可以同中上层人士保持合作的;在与中上层人士保持合作的条件下,仍然是能够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那些认为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就不可避免要与中上层人士弄翻脸的观点,是不对的。

第三,发展了抗日武装部队,在一定基础上武装了人民。我主力军之大部经过几年来的战斗锻炼和整训,一般已结束了游击队的阶段过渡到正规兵团的规模。地方军中的一部分已提高了战斗力,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中一部分已能担任战斗任务。

第四,发展与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一定范围内组织了群众,改善了群众生活,实行了减租减息^[144]、改善雇工待遇等。

除开这些主要的成绩外,还在各地开展了敌伪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个别地方联络友军的工作亦有成绩。各地党与部队在训练干部方面亦进行了一些工作,在各种学校及训练

班毕业的学生已有数千人。一部分在职干部的理论认识与党性有些提高,在三年的艰苦斗争与工作中,锻炼了我们大批的干部。兵工生产,文教工作,亦已在各地开始进行。

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成绩。一般地说,开辟与发展华中敌后工作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这种任务的完成,抗日民主势力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内的生长与巩固,不会不影响到中国的抗战形势以及国内政治军事情况的发展。我军在华中敌后已最后地站稳了脚跟,任何势力企图消灭我们,是断乎不可能的了。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斗争以至于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已经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呢?

除开我们最初对于敌人的战略进攻有某些过分的估计,及皖南的负责同志犯了错误,因而受到很大损失外,还有一些错误与缺点:

第一,有不少同志在反磨擦斗争中犯了左倾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反共高潮一来,磨擦一起,国民党就完全反革命了,国共关系就根本破裂,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可抛弃,因而在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有的同志在武装反磨擦中超出了有理与有节的原则,只图有利,造成了原则的错误。还有的同志提出了“打倒顽固派”的口号,或把“敌、伪、匪、顽”写在一起,把顽固分子当作汉奸,把中间分子当作顽固分子来对待,甚至还发生个别没收顽固派财产的事情。有的同志向各方面的宣传解释不够,不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个复杂的武装磨擦问题,而是粗枝大叶地随便地处理这个问题,因而引起许多人的误会与自己内部的怀疑。

最初我们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错误,反对在反共顽固派进攻面前畏怯、退却、投降。但后来,在武装磨擦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逐渐地严重起来。因此,我们又不得不集中火力来反对左倾,纠正这种错误。

第二,最初,华中的党、军队和群众团体在筹措给养方面,在收编游击部队与地方武装方面,在处罚汉奸方面,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和华北一样,犯了一些过左的错误,经过了一个混乱时期,引起了社会上某些不安及上层人士的恐惧,个别地方发生地主逃跑等。然而混乱时期一般不长,有的几个月、有的几星期就纠正了。另外有些地方,则由于土匪的蜂起及顽固派武装的捣乱,这种混乱时期比较长些。

第三,由于我们在华中敌后的军队和党的组织,最初是通过江南、华北及中原各方面的关系去建立的,是各方面合拢来的,各有各的建制及领导关系、指挥关系等,在行动上、政策上最初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联系很少,因此,在斗争中就不能彼此协助,不能统一地对付日伪与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而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在统一战线及其他政策上,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常常表现各部队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与党及政府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党所公布的政策与各部队各机关的行动之间的不一致,因而就给反对我们的人以很多机会来钻空子,进行挑拨离间,引起我们内部的误会。在华中建立统一的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从组织上、行动上、思想上以至供给上、制度上去统一各部队与各地党组织,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并在中央的有力帮助之下,才最后获得解决的。

第四,华中我军是处在民族战争与内部的磨擦战争中。这两种战争,须要两套不同的战法,须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磨擦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政策上,更须要统一。而这两种战争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由于客观事物的这种复杂性,再加上我们部队组织及战斗作风的不同,所以,许多军官的军事指挥就难免发生错误,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比如,在几个部队配合作战的反磨擦战争中,有些指挥员用指挥游击战争的原则来指挥部队作战。他们并不严格听从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认为可以打时就打,不可以打时就不打,或随便转移方向,擅自指挥部队行动。他们或者把内战时期的战略战术原则机械运用到情况完全不同的华中敌后的反磨擦战争中。还有些同志不尊重上级所给予的战略任务,不肯用一点力去解决战略上关系重大的战斗,而只注意争取战术上的胜利。结果他们虽然在战术上获得胜利,缴了很多枪,俘虏了很多人,战斗次数亦很多,然而局面并没有打开,战略上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形势甚至还弄得更坏。另外有些部队在对日作战中不了解在战略上要统一指挥,而各部队在战术以至战役上要独立自主。他们常常在战略上不严格服从指挥,而在战术与战役上又常常请示上级,甚至抱怨上级对他们指挥太少等。还有些部队在对日伪作战中,疏忽了对反共武装的警戒,或在反磨擦战争中,疏忽了对日伪的警戒;或者不能在一定的时候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而两面同时作战;或者在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时,又过分估计另一方面的夹击

危险，而畏首畏尾，不敢下决心，或中途动摇，不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以上这些，就是这个时期华中工作所发生的一些错误与偏向。由于这些错误与偏向的发生，使我们在斗争过程中丧失了一些后备军，在某些阶层的人民中引起了某种程度的隔膜，并给了敌人一些可乘之机，使某些问题不能解决，造成某些僵持的局面，浪费很多时间，使我们以后的工作发生了很多困难。

华中敌后的根据地是在抗战三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是在反磨擦斗争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的。由于这两个特点，再加其他特点，就使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然而，我们有了华北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中央的许多指示，我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可以较快地纠正各种错误。因此，也就使我们在中下级干部较少较弱的条件下，能够运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复敌后抗日的秩序，团结各阶层人民在我们的周围，建设与巩固各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

这就是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基本经验。

对华中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

(一)华中各根据地工作是经过如下的具体步骤进行的：第一年(一九四一年)是以军事行动为主,打开华中各根据地局面,附带建立我们的秩序与进行群众工作;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是以恢复各根据地秩序、建立各种组织为主,并初步进行群众工作;第三年(去年)是以进行群众工作为主;第四年(今年)是以改造政权及建立民兵为主,同时教育干部(整风^[187])与发展生产。这些工作都是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大前提之下进行的,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坚持对敌斗争与达到保存骨干之目的。在第五年(明年),各根据地就应以组织与发展根据地生产为中心工作,以便打下将来坚持根据地的基础。为了这个目的,你们现在应作一切准备。在今年生产中,创造经验,总结经验,使政府和农会工作人员熟习组织群众生产劳动的一切方法,以便在今冬能够定出明年发展生产的实际计划。农会在减租之后,应以组织群众生产及办理合作社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农会工作内容要有切实而适当的转变,不可老照过去一样。政府亦应制订比较固定的公粮、税收政策,保证农民在增

* 这是从延安发给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的负责人陈毅等的一份电报。

加生产之后,不再增加负担,增产完全归农民自己所有。参议会及其他政府的一切会议,应以生产为主要内容,其他一切与人民关系很少的会议少开,以便能动员群众的力量到生产上去。各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战斗与工作的条件下,要实行广泛的生产运动,以便增加自给的百分比,而不加重农民的负担。

(二)在进行上述工作中,你们一方面要应付日寇的扫荡与开展反蚕食斗争,同敌人争地盘;另一方面要在今年明年彻底完成整风与审查干部的任务。因此,你们要好好总结对敌斗争的一切经验,我们亦准备将华北对敌斗争经验告诉你们。关于今年的整风,你们的决定是好的,但必须加紧检查与督促,加强思想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才能贯彻。在整风初期与中期注重整顿学风(文风合在学风一起学习)是对的,但在后一阶段即应注重整顿党风,深刻检查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党性,要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以季米特洛夫^[188]所提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189]来反省自己。整风与审查干部的工作,应与生产及对敌斗争联系起来做。

(三)你们是在复杂的情况、复杂的任务与工作中前进,要善于利用时机,使各种工作联系起来进行,而不失去中心环节,要切实避免工作步骤的凌乱,才能按时完成任务。领导要总其成,工作则应分途进行。比如,生产主要是动员群众及战斗员杂务人员去进行,对敌斗争主要是指挥部队、武装工作队、民兵及敌工部门去进行,但领导机关须总结经验,随时给予指导;而整风与审查干部则主要是由领导机关自己来做。

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133]思想*

(一九四三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的政党，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是二十二个周年了。这是伟大的二十二年。在世界上，在中国，无数的伟大事变是在这二十二年中经过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三次伟大的革命战争。第一次大革命^[30]与北伐战争^[125]及现在还在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与中国国民党^[5]共同进行的，而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则是在我党单独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三次革命战争对我党来说是没有间断地连续进行到现在。许多共产党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放下过武器。在这一点上就说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是与武装斗争分离不开的。

我们的党，在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连续不断的全国性的革命战争中，经受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它经过了多次的胜利，也经过了多次的挫败。它走着非常迂回曲折的道路，以至于今日。它屹立于伟大中国的国土上，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

* 本文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而写的，原载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文中的“孟什维主义”泛指机会主义。

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与历史事变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正是因为它走过了各种迂回曲折的道路,经受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所以它也就把自己锻炼得特别坚强,它也就具有多方面的特别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可以说,它在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共产党都经历了更多的重大事变,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论是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国内战争的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公开的与秘密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党外的与党内的……各种复杂形式的革命斗争,我们的党都经历了,都有丰富的经验。而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经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我们的党有各方面的极端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把它总结起来。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很好地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还是今天我们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这些经验的马列主义的总结,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只要我们的党员能够真正懂得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那他们就会增加无限的信心与勇气,就会把自己的工作大大推向前进,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推向前进。他们就能够避免许多在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使工作过程与革命过程缩短许多。必须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革命者,用中国党的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党员,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实际的效

果。如果抛开如此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如果轻视我们党二十二年来在伟大历史事变中的斗争经验,不用心研究这些经验,不用心向这些经验学习,而只去学习离开我们较远的外国革命经验,那就是轻重倒置,那就要使我们再走许多弯路,再受许多挫折。

二十二年来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是极丰富的,是多方面的。现在我不能一一加以说明。但是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16]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国也有许多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然而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何者又是假的马克思主义与假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是在中国革命群众中,并在中国共产党内多年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如果我们的党员不了解这种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标准,而不自觉地盲从在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去进行革命,那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事。这种经验应该是我们党的各种痛苦经验中最痛苦的一个经验。过去我们党遭遇了许多不应有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不必走的弯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党内存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党员不自觉地盲从在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以至使这些人占据了某些组织某种运动的指导地位,甚至在某些时候占据了全党的指导地位,因而把革命运动引上痛苦的困难的道路。这是我们全体党员必须引为深戒

的一个痛苦经验。

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以及宣传组织工作的能力,并不弱于任何一国的共产党。我们对于各种工作,历来就是做得很好的,可以几十万几百万地组织群众,可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可以在敌后那样艰苦与没有任何援助的条件下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战六七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革命精神与艰苦的工作精神,是很可钦佩的。然而我们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关于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上的准备是很不够的。在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在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还不免发生错误,因而就使运动遭到部分的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应有的损失。这一个历史教训,我们必须记取,并且必须在今后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只要我们能够保证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在各方面不发生严重的原则错误,那就等于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革命精神与艰苦工作精神,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指导,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地走向胜利。

然而,要怎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各方面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不发生严重的原则错误呢?这就须要我们的党员首先是我们的干部能够辨别马克思主义的真假,就须要在革命的队伍中,在党内,粉碎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派别,就须要很好总结我党二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就须要很好地进行学习,提高我们的嗅觉,就须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

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就有真假两

派马克思主义者。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充满着这两派斗争的历史,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也同样充满着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这是我们一切党员必须认识明白的。

还在二十多年前,斯大林就很确切地描写过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现把他的全文引在下面:

“现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底旗帜下面做工作,都是把自己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可是,这两派人究竟还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在两派中间,还横着一条鸿沟,因为,两派人底工作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派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照例只是在口头上得意地宣扬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会或者不愿意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会或者不愿意实行马克思主义,他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们不拿经验,不拿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工作的根据,却拿那些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摘录下来的语句来做工作的根据。他们不在分析实际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却在相同的事情和历史上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言行不符——这就是这一派人的基本弊病。因此,他们总是灰心失望,始终都是不满意于那个常常欺骗他们的‘厄运’。这一派人的名字,便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就是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科(约西里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上给了这派人一个很中肯的估计,他说:这派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

“第二派人却正是相反,第二派人把问题的重心,由表面

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而移到实行马克思主义,移到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实际。规定适合于环境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因环境发生变更而变更这些方法和手段,就是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这一派人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而是由研究周围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在工作时,他们不是拿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是拿实际经验来做根据,拿经验来审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错误中来学习和教导别人去建设新生活。所以,在这一派人的工作中,言行总是一致的。马克思的学说,完全保证着自己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说过,我们不当限于说明世界,而且应当更进一步去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遵守这几句话的。马克思的这几句话,完全和这一派人相符合,这一派人的名字,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人的组织者和领袖,便是列宁。”^[190]

斯大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两派人虽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做工作,都把自己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两派人的工作方法,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一派人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孟什维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们照例只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会实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公式教条。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不拿经验与对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根据,而拿书本来做根据。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从分析具体实际生活中去求得,而是从

书本上、从历史上相象的事情或相同的事情里面去求得。他们言行不符,口讲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做的就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是愚弄他们的,他们总是灰心失望,死气沉沉。

另一派人,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者。他们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他们特别注意规定适合环境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变更。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而是由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中去求得。在工作时,他们不拿书本上的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并拿实践经验来审查自己每一步工作,在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和教育别人来推动工作前进。这派人言行一致,口讲马克思主义,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仅说明世界,而最着重的是去改造世界。他们经常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力量。

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也就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陈独秀^[114]、彭述之^[191]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李立三路线^[18],就是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154],就是教条主义。这些机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必须明白,必须提高警惕性,在我们党

的历史上是存在着一条孟什维主义的路线及其思想体系的。从陈独秀、彭述之、李立三以及后来的各种机会主义与教条主义,他们在各个时期中的各种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在组织上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联系,然而他们的实质,他们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是基本上相同的。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有其一贯性的,他们给予党的损害,给予中国革命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

中国的孟什维主义,除托陈取消派有其欧洲托派的衣钵真传^[192]外,其他形态的孟什维主义,是并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128]及俄国孟什维克衣钵真传的,而是从中国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中,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自己生长出来的。所以这些人,与欧洲社会民主党及俄国孟什维克比较起来,在形式上有许多特点。这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在形式上是以“反孟什维主义”出现的,是以“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等等形式和词句出现的。他们在这些美丽的形式和革命的词句掩盖下,来进行实际的反列宁主义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来宣传与实行实质上的孟什维主义。再由于我们许多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低下,嗅觉不灵,不能在实质上辨别其为孟什维主义,就常常为他们那些美丽的形式与革命的词句所蒙蔽。他们就能够一时地取得许多党员和干部的赞成,而攫取到全党的或某些部分的领导地位。他们还特别发展中国半封建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并与中国社会中的流氓手段相结合,如是他们在党内的为害就特别严重,就特别表现其肤浅庸俗,表现其两极性与两面性。这就是中国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特点。

中国党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但存在着中国的孟什维主义体系和传统。

对于这种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假布尔什维克,是不能仅仅从他们的词句,从他们表现的形式去识别的。他们可以在言语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有更多马列主义,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更革命,然而他们最怕实践的考验,最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因此,必须从他们的实践中,从他们的工作中,从他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中,从他们工作结果的检查中,去识别这种人,去暴露这种人的真相。他们是口头的马列主义者,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马列主义者,他们的实际行动照例是不受马列主义原理的严格指导的。他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总是拿书本子做根据,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拿什么决议上的条文来做根据,即是拿一般的概念、一般的理论来做根据,而不拿实践中的经验和对于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根据。他们在解决问题、决定方针的时候,总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调查研究周围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从历史上的类比出发,或者从苏联、从西欧各国、从其他什么相象的事情出发。他们在实践中是唯心论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是常常要犯错误的,是不能最后把工作做好的。他们在实践中的结果,是必然要与他们最初的愿望、最初在口头上的宣言相违反的。如果注意到他们的工作方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及其结果时,就会暴露他们的本质。毛泽东同志在整顿三风报告^[193]中,对于这种人是有过严格批评的。

然而,这种人的危险性,就在于他们那大堆的马列主义的

词句、布尔什维克的外衣及其先天的两面性。他们可以吓唬及蒙骗许多工农同志及幼稚的青年同志,甚至就是很老练、很有工作经验、但理论上的识别能力还很差的同志,也常常被他们所欺骗所俘虏,因而他们就可以把党的事业弄到很危险的地步。

党的过去的历史,是充满着布尔什维克路线与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这两条路线、两个传统,是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内容是极端丰富的。在这种斗争中,党内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路线,虽然也曾经在几个短的时期内占了上风,得到过暂时的胜利,但大多数的情形总还是把错误路线克服下去。我们的党虽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错误路线,但是对思想上的孟什维主义的体系,总是没有彻底加以克服,没有彻底加以清算,没有给它以致命的粉碎性的打击。因此,这种思想,这种传统,总还是在党内残存着,到了某个时期某种条件之下,它又发展猖獗起来,危害我们的党。

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只有这样,才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维护我们党的队伍的统一和纪律,才能保证我们党经常的正确的领导,才能在今后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在艰苦复杂伟大的时代中,很好地实现我们先进政党的历史使命。

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反映,是它的一种高级表现形态,是成了某种体系的。要清除党内的孟什维主义的思想及其体系,就要在党内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清除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要使我们的党员能够在一切形态上区别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有些地方还正在做,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去年以来所号召的整顿三风的运动^[187]。这种整风运动,是党在二十二年的历史中空前未有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批评运动。它使我们的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空前地推进了。我们应该在整风的基础上,进而总结我们二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思想体系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把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到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在党的建设上今天的中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党内各派机会主义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的历史。党内孟什维主义的体系及其传统,决不能成为党在思想上的体系及其传统。党的历史,是与这种体系、传统作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历史。为了肃清这种传统的残余,给这种传统以暴露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没有必要替它掩蔽,替它否认,否则,对于党是有害无益的。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但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应该更加提高警惕的是,敌人派遣了一些特务分子混进到我们党内来,这些人也是以马列主义伪装起来在党内出现的。他们与前一种假马列主义者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对于这种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必须把他们清查出来。这就要在党内分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而在党内肃清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则是在党内分清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这两种界限都应该分清楚,但分清的方法和手段应该不同。前一种是用审查干部和党员的方法来分清楚,而后一种则是用整风与总结经验的方法来分清楚。

用马列主义来清算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及其体系,清查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巩固党提高党的两大工作。这两大工作的胜利完成,我们就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自己,我们就能以完全巩固、完全准备好了的姿态,迎接伟大光明的时期的到来。

掌握科学的马列主义的武器,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的残余,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 代表会议^[194]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我们陕甘宁边区最近几年搞起来一件新的东西,这就是工业。我们今天的工业规模虽然还很小,但这几年的发展是惊人的。一九三五年时,这里只有几十个工人的一个修理厂,而现在则已经有一万多工人了。这次会议以后,相信会有更快更大的发展。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是保障工业的发展的,老百姓也需要发展工业,以便于达到工业品的完全自给。现在世界上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苏联经过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大发展了工业,就把苏联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因此他们就能进行如此伟大的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我们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我们就要建造很多的工厂、铁路和轮船,搞很多的机器,需要很多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工人和很多的劳动英雄。所以工业这个新的东西,有它极远大的前途。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

我们有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因此要他做经济工作、做

工厂工作就不高兴,他们说干这一行没有前途。依我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象做经济工作、工厂工作这样有前途。比如有很多同志,特别是长征过来的,他们总喜欢带兵打仗,他们可以当团长、当旅长。当然,在今天仍进行战争的时候,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学习打仗,应该奖励与拥护那些战争中的英雄。但是,不久的将来,战争打完了之后,那些团长、旅长又干什么呢?那时有许多同志就要放下枪杆来搞你们这一行——搞工业、搞经济或者搞文化。那时你们就是“老资格”,就是先生,他们就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就要当领导人。

将来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候,象战争一样,工业也可以不要了呢?我看就是在长远的将来,工业不仅不能被取消,而且必然要大大发展的。现在边区的一百五十万人当中,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只有一万多,可是这一万多人却最有前途。几千年以来的农民,发展到今天还是农民,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以后怎样呢?以后农民一天天就会减少的,因为以后开荒、耕种、收割大都用机器,工业技术要普遍运用到农业中去,那时农民就会变成驾驶农业机器的工人了。今天边区农民的作用与农民的力量很大,可是就发展前途来说,今天这样的农民,在将来是要起变化的,只有无产阶级和工业是最有前途的。

但是要达到那样远的前途,一定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步地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学习、研究,把办工厂当做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例如,怎样组织劳动力,怎样管理工厂,怎样改良技术,怎样规定工资等等,都要用心去研究。我们要熟悉这门知识,要使学习在工厂中成为一种风气。厂长、工程师要学,工人、职员也要学,学徒更要学,大家

互相学习,这是促进我们事业发展的一种动力。须知我们现在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搞,很多事情搞得不好,或是搞错了,这在开始当然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些搞不好或搞错了的经验中去学到本事,使我们以后能够搞得好,能够少错一点,我们才可以前进。

在学习中,无论什么人,一定要放下“包袱”,去掉骄傲,才能够学好。不要以为我是从城市里来的,我已经学好了,看不起这里山沟中的东西。对眼前的事情不好好学,不加以研究,你就不能把眼前的事情搞好。至于从农村中出来的同志,那更要好好学习,否则,不独现在的事情办不好,将来更无法应付。抗战要胜利,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甚至在胜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现在我们是山沟里、在窑洞中搞,将来我们就会到城市中去。那时不仅有大工厂要办,而且有铁路、有火车、有轮船,要我们去管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把这比较简单的本事学习好,那末将来遇到那样复杂的大的场面又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开这个代表会,固然是为了推进边区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我们就可以把边区的工业搞好,不久的将来,也就可以搞更大的工业。

我们既然认识工业的前途是最远大的,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同志,就应该有决心把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终身事业,一定要把它搞好。一年不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是一定能搞好的。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事业精神和我们固有的革命精神结合,那一切的事情都是能够办好的。

大家知道,我们的工厂是公家办的,不是资本家办的。资

本家是为了追逐私人的利润而办工厂,我们办工厂不是为了哪一个人发财,而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国家好,在今天是为了打败日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工业,我们同时采用私营与公营这两个办法。我们应该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有些事情私人不办或办不了的,便只好公家来办,即国家办。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工农兵在这个国家中占主要的成分,公营工业也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在我们的公营工厂中没有资本家,因而工人与工厂就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在我们工厂管理方法上,就不是采取资本家的那一套办法。我们管理工厂的方针应该是:用一切方法与工人合作,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工人也应该以一切方法和工厂合作。要办好工厂就要依靠大家,依靠大家都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

邓发^[195]同志讲过,工厂管理人应该有群众观点,这很对。但工人同志也应该有群众观点。你织的布,做的衣服和鞋子,都是给八路军^[56]穿、给人民穿的,你做的东西,都是给八路军和人民用的(资本家开工厂所制造的物品就不管哪个穿、哪个用,只知道赚钱,这叫做发财观点或利润观点)。如果你织的布不好,一穿就破了,鞋子做得不结实,给八路军穿,一个冲锋就烂了,那就是没有群众观点。因为我们产品的消费者是工农兵大众,开工厂就是为了替大家做事,就应该对大家尽责,不可因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工厂管理者在可能条件之下,应该把工人的文化生活、物质生活都搞好,使他们安心工作。大家都应该有群众观点,大家负责。有困难,大家讨论、大家研究来求得解决。领导是要集中的,每个人办事的职责应该分明。谁的

工作没有做好,谁就应该负责,就应受到适当的指责。这样,我们的工厂便一定可以办得好。

总之,我们不仅能组织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而且要会组织经济、组织工厂、组织劳动力、组织市场等。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我们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把它学会,使我们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变成一个经济繁荣的工业国家。

对中央妇委^[196]同志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四月)

对于妇女工作,我是外行,过去工作情形也不大清楚,所以无话可谈。但从一般群众运动(其中包括妇女运动)的做法来看,过去是否有不妥之处,因此影响工作成效呢?从这方面我可以谈几个问题。

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在这里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的、各国的经验。

做妇女工作,首先要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过去有些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和指示,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只是一般地说二万万妇女。但是二万万妇女中,有城市妇女、农村妇女,农村妇女中,又有各阶层及各种不同年龄的人,因此必须具体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只有认清了工作对象,才能进一步了解她们的要求和需要,才能替她们解决困难,为她们服务。

* 本文原题为《总结妇女工作的几个基本认识》,一九四九年由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入《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重要文献》。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整个来说,目前根据地的问题,是一个农村问题。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处在农村环境里,农村的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农村是文化落后的、不卫生的。我们在农村中工作,就要分析农村的具体环境。很可惜,我们在农村里搞了十几年妇女工作,还有不少人完全不了解农村妇女。我们吃了农民的饭,穿了农民的衣,住在农村里,但是我们的观点,还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我们的工作,不是从农村的实事中去“求是”,而是从外国妇女运动历史类比中去“求是”;我们不去倾听农村妇女的要求和呼声,不从今天可能办到的事情出发,而从固定的公式、口号出发。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据我们看,在妇女工作中,过去经验不多,经验主义比较少,但还是有的。例如只凭大革命^[30]时期的经验、“一二九”运动^[153]的经验、救国会的经验等,拿这些局部的经验,而且还是教条式地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是从了解对象出发。由于这样,所以始终没有解决好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对于农村妇女运动,我们现在还不很懂得。过去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求是”的工作做得很少,我们一些“有学问”的“妇女运动专家”,始终没有求得农村妇女关于纺织、文化、卫生等的“学问”。教条主义把什么聪明才智都闭塞了。其实农村妇女运动不是神秘的,只要你接近农村妇女,就能了解她们的思想、观点、呼声和需要。如何去了解呢?可以做农村调查,找农民和农妇谈话。只要我们真正为他们服务,他们是愿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自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工作,但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小陶^[197]刚到杨家湾去工作的时候,帮助老百姓修纺车,有一个老百姓拒她于门外。

当她真正替许多老百姓修好纺车以后,老百姓便把纺车送给她修,逐渐地就把什么话都讲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要真正从一个村一个乡开始,了解清楚,着手工作。如果真正了解七八个村,解决了七八个村的问题,那么农村妇女运动究竟如何搞法,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答案。再把这种经验普遍推行,就可能形成一个运动,使整个运动提高一步。这就是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这种工作非常实际,在开始时,要埋头苦干,要切实解决问题,不能浮夸,不能出风头。但在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后,你又能在全局上来指导这个运动,使群众得到一定的利益,群众就会把你当做她们的好朋友和领袖的。不实干,要出风头,跌下来,还是要从头做起的。

过去的工作,有些不实际,没有能突破一点,没有能解决问题。有些工作是赶时髦的,例如过去从延安拍发给各地的妇女工作调查提纲,是党八股式的,不能解决问题的。

总之,在过去工作中,不认真地去了解对象,不懂得从实际出发,不知道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这是一个缺点。

自然,在突破一点以后,即在少数地方取得具体经验以后,就必须善于使这种经验普遍化,使之推动全局,形成运动,解决问题,不能老是去“突破一点”。

第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⁵⁾区、敌占区的群众运动方针问题。这三种地区情况不同,方针也不同,这是大家口头上一致承认的,但到实际工作中就模糊了。在敌占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破坏(在国民党区,我们同国民党是合作抗日,但对它的一党专政与反人民政策是要破坏的);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我们的工作方针则是建设。破坏和建设这两种方针有

根本的区别,不容混淆。

在我们根据地,也有一部分要破坏的东西,例如减租减息^[144]以破坏一部分封建残余势力。当你们妇委派工作团去绥德的时候,封建势力还维持着,对这些东西就要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就是在延安,也有要破坏的东西,例如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等,但总的方针是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例如,减租减息是为了提高生产,反迷信宣传是为了建设新文化等等。有些文化工作者,认为延安还是“杂文时代”,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以为只要做破坏工作,而没有明确的建设方针。在敌占区和国民党区,也有一些建设,例如建设革命党、建设革命群众团体等,但是一切这些建设是为了破坏敌人,破坏一党专政。

方针问题,现在是解决了,但思想上是否已明确认识呢?以后是否能保证不再犯错误呢?那就不一定。我们延安和解放区,也有缺点,但这是次要的,是胜利中的缺点,可以克服的。我们这里,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小米、草鞋……虽然不好,但这些都是人民的。敌人那里也许有些好东西,但是可惜不是人民的。我们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以及敌占区的一切黑暗,大家听到那里的人民起来斗争很高兴,这是革命感情。你到底爱什么?爱人民,还是爱反革命?有些同志过去在工作中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方针上有错误。

第三,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过去工作中,有些同志群众观点不够。我们是一切为了人民,是人民的勤务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为人民服务。妇女工作者为妇女群众服

务,但一下子就要替二万万人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从几个村子、几个妇女着手。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应该建立起来。大喊大叫,装模作样,口号喊得高,样子装得象,但没有为人民做一点实事,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吧!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只要你做好事,就会拥护你。人民养活了我们,要我们为他们办事,但我们有些同志不老老实实替群众解决问题,想这样,想那样,还闹别扭。现在各根据地,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干部有几十万,做了许多的工作——建立政权、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但还要在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

群众观点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群众路线。劳苦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早已指出,不是依靠英雄、豪杰、皇帝、神仙来解放人民,完全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但我们有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总站在群众之上去“解放”群众,这是恩赐观点,剥削阶级观点。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不是英雄创造的。因此,妇女解放也要妇女自己起来。减租减息运动中,发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就是因为群众自己没有起来。

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命令主义,这是一种官僚主义,是违反群众路线的。表面看来,雷厉风行地执行党的口号与决定,但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等候群众觉悟,不知道怎样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他们犯急性病,强迫命令群众去执行。因此,一切变成形式。办合作社,就摊派股金,代农民做好户计划,但是农民则把它倒贴在门上;变工也强迫,开会也变成老百姓的重大负担。因此人民中有所谓“日伪那里罪多,国民党那里税多,共产党那里会多”的严正批评。命令主义

就是没有群众路线。

我们对群众要强调其自动自觉,任何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自觉是搞不起来的。我们做群众工作,不要以群众解放者的资格与群众见面,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你们觉悟比较高,有理论,可以把群众的经验提高一步,转而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能否解放,决定于群众自身的觉悟程度。敌人之所以能够压迫群众,除了敌人自己的力量以外,也由于群众自身的落后和没有组织。如果群众觉悟提高,就会自己起来争取解放。在群众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地教育群众,一天一天地提高群众,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法。我们的革命作风,我们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步骤,都要能够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是强迫命令群众革命化。群众如果不发动起来,我们任何革命事业都是干不出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群众的自觉与自动。

第四,必须有坚持到底、百折不回、克服困难的革命工作精神。真正发动群众自觉是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阻力,要长期忍耐地工作,要采取许多适当的步骤。如果今天搞一下,明天又不搞,事情就办不起来。这就不是群众革命性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革命性不够的问题。

要有革命精神,必须去掉“爱面子”、“逞英雄”、“出风头”、“怕批评”等坏东西。自己有坏东西,还有什么面子呢?要保持面子,就必然会使自己趋于保守。有些同志,自己没有知识,为了维持“指导者”的面子,硬要拿出一套东西到群众中去,结果祸国殃民。所以改造思想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破坏,一方面

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

如果我们真能根据上述四点精神办事,又去掉“爱面子”、“逞英雄”等坏东西,那末事情一定可以办好。群众随时欢迎实事求是的人去指导他们。小陶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她在杨家湾工作几个月,解决了许多基本问题,小陶好的地方在于没有一套主观主义的东西,而有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把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上层领导机关就要善于学习这样的经验,善于总结与推广这些好的经验,并培养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要善于做伯乐^[198],认出许多群众中的“千里马”来,并继续加以培养。

论 党^{*}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

一 引 言

同志们：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9]中,对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一个深刻的英明的分析,对于八年来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及我们党在抗战中所坚持奋斗的路线,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对于如何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制订了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伟大的纲领。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中国人民战斗的胜利的号召,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宪章。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过去二十四年的英勇奋斗中,特别在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中,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

*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一九五一年一月经作者改名为《论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九部分,收入本书的是其中一、二、五部分。

迂回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终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打出了无限的光明。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和八路军^[56]、新四军^[122]及其他人民军队,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抗日救国的重心。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规定了彻底代表中国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与革命政策,不但和中国民族与人民的敌人及一切违反中国民族与人民利益的反动政治派别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粉碎了党内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我们党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使它在和民族与人民的敌人斗争时十分坚决、十分勇敢,并且知道如何去打击敌人与如何避免敌人的打击。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的基本原则,使我们党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它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自觉的铁的纪律,有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不容许有小组织和派别活动,慎重地接收党员,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原则,都是为着领导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

目的。这些组织原则，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党章起，就体现在我们的党章内，经过二十四年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证明我们党的这些组织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我们的党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就保证着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在斗争中的行动一致，以及各种艰难困苦的克服，并领导人民获得伟大的胜利。

广大的革命的中国人民，是热烈欢迎与信赖我们这样性质的党，因为它不只是有彻底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革命的纲领和政策，而且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在严重的艰苦的战斗中，经得起锻炼，并表示了自己坚强的组织力量。灾难深重的、具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在强大、狡猾而野蛮的敌人面前，它的解放斗争，是十分严重的。只有我们这样性质的党，才能也才敢于率领全国人民战胜这样的敌人，获得解放。因此，我们今天来修改党章，并不是要改变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修改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相反，而是要根据我们党的新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三个大革命时期中所更加丰富起来的建党学说，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这些原则。很明显，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事变，为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极大地增强我们党的战斗能力及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那末，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与这些原则，乃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

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因此，在我们党的一定基本组织原则下，依据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我们党内的新的情况来修改党章，也是完全必要的。

党坚持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不可破坏性，但应规定适合于环境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以促进党的工作的发展，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与行动的统一。

我们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对我们的党章作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为什么要作这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呢？这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我们的党章，从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56]修改以后，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党内党外的情况，与十七年前比较，都有了极大的变动，党在今天又有了需要动员全党去执行的完全新的政治任务。

第二，我们党在最近十七年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必须总结这些经验，

来充实我们的党章和加强我们党的建设。

第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适用,这就造成许多党员对于党章重视不够、实行不力的习惯,因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制订完全适合于今天现实情况的党章。

完全明白,现在我们党的情况,同它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比较,都有了极大的特点。我们党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党: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它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

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在它领导之下所组织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的主力军,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依靠这支人民军队长期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并将依靠它使战后的中国,成为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

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在这里,实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并进行了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因而使这里的生产提高,民生改善,社会安定,人民文化与觉悟提高,因而动员与团结了这里的全体人民,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并鼓舞着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里是新中国的模型,是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保障。

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

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路线,业已被彻底清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业已在整风运动^[187]中被大量克服,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与路线,则在全党获得了从来未有的巩固的胜利。暗藏在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和奸细,也业已有许多被清出。因此,我们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业已空前地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这在中国全部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衡量的。

最后,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循着这条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6]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

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的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有了这样的伟大的领袖,又有了大批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并将战胜民族的和人民的一切敌人。

同志们!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这就是我们党的目前情况的主要特点。

这就是我们党业已得到的伟大的成功。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胜利。

然而,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弱点了,也不是在我们前面就没有困难了,我们还有缺点和弱点,我们已做的事业,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党的绝大部分还是处在农村中,我们的党

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虽已经过严重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们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一般还不高。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在一些同志中还没有完全克服,并且在一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妨害全党团结和统一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我们党的这些缺点和弱点,还需要我们作更重大的努力和更艰苦的教育工作,才能克服。

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特别经过了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现在是接近胜利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与准备胜利,就是要动员与团结全中国人民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沦陷了的城市和乡村,并克服中国一切反民主势力,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这个目的,就要百倍地加强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工作,提高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组织作用与领导作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人民,去迎接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斗争和空前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任务。

目前我们党的这些情况和我们党的这些任务,就是今天我们重新修改党章的出发点。

二 关于党章的总纲

我们现在制订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这也是党章的组成部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

因此,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纲,并以这个总纲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我们党有了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这个总纲,是概括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的经验,并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好的经验,也即是概括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制订的。它用简要的文字,说明了我们党的性质与理论,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以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基本方针和我们党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还说到了在我们党内不能容许机会主义存在;说到了党内的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党章的总纲内都已提到。我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一些解释。

第一,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首先就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我们党的这种性质是不是还有疑问呢?我以为没有疑问了。

还在我们党成立以前,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在其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就进行了八十年的、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的革命斗争,直到一九二一年,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国内条件(愈来愈凶的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的压迫、人民

的革命斗争与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革命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因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到现在,它已经过了二十四年艰苦、曲折而极端复杂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它不只是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局面,而且积蓄了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党从来就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

虽然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份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我们党今天的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思想,也时常经过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传达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政治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来源。然而,这种情形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由以下一些条件来决定的:

(一)我们党是在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接受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最优良的传统,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及革命以前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与中国工人运动有不断的联系;(二)党是一贯地遵循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及其所制订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违反这个路线的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其无限威信,和大批久经锻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其中并有许多是直接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干部,足以担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事业;(三)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纲领与政策,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并以这种纲领和政策独立地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实现了无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革命的领导权,并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四)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纲党章,并成为党的一个组织内的工作者,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一直保持着与加强着的,党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及不可救药、不可改造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五)二十余年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对于我们党的锻炼,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与集体的意志,加强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他们懂得在敌人面前形成全

党利害的一致,而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集中领导,并使动摇分子在严重的革命斗争中从党内不断地自然淘汰出去;(六)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

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论它是怎样大量地反映在党内,但它在党内是不合法的,并在党的教育和整风中不断纠正,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不断证明它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使它不断破产。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份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那些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

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到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是过渡的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是要分化的,除开极少数的分子走向资产阶级外,一般地要走向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当它们还是作为过渡阶级而存在时,它们在政治上可以跟自由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无产阶级走,它们在思想上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大量地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是能够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经验证明:在他们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加入我党以后,极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因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并有许多人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他们的性命。然而,也还有极少数的人,在他们入党以后,不能认真地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观点与作风,有时甚至顽强地对抗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作风,企图按照他们小资产阶级的面貌和兴趣来改造我们党和建立我们党内的生活,这就不独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且要在党内引起各种错误与分歧。这也是被党的历史经验所多次证明了的。

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他们必须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自己的主观主义、

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工作，对于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来说，当其还不完全自觉时，并且是一种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

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和我们党内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之众多，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我们党以前还是处在幼稚的缺少经验的时期，此外，还由于我们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这种情形，就给了党内没有经过改

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可能 :利用许多党员思想上的盲目性及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情绪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 ,来宣传实质上的机会主义。这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取了某些时期的暂时优势的原因。

当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居优势时 ,他们不只是在政治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而且也在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就是党内某些同志的自由主义路线。这些同志企图使我们党变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 ,反对与废弃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肃性 ,破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铁的纪律 ,集体地无分别地接收党员 ,听任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发展而不加以纠正 ,对党的敌人及暗害分子丧失警戒 ,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 ,拥护党内的散漫性和小团体倾向及自发性等。很明白 ,这将影响我们党不能完成任何事业 ,并将瓦解我们的党。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表现在某些同志无视中国的特点 ,机械地搬运外国党的建设的经验 ,并把它当作教条而加以绝对化 ;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 ,强调一切不妥协 ,强调机械的纪律 ,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 ,遇事武断 ,实行家长式的统治 ,实行“愚民政策” ,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 ,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 ,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 ,造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 ,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 ,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 ,但这种统一 ,

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一旦这种虚伪形式被揭破，就要产生党内极端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

这两种偏向，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与急性病在组织问题上的反映。

除开上述两种偏向外，还有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与盲目性，他们不知道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而只是单纯地着重从组织上建党，因而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主义。他们喜爱与奖励那些只知盲目服从的所谓“老实人”，而惧怕与责备那些有思想、有能力但不盲目服从的人。他们只是琐碎地从生活上去注意人家的小节，而不注意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从而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更不了解为了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启发与提高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的觉悟。他们只是注意党内的工农成份，而惧怕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忙于所谓组织上的“领导”，忙于开会，忙于奔跑，忙于各种琐事，但是不用思想，不能将组织上的领导提到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水平上来，而是党的组织工作脱离党的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这就是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很明白，照这种做法，也同样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并可能被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利用。

我们党对于上述各种错误路线，不断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加以克服，而一致地拥护与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和上述各种错误路线相

反，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他为我们党制订了详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着重提出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加以纠正。毛泽东同志还采取了整风这种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去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组织方法与千篇一律的滥调）。他把我们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他把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同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党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密切联系着。毛泽东同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新阶段》的下半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央关于继续整风运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以及其他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建党路线的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我们党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正确的建党路线。我们党实行了这条路线，因而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的建党路线，因而使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成功。

很明白，如果我们党采取了上述错误的建党路线，即使我们党内的工人成份再多些，也不能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政党。

我们党的主要部分之所以长期处在农村中,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最广大的农民作为目前革命中的主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受压迫,长时期内无法自由进行革命活动,乃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组织自己广大的农村同盟军,以便在适当时机配合这个同盟军解放城市。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的实际意义。在现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只有当我们党是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党才是代表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执行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时期的任务。如果我们党没有这样做,那我们党就决不能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因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与领导这个农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

党章的总纲指出了我们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当然,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

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才是中国民族的主体,只有他们的利益,才构成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目前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也同样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即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这些都清楚。

现在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

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及其与人民联系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们的代表者,纵也能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说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125]、土地

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陈独秀^[114]主义,李立三路线^[118],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116],列宁主义。而列

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有益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

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

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

在闭塞头脑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被克服之后,还须继续努力去克服经验主义的阻碍,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性质。但现在具有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则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了。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等等。

由于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又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和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但还有别的阶级可以参加革命,还有其国内外的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有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过去在党内曾经是混淆不清、发生过许多争论的,但现在已是非常清楚而确定的了。

此外,在党章的总纲上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其他许多特点,如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斗争的复杂性,在一定时期内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所有这些,今天也已经是清楚了。

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问题,过去在党内争论是最多

的,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差不多都对于这些问题有过错误的了解,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备的发展。因此,这些特点,必须在党章的总纲上加以肯定的说明。每个党员彻底了解这些特点,乃是必要的。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最好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我们党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200],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是经过光荣的特殊的历史道路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认识与利用中国这些特点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众力争解放的基础上,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大众的一切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三次伟大革命战争中,即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三次革命战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中国广大的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对敌,又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反动性进行各方面的斗

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与中国广大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历史,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又与它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建设伟大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上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建设中国近代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根据地上试验成功,借以教育我们党与全国人民的历史。

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反对党内无视或者误解中国革命这些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与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历史。

这些,就是我们党已经走过的具体的历史道路。

我们党的这种历史道路,最好地说明了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这个革命中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特点所早已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

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所以我们在党章的总纲上特别强调地说到了这些特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胜利时，这些特点，是会继续存在的。因此，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经常记住这些特点，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过去的许多错误还是会要重复的。比如，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在目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因而在政策上犯了偏右的或者偏左的各种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因而在工作中犯了过分的集中与不适当的正规化，以及工作中的简单化、一般化、缺乏灵活性等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

在精神上没有充分的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因而犯了各种形式的急性病,或在困难时悲观颓丧。由于不了解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重视军队工作,不学习军事知识的错误。由于不了解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适当地在农村环境中强调城市观点和不重视农村工作的错误。又由于不了解在某种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又可能犯忽视城市工作、拘守农村的保守主义错误。由于不了解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而采取盲动冒险及命令主义的办法等。如果我们同志只就一般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特点,那还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在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时,都能具体地照顾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所以这些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至少是目前阶段中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

第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词句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

一个显著的标帜。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201〕}。他要我们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02〕}要我们同志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203〕}，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204〕}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领会和切实执行。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而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的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

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锋队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呢?

首先,就是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公开的自发论,公开主张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论”,公开主张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是还没有的。但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们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损失或失败。此外,还有些同

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质的错误。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军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属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塌,老一套,安于现状,任其自流,丧失上进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领群众力求前进,违反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错误的意见,而跟随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后面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倾向,是要使我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不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许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们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

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作。其中最恶劣的作法,就是他们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错误、缺点和坏典型,加以批评、斗争和处罚,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统化,奖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传布好的经验,以鼓励党员和人民前进,同时即可以克服那里的错误、缺点。他们到处打击人,简单地用命令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收群众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而强迫别人依照他们的办法行动。这种倾向,是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并会引起群众对于他们、以至对于党发生怨恨。

除开上述两种倾向外,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中发生了。这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

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上,用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统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觉与自动。其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属的群众纪律,不热爱人民,而强迫、打骂人民群众,使军队脱离人民群众。再其次,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在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企图照军阀那样把军队摆在政府之上,企图以军治政。很明白,这种倾向,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之所以在我们党内产生,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分,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形成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至在我们党章的总纲上也提到了它们。将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应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清除上述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

群众的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正确地到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可能发生某些部分的暂时不协调现象,但不能设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路线却是不正确;反之,组织路线正确了,政治路线却是不正确。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

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

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只要是忠于职务并多少著有成绩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们担负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员和炊事员、饲养员等职务,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们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损失。凡属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该是正确的,这样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损害人民的利益,那就要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说,我们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们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轻率态度,而应采取严肃的负责的态度。

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即是说,我们党员接受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的责任。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做。凡对

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马虎敷衍。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党的统一是必须保持的,因为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与纪律,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与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纠正。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纠正任何缺点与错误。因为任何缺点与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147]。国际歌上说:不是皇

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由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并且举出自己的先锋队,在先锋队的指导下,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去斗争,自己去争取。然后群众才能自觉地去获得斗争的果实,并保持与巩固这种果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否则,人民的敌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144]、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利益的事,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赐”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组织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但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

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因为只有做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迫切需要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因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代替他们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因为这种脱离群众的“英雄好汉”不能完成任何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要去启发群众的自觉,要去指导群众的行动,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有预见,对于各种问题必须有预先的计算。就是说,必须是先觉者。只有先觉者,才

能觉后觉。我们同志除开完全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还必须是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启发群众自觉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向敌人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识。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育群众。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 and 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里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经验中搬运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平常的人有时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

“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

为要做到这一步,只有“为领导者和群众保持极密切的联

系,领导者和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和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保持极密切的联系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205〕}

这是斯大林告诫苏联共产党人的话。这是一条普遍真理。

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而为要使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否则,任何一件领导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有些同志只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看成是群众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群众工作,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

线,都要有群众观点。

我们党内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党的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军队本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军队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自然,各种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会、农会的工作方式,和党的、军队的工作方式,应该有所区别。但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

自然,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我们同志应从各种工作的岗位上,直接地去为部分的、具体的人民服务(如为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个机关的职员、一个部队的士兵服务,以至只为几个人服务等),而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因此,我们同志必须正确理解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间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同志必须同时具有部分观点与全局观点,只照顾部分不照顾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顾全体不照顾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部分的暂时的利益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使部分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就是说,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否则,就

可能自觉与不自觉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暂时的利益上,反对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而从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上脱离人民群众。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我们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情况

下,如果看不见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分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的。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事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启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觉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领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经验,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经验来做一般号召的内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

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关于总纲的解释,就是这样。

五 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

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中,仅有三个党员在一起,这还不是党的组织,还必须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个党员中必须有一个是组长,其余两个是组员,即是在各种活动中有一个领导者,两个被领导者,才能成为党的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

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如是就使自己的领导脱离党内的民主,脱离党员群众,并把此种状态名之曰“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导上的权力,无须由党员群众授予,而是可以自己攫取的。他们的领导地位,也无须经过选举,无须取得党员和下级组织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封

的。他们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无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经过群众去决定,而是可以独断的。他们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他们对于上级,则利用党内的民主制向上级闹独立性,对于下级和党员,则利用党内的集中制来压制下级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既不民主(对下级),又不集中(对上级)。多数通过的决议和党的纪律,别人都得服从与遵守,但他们领导人自己觉得是可以不服从不遵守的。所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些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他们都不遵守。他们认为党的法规和决议,是为那些普通人写的,而不是为他们这些特殊的领导人写的。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与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偏向,在我们党的组织中是存在着的,应该完全肃清它。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如是他们就使自己的行动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脱离党的整体。他们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地自由地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传播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播弄是非,或者在党内实行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不顾环境的严重与紧急情况,甚至利用党员群众一时在思想上没有准备的盲目状态,来表决自己的要求,利用“多数”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企图等。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与我们党的民主制

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思想的危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206]。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207]

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

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高度集中。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73]的报告中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208]从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情形是有了一些变化,不独中国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在检查工作的运动中,党内的民主已有极大的发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的深入的自由的检

讨,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发挥,因而充分地准备了我们这次大会。然而,就全党来说,就各个地方来说,党内民主生活至今还是不足的,还应该继续发展。因此,党章上有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规定。

目前我们党虽然是处在战争中,但我们的战争,是一种长期战争,在我们的技术条件和敌军的情况没有改变以前,基本上还是一种游击战争。因此,凡在游击战争中可以进行的会议和选举,都必须进行,不应借口战争环境,不必要地缩小党内民主。

在解放区,在一切可以召集大会进行选举的地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必须依照党章的规定来召集,并由大会来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党章规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除大会主席团有权提出候选人名单外,必须保证各代表团及所有代表都有权提出候选人,并保证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候选人名单,须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时须按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

党章规定:各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即是说每二年改选党的各级地方领导机关一次,那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再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来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乃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在过去是召集各种大小干部会议来检讨与决定工作问题,而无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在今后则应召集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选举只能每二年进行一次,过多的选举,没有必要,并将妨害工作,因此,除代表大会外还须召集代表会议来检讨与布置工作。这种代表会

议，每年可按各地工作需要召集一次至二次，其代表即由下级党的委员会选派。它有权撤换与补选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但它的决议和撤换与补选的委员，须经过各该委员会批准，因它比过去的干部会虽有较大的权力，但它还是各该级委员会的下级机关。

省或边区^[64]、地方、县、区的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可以轮番召集。比如，今年召集省或边区、县的代表大会，地方与区则召集代表会议；明年召集地方与区的代表大会，省或边区与县，则召集代表会议。

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较过去扩大，应将各方面负责的与人民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干部包括在内。党章规定：在委员会中再组织常委，进行日常工作。在常委委员中，亦须包括各方面负责的干部，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经常的总的领导核心。在各级委员会中，除有一个正书记外，可以按工作需要再设一个至两个副书记，以便没有缺陷地照顾全般工作。各级党的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党内的组织工作只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应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去作专门的管理。因此，凡是各级委员会比较带普遍性的工作决定和工作计划，应召集全体会议来集体讨论和决定。集体决定之后，就应分途去执行。

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着重地说到了自我批评，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要启发党员和干部对党的政策与工作的积极负责精神，要使他们考虑问题，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

见。为此,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和干部中以身作则,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万不可在遇到别人批评时,即冲动暴躁,或采取压制打击等办法。只有如此,党内民主才可顺利发扬,否则,即使按期召集各种大会和会议,仍然可能是死气沉沉的、人云亦云的、照例听报告和举手的、没有生气、没有民主的大会与会议。我们有许多同志,甚至有些负责人,至今还不能很好地领导开会,使会议开好,因此,有许多会议是失败的,或是开得不好的,有时甚至变为党员和群众的严重负担。可见单是多开会,还不是民主,还必须把会开好,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怎样使党员到会会有兴趣”的指示。

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而是面红耳赤,反口相讥,或寻隙报复,那末,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开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因此,

开展与扩大党内民主,各地党的负责人所负责任是非常之大的。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报告中,不只应该说到当前的情况和工作的成绩,而且应该说到缺点和弱点以及工作中的错误,请求自己的选举人和下级组织提出意见和批评。经验证明:许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与缺点,其责任并不能由下级组织及党员与干部来担负,而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来担负。因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造成,许多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没有及时地提出任务、指示政策,或者虽然提出了任务,指示了政策,但是没有系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或者提出的任务,指示的政策本身就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责备下级组织和党员与干部,把责任向下面推卸的现象,是很不好的,是最能使下级丧失信心和积极性的。当然,下级党委,被领导的党员与干部,如果有错误、缺点,也应一样有自我批评精神。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为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

要在党内放手实行高度的民主,决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

中制,相反,要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高度的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集中领导之下,才能实行高度的民主。认为实行高度的民主就要削弱领导上的集中,是错误的。因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党内民主,必须保证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的方向进行,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能被暗害分子、反分子和党内的分裂主义者与投机家、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党的或地方范围的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之彻底检讨与辩论,必须是有领导的,必须是在时间上允许即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须有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下级组织有过半数以上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也可以进行这种检讨。

党内的民主应该扩大,但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党章规定的这些原则,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有些同志在执行这些原则时,是提出条件的,他们或者以同意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从的条件,或者以人事上的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以及某些历史的恩怨与山头亲疏等关系,来作为服从的条件。应该

说: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应该有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组织原则,他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

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常有极大的悬殊,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采取过分集中经营的政策与平均主义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分散经营(即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是闹独立性),不是脱离集中领导,而必须有领导上的集中。在这里,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与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

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关于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上级的决议、指示,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这叫闹独立性。不管他用什么话来敷衍搪塞,这总是闹独立性,这是要不得的。第二,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指示,又不研究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是一种盲目性。这不是在认真地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而是在盲目地执行,这也是要不得的。第三,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指示。这叫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指示。只有这第三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

领导机关的决议、指示,应该允许下级和党员提出意见,提出怀疑,提出修改。如果是决议、指示真有缺点和错误,应该接受下级意见加以修正,如果是下级的意见不对,也应很好解释,把思想弄通,而决不可对下级加以错误的打击。对任何指示、决议,在请求修改后,上级仍然决定要执行者,均必须执行,不可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抗上级的决定。

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

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中央与上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必须在各地宣传,而与这些决议和政策相反的一切思想,则不应宣传。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得宣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某些地方党的组织的执行情形并不是很好的。有些报纸,对中央决议与政策宣传不够,并且有过抵触中央决议与政策的文字发生。为此,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加以检查和改正。

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布意见和决定以前,各地方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这也是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我们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而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而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凡是应该和必须由中央决定与发布的问题,各地方党的组织,不要越俎代庖,抢在中央之先来发布意见。凡关于全国性的问题,一切党的负责人,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在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前,均不得发布意见。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在当地党的委员会内加以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但是对内对外发布中央尚未发布的意见,或通电各地党委宣传这种意见,则不能允许。因为这种意见与决定如与中央意见和决定相抵触,则在党内,在人民中,在敌人面前,均将留下极不好的影响。在没有或缺少无线电的时期,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在无线电已经畅通的情形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抗战期间,中央曾经几次指示了这个问题。

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 ,党章规定 :在不抵触中央与上级决定的条件下 ,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在这里 ,上级组织的过分干涉 ,代替下级决定问题 ,也是应该避免的。上级组织向下级提议 ,帮助下级正确地解决问题 ,是必需的 ,但决定之权 ,应给下级组织。

我们党在许多地区 ,现在还是处于地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党的组织 ,必须采取特别的形式去进行工作。因此党章规定党在公开状态之下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 ,凡不适用于秘密状态之下的党的组织者 ,均得变通办理之。这个规定 ,是必要的 ,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原则 ,全党都必须执行 ,但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 ,是应该依照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 ,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一)国共谈判^[209]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5]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210]及察哈尔^[166]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211]在十二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212]、马占山^[213]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214]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70]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这是根据党中央决策起草的一份党内的指示电。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122](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215],以李富春^[216]为书记,林彪^[217]为司令员。罗荣桓^[218]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219]、饶漱石^[220]到山布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221]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以主要力量建立 东、北、西满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月)

一 十一月二十日的电报

(一)退出大城市后,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⁵⁾斗争的胜利,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从城市退出时,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搬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对铁路,除开军事上有必要者外,亦不要破坏。可以在人民中公开宣传,我们为了避免内战、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而退出城市,但我们要求东北人民实行民主自治。

(二)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²¹⁰⁾、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

* 这是给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的三份电报。

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国民党是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的。只要我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二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电报

(一)毛主席因疲劳过度,已休息一个多月,现仍在休养中。

(二)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你们只有这样做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

(三)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222]及梁、罗^[223]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全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分散与剿匪均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以上意见,请你考虑。如你同意的话,请向东北局提议迅速适当地改变若干部署。

三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电报

十二月二十四日你们关于群众工作指示,很好,望切实迅速贯彻执行。如果你们在东北今冬明春能发动广大深刻的群众运动,象大革命^[30]时南方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那样,又有十余万主力部队和二十万地方部队与之配合,那你们就不独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而且能争取对国民党的优势,否则你们在东北的地位就将是很危险的。望抓住这一决定性的环节,集中全力,加以解决,这样你们就取得了第一个决战的胜利。你们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军队不论到任何地方,必须帮助群众剿匪,帮助群众反对汉奸、特务及进

行减租、增资，群众才不会讨厌军队。军队必须用心进行群众工作，新建部队亦必须在群众工作中才能巩固起来。东北各地发动群众的具体情况，望经常电告，中央很关心这一工作进行的情况和程度。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有些地方,运动的结果,甚至实现了“平均土地”,所有的人(地主在内)都得了三亩土地。

另一方面,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逃跑到城市中,则大骂解放区的群众运动。有些中间人士则发生怀疑。党内亦有少数人感觉群众运动过火。

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

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

^{*}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展开,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中共中央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本文是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文件,通常称“五四指示”。

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的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全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依据下列各项原则,给当前的群众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一)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二)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

(三)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得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对富农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如果打击富农太重,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将影响解放区的生产。

(四)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

份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国民党⁽⁵⁾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解仲裁方式。一方面,说服他们不应该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自动采取开明态度;另一方面,应教育农民念及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属,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

(五)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

(六)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即给他们饭吃。对于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走狗之属于中农、贫农及其他贫苦出身者,应采取争取分化政策,促其坦白反悔,不要侵犯其土地。在其坦白反悔后,须给以应得利益。

(七)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同样地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我们对待封建地主阶级与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是有原则区别的。有些地方将农村中清算封建地主的办法,错误地运用到城市中来清算工厂商店,应立即停止,否则,即将引起重大恶果。

(八)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处死者,应当赞成群众更求,经过法庭审判,正式判

处死刑外,一般应施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捉人,以减少反动派方面的借口,不使群众陷于孤立。反奸清算 是必需的,但不要牵连太广,引起群众恐慌,给反动派以进攻的借口。

(九)对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机会。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们赞成我们的民主纲领,不管他们还有多少毛病,或对于目前的土地改革表示怀疑与不满,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以巩固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对于逃亡的地主及其他人等,应让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即使其中有些人回家目的在于扰乱解放区,亦以让其回家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为有利。如此,可以减少城市中反对群众的力量。

(十)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应迅速发动,务必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获得解决,不要拖到明年。但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

(十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群众已创造了多种多样。例如:

(甲)没收和分配大汉奸土地。

(乙)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佃农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

(丙)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三成或二成土地自耕。

(丁)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

农民用以上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且大多数取得地主书写的土地契约。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而和在内战时期解决土地问题所采用的方式^[224]大不相同。使用上述种种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各地可以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用。

(十二)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果实,必须公平合理地分配给贫苦的烈士遗族、抗日战士、抗日干部及其家属和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在农民已经公平合理得到土地之后,应巩固其所有权,发扬其生产热忱,使其勤勉节俭,兴家立业,发财致富,以便发展解放区生产。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凡由于自己勤勉节俭,善于经营,因而发财致富者,均应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因此,不可无底止地清算和斗争,妨害农民的生产兴趣。对于一部分有游惰情绪的人及二流子,应加以教育,使他们从事生产,改良生活。

(十三)在运动中及土地问题解决后,应注意巩固与发展农会和民兵组织,发展党的组织,培养提拔干部,改造区乡政权,并教育群众为保卫已得的土地和民主政权而斗争,为国家民主化而斗争。

(十四)凡我之政权不巩固、容易受到摧残的边沿地区,一般不要发动群众起来要求土地,就是减租减息^[144]亦应谨慎办理,不能和中心区一样,以免造成红白对立及受到摧残。但在情况许可的地区,又当别论。

(十五)各地党委应当放手发动与领导解放区的群众运

动,依照上述各项原则,坚决地去解决土地问题。只要能遵守上列各项原则,保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在—道(农村中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百分之九十二,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八),保持反封建的广泛统一战线,我们就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够在—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遵守上述各项原则给运动以正确的指导,如果侵犯中农土地或打击富农太重,或不给应该照顾的人们以必要的照顾,那会使农村群众发生分裂,因而就不能保持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道,就要使贫农、雇农和我们党陷于孤立,就要增加豪绅、地主和城市反动派的力量,就要使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受到极大的阻碍,这对于群众是很不利的。因此,必须说服群众和干部遵守上述各项原则,对于群众方为有利。

(十六)因此,各地必须召开干部会议,总结经验,讨论中央指示,向—切党的干部印发并解释中央指示;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确定实施中央指示的计划;调动大批干部,加以短期训练,派到新区去进行—工作。同时向党外人士作必要与适当的解释,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合乎孙中山主张与政协决议⁽²²⁵⁾,而且对各色人等及地主富农有相当照顾,因此应当赞助农民的要求。同时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如果此种斗争已经发生,则应劝告干部采取公平态度解决问题,以免脱离群众。

(十七)几年来,各地正确执行了一九四二年中央土地政策的决定^[226],发动了广大群众运动,支持了抗日战争。由于目前清算减租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实际上不能不依照广大群众的要求,对土地政策作重要的改变,但不是全部改变,因为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

(十八)党内在土地问题上发生的右的与左的偏向,各地应根据本指示,以充分的热情与善意进行教育,加以纠正,以便领导广大群众为完成土地改革、巩固解放区而奋斗。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全国土地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在会议上,各解放区同志就土地改革情况作了报告,交流了经验,提出今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并进行了反复讨论。同志们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实事求是,不夸张,不抹煞,有功不骄,有过不隐,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好的。因此就能平心静气,发现真理,发现错误,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土地会议有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阶段,一些观点、论点、看法和政策有缺点,甚至有错误,后来修改了。可见大会是实事求是的,也看到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是会有错误的。开始有错误,后来改了,这就对了。领导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要求领导人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是不可能的。占着领导地位的人(我们大家大小都是领导干部)自己应如此想:我说的话、决定的政策,应力求完满,缺点少,不犯错误。但事实却往往相反,运动发展过程证明总不是那样完满,原来的决定总会需要

*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刘少奇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进入晋察冀解放区,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并作了报告。这是在会议上所作结论的节录。

修改,甚至有根本的错误。下面工作的同志,要求上面的领导指示都是正确的,这当作一般要求是可以的,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领导者,古今中外都没有。领导者主观上要求不犯错误,结果也往往会有错误的。不怕有错误,只要能发现错误,寻找原因,迅速修正错误就好了。大会开得好,错误发现了,修正了,真理也发现了。我们准备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是毛主席的口号。今后要继续去发现我们的错误。《土地法大纲》^[227]等文件还可能有错误,要准备去发现,准备由历史来证明、来作结论。现在我来作会议的结论,是否对,也要由历史来证明。

—

“五四指示”^[228]后,一年多来各解放区都进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发动了广大群众。一般讲,运动得到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不彻底,即使比较彻底的地方也还有若干毛病。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有以下三个:(1)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2)党内不纯;(3)官僚主义的领导。

首先分析第一个原因,即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我们党解决土地问题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经过十年内战,我们对土地革命有了经验。抗日战争开始后,将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229]。这个改变,在领导机关讲是完全自觉的,是在一贯坚定的土地政策之下自觉地让步。到情况发生变化,让步的条件和原因发生变化时,又由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这就是去年的“五四指示”。“五四指示”是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

转变是正确的,但是转变得还不彻底。由减租减息到现在这次会议决定平分土地,中间经过一个“五四指示”。从“五四指示”以来,时间是一年零三个月。一年多的经验证明,一定要有象今天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政策,才能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五四指示”是由减租减息到彻底平分土地的过渡政策,有其历史的来龙去脉。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 and 不了。假如只根据我们共产党的了解,认为与蒋介石和不可能,与美国和不可能,因而就决定不和的政策,那就会脱离广大群众。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这不算错误,应当如此决定。今天情形不同了,全国人民认为与蒋介石和不可能了,我们党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现在党与群众的思想准备成熟了,形势也成熟了,提出彻底平分土地是适时的,不迟也不早。

第二,党内不纯。这是土地改革不彻底带基本性质的原因。党内不纯在一年土地改革中更加证明、更加暴露了。可以说,党内不纯的情况不改变,即便政策彻底也不行,不只是不能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也不能进行战争,还会使党走向灭亡。党内组织上,思想上不纯,上一次报告^[230]讲过。党内小资

产阶级自发性的弥漫,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组织上混乱等,都是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混进来,党内阶级路线、阶级观点模糊,就使得土地改革不能彻底。

第三,官僚主义。从现象上来讲,最严重、妨碍群众最大的,就是那种“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还有一种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连孔夫子都反对,我们还能不反对么?那种“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不发动群众,不启发群众,不等待群众觉悟,而站在群众头上,命令群众,这是不允许的。为“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是错误的,不能鼓励,不能批准,不能撑腰。愈奖励愈来强迫命令,愈是“完成任务”,那就不得了。官僚主义是地主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反映到无产阶级的政党里来,一些党员受了影响。还有,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觉悟和文化程度不够,使那些官僚主义者能利用群众的弱点,钻空子来整群众。所以,领导机关要小心,不要看见形式上完成任务就奖励,那样可能上大当,奖励了官僚主义。奖励官僚主义的人,也是官僚主义。今后不仅要是否完成任务,还必须考查是怎样完成任务的。官僚主义与党内不纯是相联系的,党内不纯则官僚主义更厉害。有些官僚主义者,是以国民党⁽⁵⁾的方式来统治群众。工农分子搞官僚主义,是受了地主富农的影响,要教育批评,必要时要处分,处分也是为了教育。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套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保证群众有很多机会、用各种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

二

会议上通过的《土地法大纲》,代表着今天土地政策的基本和主要部分。《土地法大纲》还要经中央修改、批准后再发给你们,可先根据此草案去准备。从草案来看,政策已彻底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路线,在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下也不变,还是这个路线。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团结中农,不仅不可以少注意,而且更要注意,一部分中农虽然抽出土地,但大部分中农得到土地。就是对抽出土地的富裕中农也要设法团结他们,必要时可设法在别的方面予以补偿,比如在政治待遇方面或分些别的东西给他们。为了使他们不受地主富农影响来反对我们,群众所采用的抽地方式要好些。个别中农不愿意抽,就不要强迫去抽。如果有的中农坚决反对平分土地,甚至与地主富农搞在一起,那自然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但斗争还是为了团结中农。

《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没有规定区别对待,但实行中可以有所区别。如对不同的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等,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区别一下好。对大地主、恶霸可斗得凶一些,对于那些愿意投降的中、小地主就轻一些。不过,要在基本上不牺牲群众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之下,在执行平分土地政策之下来区别,不能因为区别和照顾而牺牲群众基本利益或不实行平分。区别,基本上是根据群众意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在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方针下,分化敌人营垒。应该有此斗争策略。

关于打乱平分问题。一般讲,党与政府不要大宣传打乱平分,一定要照《土地法大纲》宣传,不许宣传其他东西。打乱平分,虽然有它的好处,但阻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还是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好。

对地主,一定要使他低头屈服,要监视管制起来。对不屈服的、顽固反抗的,可暂时不分给本人土地,但一经屈服就要分给。如地主坚持顽抗、反革命时,一定要严格镇压。有的富农反对彻底平分政策,甚至不比地主弱。中国富农有许多方面比地主本事还多一些,要知道,地主很难争取到中农反对革命,而富农接近中农,影响中农的可能性较地主为大。所以,对富农要特加注意。在做法上、政策上对富农与地主有些区别,以便不使他们与地主一道反对革命;如果他们反对革命,就要镇压。

《土地法大纲》经中央批准后,要与群众直接见面。各地订的细则如有与《土地法大纲》抵触的,以《土地法大纲》为依据。平分土地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自己去搞。最可怕的是群众还没有发动,还没有与地主撕破脸,仅仅由几个干部包办。苏维埃^[6]时期的经验,彻底平分土地一定要组织队伍,发动贫农、雇农组织农会,群众觉悟了才行。不去组织队伍,不提高群众觉悟,是不能分好的,就是分了也不巩固。

政策上有个问题要提一下,就是工商业问题。工商业肯定要保护。有的工商业者有土地可以分,其他不动;有些地主有工商业,工商业部分不动;有的地主把东西转移到铺子里,可以命令退出。特别是城市里,一切工厂商店,一律不动,让它去经营。

三

上面讲了一年来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有三个。今天,政策不彻底这一条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所以,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党搞好了,其次是群众队伍,群众队伍的整编决定于发动群众。整编队伍的方法,上次报告中已详细讲了,还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洗;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要进行思想斗争。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防止左倾。特别是在贯彻平分土地政策的情况下,左倾情绪在党内、群众中有很大的基础。这就是流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投机性;有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怕别人说右,故意搞“左”;党内还流传着一种“左”比右好的观点。有犯左倾错误的环境与条件,再加上土地分配方法简便,容易使我们犯左倾错误。必须搞好正面宣传:如何整党,如何斗争,如何分配,怎样搞就对,怎样搞就错。思想上必须提倡为人民做长工,要提得响亮。鲁迅先生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要甘心给老百姓做牛马,凡不愿意给老百姓当长工、当牛马的可以退党。退党有自由,入党没有自由。如果有的党员站在人民头上胡作乱为而不受到打击,领导机关熟视无睹,不设法

整顿,领导也有问题,要批评,要改正。同时,党内要表扬好的、为人民当长工的。要把表扬与批评结合起来。没有功而表扬,则是丑表功。我们是有功则表,无功则不表,有过则批评,无过不批评。有些地方单表扬是不对的。整党也要有批评有表扬。整党分为两步,一是由上而下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目的是去掉障碍,去掉障碍才能彻底实现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之后,由下而上地整上来,这是巩固党,扩大战果,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党的经常制度、正确作风建立起来,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整党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要严格,不放任,不搞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对愿意改正错误、愿意学习的同志要热情帮助,要给他们以工作和学习的机会,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要把严格与热情结合起来,放任与冷酷都要不得。“不教而诛”是不对的,要教育才行。没有讲清楚,不处分;教育了,纪律说清楚了,再犯错误就要处分。处分第一次轻一些,二次三次重一些。该处分的必须处分,否则就失去了党的严肃性。要把讲清楚以前与讲清楚以后区别开来,这是领导机关的责任。

整党中要注意清查反革命分子。我们这样大的党,一定会有混进来的国民党特务,但为数不多。对特务案子处理要慎重,凡特务案子一律不准许在下面处理,要送到保卫机关审查清理。土地改革中对反革命案子的处理也要慎重。组织人民法庭,我们没有经验,大家可以去创造。

四

一般来讲,干部在执行群众路线上(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决定政策、执行政策)都进了一步,但是还没有彻底解决。

群众观点是革命观点、革命精神,它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人民的情感都有联系。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彻底的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有创造力,能创造一切,群众是聪明的。不相信这些,就没有群众观点,就不会有群众路线。

有人以为要群众路线,就不要领导了,这种理解很简单、很庸俗。一切领导,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都要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所谓走群众路线,就是领导者走群众路线。问题是领导决定政策、考虑问题、决定办法时,要有群众观点,要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我们的群众路线即马列主义的阶级路线。所以,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立场,才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党性不纯的人不可能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离开群众路线,党的政治、组织、军事及其他一切就不可能有正确路线。决定政策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执行政策也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一切政策的决定、修改和执行,口号的提出与转变,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比如,十年内战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到抗日战争时期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是从群众利益出发决

定的。“五四指示”也是从群众利益出发决定的。今天彻底平分土地,对解放区群众有利,对自卫战争有利,即对全国人民有利。

决定政策的方法,是从群众中来,政策决定后,要拿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拿到群众中去执行。对的,就有群众拥护;错的,就没有群众拥护。群众反对的、不拥护的,就有问题。我们的政策,唯一目的是为了群众利益。政策要群众自己去执行,但我们先锋队要领导,不要包办代替。群众没起来,去代替群众,是不对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必须有领导,对群众中的错误意见,要说服教育。不是说,不要包办代替就什么也不做了,尾巴主义、自发论也要不得。

五

方针政策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贯彻执行。这次会议决定的政策,可以全部适用于比较巩固的解放区。在特殊地区、游击区、战区和新区,可以特殊一些,务使适合于当地的环境,不能机械执行。

青年团问题,由中央决定后就着手去办。头一步要选择和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在土改中把青年团下层组织形成起来,选择积极分子加以训练。中央局、区党委要选择一批有群众工作作风的、虚心的、能接近群众而没有官僚主义毛病的青年干部去做青年团工作。

妇女工作要重视。妇女工作是党的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必须注意去做。经验证明,单靠女同志把妇女工作做

好是不可能的,应当由全党来做。土地改革中要进行妇女工作,根据妇女觉悟程度决定政策,采取办法。妇女婚姻自由的主张,我们共产党应该拥护,现在慢点讲可以,但不能不赞成。婚姻自由是妇女的基本权利之一。贫雇农一起来之后,不只是打倒地主的权、财权、地权,还要打倒夫权,这是今天妇女解放的一个条件。

生产问题。董老⁽²³¹⁾讲了,我赞成。同志们在土改中,要调查土地情况,村财政要整理好,其他负担方面也要搞好,但主要是组织互助,把生产力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

军队问题。土地改革后群众有了新气象,党有了新气象,军队也应有新气象。在部队中要给翻身农民撑腰,要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军队必须参加土地改革,军队有很多人,有很大力量。军队里边有许多好作风,地方要学习。军民关系搞好就是增加了战胜蒋介石的力量,军队打了胜仗,也增加了地方力量。

最后讲几句。实行这样的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整顿党,整顿作风,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了把土地改革这一基本任务完成。解决土地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蒋管区有三万万多人口,比我们多,但蒋介石那里农民没有翻身,在反对他,在他的脚下安了“碾子”。我们这里农民翻了身,我们脚跟站得更稳了。这样,就将使我们与

蒋介石在力量对比上发生根本的变化。他那里有三万万人,但没有人拥护他,还反对他;我们有一万万五千万人,群众自动参军参战,人力、财力、物力是无穷的。晋冀鲁豫那里,刘、邓⁽²³²⁾带走五个纵队,又组织五个开走了,现在又在组织五个,几十万人参军。负担问题也是一样,农民翻了身,生产提高,从前出三斗公粮还嫌重,现在出六斗也愿意。只要一万万五千万人翻身,我们的力量就比蒋介石大,后备力量就比他大得多。晋冀鲁豫现在仅有七百万人彻底翻身,即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今后搞他七千万或两个七千万,力量是不可限量的呀!中央苏区⁽²³³⁾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战争,抵住了蒋介石,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搞。土地改革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尽的。几个县搞好就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搞他三百个、成千个县,农民都起来革命,蒋介石有什么办法,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解放区搞好了,蒋管区群众也要起来。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屎尿撒尿。这两个条件我们可以做到,做不到就不象个共产党的样子。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我们有信心能做好。大体上半年可以完成一个大概,以后再仔细搞。我们党内虽然有些不好的现象,要洗刷、批评,但多数同志是好的、忠实于人民的,因而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一定能够战胜蒋介石。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同志们：

很久以前,就想和你们做新闻工作的同志们谈一次话,我过去只和新华社同志谈过,和多数同志没谈过。谈到办报,我是外行,没办过报,没写过通讯,只是看过报,因此,你们工作中的甘苦我了解得不真切。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可以向你们提点要求。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

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磨擦。因此,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要受历

^{*} 一九四八年九月间,中共中央为了改进和加强新闻工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进行学习。这个谈话是在这次学习的集会上发表的,通常称为“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史的处罚。

新闻工作很重要,党很重视这个工作。党历来的文件、书刊都曾说明党报的重要性。《联共党史》^[146]说了党报的重要性,说明它组织和团结了群众,起了指导革命的作用,而且说它是“中心”。俄国在创立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列宁认为,要首先搞清思想界限,宣传党应该如何建设,方针是什么,路线是什么,然后再来建党^[234]。原则问题没搞清楚,建党建不好。如何把原则性的问题搞清楚?办报,办全国性的报纸,使报纸起中心一环的作用。

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235]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美帝国主义,我们是从来不怕的,原子弹,我们也是不怕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手无寸铁,就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足怕。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分析的结果,知道它们要死亡的,无产阶级硬是要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的。但是,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因此,我们到处宣传这一点,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宣传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和群众密切联系,而且不断地巩固扩大这种联系。现在,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百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甚至有人说,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

我们所说的和人民群众联系,主要是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而且我们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

这是讲联系群众的重要性。那末,怎样联系群众呢?怎样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呢?

列宁说,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是的,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军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人民代表会、合作社等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没有这些桥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断了,党和人民之间就有了鸿沟,因此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

报纸要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

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有的同志说,做新闻工作没有兴趣,没有味道,担心是不是有前途。很明白,这是不懂得你们工作的重要性,自己轻视自己。当然,除了新闻工作,还有别的重要工作,打仗、生产都是重要工作。不能这样讲,“只有我重要”。要了解,除开前方有军队打仗,后方有人办工厂,有人做党的工作等,还需要你们,这是必要的社会分工。

党是依靠你们的。党怎样领导人民呢？除了依靠军政机关、群众团体领导人民之外，更多更频繁的是依靠报纸和通讯社。现在我们铁路不大通，邮政也不大通，和广大群众通点消息，就靠新华社、广播台了。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

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人民想和中央通通气，想和毛主席通通气，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许多人不会写字，邮路不通，电报不通，见毛主席很难见到。本来天天见面就好了，可是办不到。你们记者是要到各地去的，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

我们的报纸现在有几十种，将来全国会有几百种，如果能比较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反映出来，那不知会起多大的作用。你们要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真正的情绪和要求，看他们反对什么，拥护什么，要求什么，把这些东西反映出来。不相关的人看看也许就算了，相关的人就会好好注意，就得到了你们的帮助。我们要了解群众，向群众学习。不经过和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不经过人代会，不经过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危险得很。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

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因此，你们做得好，对党对人民的帮助就大；做不好，帮助就不大；如做错，来个“客里空”^[236]，故意夸大，反映得不真实，就害死人了。因此，这是个很严肃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地从事你们的事

业,要对党对人民有很大的责任心。搞“客里空”是会受处罚的。有些资产阶级的记者是靠拍马屁吃饭的。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喜欢别人吹拍的戈尔洛夫⁽²³⁷⁾呢?有的。你批评他,他不高兴,你给他吹吹拍拍,他高兴了。因此,“客里空”还有点地位,因为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影响,“客里空”还能靠这点残余吃饭。不过这不可靠,哪一天一说整党,就糟糕了,靠资产阶级影响得彩的“客里空”一下子就不行了,这是他们应该有的前途。不靠广大人民吃饭,不靠真理吃饭,你的事业就靠不住。如果你的事业建筑在人民利益与真理上面,那才是可靠的。这样,即使你批评了别人,吃了人家一顿骂,也不要怕。只要我们的工作建立在党的路线、方向上,即便一时不得彩,也不要怕,要能坚持,要有点硬劲,要有点斗争性,要象鲁迅那样有骨头,没有骨头,是硬不起来的。为了人民的事业,你们要经得起风霜,要经得起风浪,要受点锻炼,要学得经验。你们不受多次波折,怎么能锻炼出来!

你们就要出去了,要到群众中去了。听说你们在这里学习后,把握增大了,信心提高了,这很好。又听说你们感到知道的东西很少,担心下去会碰到困难,把握还不够,信心还不高。你们还年轻、幼稚,还不成熟,还不能自立,这些党是看到了的。怎么办呢?要不断学习。你们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看国民党⁽⁵⁾的报纸,看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人家有许多东西不比你们写得差,甚至还好些。如果你们的工作完全建立在这三个星期的学习上,那是不够的。你们要看一看,做新闻工作需要些什么条件,需要些什么知识,自己必须独立学习、努力学习。这样,你们就有了主动性。

你们的工作还没有上路,我的估计是这样子的。你们的工作还有些象豆芽,还在生长的阶段,但是生命力很强,将来是会上路的。那时你们对工作就会是熟练的、顺手的了。党老早就办报了,办报的人还没有上路,这是不是估计过低了呢?如果估计过低,那就对不起了,如果估计得对,你们就警惕。

为什么说你们还没有上路呢?这是有理由的。共产党办一件事情,要重新创造,要积累经验,一时办不好,并不奇怪。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比资产阶级落后。资产阶级办报是经过好多年才上路的,把办了几十年的《申报》⁽²³⁸⁾和刚办的《人民日报》⁽²³⁹⁾比较一下,我们进步并不慢。说我们进步不慢是不是就要骄傲呢?不是的。你们是给人民办报,是人民的记者、通讯员,人民给你们的任务,是否都已办好了?还没有,还没有上路。我是就这个标准来估计的。

你们要有主动学习的精神,独立地把你们的事业做好。这三个星期的学习,当作一个开始。你们要根据这个方向努力学习,创造条件,增加知识,把工作做好。

你们过去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曾经犯过错误,在人民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可是我们没有责备办报的同志,更没有责备你们,因为这怪不得你们。依照你们现有的条件,还不可避免地犯些错误。这怪我们没有把新华社、报纸掌握好,我们是批评自己的。但是应当向你们讲清楚,你们过去做错了许多事。过去的责任不追究,要追究的话,我们负责。

我们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成熟起来,我作为一个读者把这个要求提出来。你们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

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

为了把工作做好,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

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你们要了解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动态、趋向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人民包括各阶层,要加以区别。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看各阶层人民有什么困难、要求和情绪。要采取真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采地反映出来。“精”,就不是拉杂;“采”,就是漂亮,挂点“采”,读起来爱读。你写得不“精”,人家看不了那么多,你写得不“采”,人家不愿意看。所以要拣重要的写,重要的就是“精”的。要做到真实,就要全面,缺一面就不是真理。

你们写东西要考虑对象。这就是说每写一篇稿子,就要考虑这篇稿子大体上是写给谁看的。要区别全国与地方。你写给新华社的稿子,是面向全国的,包括蒋管区,而且还有外国人。你们就要考虑,他们需要什么,哪些东西多了,哪些又少了。如果你写一篇太行的通讯,要给各解放区看,就要估计到他们对太行需要知道些什么,怎样写才使他们更有兴趣。如果是报道经验,就要考虑太行的某一经验有无一般性。各解放区都适用的经验,哪怕只是一个村的,他们也要看的。有的经验并没有一般性,只适合太行用,那就不要详细介绍,人家不看,因为他们那里没有这个问题。

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

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绝不要添加什么,绝不要带着成见下乡。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要提出来。这是不是不相信党的政策呢?不是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马列主义的领导,应该如此。因之,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当然,有的是不宜发表的。你们要从各方面去考察,用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自己的判断。第一是真实,不要过分,再就是全面、深刻。

说到全面、深刻,应该说,不深刻不会全面,提不到理论高度,是不会全面的,那只能是零碎的、现象的、无系统的。全面,就要综合,要总结,要提到政策、理论的高度。提不到理论高度,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理论的东西就是要“透”,不是光说明现象、皮毛,而且能说明内部的联系。

要全面,就不要笼统地讲,得分析。一个政策在执行时,要看各阶级、各阶层有什么意见,各种人有什么意见,看这个政策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怀疑。如果该拥护的却反对起来了,就要看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执行的问题。你们的责

任,就是要从各方面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下判断。考察不清楚,就没完成任务,你的通讯人家就不会相信,因为没有材料,没有分析。问题不在于人家是不是相信,而在于你是不是把事情搞得清楚。你们应敢于说:“相信我的通讯吧,不会有危险的。”你们要负起这个责任。

你们去访问,不论访问什么人,要得到群众的真心话,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新闻记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很少有人对他们讲真话。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记者,所遇到的不会这样了。但即使如此,如你问群众,今年的公粮怎么样,所得的回答是“很好很好”,你就报道个好,这不一定真实,因为你听的是表面的话。你们要和群众深谈,要从各方面考察,找出普遍现象,否则,这种反映就不真实。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群众就会拥护你们,你一到那里,群众就会找你反映情况。那时,记者在群众中威信高的、低的,影响大的、小的,就看出来了,现在还看不大出来。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党和群众会报答你们的。但是,这是结果,不能当作目的去追求。如果你着急,马上想搞一个全国出名,那只能是“客里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你们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式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做工作。

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凡不愿独立地做艰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你们要切记这一点。艰苦工

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人家叫你们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行的。你们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就要到处去看,去问,就要读马列的书,做许多研究工作。光靠在这里学习三个星期,下去还不能把事情做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比方说,有时从群众中听到一句话,这句话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意思,下个判断并不容易。没有经验,没有理论上、方法上的修养,就没法判断。有的同志说,过去走了“干部路线”,现在要走群众路线,只提倡群众当家,反对干部当家。哪里会有不要干部的群众路线?那只能变成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群众怎样当家?总要选派代表吧,不能几百万人一齐当家吧,干部还不就是他们的代表。许多同志认不清这一点,把群众当家和干部当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独立的思考,不能在分析之后加以正确的判断。

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要做马克思主义记者,却不大懂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

有的同志在北平时写得很多,很有人看,可是一到我们这里,写不出来了。他们说没有“自由”,一篇稿子改来改去,把“创造性”给限制了。不是的,如果你写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当然要限制,必须限制的。比方,你写一篇文章,倒是生动活泼,但内容却是只要群众当家,否定干部的作用,这种“创造性”是要限制的。问题在于你当了党报的记者,不是在北平墙报上、不是在《大公报》⁽²⁴⁰⁾上写文章,这一点要搞清楚。在蒋管

区写东西,有百分之三十的马列主义,群众就欢迎,呱呱叫;在我们的报上如果有百分之三十的非马列主义,就得挨骂。

你们缺乏经验,特别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看问题不是马列主义观点,而是别的观点,比方小资产阶级观点等,这样,写东西的盲目性就很大。

因此,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你们学习这些,不是看一遍书就行,而是要不断地学,直到能够运用,有能力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那时,写东西就自由了。不熟悉马列主义,就不自由,你们现在还没有获得这种自由。共产党记者最可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在这方面,你们特别缺少。所以,要继续学习,不只要三个星期,要三个月、三年、三十年,努力把马列主义学好。

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自己不懂的问题,应当勤问,可以写信问你们的上级。不懂得党的路线,是搞不好工作的。你们还要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办报。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批评左的倾向,又批评右的倾向。这是基本的方法,马列主义的方法。不否定左和右的谬误,就没法肯定真理,要确定真理,就得否定谬误。

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点,这里就表现出你们的创造性了。你能了解群众的真正情绪,他就不能;你能有力地宣传党的政策,他就不能;你写得真实、精采,他就不能;你能发现党

的政策缺点,他就不能。你的创造性就表现在这里,党不是限制而是鼓励这种创造性。但是,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任其泛滥。写这些东西的人说是发展他的个性,其实是发展他那个阶级的党性。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个性,如果你有接近群众的个性,有全面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心理之个性,这是好的。如果你讨厌群众,有喜欢反映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之个性,那是不行的。

具备了以上四个条件,工作就可以做好。但是,你们现在还不够,还要学习。当然,如果感情还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那里,那就不只是学习问题了,不过学习也会好些。相信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即使有点地、富、资产阶级观点,也是不自觉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改造自己,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学会接近劳动人民的本事,加强马列主义的修养,熟悉党的路线政策,不怕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把人民的新闻工作做好。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同志们：

学校开学已经很久，我还没有来过。以后想和同志们多谈一谈，不知能不能做到。我们学校要办下去，大家可以安心学习。学习时间定为一年半，课程也规定了，大致分为三个学期。有的同志担心，怕中途调走，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让你们尽可能学完，中途不调动。但世界上的事情不是绝对的，个别的人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能调走。一般地说是调动，让大家学完。

有些同志要求讲讲形势。现在中国的形势发展很快，政治形势的中心点，即战争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北平很快就可解放。去接收的干部，正准备赶往北平。南边还包围着蒋军的主力，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黄维^[241]等四个主力兵团可能被消灭。把在北平、天津及徐州的两股主力解决之后，蒋介石就没有主力了，中国局势就算“天下大定”了，长江以北军事上

^{*} 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具有理论知识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仍沿用延安的马列学院的名称，刘少奇兼任院长。马列学院第一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沟口开学。

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了。此外就是过长江了。胡宗南^[242]、白崇禧^[243]不是主力,明年过长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呢?不可能。例如,美国会不会开兵来干涉?大量开兵,开一二十万来干涉中国革命,美国是不敢的。因为开来军队,不但可能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会使中国革命更要大大发展。它很怕和我们打一仗。如果打起来的时候,我们俘虏它一些人,或消灭它几千、一万,它怎么办?不打下,帝国主义面子上不好看,打下去,它受不了。所以现在国际形势很好。不久,平津解放和徐州战役结束后,我们将休整一下,明年再过长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定了。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窗外事可以问一问,但不要因此不安心。现在你们只有一百多个人。虽然工作上需要干部,但抽出一部分人,挤出一年半时间专心学习,却很有必要。工作会因此有点损失,但不大。这一年半的时间,你们学马克思主义,学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

为什么要办马列学院,为什么要学马列主义呢?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学行不行?少学行不行?不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44]这是列宁的有名的话。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

了很多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蒋介石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艰苦奋斗,这很好。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就整个党来说,我们是不是有个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呢?是的,是有理论的,而且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党。党中央、毛主席的马列主义修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多数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马列学院办起来,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做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例如,一下子农业社会主义,一下子又是地主富农思想,一下子又是资本主义思想。做了一些工作,有成绩是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即犯过些错误。只要真正多少做过具有群众性的、在革命中起过些作用的工作的人,都懂得自己有盲目性,犯过错误。经济工作中犯过错误,土改工作中犯过错误,组织工作中犯过错误,就是因为有盲目性,缺少知识。很多同志现在也许还不了解,到毕业时就会知道,过去犯的那些错误,是马克思、列宁早就在原则上说过了的。

有些同志希望多听报告。这不是坏事,但有点依赖别人学习的味道。你们的意思好象是说:读过马恩列斯的书的同志,讲给我听,我就可以不读了。这是懒汉的精神,想依赖别人。这种精神,是与共产党员的精神不符合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列宁讲过,要认识一个复

杂的问题,要认识一个真理,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的精神和工作是不可能的^[245]。必须有自觉的、艰苦的、独立的工作,要自己搜集材料,分析材料,否则要了解真理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也讲过,我们不能希望马克思在几十年前就把几十年后的事情都做完,把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246]。他们总要留一点事情给后人做。他们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很多,你要做起来,就不太容易,就是相当艰苦的工作。自己不进行独立的艰苦的工作,要想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主要是靠自己。听报告,听教员讲,只能得到一定的帮助,不能完全依赖听报告和教员。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对。只努力而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自认为学到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

很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党中央、毛主席都研究过,很多理论问题在原则上几乎都已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读这些书,了解这些知识。至于很多具体问题,是不是马克思都给我们解决了?例如接收北平这类具体问题,是不是都给我们解决了呢?如果这样要求,就是教条主义。接收北平的具体方法、具体组织、具体形式,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30]失败后,有些同志看了“两个策略”(即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看,许多问题列宁早已解决了。如果当时看了“两个策略”,从建党、国共合作问题上好好研究,我们就不会在国民党^[5]、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毫无思想准备。后悔的事多得很,土改中又发生后悔,后悔一九三三年划分阶级的文件^[247]为什么不早看。我们现在要做到不是事后后悔,而是事前有准

备、有研究。

你们做过很多工作,也犯过一些错误。现在也许不懂得,到毕业时就会知道,没有理论是不行的,不学马列主义理论是不行的。

过去办过马列学院,有毛病,有教条主义,已经批评过了。现在又办起来了,要办好,办下去,一班完了,二班、三班还要来。中国党有三百多万党员,面临的情况复杂,再加上解放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情况更复杂,没有高深理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现在中央提出一个任务,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不久即将发出指示。开办马列学院也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将来还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依靠马列学院去使全党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你们不仅要学习模范,而且要帮助全党学习。比如你们的文章、你们的刊物、你们的学习心得,可以拿来帮助中央去指导全党的学习。教员、学生也都有此责任。马列学院是高级党校,将来还打算在东北办一个分校,还要办中级党校、初级党校。这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办法。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方法,例如在职干部学习、写文章、办报纸等,都是提高理论水平的方法。但马列学院有特殊作用、特殊任务,而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办的,一定要用它来培养一些干部,使他们懂得马列主义知识,把工作做好。

有人会说:“我不读马列主义的书不行吗?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但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

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248]曾与魏徵^[249]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如在党内反对地主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等,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否则,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

有的同志担心,过去马列学院有教条主义,将来恐怕又搞教条。这种警戒是有好处的。有没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呢?任何时候都有的,今天有,以后还会有。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总是存在的,要是人们不犯主观主义,就没有唯心论了。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主观主义。我们自觉地警戒,就能够少犯或不犯。但是,如果怕犯教条主义,就不学习了,不进马列学院了,这也有危险性,这叫做经验主义。现在党内思想上主要的偏向、危险性到底偏在哪一方面呢?偏在经验主义方面的多,经验主义是主要偏向、主要危险。不学习就要犯经验

主义，而且已经犯了，就是那些怕犯教条主义的人，他就有经验主义的偏向，因为他怕犯教条主义，便不学习了。自己已经处在经验主义偏向的危险中，还不觉得，这就不好了。事情有些为难：不学是经验主义，学了又是教条主义，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既不是教条主义，又不是经验主义，布尔什维克^[16]的可贵就在这里。土改不能左，不能右，是不容易的。既要走群众路线，又要不犯尾巴主义，是不容易的。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工作，要找到真理，找到正确路线，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学习，要努力。各种问题都是一样。现在经济上右的、左的问题又来了。搞资本主义那是右，马上搞社会主义那是左。既不能搞资本主义，又不能搞社会主义，事情就有点为难，要克服这个困难。不怕这些为难，才是布尔什维克。学习马列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做了很多事，不读书，怕犯事务主义；读了书，又怕犯教条主义。任何事情都有两条战线的斗争。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犯经验主义，又不犯教条主义。两条战线斗争，这是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经常进行的、不能离开的。

有的同志说：“要联系实际，就要到村子里去工作。”联系实际有很多方法。到村子里去，是一个方法，但还有更多的方法。马列学院也能联系实际，是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

读马恩列斯的书，就是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马恩列斯的书籍中，论中国的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讲的外国事，写的外国材料，分析的外国历史。

有的人认为，何必学这些外国东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要认识中国革命经验与世界革命经验的关系问题，必须都学，废弃一面是不对的。废弃中国革命经验，就是“言必称希腊”，就是教条主义。也有些人认为凡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五四运动以来，不但党内，就是党外，也是如此。整风⁽¹⁸⁷⁾以后，党内在这方面纠正了。现在发生的问题，是只学中国的，不学外国的。学不学外国革命经验的问题，就是学不学马恩列斯理论的问题。

中国是个大国，将近五万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几乎等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和人口。有人说：“欧洲是出马恩列斯的地方，但欧洲还有一部分地方革命没有胜利，中国没有出马恩列斯，革命却胜利了。”是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的胜利，对其他地方影响甚大，是一件大事。但是，只有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不吸取世界革命的经验，就不但不能担负世界革命的任务，而且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请你们看看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中的第三条⁽²⁵⁰⁾，他告诉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来指导各国自己的革命，但是这一条中的最后一句话说，必须参照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这一句很容易被忘掉。没有这一句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删掉呢？不能删掉。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验、历史经验。例如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就是研究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²⁵¹⁾和苏维埃⁽⁶⁾制度的经验而提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而且是世界革命很大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

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学西方史?不学行不行?不学不行。因为学西方历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毛主席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理论,就是为了使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既要有实际经验,更要有理论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中国经验,又要有外国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经验主义者则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

有同志又问:“没有外国经验,土改、军事我们也搞了些,而且有成绩,为什么不行?”是的,以前你没有这种知识,但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中却有,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们还有个缺点,就是如果中央写错了,你们也看不出来,照着错的做。人家写错了,你看不出,你只能照样做,那是不够做领导工作资格的。你们凭个人的一点经验去做革命工作,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也是不够的,那就好比是只能在地上爬行一样。当然,你们曾做了好多事,也有的做得好,但还是不大称职的干部。你们在正确领导下就能做对,没有正确的领导就做不对,不能独立决定方向。季米特洛夫^[188]讲干部四个条件^[189]中,就有一条,要能独立地决定方向。你们不能如此,就不是称职的干部。如果要算个好干部,够资格做领导工作的话,那就要

能独立决定方向。要有中国知识,又有外国知识;要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经验。过去工作做得不坏,假如学了理论,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使工作更前进一步。否则,就有一种危险,就是要后退一步,因为中国革命胜利了,情况更加复杂,不能前进,就要后退。

外国经验怎样运用呢?毛主席讲不能“言必称希腊”,斯大林说是参照,所以不能拿外国经验硬套。不是套,而是参照。例如关于合作社问题,要根据中国情况,参照外国经验,作具体分析。要这样去运用。

学习国际经验,现在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无比丰富,解决了世界上许多大的原则性问题,如民族问题、工人运动问题、秘密工作问题等等。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要认真学,学得好就站起来了,不爬行了,过去未想通的,现在可以想通了,眼界宽阔了,天地大了。

有的人说:“地理、历史以前学过,又来学,不必要。”我们考虑过,还是学一下好。过去学过,现在再学,也没有什么坏处。过去在北平学习历史、地理,和我们这里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分析。有的同志未学过史、地,学一下更好。不学地理、历史,你就“理论不起来”。你说你的历史知识够了,就考试一下,结果证明,还是要学。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

有的同志认为规定的书太多了,读不完。我以为最好还是把它读完,紧张一点。

我看了你们的卷子,许多同志文化水平不够。要学习理论,文化不够是一个缺陷。因此,为了学马列主义,学习文化是

必要的。以你们现在的文化水平看来,要真正学好理论,有许多同志是不够的。有些同志大学毕业,但写的文章就是不通。写文章,字也要写正当。你们写的很多字,我就不认得。写字也要搞点“纪律性”,否则是无政府状态,主观主义,乱七八糟。这叫做不尊重民族语言的传统。毛主席曾挖苦过写“工人”二字弯两弯、加三撇的人,说他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不管别人懂不懂,叫做主观主义。这些现象要批评一下。最近各地写来的报告,审查之后,大错没有,小错一篇中可以找出一百个。语言不通,名词的解释不同,一件事就各有各的解释,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和农民不同。怎样才能使语言共同起来呢?就是要学习写文章,否则你们出去工作难以动笔。多写文章也能帮助读书。不但要学习写理论的文章,而且要注意写现实性的文章。写文章也是你们学习好坏的标准之一。学校要用正规办法,要考试,将来毕业要准备这一着。初级、中级的党校,也要一步一步地正规点,办下去,将来党内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

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毛主席的报告^[252]很好,许多同志的发言也很好。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土地会议上主要是反右,也批评了、反对了“左”,但做得不够,积极想办法防止“左”做得不够。看到了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也提出了批评,但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

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现在讲讲城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城市的接管问题。接收城市的问题,现已大体解决,虽然仍有些毛病,但已能接收得使人民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问

^{*}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这是在会上的发言。



农民接近起来了。

(三)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在管理城市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谁、做什么的问题,毛主席的答复是依靠工人,发展生产。

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5]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1)关于保障工人生活。人民政府应给工人以可能与必要的优待。例如当物资缺乏时,除保障军队生活外,第一就是保障工人生活,要使他们生活水平比我们后方机关职员较高。自然,工人过高的要求,片面追求福利,那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批驳过了。但因此而疏忽对工人生活的保障,对工人生活漠不关心,那更是错误。在极端困难时,工人生活虽苦,而我们的生活更苦,那我们就有理由说服工人,取得他们的谅解,获得他们的支持。陈云^[253]同志在沈阳对工人讲,不仅工人烧碎煤,我们也烧碎煤,好煤拿去开火车运军队打仗了。好煤是用来开火

车对呢,还是用来烧火对呢?工人知道了这些情形,就没有怨言了。陈云同志这样讲是很对的。

自然,共产党要为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而斗争,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给工人阶级以希望,那末工人就会说,国民党时代如此,现在也如此,你们与国民党一样。我们必须宣传,将来工人生活是要改善的,现在生活苦是为了战争,为了建设,为了将来。

目前,有许多农民说,工人生活好,不出差,不出公粮,这不公平。这些话,有其部分理由,但不能完全同意。另一方面,工人也说,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什么?工资未增加,工时未减少,种种情况与过去差不多。这也有部分的理由,但应向未来看。当然不能象对农民一样,允许工人“工者有其厂”,但应注意宣传解释,到将来一有可能,即要改善工人的生活。

工资问题,现在仍未解决,到北平后就要召集全国的专门会议,或先从某一个企业部门研究解决之。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大家注意。

(2)关于教育工人问题。我们一进城,即应着手进行教育,要以几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开展广泛的职工教育,开始着重于工人。对于旧的行会组织,应加以改组。对于旧职员,则应区别企业职员与政府职员之不同。企业中的旧职员,基本上不动。旧政府机构是要打烂的,可以留用的旧职员,一般也要调离原机关(除特殊技术需要者外)。原封不动地保存旧政府机构是不对的。

总起来说,不管是职员、工人,均应加以教育,着重的

是政治教育。方式是多办短期训练班，一两个月毕业，三四个月毕业；再就是上大课、夜校等。开始一个时期，上大课是主要的。李立三⁽²⁵⁴⁾同志说，沈阳解放以来，住过训练班的职工有三千人，上过大课的有三万人。至于留用的旧职员，当然应受训练。

我们现在许多训练班的教育内容，多着重于政策。政策是要讲的，但对于唯物史观的教育忽视了，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传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缺点。俘虏兵经过诉苦运动，一个星期就变了，掉转枪头，英勇杀敌。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诉苦运动，也是这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都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尽管讲政策，但一遇到严重困难就站不稳了，就不能坚定不移。这是屡试不爽的。在对工人进行教育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必须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平津解放后，进行教育的条件是很好的，工人有充分的热情，找我们上大课，虽然下工后很疲劳，上大课还是来。如果进城半年还不搞教育，工人热情就会冷下来。所以要趁热打铁，大办工人训练班、短期训练班，选择优秀分子，办工人政治大学，象东北那样，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组织工作。课程大约就是这四门。

经过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工人，至少是工人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提高觉悟。接着就要搞职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原则上党在工人中应大量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工

业，掌握城市。工人政治觉悟提高，组织上有了工会，还有大量党员，那末工人群众就成为最可靠的力量，并且同我们互相了解。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长时期内，我们和工人群众是被隔离着的，彼此生疏了。我们许多负责干部不了解工人，工人也不了解我们，他们急于要了解我们。所以，负责同志进城后就应该和工人见面，向工人讲话，和工人接近，真正互相了解。

(3)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全国总工会应该发一个关于组织工会的决定。全国产业工人有几百万，连手工业工人在内则有千万。应规定只有出卖劳动力为生者才可以加入工会，而不要把小手工业者也搞进来。可以组织几个大企业的全国性的工会，如铁路总工会等。原则上要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到工会中来。

工人代表会的方式很好，凡有三百个职工以上的工厂、机关，均可成立代表会。机关、工厂的代表会合起来，就是市的工人代表会议。

城市的工人代表会议，可在工会成立以前就成立，开始是讨论工人本身的生活问题，逐渐到工厂的生产问题，再到市政等问题。市工人代表会议可作为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一个步骤。市政府的工作计划和意见，均可向市工人代表会议报告、解释宣传，让代表们讨论。工人代表会议搞熟练了，然后搞学生的、街道市民的代表会，搞几个月，搞年把，再发展到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

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主要组织制度、组织形式，有整个的代表会的系统，由代表会选出各级政府委员会。这就

是民主的形式，是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的、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种主要的经常普遍运用的形式。厂长的行政命令在工人代表会议上通过，取得同意，而后下达，则容易贯彻得多。各地应抓住代表会这一形式，大量地搞。大革命^[30]时期我们没有搞，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也搞得不多，现在不能再拖了。如再拖迟，就不利于反官僚主义，不利于有力地克服行政命令中的一切毛病。现在各地应成立人民代表会议。

总之，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撑我们的腰。于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产党，相互依靠，我们与工人群众就结合起来了。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

(一九四九年六月)

一、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一部分地区已结束。没收官僚资本及改革土地制度一部分已完结,其余亦将完结。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

二、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

三、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我国大部地区的经济,比东北要落后得多。但在改革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经济特权以后,我国的经济将会很快地恢复和发展。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应该怎样和采取什么路线去发展经济呢?

四、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⁵⁾统治以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

- (1)国营经济;
- (2)合作社经济;
- (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 这是一份党内的报告提纲。

(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此外还有一些纯粹的自然经济，但意义不大。

五、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合作社经济今天还很少，但可以很快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很少，但可能在一个颇大程度上去组织。国营经济则在接收全国官僚资本后，以及在将来收回若干大企业后，是一个可观的但还是很小的成分。不过它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命脉操在国家手中，而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之下，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

六、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将要决定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

七、在前项基本矛盾的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而小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

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大量的独立的小生产者，一方面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又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255]。

八、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应如下：

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因要急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这就是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256]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

九、我们从国民党政府及战犯手中可接收不少的大企业，

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也将逐步收回或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剩下的私人资本的大企业,已经不多。铁路、银行、对外贸易、邮政、电报、大钢铁业、盐业、纸烟业和大部分矿山、轮船、纺织业等,将由国家经营或由国家监督经营。目前的问题是:(1)我们还没有制订完备的经济方针,还没有完备的经济计划;(2)我们的干部还不懂得管理经济,大批最好的干部还在忙于军事,无暇来学习经济;(3)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领导的经济机关,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国营经济常出现无组织无政府状态,互相竞争,商人资本家则从中渔利。中央拟于最近发布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决议,建立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各省各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财政、工业、铁路、船运、邮电、农业、商业各部及国家总银行与各专业银行,并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257],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建立国营、省营、县营、市营各企业间的正确关系。

十、我们在土地改革已完成的地区组织了许多劳动互助组。还拟普遍地组织消费合作社、农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及劳动互助组。要办学校训练干部,并建立全国性的合作社领导机关及合作银行。

十一、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有可能在颇大的范围采用,也很需要。其形式是租让、加工、定货等。现在已有少数加工、定货企业。

十二、依国家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发展的程度,适当地实行某些物品的配给制,以保证军队、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及学校学生的生活。对市场则采用调剂物价的政策,以与奸商作斗

争。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以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和工业，逐渐地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

十三、很明显，苏联及东欧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上述任务的实现，是有重大意义的。这种援助我想有以下几方面：(1)经验上的援助；(2)技术上的援助；(3)资金上的援助。此外在物资方面似应实行某种程度和范围内的经济互助。如果这种援助和互助是很大的，那就可能帮助中国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

十四、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

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各位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深深地懂得：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才能战胜压在自己头上的强大的敌人，并在战胜这些敌人后巩固胜利的果实，成功地建设新中国。但在过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百端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没有能够在组织上最后地形成起来，或者初步地形成起来又被

^{*} 这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破坏。然而，在今天由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基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5]反动派的统治以及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增高，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得以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就是表示这种新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及其在组织上的最后形成。这种团结的基础十分巩固，团结的规模十分广大，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虽然仍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这种团结，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这种革命大团结了。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在今后，它也一定要继续为这种大团结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今后所要采取的态度。我们也希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以至全国人民，对今天开幕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今天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有它的坚固的政治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即将由政协筹备会提交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它是如此的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共同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及政治协商会议，在世界上将是无敌的。

中国共产党要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是因为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这个最低纲领，既已全部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除开自

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知道,不独是今天实现新民主主义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就是到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一样地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注 释

- 1 “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著名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当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时,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1页。
- 2 奉直军阀即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奉系军阀是指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天省(今辽宁省)籍军阀集团,直系军阀是指以冯国璋、曹锟等为代表的直隶省(今河北省)籍军阀集团。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洋政府,并占据着东北、京、津及直隶北部、山东北部;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占据着直隶南部、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第1页。
- 3 这里是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第2、171页。
- 4 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一九〇五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积极协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军需总监等职。一九二五年八月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第4页。
- 5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

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一九一四年,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孙中山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改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依靠这一合作进行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具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性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第 4、15、20、35、55、77、89、95、110、176、229、234、246、290、309、371、373、379、387、400、411、421、426、433 页。

- 6 苏维埃 是俄文 Совет 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它所控制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第 11、19、32、39、49、75、245、319、389、415 页。
- 7 黄色工会 原指为资产阶级所收买、控制的工会。一八八七年法国蒙索明市工人罢工,资本家收买工贼组织了一个假工会,来破坏工人罢工。当时罢工工人打碎了这个工会会所的玻璃窗,资方改用黄纸糊窗子。从此,资本家操纵的工会被称为黄色工会。中国的黄色工会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会。——第 14、28、37、62 页。
- 8 当时上海出版业工会,是国民党改组派操纵的一个工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大东书局工人举行罢工时,出版业工会曾发动商务、中华、世界、民智等书局工会发表宣言,表示支持。大东书局的工头为了执行资本家的命令,破坏罢工,就带领工人退出出版业工会,并进行复工。大东书局党组织的负责人,没有识破资本家和反动工头的阴谋,并且不懂得在出版业工会内部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性,从左的错误观点出发,为了摆脱出版业工会的领导,也赞同退出黄色工会。——第 14 页。
- 9 赤色工会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第 14、28、37、62 页。
- 10 指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第 14 页。
- 11 作者在此文中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应参加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批评了退

- 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但沿用了当时中央文件中“消灭黄色工会”的提法。——第15页。
- 12 蒋派 指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派。——第15页。
- 13 改组派 是中国国民党的派别之一。一九二八年底,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第15页。
- 14 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四一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任主席。——第15、173、276页。
- 15 国际五次大会 指一九三一年八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16页。
- 16 布尔什维克 是俄文 *Большевик* 的音译,意即多数派。一九一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了多数票,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曾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第17、24、40、64、71、163、184、220、227、292、334、414页。
- 17 见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第21页。
- 18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错误,称为“立三路线”。同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在会上也承认了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改正了错误,在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23、71、296、334页。

- 19 “六大”的决议 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第 25 页。
- 20 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第 25、57、245 页。
- 21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驻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迅速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第 25 页。
- 22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英勇抗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抗战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终于失败。这次事件被称为“一二八”事变。——第 25、253 页。
- 23 王正廷(一八八二——一九六一),浙江奉化人。一九二八年六月起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学生到外交部请愿,激于义愤,将他痛打。同年九月三十日王被迫辞职。——第 27 页。
- 24 上海工联 即上海工会联合会,是上海各赤色工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九年六月成立,一九三六年结束。——第 28 页。
- 25 反帝同盟 指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第 28 页。
- 26 民众抗日会 即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六日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抗日组织。——第 28 页。
- 27 左联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六年初,为了更广泛地组织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第 28 页。
- 28 社联 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成立,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其成员大部分参加各界救国国会,社联即停止活动。——第 28 页。
- 29 灰色团体 指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或由与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组织的,

- 但不以革命面目出现因而可能避免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的群众团体。——第 29、62 页。
- 30 大革命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第 32、48、77、172、241、246、290、308、375、411、425 页。
- 31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比李立三更左的指导思想批判李立三的错误,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作者在此文中对四中全会的看法,是当时党内对四中全会的一般认识。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四中全会的错误作出了正式的结论。——第 32、56、247 页。
- 32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建立由各党派联合组织的国防政府和由各抗日武装部队联合组织的抗日联军。这一主张后来未能实现。——第 33、39、86 页。
- 33 工厂法、工会法是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九年公布的。——第 35 页。
- 34 苏维埃劳动法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一九三一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同年十二月颁布。劳动法体现了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原则。——第 36、71 页。
- 35 民族扫墓运动是国民党于一九三四年发动的清明节祭扫黄帝陵及中华民族其他历史人物陵墓的运动。——第 36 页。
- 36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进行军事“剿共”的同时,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艺术化”等为口号,宣扬封建道德和法西斯主义。当时我党领导工人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曾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过“整齐清洁”生活的虚伪口号,向统治者争取工人群众的经济利益。——第 36 页。
- 37 京东与保属的干部即中国共产党冀东特委和保定特委所属的干部。——第 42 页。
- 38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和指挥伪蒙军,两次向绥远东北部进攻,当地驻军傅作义所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奋起抗战,击溃了日军和伪蒙军,并于十一月下旬乘胜收复了百灵庙等地。这就是绥东事件。——第 50 页。

- 39 晋绥当局 指当时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及其所属的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第 50 页。
- 40 冀察、南京当局 指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第 50 页。
- 41 牺牲封建地主的利益 指中国共产党当时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党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作了相应的改变。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第 52 页。
- 42 指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第 55、72 页。
- 43 “八七”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坚决地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但是,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不认识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退却,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第 56 页。
- 44 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3 页)。——第 57 页。
- 45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2 页)。——第 63 页。
- 46 指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第 69 页。
- 47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曾规定: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凡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团;党团的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把“党团”改称“党组”。——第 70 页。

- 48 西安事变 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的艰苦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 73、250 页。
- 49 东北军 即张学良统率的原东北边防军。西北军指杨虎城统率的第十七路军。——第 74 页。
- 50 北洋军阀 是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窃据大总统地位,培植党羽,形成了控制中央和许多省份的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历时十七年的北洋军阀从此覆灭。——第 76、172 页。
- 51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精神,派遣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国民党各级的领导工作。党内合作的形式 即指这种统一战线形式。——第 77 页。
- 52 十年苏维埃运动 指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和保卫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运动。——第 77 页。
- 5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四项原则,其内容是: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第二,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

- 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第78页。
- 54 芦沟桥事变 也称“七七”事变。芦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第80、117、230、253页。
- 55 领导战争的政党与军政当局 指国民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第81页。
- 56 八路军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之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依据与国民党政治谈判的结果,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同年九月,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八路军一直在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粉碎了日、伪军的反复“扫荡”,并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屡次进攻。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九十余万人。——第81、92、94、173、231、238、243、251、305、315页。
- 57 会门 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由于这类组织的落后性,也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地主豪强势力甚至日伪所利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为团结一切抗日民众组成统一战线,曾对一些会门采取了联合和争取的策略。——第84页。
- 58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东北各地人民和国民党一部分在东北的爱国军队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这些武装通称东北义勇军。——第84、95页。
- 59 民团 是旧中国农村中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组织的武装。——第85、91页。
- 60 伪蒙军 指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为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所属军队。——

- 第 85 页。
- 61 维持会 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政权。——第 88 页。
- 62 复选制 是间接选举的一种形式。先由选举人选出代表,称初选;再由代表投票选举,称复选。——第 89 页。
- 63 聂荣臻(一八九九——) ,四川江津人。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 90 页。
- 64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很多都是在两省或几省交界的地区,所以称为边区,如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等。——第 90、96、259、363 页。
- 65 宋劭文(一九一——) ,山西太原人。中共党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山西省五台县县长、山西省第一区政治主任公署主任、专员公署专员。一九三八年一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时被选为主任委员。——第 90 页。
- 66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为抗战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第 91 页。
- 67 累进税 是随着纳税人应该纳税的收入(或财产价值)的增加而递增税率的税,收入越高,交税的比率越高。——第 91 页。
- 68 民先队 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青年团体。一九三六年二月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蒋介石政府强迫解散。解放区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第 91、96、249 页。
- 69 蒋、阎 指蒋介石、阎锡山。——第 91 页。
- 70 绥远 原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 91、371 页。
- 71 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 ,湖南桑植人。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师师长。——第 92 页。

- 72 关向应(一九二二——一九四六),辽宁金县人。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师政治委员。——第92页。
- 73 战委会即战地动员委员会,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山西等地建立的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它是发动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战的动员机关,又是游击战争的领导机关。在有些地区,国民党的政权机关撤走后,它还起过政权机关的作用。——第92、255页。
- 74 牺盟会即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建立的一个地方性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省的抗日战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阎锡山在牺盟会建立初期表示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公开摧残牺盟会,许多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杀害。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第93、261页。
- 75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抗战发展壮大起来,因而不许人民群众起来抗战,只实行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片面的军事抗战。——第94页。
- 76 国际上调解“中日冲突”的活动指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英、美、德等帝国主义企图以牺牲中国权益为条件来结束中日战争的调解活动。这一年八、九月间,英、美等国多次表示愿意出面“斡旋”,十一月间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但未能取得结果。与此同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多次向蒋介石政府提出和谈条件,实行劝降,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第94页。
- 77 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77页)。——第98页。
- 78、79、80 本文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编辑部注:在这三处的“反革命”一词后面,在一九六二年版都加了“和改良派”四字。这不是作者本人加的,而是本书的编辑人员加了而经过作者同意的。现在这三处仍按一九四九年版。——第99页。
- 81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公元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立者。这里的引文见《论语·为政》。——第101页。

- 82 孟子(公元前三七二——公元前二八九),名柯,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是儒家学说的主要继承者。这里的引文见《孟子·告子下》。——第101页。
- 83 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3页)。——第101页。
- 84 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第104页。
- 85 见《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9—450页)。——第104页。
- 86 见斯大林《致工人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第104页。
- 87 见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164页)。——第105页。
- 88 见《孟子·告子下》。——第106页。
- 89 曾子(公元前五五——公元前四三六),名参,春秋时鲁国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孔子的学生。这里的引文见《论语·学而》。——第109页。
- 90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名《诗》,后世称为《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内分《风》、《雅》、《颂》三大类,共三百零五篇。这里的引文见《诗经·卫风·淇奥》。——第109页。
- 91 三民主义 是孙中山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第110、174、261页。
- 92 总理遗嘱 指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病危时的遗嘱。全文如下:“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第110页。

- 93 见《论语·乡党》。——第 111 页。
- 94 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499—500 页)。——第 112 页。
- 9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4 页)。——第 119 页。
- 96、97 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84、294 页)。——第 119 页。
- 98 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68 页)。——第 119 页。
- 99 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2 页)。——第 120 页。
- 100 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68—269 页)。——第 120 页。
- 101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0—201 页)。——第 126 页。
- 102 本文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编辑部注:这里的引文以前各版在“由于这一切原因,”以下,省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等字。作者可能因为重点是要说明消灭阶级必须经过非常“艰难的工作和斗争”,所以作了这种省略。考虑到这里的省略不免对引文原意有所影响(这与上一段引文中的省略不同),现在加以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这种省略说成是作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证明。凡是能够看懂这段文字的真实意义的人,都会明白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第 126 页。
- 103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1 页)。——第 126 页。
- 104 指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一八八一——一九四八)。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路德维希访问苏联时,曾受到斯大林接见。详见《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98—312 页)。——第 128 页。
- 105 彼得大帝(一六七二——一七二五),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皇

- 帝。——第 128 页。
- 106 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488 页)。——第 130 页。
- 107 见宋朝范仲淹《岳阳楼记》。——第 132 页。
- 108 见《孟子·滕文公下》。——第 132 页。
- 109 见《论语·子张》。原文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第 132 页。
- 110 慎独 是儒家的用语,意思是: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能谨慎遵守道德原则。原文出自《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第 133 页。
- 111 斯达汉诺夫(一九一六——),苏联顿巴斯的采煤工人,煤炭工业中的著名革新者。由于他运用新技术和改进劳动组织,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创造了在五小时四十五分钟内用风镐采煤一百零二吨的记录,相当当时定额的十四倍。这一先进事例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即斯达汉诺夫运动。——第 143 页。
- 112 阿比西尼亚 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的东北部。——第 144 页。
- 113 见《伊索寓言》中的《蝙蝠与黄鼠狼》。故事是:一只蝙蝠跌在地上,被黄鼠狼捉住,他请求饶命。黄鼠狼说不能放他,因为黄鼠狼生来是与鸟类为敌的。蝙蝠说他并不是鸟,而是老鼠,因此就被放了。后来他又跌在地上,被另一只黄鼠狼捉住,他请求不要吃他。黄鼠狼说自己恨所有的鼠类,蝙蝠说他并非老鼠,乃是蝙蝠,就又被放走了。蝙蝠就这样地两次改了他的名字,救了性命。——第 147 页。
- 114 陈独秀(一八八——一九四二),安徽安庆市(原怀宁县)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否认无产阶级应当继续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和托派分子相结合,一九三一年五

- 月曾被中国的托派组织推为总书记。一九三二年九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第 148、218、241、280、296、334 页。
- 115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第二、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后任红军总政委。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和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第 148 页。
- 116 抗大 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第 150 页。
- 117 见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01—502 页)。——第 152 页。
- 118 见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59 页)。——第 154 页。
- 119、120 见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7 页)。——第 161、162 页。
- 121 见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09—310 页)。——第 162 页。
- 122 新四军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力之一。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的协议,决定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下辖四个支队。随即挺进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重整了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部队改编为七个师,继续坚持抗战,创立、发展和巩固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新四军发展到三十多万人。——第 168、173、

- 231、244、266、315、372 页。
- 123 两个特委 指中共江北特委和中共苏北特委。——第 169 页。
- 124 革命的三民主义 也称“新三民主义”，详见本书注 91。——第 171 页。
- 125 北伐战争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并组织了革命军队。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军向湖南挺进。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八月在湖北击溃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十一月在江西歼灭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十二月占领福建、浙江，一九二七年三月进入南京、上海。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战斗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并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所以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大江、黄河流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篡夺。——第 172、290、333 页。
- 126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成员的组成，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故称“三三制”。——第 174、225、283 页。
- 127 抗战建国纲领 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第 175 页。
- 128 欧洲社会民主党 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等的统称。这些党大多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早期曾对各国工人运动起过积极作用。十九世纪末年以后，各国党内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迅速滋长，绝大多数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了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党内的左派则分裂出去，在一九一九年以后陆续成立各国共产党。——第 179、297 页。
- 129 见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7 页）。——第 181 页。

- 130 见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498页)。——第181页。
- 131 第一国际 即国际工人协会,一八四六年九月在伦敦成立,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指导了各国工人运动,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斗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一八七六年七月,根据马克思的提议,第一国际正式宣布解散。——第182页。
- 132 第二国际 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陷于破产。——第182页。
- 133 一九 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反对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在投票选举党中央机关时,该派只获得少数选票,故称为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是俄文Меньшевик的音译,原意为少数派)。他们的观点被称为孟什维主义。——第183、290页。
- 134 俄国的经济主义派 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以普罗科波维奇、库斯科娃为代表。他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工人运动的任务只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经济主义派即因此而得名。一八九九年曾发表宣言,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要求放弃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放弃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要求。列宁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同经济主义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第183页。
- 135 工团主义 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流传很广。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索烈尔、拉加德尔等人。工团主义者反对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由工会领导和组织生产,以工会代替国家机构。——第183页。
- 136 左派共产主义的一派 指一九一八年一月布列斯特和谈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核心人物是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

- 基、皮达可夫和拉克狄等。他们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认为继续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可以促进国际革命,只有在西欧各国革命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才能巩固。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苏维埃政权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他们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在企业中建立纪律和实行经济核算,认为这是恢复资产阶级秩序。列宁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八年夏承认了错误。——第 189 页。
- 137 布列斯特和约 指一九一八年三月苏维埃俄国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所签订的和约。按照这个和约,苏俄丧失领土并付出巨额赔款。这是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革命妥协。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随着德国的被战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个和约。——第 189 页。
- 138 关于工会问题的论争 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初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挑起的。托洛茨基反对对工人采取说服方法,反对在工会里扩大民主,而主张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里来,并提出了立刻把“工会国家化”的要求。列宁先后发表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等文章,批判了托洛茨基的错误。——第 189 页。
- 139 召回派 是俄国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波克罗夫斯基。他们主张放弃一切合法斗争,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的组织,并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因此被称为召回派。一九一九年六月召回派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第 189 页。
- 140 托派 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原为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

- 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这个组织遂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进行活动。——第 199 页。
- 141 中国党秘密活动的十年 即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合法地位,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第 221 页。
- 142 《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是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的讲话。《红旗》1980 年第 14 期重新发表了这篇讲话。——第 226 页。
- 143 庞友兰(一八七四——一九四七),江苏滨海人,苏北开明绅士。一九四二年十月被选为盐阜区参议会副议长。——第 227 页。
- 144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这一政策。——第 229、233、283、310、351、381 页。
- 145 整顿三风 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提出的,他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称为“三股歪风”,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第 232 页。
- 146 《联共党史》即一九三八年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主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 234、397 页。
- 14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5 页)和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36 页)。——第 238、350 页。
- 148 四项动员 指一九四一年晋绥地区动员筹粮、筹款、做军鞋和参军。——第 240 页。
- 149 收回英租界 指一九二七年收回汉口英租界。同年一月三日,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集会。当宣传员在英租界附近广场演说时,英帝国主义公然指使大批武装水兵用刺刀驱赶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暴行,激起了武汉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向英国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一月五日,武汉数十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大会。会后革命群众英勇地驱逐了英国巡捕(租界内的警察),占领了英租界。武汉国民政府接受群众的要求,派军队进驻租界,

- 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第 241 页。
- 150 “八一宣言”即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第 245 页。
- 151 “华北事变”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系列事件。这一年五月底,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六月初,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会商。七月六日,何应钦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六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又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更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十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汉奸在河北省东部举行暴动,一度占领了香河县城。十一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第 245 页。
- 152 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 ,山东乐陵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第 246 页。
- 153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次运动,历史上称“一二九”运动。——第 246、308 页。
- 154 这里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第 246、296 页。
- 155 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 247 页。
- 156 “六大”指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

- 代表大会。——第 247、317 页。
- 157 指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第 248 页。
- 158 张东荪（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当时是国家社会党的首领及《自由评论》的编辑。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张东荪在《自由评论》第 10 期上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一文，对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进行了评论，文章虽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也有错误观点。刘少奇写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署名陶尚行，发表在《自由评论》第 22 期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批评了张东荪的错误观点。——第 248 页。
- 159 走私 原指违反海关法规，非法运输、携带、邮寄货物进出国（边）境的行为。这里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华北的经济侵略，非法偷运和武装护运大量日本货物入口，占领中国市场，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第 248 页。
- 160 《火线》是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天津创刊，秘密发行。一九三八年转移至平西根据地出刊。——第 250 页。
- 161 即本书《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第 250 页。
- 162 冀东抗战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国军队在冀东喜峰口一带长城线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对日妥协政策，这次抗战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而结束。——第 253 页。
- 163 国共宣布合作 指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被迫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公开发表，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 254 页。
- 164 宋时轮（一九〇七—— ），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兼该纵队第十二支队司令员。——第 254 页。
- 165 北方局的书面决定 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北方局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即本书《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一文。——第 256 页。
- 166 察哈尔 原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第 258、371 页。

- 167 韩复榘(一八九一——一九三八),河北霸县人,国民党地方军阀。当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不战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的十多天时间里,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国土。——第 258 页。
- 168 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〇),山西五台人,长期统治山西省的军阀。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督办等职。一九三二年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 261 页。
- 169 绥远事变 这里指绥东事件,见本书注 38。——第 261 页。
- 170 决死队 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第 262 页。
- 171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时提出“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他对统一战线的主张和依据这种主张而采取的行动以后被概括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践证明这一口号是错误的,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评并纠正了这一口号。——第 265 页。
- 172 博古 即秦邦宪(一九一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一九三八年起先后任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第 266 页。
- 173 六中全会 即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 266、361 页。
- 174 一九四一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

- 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少数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接着，蒋介石又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在华中、华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中国共产党严厉驳斥了蒋介石的反动命令，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整并扩大了新四军部队。——第 266 页。
- 175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政府强迫停刊。——第 268 页。
- 176 李先念（一九 七—— ），湖北红安人。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 275 页。
- 177 彭雪枫（一九 七——一九四四），河南镇平人。当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四一年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区司令员。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战斗中牺牲。——第 275 页。
- 178 吴芝圃（一九 六——一九六七），河南杞县人。当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第 275 页。
- 179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国民党中央在一九三九年春秘密颁布的。这个文件规定采用各种法西斯统治的方法，控制、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他们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规定实行“联保连坐法”，并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第 276 页。
- 180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美、英帝国主义曾多次酝酿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个阴谋因和一九三八年英、法两国通过与德、意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出卖给德国的阴谋相类似，所以叫做“远东慕尼黑”，或称“东方慕尼黑”。——第 276 页。
- 181 反共高潮 指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日益加剧。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下令蒋鼎文部侵占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和镇原五县城；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队等山西新军；一九四 一年春，蒋介石又下令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大举进攻我冀南和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予以坚决的反击，一九四 一年三月消灭国民党三个师，肃

- 清了盘踞在华北各解放区内部的反共顽固派。这样,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第 278 页。
- 182 第二次反共高潮 即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阴谋策划的围攻皖南新四军的事件。详见本书注 174。——第 278 页。
- 183 韩国钧(一八五七——一九四二),江苏泰县海安镇(今属海安县)人,是著名的开明绅士,曾多次参与调解苏北国民党顽军同新四军之间的磨擦。——第 278 页。
- 184 二次黄桥战斗 指著名的黄桥决战。一九四一年十月初,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指挥二十六个团三万余兵力向驻泰兴县黄桥镇的新四军发动进攻,妄图消灭新四军苏北部队。新四军七千余人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奋起还击,激战四天,把韩部击溃。此役共歼国民党顽军一万一千余人。——第 280 页。
- 185 韩德勤(一八九一——),江苏泗阳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第 280 页。
- 186 参议会 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而设立的,具有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机构。——第 283 页。
- 187 整风 即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参见本书注 145。——第 288、300、319、415 页。
- 188 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第 289、416 页。
- 189 详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56—157 页)。——第 289、416 页。
- 190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解放社 1942 年版,第 19—21 页)。今译文见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9—130 页)。——第 295 页。
- 191 彭述之(一八九六——),湖南宝庆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追随陈独秀积极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大革命失败

- 后,成为取消主义分子,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第 296 页。
- 192 托陈取消派有其欧洲托派的衣钵真传 指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与托洛茨基有直接联系。托陈取消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完全照搬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一九二九年,托派分子刘仁静由莫斯科经欧洲回国途中,曾专程前往土耳其会见托洛茨基,带回了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分子起草的纲领草案。这一草案被一九三一年五月召开的中国托派的统一大会接受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政治纲领。——第 297 页。
- 193 整顿三风报告 指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三个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和《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第 298 页。
- 194 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 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延安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边区各工厂和生产合作社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和工人的代表共二百余人。会议总结了边区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讨论并确定了进一步发展边区工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第 302 页。
- 195 邓发(一九一六——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等职。——第 305 页。
- 196 中央妇委 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第 307 页。
- 197 小陶 即陶端予(一九二一——),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市。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科干部。她在深入农村开展工作期间创办的延安杨家湾小学,成为全边区模范小学。——第 308 页。
- 198 伯乐 相传古代善于相马的人。这里比喻善于发现人才的人。——第 313 页。
- 199 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第 314 页。
- 200 马克思主义小组 或称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一九二一年,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工人罢工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国外,东京和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进一步为

-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第 339 页。
- 201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043—1044 页)。——第 343 页。
- 202、203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045 页)。——第 343 页。
- 204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044 页)。——第 343 页。
- 205 参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47 页)。——第 354 页。
- 206、207 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86 页)。——第 361 页。
- 208 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495 页)。——第 361 页。
- 209 国共谈判 指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出现了内战危机。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八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十月十日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权利,但是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以致无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继续谈判。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第 371 页。
- 210 热河 原是一个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二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第 371、373 页。
- 211 红军 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后,因中苏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军队。——第 371 页。
- 212 傅作义(一八九四——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

- 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第 371 页。
- 213 马占山(一八八七——一九五) ,吉林怀德人。当时任国民党东北挺进军司令。东北挺进军当时归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第 371 页。
- 214 胡宗南(一九 二——一九六二) ,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里是指他的第三十四集团军,这支部队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由陕西进入河北,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第 371 页。
- 215 冀热辽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原称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军事领导机关称冀热辽军区,分别隶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因形势发生变化,并未付诸实施。十月,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分别隶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领导。原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改为冀东区党委、冀东军区。——第 372 页。
- 216 李富春(一九 一——一九七五) ,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 372 页。
- 217 林彪(一九 七——一九七一) ,湖北黄冈人。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当时在派赴东北途中。——第 372 页。
- 218 罗荣桓(一九 二——一九六三) ,湖南衡山人。当时任中共山东中央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治委员。——第 372 页。
- 219 陈毅(一九 一——一九七二) ,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第 372 页。
- 220 饶漱石(一九 三——一九七五) ,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第 372 页。
- 221 晋冀鲁豫军区 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太岳军区、太行军区、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第 372 页。
- 222 黄克诚(一九 三——) ,湖南永兴人。当时是调至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第 375 页。
- 223 梁 即梁兴初(一九一二——) ,江西吉安人。当时任调至东北的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罗 即罗华生(一九一 一——) ,湖南湘潭人。当时任调

- 至东北的山东军区第二师师长。——第 375 页。
- 224 内战时期解决土地问题所采用的方式 指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的十年内战时期采取的没收地主一切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政策。——第 381 页。
- 225 政协决议 指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其中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条文是：“实行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证交租，扩大农贷，严禁高利盘剥，以改善农民生活，并实行土地法，以期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第 382 页。
- 226 指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第 383 页。
- 227 《土地法大纲》即《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颁布。——第 385 页。
- 228 “五四指示”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见本书第 377—383 页。——第 385 页。
- 229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七月，《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又提出“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八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第 385 页。
- 230 指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十一日刘少奇的《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第 386 页。
- 231 董老 即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第 394 页。
- 232 刘 即刘伯承（一八九二—— ），四川开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邓即邓小平（一九 四—— ），四川广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第 395 页。
- 233 中央苏区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位于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第 395 页。
- 234 参见列宁《火星报 编辑部声明》（《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16 页）。——第 397 页。

- 235 安泰 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地神之子。他在同对手搏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被对手举在空中扼死。——第 397 页。
- 236 “客里空”是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一个惯于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后来我国新闻界借以泛指那些脱离事实、虚构浮夸、说空话的新闻报道作风。——第 399 页。
- 237 戈尔洛夫是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一个高傲自大、故步自封的前线总指挥。——第 400 页。
- 238 《申报》一八七二年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停刊。——第 401 页。
- 239 《人民日报》当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创刊。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第 401 页。
- 240 《大公报》一九二二年在天津创刊。曾先后出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版。解放后,上海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继续出版。后移至天津,又迁北京,一九六六年停刊。现有香港《大公报》。——第 405 页。
- 241 黄维(一九〇四——),江西贵溪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七五年特赦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第 408 页。
- 242 胡宗南 当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 409 页。
- 243 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广西桂林人,国民党桂系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第 409 页。
- 244 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1 页)。——第 409 页。
- 245 参见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57—458 页)。——第 411 页。
- 246 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68 页)。——第

- 411 页。
- 247 指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等文件。——第 411 页。
- 248 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即李世民。唐代皇帝。——第 413 页。
- 249 魏徵（五八——六四三），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时，曾任谏议大夫和秘书监等职。——第 413 页。
- 250 参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12 页）。——第 415 页。
- 251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采用这种制度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议会为立法机关，并有组织或监督政府的权力。议会的权力大小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有所区别，但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第 415 页。
- 252 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 419 页。
- 253 陈云（一九——），上海青浦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第 421 页。
- 254 李立三 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第 423 页。
- 255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1 页）。——第 428 页。
- 256 新经济政策是苏联一九二一年开始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第 428 页。
- 257 托拉斯是英文 Trust 的音译。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很高的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它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在社会主义国家，托拉斯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之一。——第 429 页。